

法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

讓·勃呂阿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法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

讓·勃呂阿著

孙源、孟鞠如合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Jean BRUHAT
HISTOIRE DU MOUVEMENT
OUVRIER FRANCAIS
Tome premier
DES ORIGINES A LA RÉVOLTE DES CANUTS
E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2

根據法國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法国工人运动史

第一卷：自运动的起源至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義

〔法〕讓·勃呂阿著

孫源、孟鞠如合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850×1168公厘幅·印張87·插頁5·字數202,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3,200 定價(7) 1.30元

統一書號3002.45

封面設計者：牟紫东 校對者：吳季之等

目 次

序言	加斯东·蒙慕梭	1
导言		5
第一章	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31
第二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工人和阶级斗争	73
第三章	人民群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93
第四章	资产阶级国家的诞生	129
第五章	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妥协和初期的工人斗争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	172
第六章	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	213
第七章	总结	257
大事年表		264
人名对照表		269
地名对照表		274

序 言

我們当然已經有了一些專供各級学校作教材用的“法国史”。我們無意貶低它們的价值，然而它們都只是些按照年代順序編写，向学生介紹历史事件的文集。这些書並不解釋事件，因此，与其說是提供思考問題，倒不如說是專为別人記憶而写的。

我們至今还缺少一部揭示社会各階級、各階級之間的利害冲突、由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斗争以及由斗争而發生的变化，並运用历史科学方法把所有这些都加以認真分析的真正的法国通史。

更不用說，到目前为止，我們还没有一部真正的法国工人运动史。过去虽然也曾有人在这方面作过一番努力，但都不能算做信史。

法国工人运动是在一定的时期，在資產階級社会的內部誕生的，它是人剝削人的制度的社会产物，是在資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同資本主义的殘酷剝削制度势不兩立，通过一个战斗又一个战斗而生長、扎根並壯大起来的。

而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历史是和資本主义的历史、它的發展、全盛、沒落和腐朽分不开的；同时，法国的历史也是和随着資本主义發展而日益壯大並孕育着民族复兴一切必然性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分不开的。

要想編写一部工人运动史，必須先对法国历史作一番透徹的

研究。我在这里有责任並以愉快的心情，以法国总工会的名义向讀者推荐的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第一卷。

* * *

这一部巨著一共分为四卷。它的作者勃吕阿同志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欽佩。他是迄今为止有勇气並怀着值得我們欽佩的責任心，担負起这样一件重要工作的第一个历史家。

一个讀者如果想对法国工人运动史获得一个正确的認識，即使他很有見解，也必須在浩如烟海的資料中埋头閱讀和研究好多年之久。

勃吕阿却光輝地完成了这项难能可貴的工作；在我們現在向大家介紹的这部历史中，作者並非把旁人說过的話概括地叙述一番，而是創造性地加以撰写。只是为了写这本书的第一卷，作者就化了整整一年的時間。

勃吕阿第二个值得我們欽佩的地方是他的文笔清晰，並善於从無數事件和斗争中找出一条綫索来，由於有那么一条綫索，讀者在閱讀中就不再会有暗中摸索或迷失方向的苦惱。

勃吕阿第三个值得我們欽佩的地方，就是他成功地做到了这样一点：他不是为历史学家，而是为历史的創造者——工人們写了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

这样写出来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就成为运用非常生动的群众的語言，並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产物。

我敢說这是本令人讀来爱不忍釋的書，而且在讀完之后，我們会感到以前是如何缺乏这样一部历史書！

勃吕阿这部历史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在書中，作者随时随地为讀者着想，按照情况的需要加入一些挿話，或者更确切地說，他从史实里提出一件关键性的事实来加以鋪叙，並讓历史人物嘴上

哼着过去岁月中的古老的、富有人情味的革命歌曲，如实地走上舞台，作者还引用一些小故事，下个结论，然后再把读者引到历史中去，不使读者感觉些微的疲劳。

我认为这是一部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它一定会从我国流传出去，流传到很远的地方，而劳工介绍所、职工会以及从醇朴的工人直到知识分子都会渴望手中有这样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他们的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一卷所包括的时期是从工人运动起源——法国大革命——直到里昂丝织工人起义（一八三一年）为止。

现在我在这里只提一下本书的结论，因为单单这个结论就已足够说明勃吕阿为工人编写的这部工人运动史是如何的生动了：

“然而，里昂丝织工人的斗争并不是徒劳无功的。在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报纸‘工场回声’就追怀他们说：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们！愿压在你们身上的泥土不致于使你们感到沉重！……你们的鲜血滋润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长出无产者解放之树！”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们！自从工人阶级的一位新闻记者写下了这几句充满革命感情的、壮丽的和具有预言性的话到现在，一百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把这几句话重新拿来献给当今的许多无产阶级战士们：被贝当的警察酷刑杀害的抗战烈士们——皮埃尔·瑟马、丹波、布尔玛尔赫……被资本主义国家代理人在瓦伦斯，在马赛以及在费尔弥尼等地杀害的罢工工人们……

工人运动史的全部过程正是给我们说明了反动阶级是如何一贯地使用暴力来镇压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自己的面包、保卫自己的权利的工人阶级的。

安息吧，一八三一年十一月起义的烈士們！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長出無产者解放之树……八十六年之后，偉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和資本主义的政权，並在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無产阶级的政权。

安息吧，斯大林格勒的烈士們！你們是里昂絲織工人的弟兄，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無产者的解放之树正在那里不可战胜地成長壯大。

編写这部历史的时辰已經到来了，因为它不仅是行动的指南，而且也是信心的泉源，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历史的前进。

法国总工会書記 加斯东·蒙慕梭

导 言

这一部法国工人运动史共分四卷：

- 一、自运动起源至一八三四年；
- 二、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七一年；
- 三、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七年；
- 四、一九一七年至今日。

以上所选每一个年代都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和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的絲織工人举行起义。这在历史上是工人阶级真正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摆脱贫困，所展开的第一次战斗——巴黎和其他城市也在同一时期发生了骚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纲领，没有远景，没有组织。当时并不是没有社会主义理论家，然而这些理论家和工人的斗争是脱节的。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团体，然而这些团体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当时并不是没有工人阶级活动家，然而这些活动家都很接近手工业者，以为无产阶级只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就能自我解放。对于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工人运动的前史。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出现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一八三四年以后，无产阶级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这个将近

四十年的时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的高漲，而资本主义的高漲就必然导致工业和金融资本进一步的集中。一八四八年，无产阶级又展开了斗争。“六月起义”比起絲織工人的起义来，毫無疑問是前进了一步。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产党宣言”，这个宣言实现了理論和实践的統一，即社会主义和工人斗争的統一。

工人阶级的組織多起来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起而於一八六四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在法国虽然遭到了迫害和审訊，还是团結了大批工人。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共产党宣言”在

“它出現的时候（只是）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鋒的热烈欢迎……”那么，“国际工人协会……的目的是要把欧美工人阶级所有一切具有战斗能力的分子統一成为一个偉大的軍隊。”^①

規模巨大的罢工爆發了，工人們在罢工中表现了空前的大团結，一八六四年法国工人迫使政府承認罢工权。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爆發的起义基本上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質，因为这是工人阶级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即能实现社会解放的工人阶级的国家——而进行的首次尝试。

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在农民及士兵的协助下取得了政权。这一个事件，对国际工人运动，尤其对法国工人运动，發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殘酷的战争已經进行了三个年头。这个战争是应当由资本主义制度負責的。法国工人阶级，由於被其变节的領袖們引入迷途，沒有立即採取反战行动。

^①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一八九〇年德文版所作的序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五頁。

但是自一八七一年以来，法国工人运动已经有了迅速的进展。法国工人在一八八四年争得了组织职工会的权利，在一八九五年奠定了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并把许多自称属于工人阶级的议员选入了议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工人更加集中，阶级矛盾也更趋尖锐了。可是，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对杀气腾腾的资本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然不顾政府镇压，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但是它当时的行动仍是出于“本能”^①而缺乏理论指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还深信工团主义足够应付一切，只要有少数意志坚决的人就能排除任何障碍。因此，当一九一四年若列斯被谋杀之后，工会运动的领袖雷昂·若奥、皮德加莱、杜穆林等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头子和社会党的首领们，不顾代表大会的决议，不顾工人们所明白表示的反战决心，号召大家自我牺牲，努力为旨在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效劳时，法国工人阶级就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但是，俄罗斯弟兄们所获得的胜利重新使法国工人发现，有理由可以希望工人运动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他们很快就展开了反战斗争。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同时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一九一七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本书将从这个开端起至今天为止作为另一个阶段来叙述。

由此可见：一八三四年，一八七一年和一九一七年都是些真正“关键”性的年份。这些年份都各自标志着前一个发展过程的终点和另一个新高潮的起点。



^① 加斯东·蒙燕梭语。见蒙燕梭为列宁著“职工会在新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和任务”所作的序言，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七页。

我們所写的只不过是一部嘗試作，希望讀者提出批評、幫助，以便我們將來重新加以整理、补充新的材料、进行修正使其更加完善丰富^①。

不过我們在这里还必須提一提哪些是我們所遵循的基本观点。

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财产。法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完全不是偶然的。法国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法国封建制度被推翻之后，“共产党宣言”發表之前，在法国产生的全部学說，同时也包括了、而且主要是包括了法国無产階級斗争的經驗。恩格斯曾經指出：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历史上發生的階級斗争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国更加达到徹底的結局；而这种階級斗争所借以进展以及斗争結果所由以表現的变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是在那里造成得更为确定。法国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国的模范，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創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其所具有典型式的明显性实为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而抬起头来的無产階級反对那占有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未見过的。”^②

① 我們知道，在目前企圖着手写任何綜合性的东西还为时过早。因为，關於工人运动史，我們不僅需要更多的有关职工会、工人联合会和罢工运动等的專書，不僅需要进行更多的現場調查，不僅需要就工資發展史、就工人階級的構成进行更多的研究等等，而且还需要就目前已有的、在極大程度上受了資產階級观点和仇視無产階級革命組織的情緒影响的一切作品进行分析批判。这一件双重工作（写作和批判）一天未完成，一切綜合性的东西就只能是暫时的。

② 恩格斯为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八八五年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二一——二二二頁。

我們並不是想写一部学术巨著，我們只是想尽量把一切有关法国工人运动史的重要論著收集一起。正如恩格斯所說过的：

“当然，空話在这里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大批經過有批判地挑选並完全融会貫通的历史材料，才能够实现这一个任务。”

如果想用科学观点来研究工人运动史，那就必須从事实出發而絲毫不能憑今說古，如若不然，那就是抹煞历史的条件和历史的發展。我們不是为往事而回忆往事，不是为消遣而研究历史。为学术而学术的人收集資料和集邮家收集邮票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們通曉历史——通曉工人运动的环境、工人运动的起源和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目的在於武裝自己，为爭取美好的未来而进行斗争。我們不仅要研究世界，而且要認識社会發展的規律，並改造世界。

必須指出，这种關於工人运动史的观点永远是科学的观点，而且也是唯一科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不可能在科学基础上来叙述本阶级的历史，从而也不可能叙述其他阶级的历史。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是顯扑不破的，它們是对资产阶级的譴責，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对事实耍花槍，歪曲它們或者干脆避而不談。例如有些历史学家为了使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恆性，居然跑到最古老的社会里去搜寻资本主义的遺跡，那簡直是枉費心机。相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的学者們認為资本主义並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和其他已經消灭了的經濟制度一样，終要归於消灭的。事实是，在地球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资本主义現在已經消灭了。

現代资本主义思想家之一，英国亞諾尔德·約·托因比教授，在談到他所說的“社会机体”的分裂时（他不敢提阶级斗争），竟抹煞了自己所主張的历史精神，狂妄地把現代无产阶级和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下的古代无产阶级混为一談，並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改

头换面的犹太教启示录”^①。这不就是戈培尔的论调吗？所有这些说法无非是想叫人相信已往曾经有过无产阶级，将来还永远有无产阶级。他们想叫人相信无产阶级

“是包括在社会里面的一个人群，但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在思想上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此外，还有一些著作家，他们企图开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对一八三四年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③，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屠杀和“流血的一週”的枪杀等暴行所负的责任。为了否认它是依靠压迫才得生存，为了否认它会像已经死亡的封建制度一样，将来也必然要灭亡的事实，资产阶级不得不撒谎。为了把那些毫不含糊地宣布自己就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承认实际上只是剥削别人的“自由”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们说成是人类和自由的敌人，资产阶级不得不诬蔑工人阶级。

在工人运动史方面，这种歪曲事实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人在歪曲事实时所采取的方式，其粗暴和蛮横是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了。另有一些人，像爱德华·道莱昂这些自称继承蒲鲁东衣钵的人却歌颂着法国工人运动史中落后的东西。他们洋洋得

① 亞諾尔德·約·托因比：“历史”，巴黎一九五一年版，第四四〇頁。

② 同上書，第一七頁。

③ 莫理斯·勒克魯就是这种人（參閱勒克魯著：“梯亥尔先生”，巴黎一九二九年版，第一一四至一一六頁）他夸奖梯亥尔曾“異常勇敢地亲臨火綫”，說：“这是一个不平凡和無論如何是富有教益的举动，为了維持治安，梯亥尔在一个文官參謀团的陪同之下，和軍人們混在一起，同一位將軍（即布乔——譯者）比肩出現於叛亂的中心地帶。”他說特朗斯諾南街的屠杀与梯亥尔和布乔無关，而仅仅是“一件大大的不幸”。數年之后，布乔在写給梯亥尔的信中（一八四九年四月七日）提到革命的工人時曾說：“这些畜生是多么殘暴和兇惡！上帝怎會允許做母亲的生出这样的人來呢！啊！这才真正是我們的敌人！俄國人和奧國人並不是我們的敌人。”勒克魯对这样的話是毫不在乎的。一八三六年八月五日，布乔写給梯亥尔的信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写道：“啊！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話，請你把他們都給我送來吧！我要留在非洲來結果他們的性命。这才是为祖國效力最好的办法。”勒克魯對於这样的話同样是置諸不理。他並非不知道这些文件，但他故意撒谎，因为他与那个为了捏造历史不能不撒谎的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意地标榜着手工業这个正在死亡，这个已經被資本主义制度扼杀或正在挨它最后一刀的东西。至於正在日益壯大並負有摧毀資本主义制度的使命的現代無产階級，他們却絕口不提，或則對他們的出現表示万分遺憾。

相反，工人階級則完全沒有掩飾自己历史的必要。

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的过去，沒有任何需要隱瞞的地方。工人階級既不需要隱瞞自己曾遭屠殺和受欺騙，更不需要隱瞞自己曾被詐取和剝削。工人階級對自己的奋斗目标也毫無隱瞞的必要，因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標誌着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消滅，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

* * *

凡是以科学家的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發展史的人，都会承認人民群众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但是他們的活動始終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想了解奴隶社会是怎样崩潰的，單單說明奴隶占有制在当时已經成为發展生产的障碍还是不够的，还必須重視奴隶們本身所进行的斗争。要想了解封建社会是怎样崩潰的，單單說明封建社会的組織在当时已經成为發展生产的障碍也是不够的，还必須重視当时在革命的資產階級领导下推翻封建制度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由此可以确定，历史科学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历史科学首先是一門“生产發展史，数千百年来新陳代謝的生产方式發展史，生产力和人們生产关系發展史。”同时它也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身为生产过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会生存所必須物質資料生产的那些劳动群众的历史。”^①

^①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譯文引自“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九頁。

我們只举个最近的例子：难道我們沒有看到，不久以前，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不是全靠人民群众进行的斗争么？难道我們沒有看到，在今天，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正是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爆發的最坚强的壁壘么？

工人运动史應該是“物質資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的历史”的一个組成部分。因为从封建社会轉入資本主义社会之后，工人階級已經成为人民群众的領導集团。

如今已經沒有人再怀疑法国工人階級的强大力量了。巴黎解放的翌日，法国总工会总書記貝諾瓦·弗拉商在巴黎地区工会幹部大会上講話时，称頌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說：

“虽然有人出卖了祖国，使法国遭受了失敗，但是工人階級用自己的行动向法国人民証明：在失望和屈服之外，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当初曾被白蘭叛徒集团向人民的敌人告密，並曾被敌人圖謀杀害的人們，在崇高的目标和坚强的信念鼓舞之下，对敌人的一切襲击进行了抵抗，他們把工人斗争的組織和領導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全国解放运动的真正先鋒，他們从發动罢工开始，終於帶動了全国的起义和輝煌的巴黎起义。”^①

从今以后，沒有工人階級就不会有社会进步和民族独立。無論在哪一方面——經濟、社会、政治或文化等各方面——任何問題都得以工人階級为轉移。一八三一——一八三四年以前，甚至到一八四八年六月为止，在資產階級进行反封建或反封建殘余勢力的每一次斗争中，工人階級还只是一股不可缺少的輔助力量或一支不可缺少的同盟軍。例如一七九三——一八三〇年就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經結束了。

^① 貝諾瓦·弗拉商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十日在巴黎地区工会幹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为建設强大和民主的全国总工会、爭取法国的統一、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第五頁。

工人階級已經不再是別人的一支同盟軍。現在是它自己到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農民中間去尋找同盟軍的時代了。出身於資產階級並由資產階級培育出來的“已經進步到在理論上認識全部歷史運動進程”的知識分子也來參加工人階級的隊伍，因為工人階級是“未來主人翁的階級”^①。無產階級已經不是，並且不可能再是其他階級根據一時的情況或根據旅途上是否有困難而加以爭取或放棄的同路人。無產階級現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從事鬥爭。當然必須注意：

“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現時的占有方式，亦即消滅迄今存在的全部占有方式，方能奪得社會生產力。”^②

法國工人階級已經在戰鬥中鍛造了自己的鬥爭工具——職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政黨，但是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初期的職工會組織只聚集了很少一部分勞動者，同時這些組織是分散的、朝不保夕的，既沒有綱領，又不互相配合的。第一批真正的職工會組織要到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〇年資本主義高漲時，才隨着“工人議事會”的產生而出現。而全國總工會直到一八九五年才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全國總工會的領導者實行同大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而大資產階級為了攫取鉅額利潤，借口戰爭強迫工人階級接受異常困苦的生活條件，全國總工會便在工人群眾中間喪失了威信。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之後，復員軍人懷着仇恨戰爭和仇恨資本主義的心情，懷着戰鬥的意志參加了職工會，他們同情那些對“階級合作論”痛加譴責的工人階級活動家。於是，隨着這些新會員的激增，出現了群眾性的職工會組織，而這些群眾性職工會的

① “共產黨宣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一八頁。

② 同上書，第一九頁。

存在也給工人階級活動家提出了嶄新的問題。職工會成為法國工人階級最主要的群眾組織，它們擔負的任務就是建立和加強無產階級的團結，維護勞動者的日常利益，爭取和平並為捍衛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進行鬥爭。

至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它是經歷了更長的一段時期之後才建立起來的。當然，工人階級很早就試圖組織自己的政黨，但是工人階級的新型政黨——法國共產黨，直到積累了許多經驗，遭受了許多挫折以後，才於一九二〇年成立。這個黨從法國無產階級的先期組織——巴貝夫運動，第一國際的法國支部，以及儒勒·蓋德的法國工人黨——那里吸取了許多經驗教訓。但是，這個黨的基本性質則是根據無產階級的国际鬥爭經驗，尤其是第一個取得了最後勝利的工人階級政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經驗決定的。

我們所要寫的就是法國工人階級的历史，它的生活條件和組織的历史，我們並且將特別着重地論述職工會組織。

* * *

工人運動的領袖們曾不斷地指出，工人階級活動家必須通曉历史，因為工人運動史能夠提醒我們：不經過努力，不經過鬥爭是什麼也得不着的。不向有產階級作鬥爭，有產階級是絕不會放棄他們的特權。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套所謂社會立法的法令，如果根據資產階級要人學習的那些历史教科書來看，這些法令好像都是由政府方面自動制定的。在一本很流行的历史課本上，作者在敘述第三共和國時這樣寫道：

“在整個這一時期，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議會通過了一些出色的社會法律，例如：允許工人組織職工會以終止他們的分散無力狀態的法律（一八八四年）；勞動事故的法律（一八九八年）；星

期休假的法律(一八九六年);工农业工人退休的法律(一九一〇年)等等。”^①

这完全是捏造事实。如果以为这些立法是由资产阶级慷慨恩赐给工人阶级的,那就错了。这些立法都是工人阶级经过坚强的斗争而后争到手的。今天的工人必须知道这些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必须知道工人阶级的组织是怎样在斗争中建立起来并且怎样为了斗争才建立起来的;今天的工人必须知道,工人阶级组织是怎样在被镇压的环境中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离间分子和叛徒来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认识了过去,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劳动者就会激发自己对工人运动先驱人物的怀念,就会认识自己的光荣传统,从而提高阶级意识。

历史证明,归根结蒂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也不能抹煞旧传统的作用。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这个历史的。在这些前提和条件中,经济的归根到底是有决定作用的。但是政治条件等等,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并不是决定的作用。”^②

我们想阐明的正是这些传统的作用。这些传统都各有其根源。它们是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思想感情相吻合的。但是它们并不都具有进步意义。只有根据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我们才能够决定,而且也必须这样来决定哪些传统是

① 贝尔纳德和勒东合著中等学校教科書:“法国新史”,第三十一版,第二八七頁。該書作者在第二七五頁上写道:“在帝国时代,拿破侖第三喜欢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並於一八六四年允許工人享有罢工权。”瞧!拿破侖第三的为人是多么善良啊!

② 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日給布洛克的信。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第四八九頁。

进步的，哪些傳統是反动的。例如那种曾由列宁指出过的“使法国蒙害最烈的要算無政府主义的空話”的个人主义傳統是反动的。又例如起源於蒲魯东的那种劝导工人不要进行政治斗争 使工人陷於孤立，使工人在資產階級国家压力下和資產階級政党影响下束手就縛的傳統也是反动的。相反的，自絲織工人起义到今日的工人罢工，那种貫穿於整个法国工人运动史、为爭取幸福生活的权利而斗争的傳統則是进步的。再如全国总工会总書記阿蘭·勒里普在全国总工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历史悠久、力量巨大的那种反对战争的斗争的傳統也是进步的。

然而以上这些並不是我們所要說明的全部东西，甚至还不是最基本的东西。我們还应当說明法国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階級意識並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对工人來說，那不过是对下列这个事实的認識而已：尽管个别工人之間存在着分歧，但是他們都屬於同一个階級^①，所以为了爭取共同的利益，实现共同的願望，他們就必須进行共同的斗争。由於資本主义制度剝削工人，工人就产生了階級意識。但是階級意識並不是一下子就产生的。起初，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彼此以竞争者相待。資本家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剝削，也在工人内部制造对立。后来，在斗争中，工人們才逐漸認識到某一部分工人的失敗也就是另一部分工人的失敗这一真理。

从这时起，个人主义思想便逐漸消失了。但是在工人运动中很長一段时期里，曾經流行过地方主义和行会主义思想，而且直到如今，这种思想还没有徹底肃清。地方主义思想就是狹隘思想，就是以为不同城市的資本家並不串联勾結，从而不妨只在一个城市里进行斗争，爭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至於別的地方或別的城市發生的事情則可以不聞不問。当各个劳工介紹所还是彼此孤立，

还没有结合成为全国劳工介绍所联合会时，这种思想曾在各个劳工介绍所中占着统治地位。至于行会思想，它只不过是不同行业间的竞争代替个别工人间的竞争。行会主义者只不过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只愿为自己的同业团体谋利益，即使因此损害到其他行业的利益也在所不计。行会主义者不了解，各个行业间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一切生产部门（原料、煤炭、钢铁和基本工业）都是息息相关的，而资本家的策略正是分裂他们，使他们彼此对立。

团结一致乃是工人阶级为反对资本家而必须不断进行的斗争中的基本力量，历史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通晓历史并不就能产生阶级意识，不过当历史通过事实向人们证明：无产阶级一旦分散便易於被资本主义宰割时，通晓

① 为了免得到下面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为了帮助读者容易了解下文，我们将社会阶级和无产者的科学定义介绍如下：列宁在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分析时指出：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八二——三八三页）

资本家和无产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个基本阶级。我们可以举出三个基本特征来说明什么是无产者：

一、无产者就是不占有生产资料（工厂，工具，机器……）的劳动者。

二、无产者就是可以自由出卖他的劳动力的劳动者。这就是无产者与奴隶在历史意义上的区别，因为奴隶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身体；这也是无产者和农奴之间的区别，因为农奴不能与土地分离。但是无产者既然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就无法谋生，那么这种自由也只是一种空谈而已。

三、无产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他和资本家相反，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价值）。

“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以及劳动器具的人。工人用他的一部分工作时间来抵偿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费用（工资），而用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去作无报酬的劳动，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泉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泉源。”列宁：“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译文引自“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六七页。

历史才有助於階級意識的增長。

其次，工人們學習了历史就会認識到：他們以工人的身份參加和正因為他們是工人所以才參加的階級鬥爭，是历史發展的动力。現代的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是人类社会發展的組成部分。工人階級从誕生的那天起就展開了这种鬥爭(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研究工人运动史起源時就可以看到)。工人階級的鬥爭，只有当工人階級取得了全盤勝利，消灭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建立了走向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時才告終結。

不過這樣的鬥爭是極其迂迴曲折的。工人階級在這個鬥爭中取得過勝利，也遭受過失敗。通曉過去的鬥爭，知道過去的鬥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麼在這裡取得勝利，而在那裡却遭受失敗，就可以為今后的鬥爭作好準備。

我們說工人运动史能為我們提供經驗教訓，其意義即在於此。全國總工會總書記貝諾瓦·弗拉商在全國總工會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說過：“經驗對於職工會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工人运动史不就是由差不多一个半世紀以來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的經驗所組成的嗎？

在本書中，我們想不以學究的身份，而是以活動家的身份，並遵照已經由國際工人運動的傑出領袖在當時或事後所作的分析，努力來從法國工人运动史中提取經驗教訓。列寧說過：必須“編寫現代史，並儘量把它寫得能夠使我們的历史著述對運動的參加者，對鬥爭現場上的英勇的無產者有所幫助；同時，我們要儘量把历史寫得能夠有助於運動的擴展，有助於有意識地選擇那些消耗力量最少，但收效最大和最有把握的手段、步驟和方法。”^①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八四頁。

但是，在下笔写正文之前，我們还有几点需要說明一下。

第一：法国工人阶级並不是历来就像今天这样的。法国工人阶级已經發展了，而且在發展过程中它是起过变化的。随着生产力的高漲，法国工人阶级壯大了；而且和生产力的發展一样，法国工人阶级在其發展过程中，也具有同样的不平衡性和突变过程：不但人数上起了变化(量变)，成份上也起了变化(質变)。随着时代的不同，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也各不相同。当作坊逐渐过渡到手工工場，再由手工工場逐渐过渡到現代工厂的时候，資本主义也不断把工人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各个企業中去。这一个集中过程並不是通过有規則的运动来完成的。例如很明显的，經濟危机爆發的結果必然是一些中小企業垮台，从而工人的集中也就前进了一步。

在很長一个时期，作坊和大企業曾同时並存；一方面是几个帮工同在一个屬於手工業范围的場所从事劳动，而另一方面則是数百个或数千个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厂里做工。

在大企業中从事劳动的工人對於工人阶级斗争(斗争的形式和目标)的看法和在小作坊中作工的帮工当然是不一致的。在大企業中从事劳动的工人，阶级覺悟比較高，因为資本主义的剝削比較显著，而共同操作也加强了团结精神。到后来，由於資本集中的結果，小手工業者破了产，不得不走进工厂，但是他們仍然抱着小手工業者的思想意識。斯大林作过如下的分析，對於法国是同样适用的。他說：

“假定有一个鞋匠开了一个小鞋舖 因为竞争不过大厂主，結果只好关門，到梯弗里斯皮鞋工厂老板阿德里汉諾夫那里当雇佣工人去。他进阿德里汉諾夫的工厂，並不是想永远当个雇佣工人，而是想积些錢，湊一笔資本，再开自己的鞋舖。可見这个鞋匠的地位虽然已經是无产阶级的地位，但是他的意識暫時还不是无产阶

級的意識。換句話說，這個鞋匠的小資產階級地位已經消失，再也不存在了，然而他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還沒有消失，他的意識落后於他的實際地位。”^①

因此，對於一個一八四八年身為小手工業者或作坊幫工的戰士，如果以為他在思想作風上會和今日的冶金工人一般無異，那就不合情理了。當作坊的幫工或手工業者，成為一個大工廠的工人之後（這就是斯大林所舉的例子），他對事物的看法並不立即改變。他還懷念他的作坊，自以為在作坊里工作比較自由，不用受工廠紀律的約束，也不用接受必要的流水作業，因為他是迫於工人集中的普遍潮流而放棄舊業的。他的理想社會依然是以小作坊為基礎，通過合作社制度而把生產組織起來的社會。要想使這種人原來的看法消失，往往要經過許多次的罷工，許多次的失業。讓我們再來看一段斯大林所作的分析：

“我們這位鞋匠的小資產階級的夢想就在這裡受到了第一次打擊，在他的心坎中就初次產生出無產階級的意向，過了一些時候，我們這位鞋匠覺察到：領到的錢連買最必需的東西都不夠，增加工資對於他是極端重要的。同時他又發現他的工友們在談論着什麼工會和罷工。我們這位鞋匠在這裡意識到：要改善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和廠主作鬥爭，而不是開自己的鞋舖。他加入工會，參加罷工運動，並且很快就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思想了。”^②

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這種轉變。我們將儘量把這種轉變的各主要階段指出來。這種轉變的快慢決定於舊日的幫工和手工業者怎樣參加鬥爭，同時也決定於和他們在一起工作的同伴怎樣向他

①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譯文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二八七頁。

② 同上書，第二九〇頁。

們灌輸社会主义思想。工人的这样意識一天不發生变化，他旧日的劳动条件帶給他的思想包袱便会多保留一天。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階級內部总是存在着思想的分歧。这些思想有些是反动的，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它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但也有些是革命的，屬於無产階級的；只有革命的思想深入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意識中之后，它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当資本主义为了搜罗劳动力，跑到农村中去招募工人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雇农和破了产的小农在走进工厂之后，也同樣不能馬上接受已觉悟的無产者的思想意識。列宁曾指出：

“在任何資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有一些与無产階級並存的广泛的小資產者階層，即小業主階層。資本主义是从小生产中誕生出来，並且經常从小生产中誕生着的。資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出許多‘中間階層’（工厂附屬物，如家庭包工，以及因适应大工業如自行車工業和汽車工業需要而散佈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不免要被拋入無产階級队伍的。所以，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观当然也就往往在广大工人政党队伍中暴露出来。”^①

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中，尤其在工人运动內部的思想史中，我們必須牢牢記着这些問題。如果有一部分工人拥护某一項理論，这絲毫不等於說該項理論就是有利於整个工人階級的。

本書將时常要談到这一类問題。如今只举兩個例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一年間，法国工人階級有很大一部分人受了蒲魯东主义思想（其后是繼承了蒲魯东衣钵的無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肯定的，然而这是否說蒲魯东的学說和無政府主义就是当时的無产階級的哲学呢？当然不是。这只是工人階級尙未十分集中

^① 列宁：“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譯文引自“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八六頁。

以前，在工人階級內部所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殘余。其次，大家都知道，工人階級內部也時常出現機會主義的妥協論，甚至同資本主義合作的論調。我們不能僅僅拿個人的背叛行為來解釋一切。當然，這種背叛行為在法國工人運動中曾經起過一定的作用。為了在工人階級內部製造混亂，製造分裂，資本家所採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那些在思想和物質上同資本主義制度有聯系的變節的工人階級領袖。

但是列寧曾經教導我們，要我們為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以及變節行為找出一個更深刻的原因來。一九二〇年，列寧曾指出：

“人們曾計算，三個最富的國度——美國、德國和法國，僅就資本輸出一項說，每年就有八十萬萬到一百萬萬法郎的收入。

很明顯的，從這樣一筆數目中，就可拋出五萬萬法郎，送給工人領袖，工人貴族，進行各種各樣的收買。整個的問題恰恰都歸結在收買上面。這是用千百種方法來進行的：如提高最大的中心地點的文化，創辦教育機關，給合作社的領袖，給工聯的領袖，給國會黨團的領袖設置成千的官職。凡有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地方，到處都有這種事情發生。這几十万萬的額外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賴以維持的經濟基礎。”^①

這一條規律今天不是已經得到證明了么？某些資本家，特別是美國資本家不就是把他們的鉅額利潤分出一部分來收買某些工人領袖試圖分裂歐洲的工人運動么？這又是一種來自無產階級的敵人方面而影響着一部分工人階級的思想潮流。

最後，還應當指出，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同資本主義世界完全隔離：資產階級的宣傳和思想影響都會滲

^① 列寧：“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九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譯文引自“列寧文集”，第六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入無产階級队伍，而把各种問題弄得混淆不清。同时，一切資产階級的政党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工人階級。生活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階級，在全部政治問題上，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想法的。

“……工人階級不是一个在思想上完全一致的集团。工人階級和資产階級之間，並沒有隔着一座万里長城，所以資产階級の思想和惡習也就会通过千百条路打入工人階級的队伍。当权的資产階級掌握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掌握着比我們有力得多的表达和宣傳工具，他們往往能够收买某些人来当他們的代理人，来傳播他們の思想和他們的腐蝕作用。这一切對於工人階級中最前进的、最覺悟的人們虽然絲毫不起作用，但是對於無产階級各个階層却就会或多或少地發生影响。”^①

倘若对工人运动史加以一番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法国工人階級确实已經起了变化。随着工人階級的变化，工人运动的学說及斗争形式也起了变化。因此，法国工人階級应当保存它的傳統中的火焰，即斗争精神，而揚棄其灰燼，即过了时的学說和斗争形式。蒲魯东派历史学家之所以称頌工人斗争史上一切过了时的东西，其目的就是想叫工人們放棄目前的斗争。

第二：蒲魯东派历史学家所努力进行的另一个工作即是夸耀工人階級的自發性^②，並說只有經濟斗争才是純粹的工人階級的斗争：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質，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資本主义基础的路綫行进，而主張使工人运动唯一按資本主义‘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綫行进，完全主

^① 貝諾瓦·弗拉商：“在世界工会联合会第二屆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二十一日在柏林举行）。

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綫’。自發論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②

蒲魯东派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誘導工人們不去过問政治斗争，使工人階級的階級敌人——資產階級的政治和思想影响得以滲入工人階級内部。

然而，我們却是这样說：工人运动是工人階級反对資本主义的总斗争运动。随着時間和环境的不同，这个斗争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它总是在几个不同的战綫上进行着的，但是斗争只是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

② 为工人階級自發性作辯护的人們認為“节制”是工人階級的天生特長之一。爱德華·道萊昂对这种节制性特作說明如下：

“除了一些突然發生的暴行外，群众是有它本身的节制性的。这种节制性的来源乃在劳动者与外界物質的接触上和肉体的抵抗力上。因为工人們不得不每天去掙面包 因此他們不断地为一些难以应付的事件弄得焦头爛額。”（爱德華·道萊昂：“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第三一頁）

这种解釋枉然有一些“唯物”的外表，其实是完全不通的。一言蔽之，它的全部功劳只在於叫人相信工人階級不会自發地从事革命；因此只有在少数領头的人对工人施以鼓动挑唆情况下，工人才会丧失其节制性！这正是直接为工人階級敌人的利益服务的論調。蒲魯东派历史学家为了避免談論階級斗争，乃用空洞詞句来宣揚社会各階級間的竞赛。你們知道一九三五年的人民陣綫是怎么一回事嗎？你們知道法国人民團結在工人階級的周圍是怎么一回事么？（作者在这里是以蒲魯东派历史家的口吻向讀者發問——譯者）不。但是这是“社会的一种新实验”啊，而为了这种新实验，

“必須付出灵魂的創造性的努力，这种灵魂的創造性的努力在扩展成为社会灵魂之后，便粉碎了界限，帶动了整个社会。”（道萊昂：“默默無聞的人們的胜利”，巴黎一九三六年版，第一〇七頁）

他根据这样的論点便进而称讚墨索里尼，說墨索里尼

“發現了一切精神革命，一切社会运动及民族运动的深刻真理……”（爱德華·道萊昂：“劳动的历史”，巴黎一九四三年版，第三二〇頁）

照他这种說法，人民群众成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力量，成了首先是听憑感情因素来推动的力量。

“無庸置疑，在这些因素里面也可能混雜着一些理智因素和利益因素，即群众利益和領袖野心，但感情因素却始終在这里占据統治地位。”（同上書，第二二頁）

③ 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基础”。譯文引自“列宁主义問題”，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中文版，第三七頁。

当工人们为了降低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率而斗争时，这是经济斗争。马克思写道：

“这是不是說，工人阶级应当放棄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应当停止企图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的状况呢？如果工人这样做，那他们就会淪为一群听天由命的墮落穷人，再没有什么救路了……如果工人在和资本家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縮讓步，他们一定会喪失开展任何較大規模运动的能力。”^①

有些要求，例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日的要求，是工人阶级普遍的和基本的要求。但是工人运动也不應該放松任何局部的要求。如果某些組織完全不关心这些局部的要求，它們便会脫离工人群众，听憑资产阶级对他们施行压迫。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一再強調指出的一点。我們要了解工人的具体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並为此在工人中間进行調查，这是马克思的主要思想之一。我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增加学識，而是为了把工人們的斗争組織得更好，因为“唯有工人们自己，而不是天降的救星，才能有效地解除他們所身受的社会貧困。”^②

但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中，必然会和国家的力量（警察、法院等）發生冲突，这样他們的斗争便轉变成为政治斗争了。这种政治斗争，在起初只是自發的，以后才越来越成为有意識的。工人斗争的目的在於爭取和維護發展工人运动所必需的民主自由。阻止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就是不許工人在經濟战綫上取得胜利，並把他們的手脚綁起来，任憑资本家去宰割。

^① 马克思：“工資、价格和利潤”。譯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四二五頁。

^② 马克思：“工人生活調查”，原載一八八〇年四月二十日出版的“社会主义杂志”。我們下面还将用很長的篇幅来研究这个調查，同时也將研究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和一八六六年所作的調查。

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说明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政治斗争本身也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捍卫罢工权是政治斗争。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为堵截法西斯的道路而举行的罢工是政治斗争。法国劳动人民反对占领军及卖国贼的地下战斗是政治斗争。码头工人拒绝装卸用于帝国主义战争的武器是政治斗争。凡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用他们的政治武器向无产阶级展开进攻时，无产阶级就应该用自己的政策及政治武器来反击。如果不愿意让工人阶级永远生活在贫困中，永远受奴役，那就不能把阶级斗争的范围限制在经济方面。通过政治斗争的最简单的形式，工人就会提高自己的思想，就会认识到：要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及交换资料公有化。而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权。

其次，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是一种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总是企图把对他们有利的论调在工人阶级中间传播。这些论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通过劳资合作，资本主义制度可能“改良”；工人可以分享盈余；美国式的“企业自由”是如何如何美好等等。针对这些论调，无产阶级应该引用它自己的，同时也是唯一科学的观点，即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加以反驳。这就是贝诺瓦·弗拉商研究了由马克思起草并在一八六六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之后，所提醒我们的：

“工人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斗争局限于争取改善工资待遇、减少工作时数、合乎人道的生活条件这种日常的游击战。工人阶级的使命是把全世界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面解放出来。”^①

比方说：马克思找出了工资的真正本质以后，他便给对资本家

^① “为法国服务”，一九四五年九月，第三页。

进行日常斗争、并为摧毁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一个工人，只要精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他就会了解到他的工资并不是他的劳动的代价，劳动是属于资本家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却为资本家占为己有。这样，这个工人便会科学地认识到他所遭受的剥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并且他就会觉得摧毁对他进行剥削的制度是确属必要的，而且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唯一的、彻底有效的办法。

然而这些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从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的。

“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

而社会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①

因此，本书将谈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工人运动史和人类思想史上这种社会主义学说会构成一种革命。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所代表的是工人群众的利益，这种学说一旦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后就成为一股能加速历史前进的力量。然而工人阶级是通过斗争才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通晓工人运动史是具有基本的重要意义）。

“工人底生活条件就使工人富有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斗争。资本把大批大批工人集合到各个巨大城市里，使他们团结起来，训练他们共同动作。工人随时随地都与他们的主要敌人，即资本家阶级直接冲突。工人在与这个敌人斗争过程中，就成为社会主义者，觉悟到必须完全改造整个社会，完全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

^① 列宁：“做什么？”。译文引自“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〇二页。

压迫。工人一成为社会主义者，就無限勇敢地进行斗争，反对横在他們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①

虽然随着环境的不同，某一方面的斗争可能一时占据首要地位，但是三个方面^②，即經濟、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本書不限於叙述工人阶级在經濟方面的斗争，而是叙述整个的工人运动的历史。

第三：虽然說这一部历史是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但是我們不能把法国工人运动同国际工人运动分离开来。同时，虽然說工人阶级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但是它也同样具有民族性。因为在任何国家里，無产阶级都应当“夺得政治統治，提升为民族阶级”^③。工人运动必然是在本国范围内展开的。工人运动在那一个国家里組織起来，它便会受到那一个国家的特殊影响。

这些影响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来自經濟方面的影响。既然資本主义的發展並不是平衡的，各个国家的發展具有各不相同的速度，这也就为各个国家工人运动的發展創造了各不相同的条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英国資本主义在全世界进行的殖民剝削中，挖掘英国工人运动的某些特点的根源的。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日，恩格斯在他致考茨基的信上写道：

“你問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他們對於这点的想法也是如他們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並沒有什

^① 列宁：“革命底教訓”。譯文引自“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〇九頁。

^② “斗争是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經濟方面（抵抗資本家）——进行着。”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六二八頁。

^③ “共产党宣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二六頁。

么工人政党，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急进党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和他們共享着英国的殖民地壟断权及其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断权。”^①

我們也可以指出，十九世紀末叶（法国总工会誕生的时代），法国在工業方面的發展肯定是落后的。因此，在一八九六年，集中在五种輕工業部門（食品工業，紡織工業，服裝工業，皮革工業及家具製造業）中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百分之四九点九，而集中在冶金工業和化学工業中的工人則只占百分之一八点一：这就使法国工人运动具有某些基本特征。

其次，工人运动並不是和民族分离的东西，它和民族生活是打成一片的，它体现了並丰富了民族的最进步的傳統。如果把法国工人階級的組織看成一些独立的和与外界無关的組織，並仅就这种組織来进行研究；如果不說明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革命、一八三〇年、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的十九世紀的革命大危机以及一九四四年全国起义等對於法国工人运动所起的影响，那就無法了解法国的工人运动。以上所述，归根結蒂都是一些偉大的階級斗争，在这些偉大斗争中，無产階級的作用是在不断扩大的，而反过来，这些偉大的斗争也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但是工人运动很早就具有了国际性。“共产党宣言”虽然是在資本主义高漲的年代里写成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就已指出資本主义制度已經具有了国际性。

“資產階級既已榨取着全世界市場，於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底生产和消費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譯文引自“列宁文选”（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一三頁。

^② “共产党宣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一二頁。

这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国际斗争的深刻意义。法国工人阶级在很早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国际团结，我们将一步一步地来研究法国工人阶级究竟怎样参加这一个国际斗争的。法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参加了一些国际组织，它表达了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它学习并吸取了法国国境以外其他地区工人运动的经验。

最后，这一部历史的目的是企图解释法国工人运动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我们希望今天的工人在读了本书之后，对法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历史感到愤懑，感到热爱。密歇莱在回忆他在档案室里工作的日子时写道：

“在这些表面上好像很沉寂的书库里，我很快就感觉到：这里是在运动，是在低语，而且这不是死亡了的东西在运动和低语。这些被搁置在这里已经很久的纸张卷帙巴不得能够重见天日。这些纸张并不是纸张，而是人类的、各省的、各族人民的生活……”

想起了一八七一年的屠杀，想起了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间的集体枪杀和放逐，谁能毫无感触呢？想起了那些做完了冗长的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又跑进森林里去与矿上或工厂中的伙伴会面，第二天黎明，又拖着无比疲惫的腿但是满怀信心，重新回去一面工作一面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活动家们，谁能毫无感动呢？想到这些经常受到镇压摧残，但又重新建立起来，并变得较前更有力、更为有效的工人组织时，谁在今天还能不感到乐观呢？看到了工人运动的确是在循着历史的方向前进，工人运动的胜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前提时，谁能对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感到怀疑呢？

第一章

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

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 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是处于互相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是隐蔽，有时是公开的斗争^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

从無阶级的原始公社到奴隶占有制社会。——奴隶起义：斯巴达克。——封建社会的诞生。——农奴的地位及农奴反抗压迫的暴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农村演变的情况及农民的斗争。——封建的反动力量对贫苦农民的镇压。——农村“乌托邦”及土地法方案。——资产阶级的形成。——商人。——包买主。——商业资本及工业资本。——手工工场。——手工工场和作坊及工厂的区别。——从手工工场到工厂。——封建社会中的工人斗争。——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和托马斯·康帕内拉。——行会制度：师傅、帮工及学徒等级的解体。

沒有現代無产阶级，工人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在封建制度被摧毁以前，在法国是沒有工人运动的。工人运动只是在推翻封建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铺平道路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同时必須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創造了工人阶级成長的条件，一八三一年悲壯和光榮的里昂絲織工人起义才是真正法国

^① “共产党宣言”，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九頁。

工人运动的起点。

然而，工人运动还是有很悠久的淵源。十九世紀無产階級的祖先有一部分原来就是劳动者。不管他們是农村雇工、貧苦的小农、帮工，还是已經成为手工工場的工人，他們当时都已經是身受剝削的劳动者了。他們也曾經为爭取較好的生活——有的时候仅仅为爭取生存——而进行过斗争。这就是現代無产階級所承受下来的遺產。在这份遺產里面，甚么都有：有团結和勇敢的傳統，也有由於当时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偏見。有些是当时的城市或农村的劳动者，有些是朝不保夕的独立小生产者，也有农村中的雇工和季节工人，除了双臂之外別無他物的赤貧的光臂汉，作坊帮工和早期手工工場的工人。他們並未形成一个單一的階級。有的时候，他們也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从而自以为是自由人民，实际上却並不自由。他們沒有一个总的、完整的和自覺的斗争組織。这些劳动者处境很苦，他們常常起来反抗。但是，由於他們和資產階級联合在一起反对封建主，所以一般說来，他們是随着資產階級走的，因为当时的資產階級不但占有財富，而且具有組織的力量和文化。所有这些傳統——好的和坏的，反动的和进步的——都在法国工人階級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在提到法国大革命时，恩格斯写道：

“虽然巴黎的沒有財產的群众，在恐怖时期，短时的获取了統治权，（並且这么一来，便能够在反对資產階級本身中，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趨於胜利）那末，他們只是以此証明了，在那时的条件下，这些群众的（持久）統治是完全不可能的。無产階級还剛剛从一般沒有財產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階級的萌芽，它还完全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出只是一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級，由於它無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

上面。”①

因此，在談到“一般無产群众”的历史时，簡單地追溯一下工人运动的起源並不是沒有益处的。那怕仅仅为了提醒今日的無产階級，使他們知道劳动者一貫地具有斗争精神，也不是沒有益处的。他們一向为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而斗争。他們多少有些覺悟，他們向来不承認压迫他們的經濟与社会制度是永恆不变的。

* * *

無論在甚么时候，人类一直是成群地在一起生活②。起初的时候，他們結成家庭和氏族。当他們的生活来源只靠打獵、釣魚和採摘果实的时候，打獵的地区和獵获的野兽都是氏族的公共財物。因此，当时並沒有敌对的階級。分工仅存在於同一家族的各成員中：男人打獵，女人採摘果实，准备食物，或用兽皮縫制衣服。

随着生产力的發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根据斯大林对生产力所下的定义：

“生产物質資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經驗和劳动技能而發动着生产工具並实现物質資料生产的人，——这些要求总合起来，便構成成为社会的生产力。”③

为了生产物質資料，人們彼此之間建立一定的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在原始公社时代，因为財產是集体的，这种生产关系是合作的关系。

此后，人类学会了馴养动物。於是在遊牧部落同其他部落之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六八頁。

② 这里只能作一个很簡短的介绍。讀者可以参閱讓·巴比：“政治經濟学基本原理”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第二版。讓·弗萊維尔：“打开鎖鍊的人們”，第六章，巴黎社会出版社。

③ 斯大林：“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譯文引自“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〇七頁。

間出現了分工。耕種比採集食物是進了一大步，它保證了植物食品的經常供應，同時使儲存糧食成為可能。織布機發明了，人類開始使用金屬，首先是銅，隨後是鐵。這樣，隨著生產工具的發展，人類的勞動已能生產剩餘的物質資料了。

“一切部門——牧畜、農業、家庭手工業——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可以生產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生產品。”^①

所以就產生了占有並利用剩餘勞動力的要求和必要性，這就產生了奴隸。在這個時期以前，人們捉到了俘虜時，不知道如何處置，一直是加以屠殺的。從那時起，俘虜變成寶貴的了。勝利者把他們保留下來，強迫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最初的奴隸就是這樣產生的。

“從最初的大規模的社會分工中，產生了社會的最初的大分裂——主人与奴隸、剝削者与被剝削者兩大階級。”^②

同時，私有財產也出現了，這就是牲畜和土地。手工業脫離農業，這造成了新的分工。這樣就有可能為市場生產。當時還在原始狀態的商業，已不再局限於部落之間了。奴隸占有制成為社會制度的主要因素。原始公社在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推動下發生分化：讓位給一個新的分成階級的社會：奴隸占有制社會。

奴隸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生產工具已較完善，從而使奴隸的勞動可以增加生產。奴隸成為基本的勞動力。占有奴隸的人可以隨意使用他們，就像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樣，他們是一種“工具”。奴隸所生產的一切，都屬於他們的主人。在奴隸所生產的價值已等於他的身價之後，奴隸所生產的價值除去了他的消費，都屬於奴隸主，於是奴隸主的財富便日益增多起來。當時的國家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五五頁。

^② 同上書 第一五五頁。

是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的。

奴隶占有制在罗马帝国时代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在被凯撒征服后的高卢(古代的法国——译者),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和罗马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奴隶。国家由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着。这些贵族都是大地主。他们的产业当时通称为庄园。高卢—罗马的贵族拥有侍奉他们的奴隶和在田间劳动的奴隶。

奴隶们经常暴动,因为压在他們头上的制度非常严酷。同时,他們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他們彼此之間感到有密切的关連。規模最大的一些奴隶起义,都是在古罗马时代發生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斯巴达克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發生於紀元前七十三年。斯巴达克把自己首先解放出来,在他的领导之下,成千上万的奴隶把自己解放了。斯巴达克战争历时兩年之久,他打垮了罗马帝国几支大軍之后才被击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德国革命的劳动者团结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威廉·皮克的周圍取名为斯巴达克团,就是为紀念古罗马时代的这次奴隶起义。

当时奴隶们虽然进行暴动,但是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能够建立起巨大的和持久的集体,形成真正的战斗組織。然而,在奴隶中仍存在着秘密团体,傳播起义的口号,并把来自同一地区的奴隶们团结一起。

所以,当时的奴隶尽管非常孤立,受压迫,但是他們並不甘心承受加在他們身上的既成局面。他們的起义規模越来越大,就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落,而成为奴隶占有制消灭的原因之一。

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已显示出,奴隶劳动的生产力不够大。的确,奴隶只是在鞭撻的威胁之下才工作。他們对設法改进生产工具毫無兴趣,因为这种改进对他們本身毫無利益。而在奴隶主方面,他們認為增殖财富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奴隶的数

量。因此，奴隶占有制只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某个一定的阶段。奴隶占有制造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把少数的不事生产的奴隶主和广大的被剥夺自由并被强制劳动的男女大众对立起来。奴隶占有制曾经是发展生产力的条件之一，现在它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因此，奴隶占有制就消灭了。

但是，奴隶占有制并不是在各地区同时消灭的。在某些国家里，例如在殖民地，因为保持奴隶占有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利，这种制度曾保持了很长时期。因此在发现美洲（路易西亚那和巴西）及西印度群岛等地区之后，奴隶制度也带了进去。为了少数船主和种植园主人的高额利润，百十万非洲男女从本土被掠去，贩卖到美洲。在法国，一直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才把法国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废除掉。但是，在许多殖民地里，奴隶制度到今天还在种种不同形式（强迫劳动）下存在着。

我们当然不能把现代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斗争和古代的奴隶起义相提并论。然而，尽管历史条件不同，两种斗争的精神却是一样的，同样是英勇行为，同样是要消灭压迫与贫困制度的决心。

* * *

从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解体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这个制度的基础依然是少数人即贵族封建主占有土地。只是土地已不是由奴隶，而是由自由农民耕种。但是，他们的自由仅局限於一点，即贵族封建主不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容许他们享有小块土地和生产工具。但是他们和贵族封建主间的社会关系依旧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

贵族领主的领地分成两部分。首先是自己保留的一部分，其次是租给佃户的一部分。佃户就是领地上的农奴，他们不能离开

貴族舍給他們的耕地。貴族把他們和土地一起买进卖出。在一宗婚姻喜事或一場战争之后，一塊領地从一个領主轉到另一个領主手里，农奴就跟着土地一起轉讓过去。他們必須对領主服劳役，以錢和实物繳納各式各样的貢賦，这就是所謂封建貢賦或領主貢賦。

农奴和奴隶一样，他們也不甘心忍受这种剝削制度。“土包子”、“穷光蛋”和“乡下佬”的起义標誌着整个法国农民史。这些貧苦大众的不幸遭遇曾感动过像柏奴瓦·德·聖摩尔那样好心腸的詩人。他曾写道：

“这些人养活着另外那些人，給他們衣食而自己却遭受着最大的磨折，雨、雪和風暴。他們忍飢耐寒用双手开垦土地，过着艰苦貧困的生活。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些人，另外那些人如何生存下去。”

往昔曾有某些哲学家为奴隶制度辯护，正如現在有人企圖为資本主义辯护一样。当时有人企圖把农奴占有制說成是永恆不变和上承天意的制度，这是不足为怪的。冷斯大主教曾高高地从經壇上向农奴提出警告，就是一个例子。他說：

“农奴們：你們應該永远服从你們的主人，並且不要以他們的严酷和吝嗇为借口。你們不仅應該服从那些善良和温和的主人，而且还要服从那些並不是这样的主人。凡是鼓动农奴拒絕服从和实行欺詐手段的人，特别是那些指使农奴公开反抗的人，教会法規將处以破門之罪。”

翁热地方的聖婁修道院有一个修士所說的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說：

“一切权力均来自上帝。凡是反抗当权者就是反抗上帝的意旨。上帝以至妙至高的安排，使帝王、公侯以及其他受命君临的人

物降生於人間。上帝委任他們，俾使小民服从大人，这是应当的。人有貴賤，或为領主，或为农奴，这是上帝的意旨，因此，領主必須敬愛上帝，而农奴必須敬愛自己的領主——正如使徒所說：农奴們，你們要以誠恐誠惶的心情来服从你們人世中的主人。”

正如工人們起初憎恨机器，並为飢寒所迫一怒而加以砸毀一样，农奴們有时也由於受尽磨難而採取个别的报复手段——行兇、搶劫或暗杀。但是他們也曾經發動过大規模的集体暴动。这些暴动很难一一列举，只提出那些最典型的就够了。一〇〇八年，不列塔尼的农民曾为反抗公爵起来暴动。同一时期，諾曼第的农民也曾举行起义。下面引自一部古老史書的記事，其中就反映出当时的情况：

“理查公爵英年美德，而其治下却發生惡毒的扰乱，盖因全省各郡农民屢次集会，宣称决定採取目無法紀的生活。彼等不顧旧制，企圖制定新法律以開發森林水利。复为确定該項法律起見，乱民集团各选代表二人，携帶各項檄文，前往荒野之地举行大会。公爵得知之后，立即派遣拉烏尔伯爵，率領大批人馬前往鎮压农民暴行並解散其集会。伯爵立即奉命出發，擒获各代表及若干农民，断其手足后驅逐回乡俾使其他农民回心意轉，並使之畏惧可能面临更悲慘之遭遇，而知所警戒。农民經此惩戒已停止集会，还乡务农。”

这位小心謹慎的傳記家是站在强者的一边的，然而他也不能掩飾下列这些事实：农民的貧困；在选派代表这件事中表現出来的农民的組織性；鎮压的殘酷。諾曼第的詩人罗伯·瓦斯^①虽然是在这件事發生后一百年左右才写出他的長詩“諾曼第叙事詩”，但

^① 諾曼第詩人瓦斯約逝世於一一八〇年。其主要著作有“不列塔尼叙事詩”和“諾曼第叙事詩”。

是从他借假諾曼第农民的口所唱的詩中，还可以充分看出当时农民的贫困和斗争精神：

我們和他們一樣是人，
和他們一樣長着手腳，
身體和他們一般高大，
一樣也會感覺到苦痛。
我們只需要有一條心……
對着一個騎士，我們有
三十、四十個農民。

此后每个世紀中，农民起义相繼不絕：十三世紀發生的“牧羊人”运动，特別是一三五八年規模宏大的“雅克团”起义^①。当时正是百年战争时代，农民受到的痛苦比在和平时代更甚。武装土匪到处毁坏田地，並綁票勒贖。一个亲眼目睹的人曾这样描写当时情况：

“这一年，葡萄园無人种植，田地無人播种耕犁，牛羊無人放牧，教堂和民居倒塌敗落，到处是一片战火的創痕和断瓦殘垣。教堂打鐘已不是欢乐地召集信徒举行礼拜，而是对农民發出警报，通知敌人即將来到，讓他們赶快逃命。主要是一般农民，最为赤貧無告，因为封建貴族使他們苦上加苦，夺去了他們糊口之計和可憐的生命……”

起义是突然地爆發的。这次起义是自發的、兇猛的，就像是一个山穷水尽的民族从絕望中發出的集体反应一样。起义在五月从貢比臬开始，很快就蔓延到巴黎与亞眠之間的整个地区，並且找到

^① 梅利美著：“雅克团”起义”，一九四六年法国圖書館版，安德列·福热隆插图，阿拉頁序。

一个同盟者——当时巴黎市首席法官艾丁納·馬賽。艾丁納·馬賽正联合巴黎的商人和小店戶們一起在反对国王。这次“雅克团”^①起义是很兇猛的，因为在这些貧苦的农民心里累积的仇恨实在太多了。当时的农民領袖是吉奧·喀尔。这个农奴的斯巴达克是一个退伍軍人。紀載上說：“他是一个有學問，會說會道，面目清秀仪表整齐的人”。暴动历时五星期。鎮压非常殘酷。所有封建領主都放棄了彼此的嫌隙，一致联合起来反对农奴。当时曾有人这样記載：

“甚至王国最惡毒的敌人——英国人，也不会像貴族对待农民那样殘酷。”

在摩城和克勒蒙·昂·波維西进行了兩場大战。成千上万的农民牺牲了。起义領袖喀尔中了計，被騙到克勒蒙，受尽了最殘酷的毒刑，最后被杀害。他被嘲弄地称为“农民王”，把一个燒得通紅的铁环套在他的头上“加冕”，然后斬下首級。在瓦斯河、塞納河与馬恩河流域之間，所有村庄都被摧毀無遺。所有妇孺都惨遭屠杀。农民的子女們用不着会讀書写字，但他們自然而然不会忘記这次大屠杀。在法蘭西島省和波維西省的草屋里，人們很久很久一直怀着憤怒的心情低声地談論着这件事。所以，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农民杀害某些貴族並燒掉一些城堡自也不足为奇。这使我們回想到巴貝夫^②的解釋。他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給他妻子的信中說：

“各种毒刑、磔刑、苦刑、車輪鞭刑、炮烙、絞刑以及充斥各地的

^① 当时貴族封建領主看不起农民，管他們叫“雅克·朋”，即“乡下佬”。因之当时的起义就名为“雅克团”，即雅克們的起义的意思。——譯者

^② 巴貝夫是法国革命家，生於一七六〇年，一七九七年为反动派送上断头台。后文將詳細論述他的事業。——譯者

劊子手把我們風气搞得坏透了。領主們不但沒有把我們变成文明人，相反地，使我們变成野蛮人，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野蛮人。他們正在並且將繼續自食惡果。”

这些由於貧困、絕望和飢餓而引起的暴动，遭到了野蛮的鎮压，但是这些起义却並不是沒有作用的，它們促进了农奴制的崩潰。从十三世紀起，千百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这絕不是封建領主大發慈悲而採取的一个步驟，这是他們由於惧怕，同时也是由於考虑到新的利害关系的緣故。当时必須避免这种起义，因为这种起义，和奴隶起义一样，可能动搖整个封建社会的結構。同时为了增加农業生产，也必須使农民对耕种發生更大的兴趣，並使劳动力固定下来。因为农奴一有机会——战争、暴动和瘟疫流行，就逃亡到森林里或跑到人口又重新增長起来的城市中去。农奴制度妨碍了农村中任何一点进步和任何一点新事物的發生。农奴不是用錢贖买自己的自由——因为封建領主需要錢，就是用暴力夺取自由。总而言之，在大革命的前夕，全法国只有一百萬农奴了。服尔泰就曾为汝拉山区的农奴仗义执言过。

这並不等於說农奴制在法国已經完全消灭，封建統治已經灭亡。因为，农奴制度只不过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摆脱了农奴身份的农民依旧受着某些封建义务的約束。这些封建义务由於王朝加强了階級稅收政策而更加沉重，这种稅收政策只針對着劳动人民，貴族(地主)和教会僧侶則不受影响。农民除了要滿足封建領主的种种权利外，还要繳納各色各样的賦稅：所得稅、補助稅、酒稅、關稅、鹽稅。什一稅还不算在內。這項稅收一般並不归当地神甫掌握，而是由豪富的主教、有势力的修道院主持或既不管宗教事务又不周济貧民的封建領主享用。法国农村的社会結構仍是封建的結構。这种社会結構一直到法蘭西大革命时期都不曾有

过什么变动。因此，农民的斗争精神並沒有随着农奴制度消灭而消灭。只要提一提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农民斗争就足以証明这一点。在“太陽王”^①在位时，农村情况更加惡化。

拉·布呂耶尔^②曾写道：

“人們看到某些强悍的雌雄动物散佈於四野。它們被網在土地上受着風吹日炙，面目枯焦黧黑，但却不屈不撓地翻掘着土地。”

試听一六七〇年維瓦萊山里人的战歌^③：

快有五六年了，
吝嗇的包稅人^④、
副包稅人、分包稅人，
这些与我們的幸福势不兩立的人們，
对我們肆無忌憚地进行掠夺。
餓夠了，哭夠了，
农民們：拿起武器来血战吧！
向那些吃人的惡鳥和鹽吏^⑤扑上去吧，
必須和狼一齐嚎叫，
对那些阿尔德什省的吸血鬼，
拿起你們的鉄鍬、鏟子和鋤头来
也去征收它們的稅收吧。
勇猛前进吧，兄弟們！不要休息！
为了保衛我們的糧食，

① 太陽王就是路易十四。——譯者

② 拉·布呂耶尔是法国作家，生於一六四五年，死於一六九六年。——譯者

③ 見腓力斯·盖夫著：“偉大世紀的反面”，巴黎一九二四年版，第三四五頁。

④ 包稅人、副包稅人和分包稅人是包收捐稅的財閥。

⑤ 鹽吏是收鹽稅的官吏。

在蘭德那一边的原野，
飄揚着維瓦萊的旗幟，
上帝保佑陸爾^①和他的部下！

十七世紀也發生過很多次農民起義：一六二四年在蓋爾西發生農民起義；一六三六——一六三七年，在法國西部、中部和南部各省都有過農民運動；一六三九年諾曼第的“赤腳漢”暴動；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年克洛堪暴動。這些起義的直接起因都是對包稅官的仇恨和反對苛捐雜稅。但是鬥爭開始後，農民打擊了稅吏後就轉向封建領主進攻。一六七五年，不列塔尼的農民也爆發了起義（在杜阿爾內奈與貢卡爾諾地區之間）。他們當時的行動綱領如下：

“十個教區宣佈為爭取本省的自由而聯合起來，要求廢除違反阿摩力克省^②自由權利的‘農貢’^③和徭役。要求貴族的女兒也可以嫁給平民。神甫將領工資而不得再征收什一稅或受官俸。司法權將由居民選出的有才幹的人士掌握。從三月一日至九月中禁止打獵。銷毀所有鴿籠^④。農民有權把自己的小麥隨意交給任何人磨面^⑤。”

不久之後，卡爾萊地區的農民起義也具有相同的性質。當時政府派遣了一萬名軍隊對這一個省份進行了非常殘酷的鎮壓。塞維尼夫人在談到這些兵士的時候，曾以貴夫人的冷酷口吻寫道：“他們以偷盜為樂，前兩天他們把一個嬰兒插在烤肉叉

① 安東尼·德·陸爾是起義領袖。

② 不列塔尼的古名。——譯者

③ 封建領主對農民剝削的一種方式，農民必須將農作物一部分貢獻給領主。——譯者

④ 當時只有貴族有權養鴿子。鴿子啄吃農作物，農民不准趕打。——譯者

⑤ 封建主對農民的另一種剝削，即農民磨面必須出高價到領主的磨房去磨。——譯者

上^①。”

在一个社会临近它的历史末日的时候，它的統治阶级一定是抓住政权不放，並且加强它的統治手段。大革命前夕的情况就是这样。缺錢用的封建領主企圖恢复早已消失的封建权利。他們重新审訂戶籍册，即記載一切旧封建租稅的文件。在大革命前夕，封建制度不但沒有消灭，而且相反地变本加厉了。一些古老的習俗受到了侵犯，这些習俗曾能讓貧苦的农民增加一点收入，例如允許老年妇女及兒童在田地里撿拾散落地上的麦穗的拾取散穗权。在某些地区，田地四週圈上了籬牆，这就等於取消所謂“公共牧场制”，这种制度曾允許农民在收割以后随意在任何田地上放牧。牧场、森林等公产及其使用权为那些最貧苦的农民提供了一些补充收入，而封建領主們則得寸进尺地占公产为私有，並实行分配，而經常是自己霸占三分之一。这一切都威胁了貧苦农民的生存。

在同一时期，号称为重农派的經濟学家主張改造农业：建立大型农庄^②，廢除旧日遺留下来的公产，把公产根据各地主所有田地的面积大小按比例分給他們，听任谷物自由运输。这些經濟学家反映了大地主們的主張——他們很多人本身就是大地主。这些大地主，和过去英国的大地主一样，希望把資本主义形式帶到农业生产里面来。此外，这些經濟学家也要求在工业方面停止管制並廢除行会制度。法国的一些大封建領主每年至少在領地上住一个时

① 鮑里斯·波尔什涅夫：“法国在擲石党（路易十四时代的內乱——譯者）以前的人民起义（一六二三至一六四八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法譯文見“思想”雜誌第四十及四十一期。

② 在百科全書中“穀物”欄，奎納写道：

“負擔不起必要支出的小农經營方式已經日暮途穷，而富农經營的大农庄在維持及修繕方面費用較少，从比例上看，大規模經營較小規模經營花費少而利潤高。”見“人民古典文选”中“百科全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期。他們想重振家業，而当时却正是个好机会。人口的迅速增加促成粮食价格上升。小麦价格飞漲，据估計在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之間，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六十三。因此，生产小麦和肉类是投資的好方向。重农派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奎納和古納，这一派人的任务就是以他們的理論来为那些农业兼併的新手段張本，就像他們同时也为工业資本家吞併手工业張本一样^①。

当然，农民中成分也不一致。当时有所謂富裕农民号称农夫，在巴黎盆地富饒的产粮区也有很大的农庄庄主。但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很貧困朝不保夕的。那些从事农村手工业借以取得一些副業收入的农民則受到机器發展的威胁。所有这些貧苦的农民的生活都很悲慘，他們日常的食品就是硬面餅、面包、面粥或青菜——馬鈴薯当时还不很流行，有一点咸猪油，很少能吃到鮮肉。

农业佣工的生活还要艰苦，他們人数很多，特别是在諾尔省，比卡第、諾曼第、不列塔尼和巴黎一帶。其中有些是長工，但大部分只有在农忙季节才能找得到工作。农閑时候，生活就非常貧困。他們一般都沒有家，成群結队地流浪於全国各地，以討飯为生。在日后工业發展起来的时候，首先被吸引到城市里去的就是这些人。虽然这些农村無产者成份並不一致，但他們都意識到自己的貧困境遇；虽然在他們当中还没有任何斗争組織，但在季节工人里面曾經發生过罢工运动。他們“陰謀”（当时人的說法）爭取較高的工資。在大革命初期，瓦斯省的一个商人曾記載道：种植者（即富农）“知道这些穷雇工大部分都是从四五十里或一二百里以外远道而来的，他們已經沒有盤纏回家，所以是非找工作不可，种植者就随意出个工价迫使这些人替他們做活。”

^① 参考馬克思著“經濟思想史”論及重农派部分。巴黎哥斯特出版社 一九三六年版，第一集。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反抗和罢工的人。罢工和不罢工的工人之间也常有殴斗。一七七二年一个法官发布的公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公告上写道：

“收割工人及外来人众，一律禁止携带木棍、石块及其他武器聚集成群，并禁止擅离大路走向田野，扰乱及殴打任何进行收割的农人。如有违反，则处以枷刑并驱逐出境。”

雇卒也往往出面干涉，常有伤亡。虽然如此，临时雇工的反抗使收割推迟几个星期的事情依然数见不鲜。这是农业劳动者悠久的斗争传统，下面我们还会经常碰到。

在研究法国工人运动的起源时，我们决不能撇开一七八九年农民的情况不提。那时法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数达两千一百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当时承受着封建制度最大一部分的重担的就是他们。

因此，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由于农民的贫困而产生了一些广泛的乌托邦社会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农业、制定农业法令、公平分配地产，这些都是当时的进步思想家试图解救农民贫困而关心的问题。这些乌托邦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一种希望，那就是想使所有农民都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阿尔尚松侯爵在他的日记中，就表现了这种心情。他写道：

“应使土地仅为耕者所有，而耕者则仅应耕种本人力之所及的土地。”

这也就是卢梭的理想，他曾写道：

“假如我有钱……我就在绿荫复蔽、风景宜人的小山坡上买一所小小的农舍，白色的房子襯托着绿色的窗板。院子里养家禽，牛栏里养奶牛供应奶品……”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写道：

“假如全法国都能分成小农户，那将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

卢梭的作品反映的正是当时小农的困苦。他在怀念农民的生活时，曾斥责奢侈的风气说：

“奢侈的风气在城市中养活一百个穷人，可是在农村中却害死十万个贫农。富人和工匠为了不必要的享受而在手中流转的金钱，正就是农民所失去的衣食所需。我们的厨房需要调味的鲜汁，因此很多很多病人就连面汤都喝不到。我们的餐桌上需要美酒，因此农民就只能喝白水。我们的假髮需要傅粉，因此很多很多农民就吃不上面包。”

卢梭心目中的平等就是一种财产和生活条件的平均。在他的科西嘉宪法草案中，他要求每个公民所占有的土地加以一定的限制。国家应有责任通过遗产法和累进税防止大产业的形成。卢梭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独立生产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乌托邦思想中也出现了另一派别，主张财产公有。他们通常都以当时残存的一些公社传统如拾穗权、收割后的公共牧场制，公产等等作理论的出发点。他们代表那些离开了公产制就不能生活而变成小业主似乎绝无希望的人所抱的愿望。莫尔利就是这样想法的。在他看来，私有财产已经不应该再存在，他写道：

“专横制度妄想永远让极少数人养尊处优，并且名之为富贵荣华，而使其他人等辛勤劳动。这种区别使前者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和贵族，而后者则对强制执行的义务感到憎厌和反感。总而言之，人们称之为懒惰的恶习以及我们的忿怒不平都是从无数成见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成见都是我们大多数社会违反自然的不良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东西。这种腐败现象都是由私有财产制造成

的。”^①

在莫尔利所“梦想”的社会中，土地都归公有，一切产品都貯藏在公有的大貨倉里。

換一句話說，当时反映农民困苦的理论家分成兩派：一种是“分地”派，一种是“公有”派。不論哪派都是空想主义者。因为他們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中看不出有任何可以改造社会的力量。但是这些空想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又重新出現，甚至在孕育它們的經濟条件已归消灭之后还繼續存在。它們虽然来自农民社会，但仍將使初期法国工人运动無可否認地帶上了这些色彩。

到了一七八九年，这种烏托邦式解决社会問題的方案已經与现实不相符合，因为当时的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与封建制度的对立。

* * *

农奴制度之所以消灭，封建剝削之所以發生变迁，原因之一是当时正在發展中的工業必須找到大量的劳动力。在整个中古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都过着一种閉关自守的經濟生活。当时的交通很困难，交換很稀少。每一塊領地都必須自給自足，必須在当地制造並供应許多日常生活和耕种田地的必需品。农民必須制造自己用的傢俱——虽然做得很粗糙，同时必須制造自己用的农具：犁耙和鐵鍬。妇女則用羊毛来紡線織呢。

当然，很早就已經有專業的工匠，制造某些比較复杂的物品：如鞋匠、鞍匠、鐵匠。他們經常住在城堡或修道院里——因为封建領主可能就是修道院的院長。他們也和农奴一样附屬於領主。

但过了不久，从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时候，商業又重新出現。

^① 莫尔利：“一直被忽略或認錯了的自然法典，或自然法則的真精神”（一七七五年）。

国王对其他封建領主的权力开始树立起来，那些搶劫行商的土匪領主，已被鎮压得無法为非作歹。因之交換逐漸恢复。驛道、市場和市集又开始熱鬧起来。分工日趋明确。手工業者不复仅为領主及其农戶服务，他們已經为市場而生产。他們和商人一起在鎮上定居下来，这些小鎮后来就变为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都出身於生活貧困的小百姓，大多数原来是农民，因而繼續受着領主的管轄。但是由於他們的工作条件，同时也由於他們已經不像农民那样各自分散，所以就有可能團結起来。他們成立了城市組織，迫使封建主——貴族和僧侶——准許他們独立：这就是当时的公社运动。編年史作者吉倍·德·諾尙曾叫道：

“公社，这是一个多么标新立異和可憎的字眼啊！”

有些封建主由於經濟困难，就讓城市居民贖取他們的自由。但是手工業者和商人往往是用武力来解放他們的城市的。有时国王也支持他們，因为国王認為这个年青的市民階級，可以作为自己的同盟者来反对与王室为敌的貴族。

在城市內部，商人和手工業者組成各种社团，后来称为行会。手工業和商業每一种行業都組成一个行会。行会原来的基本目的就是保衛本行業，主要是爭取有利的价格，保証商品的質量，和避免彼此的竞争。为此，它們制定了非常周密的章程，但后来这些章程的保持又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每一个作坊里都存在着同样的劳动組織。作坊里有师傅、工匠或帮工之分，最后是学徒。每一行業都有自己的行东，这些人就是行会的領袖，負責执行各种章程。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簡陋：师傅是作坊和集体工具的所有者（每一个帮工一般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在起始的时候，想成为师傅並不需要很多錢，帮工也能够上升为师傅。这种組織形式是在十一、十二世紀出現的。起初，封建主

相当不喜欢这种組織形式，后来由於行会向他們繳納貢賦，才承認行会的存在。

这种行会組織之所以能存在，正是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还很簡陋。后来在壟断資本主义时代所出現的新式行会，那只是企圖用行会这个字眼来故弄玄虛，实际上，在劳資联合的招牌下，这种行会工团主义只是把工人階級出賣給最反动的那部分資本家階級而已。所有最近的經驗都無情地証明：墨索里尼的各种行会，希特勒的劳动陣綫和貝当的劳动宪章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新行会主义的理論家曾把中世紀的行会制度說得天花乱墜。实际上，必須記住，行会制度是資本主义前期的一种組織形式。师傅在起始的时候也不能与資本家混为一談。馬克思曾很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說：

“資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在这个地方，同一个資本同时雇用較多数的劳动者，以致劳动程序扩大了它的范围，而以較大的量的規模来供給生产物。”^①

可是早期的行会並不是这种情形。我們以后会看到，資本主义經濟后来是在行会以外，並且是与行会对立的情况下發展的。

在城市里面，不久就出現了居民的分化。富裕的市民結成集团，这些人通常是商人，他們掌握了城市的領導权。随着商業的發展，他們的权力也日漸强大。在百年战争的大乱过去之后，商業重新活躍起来。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新大陆和其他地区的發現又开辟了新的商業道路。各种貨物，如辛辣食料、糖、香料、宝石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远东运到法国了。

当时的物价普遍增漲。但是与某些历史家的看法相反，这並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五四頁。

是由於大量的金銀从美洲湧到的原因。事实是，我們必須記住：

“流通界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是決定於商品價格（貨幣價值保持不變動）的總和，而商品價格之總和則決定於流通中的商品量。”^①

在整个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当中，物价是一直随着大量商品流通的增加而上漲。这种物价的上漲引起了貴重金屬从美洲大量輸入，从而使作为商品的白銀加速跌价（生产白銀的必要劳动時間不断減少）。这种物价的波动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貧困，但是商人却从中获利，行东們反而比不上他們了。

教会一直与封建的农村社会有着密切关連，它本身不很需要信用借貸，所以它一向譴責帶息借貸。但是这無关紧要，商人們一手借出，一手借进，他們不是和教会敷衍勾搭，便是和喀尔文領導的宗教改革派联合一起。喀尔文認為“帶息借貸”是“对共和国有利的而且是共和国所必需的”。十六世紀的商人在他們賬本上很虔誠地写道：“賬目清楚，可进天堂”。同时，教会也並沒有坚持，教会的神学家們不久也就承認帶息借貸是正当的。两个世紀以后耶穌会的神甫就以买卖人的口吻来談宗教了。富人成为“上帝的賬房”，並且由於他們能够对穷人施舍，他們就可以得救而进天堂。

亞森特·德·加斯盖神甫在一七六一年曾說：

“耶穌自己就是你們的保証人。你們的資本是投放在他神聖的双手中和他崇高的頭頂上。你們难道能够有比这样还更坚固可靠，还更有利的投資方向嗎？这种資本永远也不会消失，它的利益將是永生不灭的。”^②

① 恩格斯：“論資本論”，三联書店一九五〇年版，第七七頁。

② 參看格罗杜森：“法国資產階級精神之起源”，第一章，“教会与資產階級”。“法蘭西新雜誌”（一九二七年）。

商業資本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商業資本^①虽然加剧了封建社会的危机,但是当时的商人並不是“有意識的革命者”^②。在一个很長的时期內,他們像手工業者一样在行会內进行活动。他們心目中所要取得的“自由权利”,是指特权、免稅和執照。只有工業資本才是顛复封建社会的大变革的基础。商人則变成了包买主。

“甚么事情使商人从事‘包工头’这种特殊的职业呢?只有一件,那就是,售賣价格虽然与他人相等,但可望得到更大利潤这件事。現在,他有了这种前途了。因为他可以雇用那些小老板作事。

① 为了便利讀者閱讀起見,有必要作三个注釋於此:

甲、起初,資本首先是以貨幣形式出現的。但是这並不等於說任何貨幣必需是資本。在古希臘时代就有貨幣,在古羅馬时代也有貨幣,但是当时既無資本,也沒有資本家。

“世界商業与世界市場是在十六世紀开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四九頁)

若要貨幣以資本的形态出現,必須經過运动而产生出新的价值来,这就是說,产生出剩余价值。

乙、若要貨幣能起資本的职能,必須找出一种能够創造出比本身买价更多的价值的商品。这种商品就是無产者的劳动力。

“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遇到当作商品出賣的劳动力,第二个根本的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不能出賣有本人劳动在內对象化着的商品,都必把那种只存在於他本人活身体內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賣……

所以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化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这所謂自由,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他当作自由的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处分。另一方面,他又沒有別种商品可以出賣,沒有实现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东西,对这些东西,自由到一無所有的地步。”(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一七九頁)

这就产生了廢除封建制度的历史必要性,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被束縛在一塊土地上(农奴),或通过封建貢賦附屬於封建主,他們沒有自由“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处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八頁)

丙、資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取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由生产劳动(工業或农業)中創造出来。商人(商業資本)和放債人(生息資本)就是要取得劳动創造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第二节:“这一个总公式的矛盾”,对这一点作了具体論証。)

② 恩格斯:“論資本論”,同前版,第一四六頁。

一向来，生产者只能售卖他的完成生产物，在这个限制，生产上的这个因袭的限制，被打破了。商業資本家購買劳动力；劳动力的所有者虽然还有他們自己的生产工具，但不复有原料了。他虽然保障了織布工人的經常的職業，但在反面，却能压低織布工人的工資，使他們提供的劳动時間的一部分，成为無給的。因此包工头就可以在向来利潤之外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了。”^①（譯者：此处“包工头”，“政治經濟学教科書”譯作包买主或包买商。）

下一个阶段就是手工場的建立了。

“市場底發達，資本底积累，諸階級底社会地位底改变，大批人手被剝夺了收入底来源，这一切对作坊底形成就是历史的諸先存条件。”^②（譯者：引文中的“作坊”，即手工工場）

手工工場之出現是十六世紀中叶至十八世紀末叶法国工業生产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手工工場的法律地位如何，是否直接或間接隶屬於国王，这都無关紧要，紧要的是它使資本主义能够更迅速地發展起来。

手工工場与以前的作坊和今日的工厂都不相同。它和作坊不同的地方是它聚集了很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可以各有不同的手艺，他們聚集在一起为了制造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必須有这些不同的手艺通力协作才行。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曾被馬克思以制造四輪馬車为例加以具体說明。他写道：

“一輛四輪馬車，原来是許多种独立手工業者（如車匠、馬具匠、裁縫、鎖匠、帶匠、旋盤匠、緣飾制造工、玻璃細工、画工、漆匠、描金匠等等）的劳动的总生产品。四輪馬車的手工制造業，把这各种不同手工業者結合在一个工場，同时协力来劳动。当然，一輛

① 恩格斯：“論資本論”，同前版，第一五二頁。

② 馬克思：“哲学底貧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九五頁。

四輪馬車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若同時有許多輛四輪馬車在被製造，則在別部分還在生產過程較初的階段中時，可以不斷有一部分在描金匠手中。”^①

手工工場也可以把從事同樣手工藝的工人聚集在一起。路易十四的首相科爾伯曾為發展手工工場費過很大的力氣。他甚至想把所有花邊女工都集合在一個“法蘭西針織公司”里面，而且他也當真集合了五千人之多。一六六五年，一個名叫望·羅貝斯的荷蘭人，離開本國來到法國的阿貝維爾城，開設了一家英荷呢絨手工工場。他取得了皇家特權。這種特權主要包括在亞眠城週圍八十公里以內的專業權、免稅權和他一家人自由信奉新教的權利。這個手工工場辦得很發達，到了十八世紀已經雇用了將近一千七百名工人。這個工場進行各種工序，從接受原毛一直到織成呢絨成品止，有時甚至還帶繡花。

很明顯，當時的王朝政府是鼓勵這種企業的。因為在國內製造成品可以阻止貨幣外流，同時也可以使數以千計的既無土地又無職業的法國人民得到工作，雖然這是一種艱苦而收入菲薄的工作。

後面這一條理由是曾經黎塞留肆無忌憚地提出過的。他曾說：

“任何政治家都一致認為，如果人民的生活過於舒適，便無從使其安分守己。”

他毫不猶豫地把百姓比作“長時期休息比勞苦更為有害的習於重載的騾子。”^②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同前版，第四〇三頁。

② 引自亨利·奧塞著：“黎塞留樞機主教的經濟思想及措施”，巴黎一九四四年版，第一四五頁。

若干手工工場可以算是國有工場，例如哥伯林和波維的織毯工場，肥皂工場（先在盧佛宮，後來在夏樂宮），布勒斯特、土倫、羅什福爾和拉森納的兵器工場。可是，即使是國有工場，國王還是可以把經營權交給私人，該私人還可以得到場長的稱號和許多權利，如豁免捐稅、豁免關稅、豁免過橋稅等等。國家不僅撥土地給他，而且還可以付給他四分之三的建築費。此外，場長在政府的幫助下，保證自己的產品找到銷路。再加上對工人們肆無忌憚的剝削，這對場長來說顯然是一筆好生意。另外一些皇家工場把當地的若干製造商聯合在一起，如奧勃松的織毯業就是一個例子。此外比較通行的是那些由國王賜給特權的一些特殊商家。除了這些所謂皇家工場之外，我們還得談一談一些私營工場，這些私營工場有的屬於私人，有的屬於合股公司。

現在我們已經談到了最基本的問題，因為要創辦這樣的企業，必須有很大的資本。所以，當時出現了許多彼此聯合一起共同建立並經營一家手工工場以分享利潤的資本家。對資本家來說，把工人聚集在手工工場里勞動，不但可以提高生產而且還可以減少開支（這是同一般的作坊比較來說）。不過開始時候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本。當時的師傅不過是些手工業者，他們手裡沒有這樣的資本，因此有時由商人，有時由那些經營農業、剝削農民而致富的貴族們拿出錢來。

可是，工人的集中帶來了工人彼此之間的分工。工人變成了一部分工作的專業者，因為他們現在所做的只是以往所做全部工作中的一部分。馬克思在他所舉的製造四輪馬車的例子中，對這一點作了如下的說明：

“專門在四輪馬車製造上被使用的裁縫、革匠等等，漸漸失去了在原手工業全範圍內工作的習慣，並漸漸失去了這樣的能

力。”^①

劳动效率当然是提高了，生产力也增加了，但是工人却变成一个机器人，很快地习惯于迅速而正确地作某一种固定的工作。

“手工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手工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温室似地，助长他的部分熟练。”^②

训练这样一个工人当然比学习全面工作要快得多，因此，这种工人的工资就更加菲薄了。于是在手工工场中出现了工人的等级。有些工人作很细致的工作（这里特别可以看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分歧）。另外一些工人只作些无需乎技术的粗工，这种工作是妇女和儿童也能够做的，于是妇女和儿童大批被吸收入手工工场。同时工具本身也在演变。工具和工人一样，也走上了专业化和适合于固定工序的道路。所以手工工场与作坊之不同主要就在于：手工工场把工人集中在同一个企业里，它属于一个资本家，或一个组织严密的资本家集团，同时它实行分工。

但是手工工场在许多方面依然保持着手工业作坊的面貌。虽然工具已经有专业化的倾向，但是工作母机还不存在。主要的动力还是人力。工人们依然得用手工操作，并且一切还依赖工人的技巧。和行会一样，工场手工业也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则。科尔伯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规则。如果我们现在把关于呢绒制造业的法令序言读一遍，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精神依旧是和行会章程的精神一致的。该项法令的序言中说：

“近几年来，呢绒、哔叽与其他毛棉织品在长度、宽度、拉力及

^① 马克思：“资本论”，同前版，第四〇四页。

^② 同上书，第四三五页。

質量方面，曾有很多欺騙行為。我們要儘可能糾正這些現象，並使所有同一種類產品，不論在何處製造，都有統一的名稱和質量，以便增加王國內外的銷路，避免購買人上當受騙。”

科爾伯並曾制定“手工工場總經紀人”制度。這些總經紀人的職權很像行會中的行東。他們負責檢查條例的執行情況。

這就是手工工場的历史地位。它的誕生改變了工人的生活條件，同時，在發展生產力的觀點上看，它同手工作坊比起來已經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進步。

但是，市場對工業品的需要比手工工場生產能力的增長要快得多。機器的出現又開辟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手工工場本身的存在也為這個新階段創造了有利條件，因為手工工場當時已經能夠製造複雜的機器所需要的各種零件。工廠，即現代化大工廠，已將起而代替這些手工工場，這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在英國發生，其影響很快就波及法國。

工業革命的特點首先是一系列的技术發明，這些發明在紡織工業——紡紗和織布——方面，特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要把紗織成布，織工必須把紗交織起來，就是說把一根緯紗橫穿過一系列繃緊的經紗。這個工作以前一直是用手工做的，工人拿梭子把緯紗穿入經紗。一七三三年約翰·凱伊發明了飛梭織布機，使梭子自己動作，以後織布過程就快得多了。但是接着又發生了缺紗的危險，因為細紗還是用手搖紡車來紡的。織布業既然需要很多紗，而紗的用途眼看還要擴大，於是紡紗機的發明就應運而生。此後，各種發明接踵而至，因為一個生產部門中發生的任何變化，一定會影響另一部門。到了一七七一年，阿克萊特發明水力紡紗機，一七八五年，卡特萊特發明機器織布機。不過，最重要的事情還是工作母機的誕生。工作母機是“一個機構，它在取得適當的

运动之后,便用它的工具,和以前的劳动者,作同样的工作。”^①

这个进步是在棉織工業方面开始的,因为通过商業关系之扩大,远方的棉布——印度布或白洋布——在欧洲市場上出現了,而欧洲資本家(特别是当时的英国資本家)觉得用美洲产量日益增加的棉花来織布是有利可圖的。同时,人們也学会了染布和把各种花样印在布上的技术。毛織工業和絲織工業也先后机械化起来,和棉織工業相抗衡。

紡織工業的变革,带动了冶金工業的变革。織布机起初是木制的。这就有兩種不方便:一方面木制織布机容易损坏,另一方面,木机太脆弱,因而不能轉动得太快。鉄本来可以作为更坚固和更耐用的原料,但是太貴。当时用木柴鍊鉄,而森林日益在减少。因此,有人就想用煤来鍊鉄。但是这样作法並不是沒有困难的,因为拥有森林的地主們唯恐失掉生財之道,於是起而反对資本家。最初用煤鍊出来的生鉄質量並不高,很脆。於是人們就想把炭的成份从生鉄中分解出来以成純鉄。后来發明了攪鍊鉄的方法(把生鉄和某些鉄的氧化物混合在一起,使这些氧化物的氧吸收生鉄中的炭),才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此以后,就可以生产坚硬的鉄和鋼了(这种方法从一七八四年起就在英国採用了)。

可是,用什么方法使这些新發明的机器轉动呢?在很長一个时期只能用人力,后来又用水力,所以許多工場都建筑在河边。这时候,新發明机器的質量已經相当高,而可以用的动力則很不够,兩者之間已是不甚相称。然而,当时大家已經知道蒸汽机的原理。法国人德尼·巴宾在十七世紀末叶就已經發明了這項原理。但是他是新教徒,所以被驅逐出境,卜居於英国和德国。一六八七

^① 馬克思:“資本論”,同前版,第四五〇頁。

年，他發表一部回忆录：“新式車水机器的構造及用途”。一七〇七年，他發明了第一艘汽船。但事实上，巴宾只是一个开路人，因为在他發現蒸汽机原理的时候，当时的生产工具發展得还不够到需要强大动力的程度。相反地，到了十八世紀末叶，在工業上利用蒸汽的力能已經很感迫切。一七七五年，英国人詹姆士·瓦特制成第一架蒸汽机。起初，主要在矿山里才用蒸汽机，这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火力抽水机。人們用它来排除矿里的积水，以便开採一直遭水淹沒的煤田。

用蒸汽为动力的各种机器將使資本家增加利潤。归根到底，只有利潤才是推进技术改革的原动力。

“資產階級除非使生产工具經常發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①

“包买主”和手工工場的出現，以及手工工場轉变为工厂的事实，都可以用追求利潤來說明。

無容置疑，英国当时是比法国进步。英国資產階級，通过規模宏大的殖民地商業，已經很快地發財致富了。大地主沒收了农民的土地，把他們逼得离乡背井，同时为手工工場和工厂造成了一支立刻能用的劳动后备軍。十七世紀的各种变革使一部分資產階級得到了政权。在法国，工業革命的影响發生較晚。我們將在下文看到，一直要等到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它才發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早期的朕兆則自从十八世紀就可以看出来。

* * *

無产階級是与工厂同一时代誕生的。只是从这时候起——即从工業革命起，才談得到工人运动。

^① “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中文版，第一二頁。

然而，当时还不存在一个單一的工人階級，而只有許多在城市和乡村中的作坊和手工工場里作工的男男女女。我們在上文所加以区別的生产力發展的每一阶段，都曾給这些劳动人民帶來悲慘的后果。

从十二世紀起，人們已經談到工人的貧困生活。这种情况在紡織工業中尤为显著。当时为商品市場生产的紡織工業，还不过是具有手工業形式的早期工業。克萊第安·德·特尔瓦在一一七〇年到一一七五年这一时期中为絲織女工写的一首詩，就是明証：

織金線，織絲線，
女工費尽心和眼。
人人依然窮徹骨，
肘后和胸前，
衫子破得像花边，
背上油膩一大片。
細脖子，蒼白臉，
餓癩肚子受熬煎。

我們再听一听她們自己那种緩慢和淒涼的歌謠，这是劳动的歌謠也是苦人的歌謠：

手中織綾罗，
身上穿破衣，
衣破常露体，
無食腹常飢。
工錢拿到手，
果腹仍难提。
頓頓硬面餅，

晨少晚更稀，
.....
咱們穷断脊梁骨，
靠咱工錢發財的
一个个坐享其成。
咱們白天幹活
幹到更深夜又靜，
累極了敢歇歇嗎，
皮鞭子可不容情^①。

十二世紀和十三世紀就是那么凄慘的兩個世紀！

然而，这正是那个被人称頌为善良公正的聖路易时代，也就是工人们創造哥特式艺术傑作的时代，然而那些傳記家却要把他們形容成粗鄙野蛮的人。工人的起义和殘暴的鎮压標誌着这两个世紀。騷动首先从小行業开始，繼而波及制造出口貨的企業。在某些弗蘭德城市里，毛織工人必須住在城牆的外面，晚上城門即緊閉，以便大商人能安心休息。一二八〇年，依普尔發生一次猛烈的織呢工人暴动，六个法官當場被杀死。十个被捕的罢工工人因而被挖掉眼睛。通过我們至今还不清楚的方式，暴动不仅蔓延到全部紡織業地区，如布魯热、杜亞、士尔內等地，而且还波及普罗文、盧昂、加恩、奥尔良、冷斯、貝西尔和土魯斯。这些都是很壯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运动。他們在極端貧困和經常受欺辱的生活中找到了掀起运动的理由。他們这些运动的普遍性和彼此配合的情况，証明其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在历史上並沒有記載。这些运动具有真正的起义性質，但是它們却較接近同时代的农

^① 在保罗·艾吕霞的“古詩今譯初集”中，讀者可以看到这首感动人心的詩歌（皮埃尔·西格斯出版社，第一集，第二〇至二一頁）。

民起义，而和现代的工人运动比起来还是不大相同。除了这些运动之外，还有地区性的和限于某一行业的罢工运动。“罢工”这个名词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人们已经常常提到“达克昂”。当时一个法学家曾对“达克昂”下了如下的定义：

“工人们为了共同利益，彼此答应、保证或同意不再为原来的低工资劳动，而擅自增加工资；彼此议定不接受低于他们所要求的工资，而决定对不守信义的帮工进行惩罚或威胁。这样为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同盟即是‘达克昂’。如果人们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违反总的利益，而且也将永远不会有好的工艺品制造出来，因为各个行业的工人都将争取不合情理的高工资，而共同利益决不能容忍无人制造工艺品。”

十六世纪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的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发现和人文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部初露头角，广大人民为资本的初步累积付出惨重代价，工商业的发展促成政权开始集中和封建分子反抗政权集中（因为政权集中仅仅有利于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即国王）等等都交织在一起。这是各种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刻画一个理想社会的美景的时代。乌托邦这个字本身就是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他的“乌托邦”一书时产生的。当然，莫尔是英国人，他所引用的一些情况都特别与英国有关。但是他的论证对当时的法国也是同样适用的。他以何等的大胆批判和揭发当时的贫困现象！社会秩序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富人们、贵族们，特别是贵族地主们的优裕生活，同时它也开始保证那些财阀和银行家的优裕生活。法律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而制订的，而劳动者的命运却比畜牲还不如。这种罪恶的根源，就是私有制。既然当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社会阶级能够推翻压迫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托马斯·莫尔自然只能把他的读者引向一个未知国，他把这个

未知国名之为“烏托邦”。这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有这个国家才真正的可以称为共和国，因为一切财产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人利益会同集体利益相抗衡。那里只有懶汉和游手好閒的人才不齿於社会。人們每天的工作只有六小时。由於沒有人强占別人的劳动果实，所以生产是綽綽有余的。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沒有区别。农民和手工業者可以利用業余時間提高文化水平並致力於科学研究，因为必須使每个人获得“尽可能多的時間来提高精神生活”。

意大利修士托馬斯·康帕內拉所想像的烏托邦比此更要大胆一些^①。他也主張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他也想像一种不复成为奴役的劳动，他說：

“在太陽城里面，有用的劳作、各項工程、科学和艺术和各項社会事業，都均分給全体公民去作。每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就够了。”^②

然而，不仅如此。康帕內拉对科学和人类的發明創造力抱有無限的信心。他預言人类將能够在天空中自由航行，而且用某种鏡子就可以观察星球。保尔·拉法格曾写道：

“康帕內拉的烏托邦是所有烏托邦著作中一个最大胆、最徹底和最美丽的理想国之一。談到他的哲学共和国組織方面，他把人类彼此之間和妇女兒童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詳細地加以規定。他甚至細致地談及私人生活的一切細節。他以最自由的精神对待和处理当时的和在十九世紀仍存在的各項社会問題。”^③

① 康帕內拉生於一五六八年 死於一六三九年。

② “詩意的太陽城——一个哲学共和国的形象”，引自最新譯本。巴黎伏爾書店，一九五〇年版。

③ “社会变迁”，馬克思主义月刊。一八九五年九月号。

因此，我們很可以了解，为什么托馬斯·康帕內拉会受到当时反动分子的仇視，以致在監獄中度过了二十七年的光陰，也可以了解为甚么儒勒·盖德虽然考虑到历史条件的不同，却依然有一天（一八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众議院中高呼道：

“我們不否定，而且將永远不否定以往那些共产主义者。你們可以漠視巴貝夫主义者，把我們和柏拉圖的共和国、莫尔的烏托邦和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看做一脉相承，而我們对所有这种偉大的过去，却引以为荣，作为我們的傳統。同我們上古时代的傳統一样，我們要求实现偉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是所有曾用手和腦为公共的福利和幸福而斗争的人們的理想。我們对这些人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时代所發生的种种事件和理論見解，只有用階級斗争才能解釋。恩格斯曾对这种情况的复杂性，就其关键所在很清楚地揭露出来：

“从其發展时起，資产階級就帶着它的对立体以俱来：資本家沒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当中世紀的行会的行东發展成为近代的資产階級时，行会的工匠及行会以外的零工，也以同样程度轉化为無产者。虽然整个的說，市民階級在和貴族斗争中，曾可以認為自己有权同时代表当时各个劳动階級的利益，可是在每一个大的資产階級运动中，作为近代無产階級的多少發展的先驅者之階級，也已經爆發了本階級的独立运动。”^①

这就是十六世紀的社会發生动盪的深刻原因。帮工对师傅的斗争，帮工同师傅联合起来对商人进行的斗争，都是当时的社会性質的斗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頁。

在行会这个问题上，誰也不能比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說得更清楚了：

“商人把很多往日的独立劳动者降为計件加工匠，然后又降为單純的雇工，这样，他們动搖並威胁了整个社会結構。这已不仅是师傅与工人間日益加深的鴻溝，而是在手工業階級本身里面已經出現並且將日益加深的一道裂痕。一五五七年，翁德舒特的一些师傅自称为‘可憐的無辜之人’，並以辛酸的口吻埋怨那些大包买主使他們失去独立並陷於貧困。在法国北部的許多城市中也發生了同样的冲突。如果用虽然有些过分但也符合事实的話來說，工業小資產階級已面临走向無产化的危机。”^①

此外，行会制度也發生了变化。它不可能不被生产力的变化所动搖。在大多数的城市中，帮工被排斥出本行的管理機構，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城市的市政機構里，“搞机器和出身微賤的人”也被排斥出去。帮工已不可能上升为师傅，即作坊主人。这里面有兩個原因：第一，因为“师傅費”提高了很多。如果要在巴黎成为一个造鍋师傅的話，一个师傅的子弟只要付出十个苏^②，而一个在巴黎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却要付出八十个苏。一个外工——即在外地当学徒出身的帮工則要付出二百四十个苏。当时，上升为师傅必須提出一件“傑作”，这种制度已經十分普遍，特别是完成这种作品所需的費用越来越多。从一五六五年开始，“傑作”制度已經具有強迫性，有时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兩年多的劳动才能完成。同时，为了使“傑作”日趋昂貴，使用黄金白銀等貴重原料又变成了一种風气。而且除了原料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費用。下面是十六世紀末叶，亞眠一个候补藥剂师开業时的各項花費：提名时的酒会；考試时的宴

① 科奧納尔：“一七八九年以前的法国行会”，法蘭西新雜誌，一九四一年版。

② 法国旧幣名。——譯者

会；在进行考試期間，他必須供給四个监考人的午飯和晚飯；宣佈考試結果的那天晚上，必須宴請全体評判人；等到“傑作”及格並隆重地送到市政厅去的时候，又得大排酒席，这一次不仅必須邀請全城的藥剂师，而且必須邀請他們的妻子、全城的医生和他們的妻子和已故同行的妻子等等。自然，除此以外还有許多大大小小行会章程上沒有明文規定的礼物要送。

相反地，师傅的兒子和女婿却可以享受种种便利。他們不必花很多錢就可以承繼父亲或岳父的家業。如今，这条上进的路也已經斷絕。貧苦的工人將永远貧苦，永远作工人。他們沒有办法再当师傅。

在那些所謂沒有行会控制的自由行業里，这时候也發生了同样的而且更迅速的变化。其实，行会制度並不能統治一切。許多行業，許多地区不受行会的控制。往日中世紀的工人在这些自由行業里还可以变成老板，現在，由於生产工具的进步和信貸制度的發展，想作老板必須有資本，至少也得有一笔小小的資本，而工人就沒有这笔資本。比如說一个印刷工人，他从工資上积蓄下来一些錢怎么也买不起印刷机、字盤、活字、油墨和必要的紙張，他雇不起帮工，也做不到先垫錢等那些書印好卖出去后才收回錢来。

可憐的学徒們，他們的境遇比帮工还要坏，他們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中社会变迁的牺牲者。

我們只要看一看十六世紀的那些鬧劇，例如“裁縫鬧劇”，就可以知道当时的学徒已經成为“加夫罗什”^①类型的人物了。年青的艾索貝是学裁縫手艺的，他很調皮，决心尽量戏弄下他的师傅，而且他的手段都很巧妙。可是这些玩笑里面隱藏着多少辛酸的眼淚

^① 加夫罗什是法国大文学家雨果的巨作“悲慘世界”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成为革命时代勇敢、活潑的巴黎穷孩子的典型。

啊！学徒吃得很坏。当他的师傅责备他吃得太胖的时候，艾索貝回答說：

“这大概是餓胖了
……我在你家一星期沒見
有人在灶上燒鍋。”

有一位女顧客拿来一只竹鷄，並且指明一定要分一些給小听差吃，师傅就說艾索貝有胃病，如果吃野味就会丧失性命，所以只能吃面包和白水。当然，在戏里面，师傅最后是被人痛打一頓，引得一般观众哄然大笑。

当学徒不再被当作听差使用而能作为一个工人的时候，他也沒有工資可拿或是只拿一些很少的工資。这种風气愈来愈流行。因此，学徒同工人之間發生直接的竞争。工人常常把这种情况归咎於学徒，可是实际上却与学徒毫不相干。学徒在师傅家受剝削，如果逃出师傅家，自己家里又养他不起，而工人受了穷还要拿他出气，所以学徒是当时最最不幸的人。后来还得經過很多年的工人斗争，成年工人才知道自己和学徒是一家人。甚至到了十九世紀，还可以看到帮工虐待学徒。至於資本家呢，他們一出世就知道使劳动人民彼此对立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以上說明十六世紀是一个罢工和工人暴动的时代。在历次罢工中，里昂印刷工人的罢工最具有典型性^①。在那时候，工人已經提出具体的要求：改善“面包、酒和副食”那部分实物工資，改訂工作時間（当时曾有帮工从清早兩点鐘工作到晚間八点鐘）並限制学徒的数目。这一次罢工是在一五三九年爆發的。罢工工人組織

^① 亨利·奧塞：“十五至十六世紀的工人”，巴黎一九二七年第五版，第一七七及二三四頁。

得非常出色。他們筹集了一笔“公共基金”作为救济費，同时成立一支工人队伍以便糾察后来人們所說的黄色分子，並於必要时和警察对抗。事实上，里昂的乱事一直到一五七二年方才停止。

当时全法国的城市都發生过类似的情况。王朝採取了兇暴的手段来阻止罢工运动的發展。敕令和規則一道又一道地頒佈出来。由於里昂的罢工运动，弗朗索瓦一世曾以上諭禁止任何师傅进行彼此間的联盟，同时也禁止帮工彼此联合。該項上諭禁止：

“任何行業的师傅、帮工和佣工在任何情况下进行任何大小集会，从事任何壟断行为。同时，禁止任何帮工、工人假借聯絡同行兄弟或以其他借口聚众結社，禁止互通消息介紹工作或唆使辞掉工作，禁止以任何方式阻撓师傅选择本国工人或外国工人。帮工工人如有違犯，將处以罰金一百里华。”

事实上，政府是依然准許师傅自由联合的。全国城市中警察法規所压迫的無非都是工人。第戎城的工人必須从事本行手艺，否則限十日內出境，过期則处鞭刑。巴黎禁止面包匠

“集会，佩劍，携帶短刀及其他可以用来毆斗的棍棒，除在礼拜日及其他节日外，禁止戴帽、穿着大衣及長褲。只有在礼拜日及节日才許穿戴白色、灰色或其他顏色的衣帽。”

他們在工作日必須穿襯衣和短褲，不准戴帽穿長褲，以便易於辨認，並使他們平日無法离工出門。

同門会和兄弟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产生的新組織。其实这些組織是在十六世紀以前就有的。它們的起源無疑是很悠久，不过大家知道得不太清楚。当时的同門会是帶有宗教性質的，除了同行中人組成的同門会以外，还有其他的同門会。总之，每一个同門会都供奉一个聖者，逢到該聖者的节日，同門会便举行出会等宗教仪式或宴会等世俗庆賀。起初，师傅和帮工都参加同門会的。但不

久，由於行会制度的發展，师傅和帮工开始分別成立自己的同門会。帮工的同門会往往收集互助基金，成为救济互助的团体，有时也發动罢工。总之，它們时常与不断採取各种手段压迫它們的政府当局發生冲突。它們屢次被禁止，但是每一次都重新建立起来。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大革命的前夕，它們的重要性和活动範圍已大不如往昔了。

反之，兄弟会所起的作用則較为重要。它們的起源几乎無人知道。傳說最早的兄弟会是在紀元前一千年建造耶路撒冷庙的工人組成的。沒有問題的是：很多兄弟会的標誌和仪式都是从营造業方面發源的。如果当时沒有大批工人参加劳动，中世紀的那些建筑物都不可能建筑起来，这也是沒有問題的。当时許多許多精通手艺的石匠、瓦匠、木匠和玻璃匠，都在姓名失傳的营造师傅指揮下从事劳作。那时候的手工业者和艺术家还没有什么区别，而当时能够产生出很多现实主义的雕刻作品，却都要归功于他們。当然，教士們也曾提供一些主题，他們手抄本中的着色工笔画也曾被教堂的集錦玻璃用作藍本。但是工人的作品都常常不受本題的拘束，而且在有关聖經史的作品中，簡直說不清有多少人物和場面是从日常生活中脫胎出来的。这些都是城市和乡村中日常生活的形象，而大部分工人正就是从农村来的。

这些是中世紀聚集工人最多的場所，真正的工人組織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工地上产生的。如果人們了解到，当时宗教傳統的力量是如何沉重地压在人民的身上，那么工人在建造薩罗門庙的人里面找出了傳說的祖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比方說，我們知道那些劈开紅砂石，以鬼斧神工修成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石匠們曾經組成秘密社团。那末在其他城市中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总之，从十六世紀起，兄弟会越来越多，而作用也越来越大，这

种發展和上述那些巨大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一方面，兄弟会反对师傅壟断行会，同时也反对行会本身，所以它們只把工人們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們也建立了“周遊法国”的制度。行会本来是地区性的組織，只在一个城市里扎根，但是，由於工業發展，工人須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於是就發生了工人在法国各处遊行的必要。工人們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城市，盤纏如果已經用完，而工作要等待若干天之后才能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就会觉得自己孤立無援显得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可怕了。於是兄弟会就成立了这种形式簡單的互助組織。“周遊法国”以全国分成若干歇宿站：如巴黎、里昂、波尔多、土魯斯、蒙貝利埃、拉罗舍尔、南特、都尔、布洛亞、翁热、奥尔良、內維尔、尼姆等等。每到一個城市，帮工可以在一位女居停掌管的帮工客店里歇宿、烤火、用餐。店里还帮他找工作。如果找到工作，他就等領到了工資再偿还女居停借給他的錢。如果任何工作都找不到，他就領一份盤纏再到別处去。后来，兄弟会逐漸發展为一种斗争組織。十七和十八世紀中的很多次罢工就是由它們發动起来的。因此，它們引起了老板們的仇視，时常遭到封閉，但是封也是白封。一七三〇年，蒙貝利埃的地方長官以非常严厉的口吻譴責兄弟会，說他們組織团体是

“專与制造家俱和造房子木工的师傅作对，阻止某些帮工到某些舖子去做工。”

这位官吏虽然声势汹汹，可是王朝政府却不得不迁就事实。一七八三年，王朝政府明白指出：

“取消各城市中工人女居停的習俗是危險的。此則一方面，这种習俗比較容易使工人循規蹈矩，因为女居停有些像工人的保人，並且对他們的行为可以供給一些有用的線索，另一方面，她們習慣於借一些錢給工人以資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救济，工人們时

常会挺而走險。”

君主政权对工人們的这种关怀似乎是很奇怪的。其实，問題是在想办法避免工人們“挺而走險”，同时，也可以利用女居停作眼線。

不管怎样，兄弟会在法国工运的起源上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的。因为，別处虽然也出現过兄弟会，但在法国則特別發達。贈送盤纏或旅途救济都是工人互助的表現。現代的工会运动还保存着这种傳統。我們研究法国总工会史的时候还会碰到这个問題的。現在法国工人斗争的詞彙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兄弟会中吸收来的：例如把老板叫做“猴子”，車間叫“盒子”，工人团体叫做“同門会”，不参加組織的工人叫做“狐狸”。所以兄弟会的确起过进步作用，但为了了解它的性質，絕不能照現代反动派那样去評价兄弟会，因为这些反动派的企圖是要把它复活起来，与工人階級的政治和工会組織对抗。我們必須知道現代工人的政治和工会組織乃是工人階級从更高的覺悟中吸取了力量而建立起来的。

因为兄弟会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帶有很明显的反动成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分析的一样：“当时的無产階級是分散於全国各处而为互相竞争所分裂的人群。”

工人之間的竞争對於培养階級覺悟和建立总的組織來說是一种障碍。我們通过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兄弟会可以体会到当时这种竞争的情况。那时候的兄弟会分成了好几种对立的帮口：

一、薩罗門門徒，自称“阿尔卑斯山人”，这里面有木匠、鎖匠和石匠。

二、雅克大师的門徒，或称“貪吃汉”，或“守分”工匠。

三、苏比斯大师的門徒，“守分”工匠的另一派系。

这种种名称本身倒無关紧要。倒是那些關於自己源流的神奇

附会，以及各派別間的分裂，却說明着工人們还没有成为一个單一的階級。他們一方面固然反对老板，但是另一方面以为工人之間也必須彼此傾軋，才能保障本行業的生活权利。帮工彼此对立的斗争曾經是非常激烈的，这是無庸置疑的。比方說，一七三〇年，在克魯平原的阿里与沙龙之間就爆發了一次真正的械斗，交战的一方是薩罗門派的帮工，另一方是苏比斯派和雅克派的帮工。結果双方都有伤亡。兄弟会的团結可說是很动人的，但是这种团結畢竟沒有能够扫除各行業的閉門主义思想。

兄弟会組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还繼續存在一时。一直要等工業革命完成的时候才归於消灭。机器的發展廓清了不同行業的閉門主义思想，階級利益就超过了狹隘的行会利益。

“机器使各种劳动間的差別愈益消失，使工資差不多到处都降到同样低微的水平，因此無产階級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就愈趋一致了。”^①

於是，兄弟会走上了衰亡的道路，尽管有人拚命想延長它的寿命或使它复活，結果無非徒勞無功。今天还遺留下一个工匠組織联合会，它只有几千个會員，这些會員大部分都是从事手工業的人。一八三〇年以后，兄弟会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但是，法国無产階級不应当忘記，尽管兄弟会有它的弱点和矛盾，但它曾標誌着無产階級历史上的一个阶段。

本章就劳动人民自起源到十八世紀的历史描出了一个輪廓，使我們能够更好地了解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法国工人階級的情况。

^① “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同前版，第一七頁。

第二章

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 工人和階級斗争

工人的分散。——工業集中的面面觀。——帮工。——手工工場的工人和工厂的工人。——女工和童工。——工人的切身要求和一七八九年的选举运动。——工人和輿論。——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階級之間的基本矛盾。

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工人的人数並不很多，在总人口二千五百万居民中，工人至多只有六十万人^①。

並且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这些工人是分散的。

当然，当时已經有了大工業中心，那里的工人比別的地方要密集得多。里昂有八万五千居民。这是法国第三个大城市；主要的工業是絲織業。但別种工業如印刷業也有很大的發展。在冷斯，聖奎丁，里尔和盧昂，紡織工業都很發達。

特別是各港口聚集了很大数目的工人，因为商業引起了工業的兴起。哈佛尔港同英国、荷蘭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保持着頻繁的往来。它是英吉利海峡最重要的港口，但它仅是一个極小的

^① 要得到一个精確的估計是非常困难的。阿尔培·馬基埃斯，(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月份“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上“關於法国無产階級在革命前夜的重要性筆記”一文中)曾嘗試估計过。他估計的数字是一千一百万人。但事实上这主要是指無地的农民而言。我們對於城市無产階級和农村無产階級的比重，並不能作出确实的估計。雷翁·加恩根据貧民总局的文献，估計巴黎的工資劳动者为十万人，而当时巴黎的总人口則为五十万人。

城市(一万八千居民)。另一方面,大西洋沿岸各港口正處於全盛时期。与西印度群島的貿易和买卖黑奴使善於經營的資產階級發了大財。和这种商業活动直接有关的各种工業也随之出現了,例如煉糖業、釀酒業、面粉業、造船業、印花布製造業。波尔多有八万四千居民,南特有五万七千人。馬賽是法国的第二个大城市,居民九万人,其中有很多人是在作坊和手工工場工作的。而巴黎則主要是一个手工業生产中心。

* * *

当时的採煤業已有相当的进步,結果形成了重要的工人集中区。自一七四四年以后^①,任何矿产如果未得王朝政府的特許就不能开採。从那时起,相当規模的公司組織起来了,只有这些公司才能进行开採煤矿所必要的准备工作,例如:鑽探、挖掘坑道和矿井、購買和使用火力抽水机等。主持这些公司的是些長袖善舞的商人,其中有些出身於貴族,例如:克盧沃亲王和索拉热爵士。主要的公司有卡尔慕公司与阿萊斯公司,阿尼希公司和安辛公司。后者拥有十二架火力机器,雇用工人四千人。

然而工業集中現象还是作为特殊情况而出現的。机器的採用还剛剛在开始。据估計,棉布工業方面有九百台机器,而且都是英国制造的机器(英国有兩万台机器)。往往是英国人自己把这些机器运到法国来的。所以,有些棉布業手工工場也聚集了很大数量的工人。

在紡織工業的某些部門,生产集中並不是由於使用了机器,而

^①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例如在一七七五年的罢工中,小矿主和他們的工人联合起来反抗一位礦業資本主义的先驅者屠包夫。国王曾給屠包夫一种特权,即阿萊斯区所已發現的或將來發現的一切煤矿都归他独佔。屠包夫把矿主和工人驅逐出去,給矿山砌上了圍牆。結果,他把这一区内所有的矿山就全部占有了。

是由於制造方式本身不得不如此。例如布匹的染印就是这种情形。在很长一个时期，印花布的輸入和制造是禁止的。这是旧制度管制工商業的后果之一。事实上，这办法既阻止不了偷运，也不能杜絕秘密作坊的存在。

后来，在渴望自由的某些制造商的压力之下，再經過主張放任自由的那些资产阶级經濟学者的鼓吹，政府才在一七五九年准許印花布的輸入和制造。

現在我們要談的是制造問題。对制造來說，有几个条件是决不可少的。必須有漂白布匹用的相当广濶的場地，晾干布匹用的寬敞的房屋；还有各式各样的操作过程，需要精密的分工，复杂而昂貴的設備，大量原料的儲存。因此，这种工業便产生了由股份公司集資設立的大手工工場，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在茹伊·昂·約薩的奧倍尔康夫公司。

在冶金工業方面^①，技术的發达也促进了生产的集中。那时刚开始用煤炭代替木炭来熔化矿物，但是这样的轉变就使大企业非出現不可。於是在一七八九年有克劳索股份公司的創立。这个公司的資本相当雄厚，有力量使用蒸气机器，汽錘，一条“行駛馬曳車的鐵路”，总的來說，它使用着精良和昂貴的裝备。这家公司有四个高爐，兩個大冶鉄厂。克劳索公司的冶鉄厂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一家。一七七七年又有印德雷冶金厂的創立。这是一个純用煤炭熔鉄而且拥有新式裝备的鑄造大砲工場。

那时的鋼鐵大王是第特利希。他后来当了斯特拉斯堡的市長，是拉斐夷特的朋友。盧热·德·里列的“馬賽曲”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写成的。他后来因为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后曾逃往国

^① H. 和 G. 布尔金：“法国革命初期的冶金工業”，一九二〇年。

外，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国拥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工厂；在尼得布倫的工厂就集中了八百工人，在賈热达尔·賴喜索芬……也有工厂。

以上都是工業革命的初期迹象。但是总的說来，工業还是分散的，而且小型工業在城市經濟中还占着統治地位。

絕大部分的鋼鐵工場都是規模很小的（平均每一工場有二十个工人）。甚至冶煉厂也是規模很小的企業，設備簡陋，产量低劣。有时只雇用十来个工人。用木炭熔鉄依然是最流行的方法。所以冶金業分佈在森林地带，例如亞尔丁、尼維內、洛林、阿尔貢納以及比里牛斯山一带。

紡織工業也分散在许多作坊里。例如在奥尔良及其郊区就有二千二百八十七个制袜工人分散在五十五个独立的企業里工作。

我們以上所談的只是城市工業。此外还有农村工業，虽然受到威胁，但是也相当活躍。

我們可以把农村工業分成兩类。一种是貧瘠地区的农村工業，这是貧苦农民貼补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来源。例如盛行於布列塔尼的織布業就是这种情况。

可是富饒地区，农村工業也有了發展，例如在雷翁、比加第、弗蘭德以及上諾曼第等省就是如此。这些地方的土地很肥沃，所以農業很發达。但是大部分土地都为大地主所占有，許多無地的农民只好在农村工業方面去找糊口之計。可是無論如何只不过是些小作坊，而且大部分是家庭手工業。市場的范围也很狹隘。

因此，当时的無产階級还不具备工業革命以后，更不具备帝国主义时期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說还没有集中的現象。工人是分散的。从这一地区到那一地区的往来是困难的，“周遊法国”的帮工人数是很少的，因为要使这些旅行通行無阻，还須进一步等待工人

們有組織的互相支援。总的說来·工人活动的范围不出作坊以外。他們的斗争和他們的工作环境一样,都是地方性的、孤立的。工人还没有提高到能够認識阶级友爱。他們的立場和农民的立場很相近,其实他們往往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工人。簡陋的手工織布机安置在一間小屋子里,与其說是作坊,倒还不如說像一間車棚。妻子和很幼年的孩子都一起帮着劳作。房屋旁边有几亩田和一些放牧的草地。一条牛,几只綿羊和山羊,放到公共牧場上和收获后的田間吃草^①。

然而,一种新的集中方式也正在形成,但是这种集中並不是必然地帶來工人的集中。这就是商業集中。这种集中剝夺了手工業工人所仅有的一点独立性,但是他們自己却並不十分意識到这点,因为他們在表面上还是自由的,而且又不关在一个大手工工場里被迫去遵守严格的紀律。这种形式的集中發展得很快。当然当时还有很多貧穷的小商人,也有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村子的小販。虽然富有的农民嫌惡他們,說他們行窃、乞食,可是一般人却很欢迎他們。他們販賣些廉价的貨物的同时,傳播着顛复的思想。他們善於傳遞消息,他們是出色的聯絡使者。很多次农民暴动就是他們促成的。

但是,在这些小商小販以外也有富裕的商人。他們是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出現的包买主的后裔。所以人們称之为零售制造商

^① 以下是乔治·勒費佛尔描写貝桑区利特雷矿工的情形：“农業短工在矿山里找到工作,得到了不失業的保障,就算是万幸了。当探矿工作停止时,他們就跑到农庄去找工作。其中很多人有自己的或是租来的田地,耕种蕎麦,也有人有一小块栽种苹果樹的园子。在农忙的时候,他們就不下矿。大家都梦想着在一小块公地上或是在一块租地上盖一所房屋。貝桑区和十八世紀末叶法国絕大部分地区一样,充斥着农業工人,只有工业才能把他們从極端貧困中拯救出来。”(乔治·勒費佛尔:“旧制度下的利特雷矿工及其在革命初期的情形”,載於“法国革命历史年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月。)

和批發制造商。实际上，他們並不制造什么东西。他們只不过是中間人，但是很快他們就把手工業工人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都跑到乡村里去，因为乡村的工業不像城市里的工業那样管理严密，行会也比較不强大，工人也比較听话。况且，一七六二年九月七日的敕令又授予乡村居民以一种权利，可以不加入一定行業的行会而制造各种布匹，但有一个条件，即須服从政府的規章。其实这种办法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給以法律上的承認罢了。商人們利用农民和手工業者的这种自由和周期性的貧困，乘机壟斷农村工業。农村中从事手工業者仍然是独立的。但事实上他們是由商人供給原料，原料价格由商人来規定，因为不經過他們的手是得不到原料，所織的布也是由商人收購去，价格也是由商人規定的，因为这时候市場已扩大，不經過商人，布便卖不出去。最后，商人有工具裝备，甚至有作坊，他們對於布匹就有可能作最后的加工（染色或整飾）。

当織布机改良以后，这些手工業者的財力便不足以置备这种工具了，於是就由商人來供給他們。例如亞眠，阿貝維爾和色当各地区，往往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手工業者已經不再是生产工具的所有人。这样他究竟还有些什么呢？表面上他依然相当独立，可以由自己安排他的工作。事实上，他虽然还没有变成無产者，但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了。因为当手工業者为了生活，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也就沒有時間來享受留給他的这份自由，依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他的工作了。

他們最多在农忙的时候有几天可以离开“作坊”，以便从事農業劳作。

因此，由於控制了乡村，大商人便成为工業的首領。他們採用了机械織布机，为資本主义工業的飞黃騰达准备了条件；日后資本

主义工业在机器发达下就来摧毁农村工业了。

在城市手工业方面，商人的控制也日益加剧。里昂丝织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少数大商人从事生丝或丝织品的买卖，并且和外国进行贸易。他们结果把那些小商人消灭了，到法国革命的前夕，里昂只剩下二百家丝商。这些大丝商供给作坊主人以原料，介绍式样，规定花式，垫借必要的款项购买工具，然后收购丝织品，转手出售。手工的工价当然也是由他们规定的。所以里昂工人最关心的事，无非是工价标准。也正因为这样，帮工和师傅虽然彼此有斗争，但是每逢要求较高的工价时，他们总是联合一致的。这种情形到法国革命前夕变得更为严重。一七四四年里昂颁布了一个条例，把“信用证书”的条件定得更为苛刻。“信用证书”规定了师傅应该对交付商人的商品须负完成全部工作的责任。从此以后，作坊主人（师傅）完全受到商人的控制，简直再也无法解脱。同时，工价定得如此之低，以致不能保证作坊主人维持相应的生活。

* * *

工人们不但非常分散，而且工人阶级的成分也极不一致。试举其构成的分子如下。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者差不多都过着和无产阶级一样贫困的生活。

圣亚田的铁匠一直到十八世纪还带着无可奈何的讽刺的口吻，指着他们的皮围裙唱着下面这个歌：

“可憐的皮圍裙，你是一粒種子，是你造成了幸福的人；你給有錢人生產了所有的東西。

“老爺太太，你對他們每個人都打招呼；你對他們一律加以尊敬，你瞧着他們散步，趾高氣揚，緊握着他們的手杖，而你啊，可得要讓在一邊。

“城市法令增加了杂税，木头鞋两个里亞^①一对，一瓶酒要一两个苏^②；只好喝些草头汤吧，要不就只好挨饿。

“战争法令召集我们……他们要找顶替的人，他们扣你的餉；可是排起队伍来开步走的还是你。

“要是围攻一个城，或是打一场仗，你就得动身。有钱的人太笨手笨脚了，冲锋陷阵怎么行？他们会装头痛；爬城进攻到底还是你的事情。

“他们会干些什么？往纸上划字，打扮得惹人喜欢，喝够吃饱，却连一个钉子都不会钉。你们爱笑就笑吧，连泥巴也和不匀。唉呀！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皮围裙？”

“……等到你——不能再系皮围裙，你就拄根棍子去找医院；从医院再到救济院，你在那里住上几个月，然后走进壘壘荒墳。

“咳！这就是你的命运，可憐的皮围裙！”

但是这些手工業者並不放棄“重新奪回中世紀手工業者所失去的障地”(馬克思語)。他們反對大工業顯然具有保守的、甚至復古的思想。這種思想後來還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即使當他們變成無產者的時候，那些老的手工業者還留戀於已經失去的獨立，其實這種獨立只是相對的，而且他們也不知道這種獨立是和水平極低的生产力分不開的。

在那些工人之中，有些工人加入了行會，其他的工人則從事自由的手藝。但是不論是誰，他們的生活條件都是很艱苦的：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雖有許多節日，也不能補償工作的辛勞。而且不要忘記，這些休假日是沒有工資的，因此更加減少了工人的收入。工資非常低微，以致在經濟危機時期，許多工人不得不行乞

①、② 旧幣名。四個“里亞”等於一個“蘇”，一個“蘇”等於二十分之一法郎，即五生丁。——譯者

为生。

关于物价和工资问题，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面包在普通工人的家庭预算中占着主要的地位。在大革命的前夕，这项费用占工人家庭支出的百分之八十八。这就说明了面包价格只要些许上涨，立刻就能影响工人生活。

(二)物价飞涨上涨。假定以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时期的物价为一百，那末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四十五，而一七八五年至一七八九年平均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五。

(三)反之，工资的增加却非常缓慢。假定以同一时期，即一七二六年至一七四一年为一百，则一七七一年至一七八九年只增加百分之十七；而一七八六年至一七八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所以工人的购买力是大大地降低了^①。

然而，加入行会的工人，依然认为维持规章可作为他们自卫的手段，他们依然遵奉着行会的规章。我们不是见到一七二四年巴黎印刷工人为了反对不熟练的外国工人进入工场举行过罢工吗？因为外国工人会使工资降低。我们不是见到一七四四年里昂的帮工们在罢工期间曾支持作坊主吗？而这次罢工竟导致了一场真正的暴动。

在十八世纪的后期，罢工风潮层出不穷，但一般说来都被镇压下去了。第一，因为这些罢工是局限於一个行会和一个城市，而且

^① 这些数字引自拉勃鲁斯的著作：“十八世纪法国物价和收入波动情况”（一九三三年出版，二册）。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拉勃鲁斯关于物价波动的原因和它所造成的结果的见解。我们不同意拉勃鲁斯所说：“革命是违背了革命家的意志而进行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一百周年历史大会的文献”，第一页）。尽管拉勃鲁斯自己并不承认，但是我们不同意他的就是他对于历史的机械论看法。从科学观点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工人运动的利益来看，就是叫无产阶级信奉等待主义。实际上，科学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彼此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科学的工人运动史证明了，阶级斗争虽然服从一定的客观环境，但是它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

工人們既無積蓄又缺乏階級意識，所以在罷工期間不能團結互助。其次，因為僱主們阻止增加工資是聯合一致的，而且他們威吓其中最易屈服的工人。王朝政府方面也使用全部力量壓制工人：一七四四年里昂幾次罷工中，許多工人曾被判處絞刑，還有些工人被送去服苦役。一七八一年頒佈的警察律，更加劇了以往的法令。工人組織同門會，舉行集會，企圖要求增加工資，都屬於犯禁之列。工人不能擅自離開僱主，除非預先通知僱主並把正在進行的工作完成以後，而且沒有舊僱主的書面解僱書，他們不能得到新僱主的僱用。

這就是工人身份証的起源，到了拿破侖時代，工人身份証便成為正式的制度了。法院、財務官和警察隨時隨地可以干涉工人。

儘管政府採取這些鎮壓措施，工人的鬥爭依然再接再厲。“維持秩序”的人時常埋怨說工人太不馴服了。其中有一个人寫道：

“工人随心所欲地左右（東家），並且聯合起來抵抗東家。粗魯的言語，侮辱的文字，他們真是無所不為。”

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前四年，另有一個人寫道：

“最近一個時期，京城里的工人變得很不容易對付了，因為他們在我們的書籍中找到了一條對他們影響太大的真理，這就是‘工人是寶貴的’。”

然而大多數的工人都是文盲，因為初等教育還不發達，但是他們卻能說，能聽，也能討論。他們之中有識字的工人會把小冊子和報紙內容講解給伙伴們聽。

除了作坊里的幫工以外，還有手工工場和工廠的工人。當然，由於新的分工的結果，工人就無需經過正規的學藝階段。但是工場紀律仍是極嚴格的。下面是法國皇家玻璃公司強迫工人接受的契約中的一段文字，這家公司擁有三個手工工場：一個在巴黎聖安

东尼郊区，一个在比卡第省的聖奎丁，还有一个在諾曼第省的都拉維尔。

“我們，下面签字的工人們，受雇於聖哥宾皇家玻璃工場，声明自願承諾並承担竭誠为皇家玻璃工場的各股东先生服务，充当玻璃漿攪拌工或任何其他工作；在連續四年的期間內若不得股东先生或經理先生之口头許可或書面批准，不得擅自缺工或离职。此項規定包括比卡第、諾曼第以及任何彼等所指定的其他地方的工場。茲为向他們証明我們准备确以热忱和感戴的心情为他們服务起見特立此憑証。”

工人們必須住在手工工場为他們建筑的房屋里。不經許可，不得离开工場一法里（合四公里——譯者）之外。在工人居住的地区里，禁止卖酒、卖啤酒或苹果酒。冬天，夜間八点鐘以后，夏天十点鐘以后，禁止外出。至於工作時間，早上五点鐘开工，下午七点鐘下工，中間休息兩小时以使用餐。工資非常微薄，以致必須时常分發救济金。公司的领导人於一七八九年五月曾向政府請求工人救济金，他們說：

“工人中在患病时極少可不需要救济金。甚至許多身体健壯的工人，即使他們不間断地工作而且極度節約，也不得温飽。”

直到一七八八年为止，聖哥宾的工人在星期天和节日是不做工的。經理想廢除这种“惡習”，但是他良心感到不安，为此特上書里昂的大主教請求。他以基督仁慈的語气写道：

“除了叫他們做工以外，实在沒有別的方法可阻止工人們在节日和星期天酗酒滋事。”

那位可敬的主教是个闊閥貴胄，又是教會的勳旧，他对此不予答复。但据經理說：

“作为一个主教，他不能同意我；但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和爱好

秩序的人，他却不能不同意我。”

从此，聖哥賓的工人在星期天不停工了，只是由一名教士到工場去做弥撒。

煤礦業的劳动的条件更加恶劣。矿工經常在出太陽之前就下矿，到天黑才上来。終年累月，除了鬼火似的灯光外，是看不见其他的光。

下面是十八世紀描述矿工痛苦生活的兩段文字。

格里农爵士的回忆录写道：

“聖亞田近郊的煤矿，到处是許許多多的穴孔，这些穴孔既不像矿井也不像坑道，不过是一些曲折的、狭窄和低矮的窟窿，因此工人搬煤出来的时候，必須一面背上揹着裝煤的袋子，一面手脚並用地攀登这些洞穴的壁沿……男工、女工以及男女童工都参加这项煤矿工作，男人用鹤嘴、楔子和鎚子鑿下矿里的煤，男孩子把大煤塊搬上来，妇女和女孩子把煤塊裝进狭而長的袋中，一个袋裝一百到一百五十斤煤。

袋口是不打結的，只用一塊大煤盖在口上，上面系一根繩子，繩子的一端扣在袋上，另一端咬在嘴里，然后把袋子擱在头上，頸上和背上。这些可憐的工人，揹着这样沉重的煤袋，在黑暗無光的地底下，攀登孔道。他們不得不拿出吃奶的力气，克服那沉重的負担和崎嶇不平的道路，加上不得不用非常别扭的姿势前进，以致他們必須用力地呼吸，肺部上下十分劇烈，在这些地下層里，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断断续续的凄惨的嘶叫声，引起人們的恐怖感和同情心……”^①

^① 魯夫在“十八世紀（一七四四年——一七九一年）法国的礦業”一書中引用了上面兩段話。一九二二年巴黎出版，第四四頁。

有时煤矿孔道非常之低矮和狭窄，大人不能进去时，就叫小孩子或少年人鑽进去。

矿工待遇如此惡劣，即使是被罰處苦役的犯人也沒有如此被虐待。當時有一位作家很激動地寫道：

“如果我們暫且不去評論罰處苦役的囚犯們那種喪盡人格的恥辱，那末我們覺得他們的命運也許比煤礦里的苦工還要來得好一些，因為至少比較可以忍受得了。

“事實是這樣，矿工們要低著頭鑽進地底下去找煤塊，晴朗的天和美好的季節在他們的頭上很快地溜過去，不能引起他們絲毫的感覺。黎明的曙光照不見他們清早工作。他們看不見良夜的星辰在玫瑰般的天際向著他們微笑。幾支殘燈，微弱黯淡的光照亮著淒涼的地下，他們就在這種微光之下尋找煤塊；他們要用無法形容的困苦把煤鑿下來。如果他們吸進的惡劣空氣沒有把他們窒死，有毒素的气息沒有使他們得到最倒楣的疾病，那末已經算是萬幸了。他們常常是腳下一不小心，跌進礦井深淵去；他們常常是被忽然崩坍的一塊大煤塊埋到地下去。不是山岩爆炸，煤氣着火把他們燒死，就是湍急的水流把他們淹死。”^①

關於布列塔尼的煤礦的情形，有人這樣寫道：

“矿工的小孩，年紀很小就在煤礦里做工了，他們借此找糊口之資，有人專門雇用小孩來揀擇搬出的煤塊。”

總的說來，特別是在沒有行會組織的行業中是沒有任何條例來保護童工的。杜爾果是重農主義者，而且又是路易十六的大臣，他主張為了兒童自己的利益，應該讓兒童工作。這段話見之於他的回憶錄：“當糧價騰貴時如何通過增加工作使巴黎人民獲得糧食的說貼”^②。

* * *

^① 阿萊翁·杜拉克：“關於羅尼省和羅亞爾省自然史的筆記”，巴黎—里昂—一七九五年版 第二卷 第五九頁。

自从手工工場出現以后，許多妇女都跑到大工業去做工。在阿貝維爾大手工工場里，妇女和兒童占全体职工人数的三分之二。在郎格多克省的各作坊里，小女孩所得的工資比男职工的工資少四倍，这就使一般工資更加降低。

羅蘭·德·拉·伯拉第埃爾^③是手工工場的監理官，他以厚顏無恥的口吻說出了喜歡僱傭女工的理由：

“自然，妇女更慣於固定生活，更有耐心，工作更有恆心，更細致，她們很胆小，很容易滿足，經常沒有什麼派別，不懷陰謀，而且做奢侈物品很清潔很精細。不管怎樣，所花成本總比較低，而這一點總是一個經商的秘訣……”

當時一磅面包的平均價格是三個蘇。在諾曼第的萊格爾地方，小女孩做包裝縫衣針的工作，一天工資只不過一個蘇。有時女工也有起來反抗的；一七七六年巴黎各作坊的包裝女工會和工人與學徒一起舉行罷工，要求每天工作十六小時改為十四小時。

* * *

事實上，人們正是用盡一切手段在分化工人：首先是利用工人彼此之間的競爭。

幫工和手工工場工人之間的競爭，女工和男工之間的競爭，父

^② 杜爾果寫道：“紡織業可以使兒童和婦女得到適合他們技能的工作”（“文集”，一八四四年 第一卷 第四五二頁）。

馬克思在“經濟學說史”（第一卷，第六六頁，巴黎谷斯脫出版社版）曾引用了這位杜爾果的一段文章。杜爾果在這段文章中分析了工人被剝削的情形寫道：

“普通的工人只有一雙手和他的手藝，除了勞力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出賣給別人。他出賣勞力有時貴有時賤，但價格的高低並不由他個人決定，而是要看他與購買他勞力的人協議的結果。買他勞力的人總以所付的工資愈少愈好，因為有許多工人可以由他選擇，他當然情願選擇工資最低的人。工人們因為彼此競爭，不得不降低勞動力的價格。不論那種性質的工作，他們都得去爭，而他們所爭的工資則只夠維持生活而已。”（“關於財富的形成與分配的研究”（文集）一八四四年，第一卷，第一〇頁。）

^③ 羅蘭·德·拉·伯拉第埃爾是那位有名的羅蘭夫人的丈夫。

亲和兒子之間的竞争。

工人不能提出一些一致的总的要求。只有向三級會議提出委託書的時候他們才算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理論上，在最重要的城市里，居民們是組織在行会里的。可是事实上，帮工的作用並不大，只有师傅的話才算数。因此我們在訴苦的委託書上找不到關於工人貧困狀況的反映是毫不足奇^①。委託書爭論的倒是行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的問題。有些人在委託書中主張維持行会，而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比較多数，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則要求廢止行会。蒙貝利埃的资产阶级要求禁止兄弟会，而馬賽的帽匠、鎖匠和石匠則訴苦說：

“他們彼此联合起来进行慈善工作，从事救济事業的团体要被人取消了。”

相对的，很少的委託書談到工資問題。其中馬雷地方的委託書則曾提出“短工應該随着麦价的騰貴而增加工錢。”的要求。

古尔奈許馬恩地方的委託書說：

“短工的生活很苦，他們的工資應該根据人所共有的需要而加以公平的規定，不应当完全听憑富人傲慢地武断地來評定，因为激烈的竞争永远是使富人可以从利中得利的。”

梅恩省夏蘭地方的农民在委託書中提到鐵厂工人的生活時說：

“煉鐵場需用工人五百名左右。这些人都是論日的，做多少，就給多少工資，其他的工作可以說他們都是外行，因此一切都只得听憑煉鐵場的东家作主，工場的一切贏利都归在他的名下。所

^① 參看香比翁：“一七八九年委託書所反映的法国”。巴黎，一八九七年。——畢卡：“一七八九年的委託書和工人阶级”（一九一〇年）。——維達倫克：“訴苦委託書所反映一七八九年巴黎居民經濟和社会的要求”（一九四九年）。

以，只有他的生活最富裕，其他所有替他工作的人則过着最悲惨的貧苦生活。必須身历其境，才能真正了解这些苦人的境况。在最近三年中，有一百八十三个有家庭負擔的人要求佈施，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煉鉄場工作的。”

毫無疑問，农民都怕和这些工人做鄰居。他們說：工人們迫於穷困往往搞些偷雞摸狗的勾当，甚至於行兇搶劫。

另一方面却又时常發生失業問題。这說明了職業的不穩定。这情况是十八世紀末叶工人生活的一个特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情况。一般說来，这种情况既不存在於奴隶时代，也不存在於农奴时代，这是封建制度瓦解过程中的象征。人們甚至於已經不能保証找到工作使自己免於餓死。这一点一般的委託書都归咎於机器的使用。

加恩的第三等級認為：

“机器大大地有害於貧穷的人民，机器使紡織劳动完全失掉作用，因此必須廢除机器。特别是因为这种紡織机器有很多缺点，用机器織的布匹很粗劣，質量很低。”

巴黎的鋸石工为了工場里採用了兩架机器而提出了抗議，因为這兩架机器能用十二小时做好作坊里要用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才能做好的工作。特洛瓦的工艺帮工尽管承認这些机器是值得“讚美的”，但仍埋怨說，机器“使許多人失去工作”。

特洛瓦的内衣工人痛苦地認為他們所以遭到“極端的貧困”，是使用机器的結果。如果这些貨物：

“相反地用手工来制造，那末許多人不幸的人就可以得到工作而免於飢寒。这些不幸的人現在已經算得困苦顛連了，但一到冬天他們要忍受的是更可怕的災难。”

可是在这些訴苦的委託書以外，还必須提到許多工人提出的

請願書，這些請願書是在三級會議開會以前或以後發表的，例如：反對把許多工人排斥在選舉大會之外的巴黎十五萬名工人和手工業工人的請願書；以“小工、短工、手工業工人和除了雙手外其他沒有財產的人”的名義提出的“貧民訴苦書”；第四階級的委託書，即“窮短工”的委託書；“一位愛國者向全國提出的四項呼喚”。所有這些文獻，無疑地都說明了工人的生活情形，但同時也證明着這些工人在全國仍是少數。

* * *

至此，似乎可以得出若干相當明確的結論：

(一)我們在上面看到出現的各種工業生產：手工業，“包買商業”(這意味着批發商從商業上控制手工業)，手工工場和工廠，在一七八九年是並行存在的。手工業和“包買商業”多少是與封建制度相適應的。相反的，手工工場，特別是工廠卻具有顯著的革命性質了。“商業經紀人”變成“包買主”以後，從十六世紀起有了變化，他們也希望取得更大的自由。

(二)工人在舊制度的社會中是沒有什麼地位的。他們的人數不多。他們在政治上不起任何作用，而且通常都是不被人重視的。服爾泰也看不起他們，認為沒有財產的人是沒有權利過問國政的。盧梭和許多其他空想主義者一樣，夢想着一個獨立小生產者的社會。只有百科全書派和狄德羅認識到體力勞動的重要性。百科全書的序言使人聽到了前所未聞的論調。這篇序言中寫道：

“社會固然應該尊重開導它的那些偉大天才，但也不應當看輕為他們效勞的雙手……也許只有從手工業者身上人們才能找到最令人景仰的才華、耐心和技巧。發明鐘表的彈簧、擺輪和打簧的人，為什麼不可以和改進代數學的人受到同樣的尊敬呢？”^①

^① 參考“百科全書文選”阿爾伯·索波爾的序言和註解“人民古典文選”。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工艺”篇中亲自执笔写道：

“我们对有艺技的人应该主持公道。自由工艺从来没有替自己很好地鼓吹，现在却尽可以大声庆贺机械的艺技了。手工業者所以自認微不足道，是他們向被人輕視的緣故。我們現在應該教導他們起来尊重自己。”

这部百科全书被認為是“理性的科学、艺术和工艺辞典”。它的工艺部分是在狄德罗亲自指导之下編成的。在今天說来仍然是关于那时生产力情况最有价值的文献。狄德罗为了叙述当时的情景，曾特地到工人那里採訪材料。

“我曾詢問过巴黎和全国中最熟練的工人，我亲自到他們的作坊去訪問他們，把他們的話記錄下来，啓發他們的思想，收集他們行業特有的行語。但是有些手艺是那样不平凡，有些操作是那样精細，要不是亲自动手幹过，用自己的手轉动过机器，亲眼看到产品的完成，是很难說得精确的。因此，我們有好几次不得不自己置备机器，制造机器，並亲自动手操作，把自己变成学徒一样地从自己的手里做出不高明的活来。只有这样才能向別人講得清楚工人們高明的活是怎么做出来的。”

靠了狄德罗和百科全书的記載，有些最优秀的工人的名字得以留傳於后世。

“巴拉特先生是一位卓越的工人，他好几次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裝置非常精巧的織袜机。絲織工人彭奈先生和劳倫先生曾当着狄德罗先生的面表演裝置和运轉一架織絲絨的机器。”

(三)工人还没有明确地意識到他們作为工人有什么特殊利益，这是因为他們还没有形成一个單一的階級。工業还不十分發达，以致工人还意識不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須先消灭封建制度，然后使資產階級帶來為他們掘墳墓的無產階級。因此，那时更談

不到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往往很难把工人和整个人民群众区别开来；因为彼此混在一起了。只有等到很久以后，即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后，这个问题才被提出来。

(四)工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生活问题。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起义为的正是生活问题。当时一些由讨论生活问题而出現的理論被人叫做社会主义理論，实际上是錯誤的。因为这些理論很少提到新的生产組織問題，因为在那时候，归根到底生产刚开始具有社会性。这些理論所討論的問題是生产品如何在消費者之間得到更好的分配而已。人民群众所見到的，不是雇主和工人之間的區別，而是富人和穷人的區別。这就是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長褲汉^①的基本思想。

(五)因此，这时期的基本斗争，不是资产阶级和無产阶级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对立。

十八世紀时，资产阶级有了很大的發展。他們掌握着商業、工業和金融。王朝政府的官僚大部分出身於资产阶级，而自由职业者也是从资产阶级中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特别是百科全书派創立了一套維護资产阶级社会和政治利益的学說。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已經不能滿足於支持国王来反对其他封建头子。从今以后，現代的經濟將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基础，而当时的社会却还建筑在土地私有的封建制度上。一切都阻碍着生产力的發展，即资产阶级的發展，例如：行会制度，妨碍發明的条例，妨碍商業的內地关税，度量衡制度的分歧，豁免寄生阶级負擔的稅收制度，以及代表封建統治的国家权力。

当然，許多资产阶级分子只希望进行一些“改良”，以为这样就

^① 長褲汉或長褲党：一七九二年之間贵族給革命者所起的名称，因为他們脫去短褲換穿長褲。亦有人譯作無短褲党。——譯者

足够解决问题。所以当杜尔果大臣决定实施谷物自由流通(一七七四年)和废除行会(一七七六年)时,他得到资产阶级很大的拥护。

哲学家们曾热情地欢迎过这位新大臣。服尔泰喝采道:“德性和理性佔到了上风”。但是结果杜尔果是失败了,他遇到特权阶级的反抗,特权阶级不打算轻易就把他们的位置让出来。达兰贝尔评论杜尔果说:“如果说好事没有做成,那是因为好事根本没法做”。所谓好事就是指资产阶级的纲领,这个纲领在杜尔果的领导下没能实现,因为要完成这件好事,必须通过革命。

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上还可以找到很深刻的分析:

“当这种生产和交换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封建社会底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那种关系,封建制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合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①

所以当时已露迹象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摧毁封建制度的还是人民群众所发动的进攻。诚如让·若列斯所说:

“普天之下任何东西,连资产阶级革命在内,都不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

^① “共产党宣言”,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同前版,第一三页。

第三章

人民羣众对封建制度的进攻

(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哲学准备好了,开始了,推动了这一次革命,这是無可爭辯的。但仅憑文章是不够的,現在需要的是行动。

——馬拉

一七八九年的意义。——人民大众的作用。——第一次群众行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和一七八九年夏季的农民大暴动。——大资产阶级的憂慮。——八月四日之夜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工人的骚动。——一七九一年六月列·霞白立条例和禁止工人組織的措施。——工人被拒絕选举权。——一七九一年七月十七日馬尔斯广场的屠杀。——宣战。——第二次群众行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王权的廢除。——第三次群众行动:清除大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吉倫特派。——山嶽派的胜利,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尝试。——热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对法国工人运动的贡献。——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偉大性和局限性。——雅各宾派的傳統。

我們对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必須明确地指出其意义来,因为它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烙上了如此深刻的痕迹^①。

^① 我們在这里只想提一提直接有关法国工人运动起源的事件,讀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閱亞尔倍·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一九五一年社会出版社出版)以及一九三九年七月号“共产主义手册”專号(内有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加勃里·伯里等人文章)。讀者亦可参考一九三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份“思想”杂志所载讓·蒙特罗在“法国大革命和馬克思思想”一文中举出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当考茨基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七八九年法国的阶级斗争”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書於一八八九年以德文出版,一九〇一年譯成法文。

为什么？因为工人运动的敌人正是用尽一切办法来歪曲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及其意义。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要篡改昨天革命的面貌，而且更是为了要从头来降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威信。

他们首先就硬说法国大革命完全是靠了思想运动而起的。不错，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但是把一七八九年革命的起源完全归功于他们，却是要人忘记：哲学家的思想仅仅在表达资产阶级愿望的范围内才发生了作用。这是要人忘记：当时的“自由”只有一种意义，它是用来对抗“特权”，它意味着权利平等和封建地主贵族特权的摧毁。这是要人忘记：资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之后已经为一个新的革命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是的，思想在历史演进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但是，归根到底思想是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中产生的。“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

也有人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一小撮阴谋家的功绩，说是共济会当了奥尔良公爵的门客，想把奥尔良公爵捧上他的堂兄弟路易十六的王位。不管他们怎么说吧，反正他们所竭力想说明的，无非是有了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加上政治腐败，才把人民大众推动起来的。这样的解释是歪曲事实，因为人民大众并不需要外来因素来推动了他们之后才采取行动的。他们在自己本身，在旧制度所给他们造成的生活条件中就已找到了采取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人对工人运动，非从头起就给予一个直接的打击不可。因为既然法国大革命只是由少数心怀怨愤、唯利是图的阴谋家所搞起来的，那末也就可以贬低一切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现今的一切活动，而把今天的鼓动分子说成与昨天的阴谋家一模一样了。

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先提一提一七八九年革命的深刻的

原因及其意义。

第一，革命产生於生产力發展和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我們已經看到，生产力在封建制度內部已經發展了起来。但是由地主貴族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却停留在封建制度上面，因此就阻碍了生产力的發展。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就使人类前进了一步，結束了历时千年的封建統治。有些对准备革命出过力並在革命初期起过積極作用的大資產階級分子，充分地透露了事件本身的深刻意义。巴尔那夫即是一个明証。他和克劳德·彼利厄(我們在后面还要談到这一大家屬)都是格勒諾布尔城資產階級的優秀分子。他那时已經有了十分明确的階級意識。他和当时的全体資產階級青年一样，痛感自尊心受到損害。从他的母亲被一个貴族从格勒諾布尔戏院包厢中驅逐出去的那一天起，他已覺得貴族的可惡可恨。但是巴尔那夫知道革命是不能用自尊心的創伤来解釋的，他不怕把事情追根到底。

他在“法国大革命概論”中写道：

“一旦工艺和商業深入民間，並創造出有利於劳动階級的新的致富手段，在政治法規中就会孕育出一个革命运动。財富的新的分配会产生出政权的新的分配。一如土地的占有曾經养育了貴族，工業財產正在养育出一个人民的政权，而人民現在正在取得自由，日益扩展，並开始影响着一切事务。”

他所用的个别的詞虽然不甚貼切，甚至是錯誤的，因为巴尔那夫所說的“人民”和“劳动階級”，实际上指的是大資產階級，但是他的整个意思却非常明确，毫無含糊之处。就是說，只有生产力的發展——巴尔那夫把它叫做“工艺和商業”的进步——才能解釋革命的起因。以前靠占有土地而得勢的貴族階級，現在將由另一个貴族階級来代替，这个貴族階級將用工業財產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

化。

第二，这一次革命既然只能由资产阶级来进行，也就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无法取得胜利的。马克思论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六四八年的英国革命时说：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个实际领导了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屬於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若不是还没有任何脱离资产阶级独立的利益，便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组成为一个阶级中的几个部分。因此，在他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国那里，他们只是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斗争，虽则他们采用的是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手段。全部法国的恐怖主义無非是用来打破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僧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①这也是列宁和斯大林一再發揮的意見。列宁曾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是这样的一个革命：

“人民群众的絕大部份，它的最低下的阶层，深受压迫和剝削，自发地暴动起来，使他們的要求以及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代替他們所摧毁了的旧社会的意图，深深影响了整个革命的过程。”

斯大林於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同英国作家威尔斯談話時曾發問道：

“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那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保衛第三等级的利益而胜利的人民革命嗎？”^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三—四四頁。

② 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八頁。

所以，推进法国革命的正是人民群众，拯救法国免受外国的侵略，坚决要求惩罚卖国贼，並努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也就是人民群众。

第三，人民群众由於几年来的境况大大恶化而越益表示不满。在封建制度下，生产無法發展，而人口却在增加。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八七年，領主的权利和貢賦原封未动，而从事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則在迅速下降。甚至於在小麦漲价时，小农也很难得到好处，因为他們必須把很大一部分收成繳納給地主、貴族、什一稅的征收者——僧侶等等。再加一七八八年和一七八九年連續兩度歉收，面包的价格上漲，超过了被認為最高峰的一七七〇年的价格。城市居民的困苦由於失業增加而日益严重。其所以如此，有一部分是一七八六年法国和英国簽訂商約的后果。商約減低双方的关税，这只对英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工業比法国先进得多。新聞記者潘雪於一七八九年报导說：

“我們与英国簽訂的商約会使我們的子孙輩發大財，可是現在却使王国的五十万工人失去面包，並使一万个商行破产。”

的确，一七八九年阿貝維勒地区失業者就达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之多，特洛瓦、色当等城也是如此。里昂有一半工人失業。这一經濟危机虽然不是革命的起因，可是它可以解釋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緒的原因，而人民已經很早就开始採取了行动。早在一七八九年四月，巴黎郊区聖安东尼發生了激烈的騷动，雷万宏花紙舖被人放火燒了^①。

^① 關於这点請參閱：保尔·肃偉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一九四六年版，第五九——七六頁。当时三級會議虽然正在凡尔賽宮开会，牽涉在雷万宏案件中的工人却依然判了罪。街头代笔者皮埃尔·讓·巴底士达·馬利於五月二十二日被处絞刑；漆匠拉馬歇、煤气工人佛塞尔、雕刻匠肯亭、馬鞍匠勒勃郎、印刷工人托宾等於聖安东尼城門前枷鎖示众然后發往远地罰充苦役。

第四，这些群众却並不形成一个單一的階級。他們虽然抱有共同願望，但是他們彼此的利益往往是有矛盾的。農業短工、小农、工場工人、在家操作的手工業者、参加行会的帮工、小販、小商店掌櫃、找地种或找工作做的流浪劳动者；这些才是真正應該叫做人民大众（沒有別的相当的称呼了）的成員。他們之中有的只希望能有一小塊土地就心滿意足了。有的覺得有了行会保护就成了。有的同情資產階級，主張取消行会制度，但是他們却害怕机器，因此一接触到工作条件和工資問題却又反对这个資產階級。正因为他們利益的复杂性，人民群众的反应是混乱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总之，如果不提一提这些人民群众的行动，那末就無法了解法国工人在大革命时期的作用，因为工人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他們已成为城市里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 * *

三級會議就是这样在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在凡尔賽宮举行了。第三等級选出来的代表是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如法律家、作家、經濟学家、科学家以及經紀人、商人、工業家、銀行家、富农等等。他們所要求的是以資產階級君主立宪来代替以封建階級为基础的專制制度。除了少数代表外，他們並沒有有意識地追求階級目标，因为那时候民族的命运和資產階級的利益还混淆不清。他們滿怀幻想，根本沒有想到貴族階級会起来反抗。他們以为，只要一七八九年七月九日三級會議变成了制宪會議，革命就算完成了。国王似乎可以与貴族一起承認既成事实。他們認為进行一系列謹慎的逐步的改革就可以把封建制度剷除。

事实上，一切問題都要从头討論起，因为貴族不甘心解除自己的武裝，他們毫不想放棄他們的特权。国王則召集了他認為忠实於他的軍隊，包圍了巴黎和凡尔賽，这些軍隊大部分是由外籍兵团

所組成的。他以为只需来个軍事行动，會議就会解散，就可以把議員們送回本乡去，然后再廢止一些最乖戾的虐政就可以使大家滿意。对这种威胁行动，議員們自然是不会不懂得，因此米拉波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对召集軍隊一事提出了抗議。他大胆地号召軍隊里的法国士兵們發揮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大声疾呼地說：

“不，尽管他們盲目地服从軍令，但是他們决不会忘記我們是些什么人，他們会懂得我們是关怀他們最寶貴的利益的父老、朋友和家人，因為他們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而民族把它的自由、财产和榮譽託付了我們。不，这样的人，这样的法蘭西人决不会拋棄他們的理智的。他們决不相信他們的义务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乱打人的。”

喚起士兵們的同胞感，这是在这个工人运动的历史中时常听到的呼声！等到資產階級派軍隊来对付工人时，工人也是号召士兵們不要忘記他們“是民族的一分子”。但是米拉波的話是空的，因為議員們手無寸鐵，無法反抗已進駐到聖德尼、聖克羅、塞佛尔，甚至一直進駐到馬尔斯廣場上的軍隊。

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干預，才起了决定性作用。巴黎的資產階級惴惴不安起来，他們深怕反革命势力訴諸武力，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旧制度又将巩固起来。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害怕老百姓，因此他們企圖創辦只准資產階級分子参加的民团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样一帖藥也治不了那么沉重的病的。結果只有等人民来决定革命的命运。巴士提大獄於七月十四日攻破^①了。胜利者是些什么人物呢？主要是老百姓。事实确是这样，据历史記載，这些人中間有五十一个木匠、四十五个紅木家具木匠、二十八个鞋匠、二十八个零

^① 保尔·肃偉著：“巴黎起义和攻占巴士提”，巴黎一九四六年版。

工^①、二十七個雕刻匠、二十三個煤氣工人、十四個酒販子、十一個鑲金匠、九個手飾匠、九個帽匠、九個鐵釘匠、九個大理石匠、九個棋匠、九個成衣匠、九個染工、一個木柴販子、四五十個木場小工、兩個工程師、幾個商人。

馬拉曾寫道：“攻占巴士提主要是靠了聖安東尼鎮一萬個貧窮的工人。”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路易十六在制憲會議上宣佈撤退軍隊。巴黎人民進行了幾個小時的戰鬥較諸在凡爾賽演說幾個星期更能把革命向前推進。三個月之後，即是十月事件之後，巴黎的婦女把國王帶回了首都。外省大部分城市，如里昂、盧昂、馬賽等地的人民也採取了行動。

在鄉村中，農民也起義了。新的農民起義運動被稱為大恐怖時期！但是這次起義却與中古時代的農民起義有著顯著的區別。首先是範圍大小不同，這一次起義幾乎波及全國。其次是目標不同，現在再不是無指望的暴動，而是農民們起來拒絕繳納封建貢賦。他們不大了解凡爾賽究竟在幹些什麼，他們所選出的議員那種猶疑不決的態度使他們感到惶惑。按等級投票，按議席投票，審查資格等等，這一切在他們看來都是毫無意義和煩瑣的法律手續。這些複雜的程序對他們說來較諸規定封建特權的舊文書更不熟悉。有人告訴他們城里起了騷動，並且恐嚇他們說，從城市里攆出來的窮人已經變成盜匪向鄉村挺進，一路放火燒村子。可是城里又有人造謠說從農村來了大幫盜匪搶劫有錢人家的住宅。當然，當時法國確有不少窮人在全國大路上流蕩，黑夜出來白天躲着，靠行竊搶劫為生。但是這點遠不夠說明一七八九年夏季農民起義運

^① 指無固定職業，做一天工生活一天的工人。

动的原因。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反对封建制度。在一度混乱后，农民们就冲向贵族的城堡，打开了文契收藏室，一把火烧掉了规定封建贡赋的文書契約。

亞尔倍·馬基埃斯說得很对：“富裕的资产阶级一下子看到了第四等级勇猛的形象。”

这个形像出现在巴士提大狱的了望塔上，波尔多的脱龙貝特城堡上，加恩的勒維塔——即鹽梟^①的牢獄里。它出现在城堡的火焰中。在巴黎，負責巴黎防軍給养的財政总监富龙和他的女婿，倍基埃軍需官，被人吊死在巴黎市政厅的灯桿上。外省也有許多贵族被杀死。

贵族们奸猾地派遣一些奸細到工人们中間去宣傳，說工人的敌人並不是国王而是资产阶级。当时工人确是深受經濟恐慌的痛苦。面包价格昂貴，失業情况自一七八八年發生經濟恐慌以来日見严重，工資菲薄。一个巴黎工人每天只賺三四十个苏。当一斤面包只卖两个苏的时候，他們还可以生活，可是到了七月上半月，面包漲价兩倍。贵族們用尽心机把經濟恐慌誘过於革命。他們散發挑撥性的傳單，說革命是無聊的历史事件，說革命只有增加我們的困苦，不用管它等等。君主立宪俱乐部佈施面包給貧民。有一个修道院主持叫做沙撒尔，他足迹走遍聖安东尼鎮的作坊，劝小作坊老板停止开工，說：“你叫他們做工幹什么呀？你想賠錢嗎，快把你們的工人打發走吧。”^②

可是，巴黎的工人此时已經有了判断能力，这也是他們力量之一。一七八九年年底流行的这本小冊子：“聖安东尼鎮一个工人告

① 所謂“鹽梟”是指在抽鹽稅时期偷运私鹽的人。

② 引自欧仁納·泰尔萊：“工人阶级和制宪會議中的反革命党”，“法国革命”，一九〇九年版，第二卷，第三二三——三二六頁。

同伴書”即是一个証明，这本小冊子写着：

“那些想損害我們的坏蛋，他們不敢拿起槍砲来当面打我們，因為他們很懂得我們有胆量来回打他們，他們是不会傻到拿性命来跟我們拚。但是看看他們的花招吧。他們彼此劝說：‘这些第三等級的下流胚，必須分化他們，必須叫他們彼此不和，必須叫他們吵架，必須叫他們自打自起来。’”

* * *

大資產階級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人民群众的这一切举动都叫他們不高兴，因為他們开始為他們的財產害怕起来了。因此他們第一个反应是鎮压。城市里建立了民团，老百姓都被排除出去。大資產階級与起义的农民直接發生了冲突。双方摆开陣势真的开起仗来，彼此都有不少死伤。第戎城的資產階級說：“我們害怕自己做出犯上作乱的榜样来，將來輪到我們吃苦。”在道費奈省，尽管第三等級曾从維齐尔城堡号召大家摧毀旧制度，但第三等級的團結却自行瓦解了。为了反对农民和工人，資產階級却宁願同貴族結成联盟。里昂的工人虽然同情起义群众，可是里昂的国民軍却大力帮助了道費奈省的国民軍。

* * *

說实在，这对大資產階級說来已是个难於应付的局面。如果它走上鎮压的道路，那就得幹到底。脫离了人民的国民軍不久就显得無能为力，所以只有去借重国王的軍隊。但是这样一来，在資產階級說来就是放棄他們自己的革命，向封建貴族讓步。而若要使貴族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的妥協成为可能，又非摧毀封建社会不可，而这点却还没有做到。一七八九年的資產階級犹疑不决，矛盾百出，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的階級利益。但是破釜沉舟的决心是已到非下不可的地步了，於是在八月四日夜里，对封建制度發

动了第一次打击，但是这一击如果没有农民的参与，那就永远成功不了。这也就说明一个阶级从来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特权的。可是封建权利依然没有全部取消。只是把压在人身上的权利（例如：徭役）和压在土地上的权利区别开来罢了。前者是取消了而后者仅仅规定可以依照某些条件来贖买。这些条件不但对农民是侮辱，而且是十分昂贵。於是农民深表不满，斗争还是继续下去。

* * *

几天之后，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这个宣言是在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影响下写成的，并且标志着这些观点。自由问题的确是提到了，但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并没有提到每个人如何才能有效地运用自由。平等也已经宣布了，但只是纯法理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而且它还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财产权却变成永远不失时效的权利。如果说贵族领主的贡赋收入受到了威胁或部分地消失，那末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却更加巩固了。

“不同於 *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所謂人权（*droits de l'homme*）無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員的权利，即脫離了人的本質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沒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一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沒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規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私有财产……就是任意地（*à son gré*）、和别人無关地、不受社会束縛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他並沒有从财产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财产自由。他並沒有从行业的利己主义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行业自由。”①

但是对依然处於封建制度下的国家来说，“人权和公民权宣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三七—四四二頁。

言”却引起了很大的响应。它不仅对法国發生了作用，而且具有了世界性意义。它是一篇真正的檄文，号召一切身受封建制度痛苦的人起来斗争。

今天，只有工人阶级才能給“人权宣言”以真实的内容，实现馬克思所說的“人类解放”。

“只有当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的力量’並把这种力量組織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解放才能完成。”^①

只有工人运动达到了它的目标，生产資料成为人民所有之后，人民才能有效地运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在理論上所承認他們应享受的权利。

“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層生長出来，由中世紀的‘等級’轉变为近代的阶级之时起，無产阶级总是經常地、不可避免地跟着它，如影随人身似的。同样地，無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总是伴从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自从资产阶级的廢除阶级特权的要求被提出之时起，与之相並地出現了無产阶级的廢除阶级本身的要求——开始这要求採取宗教的形式，归依於原始的基督教，以后，就依据於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論本身之上。無产阶级在語言上抓住了资产阶级：平等應該不仅是表面的，它應該不仅实现於国家的領域中，它应当是现实的，它应当实现於社会和經濟的領域中。尤其是自法国大革命开始，法国资产阶级把公民平等提到前面的时候，法国無产阶级立即針鋒相对地回答以社会的、經濟的平等之要求，这一要求立即成为战斗口号，特别是对於法国無产阶级。”^②

* * *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四三頁。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〇九頁。

的确，自一七九〇年起，大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然不安得很。因为人民群众继续骚动不已，尤其是在城市中，生活不断恶化，失业日益严重。为了买一点价钱很贵的面包就得在面包店前排成长列。工人们起来举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人民的报纸如马拉的“人民之友”报受到巴黎郊区很大的欢迎，并且加以讨论，因为马拉时常在报上发表工人们的来信。这是第一张设有工人通讯栏的报纸。雅各宾俱乐部那时还不是公诸大众的俱乐部，只有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分子才去走动。可是到一七九〇年却出现了科尔德利俱乐部或称“人权之友社”，特别是在巴黎市内各区以及外省许多城市都建立了许多兄弟社。这些俱乐部成为许多工人实习政治的场所。工人们从实践中懂得了什么是开会，什么是议程，什么是大会，什么是秘书处，什么是决议案，什么是请愿书。这些知识，日后工人运动都拿来用在自己的斗争上。但是那时的工人还不可能有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纲领。因此他们跟随着资产阶级中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主张团结全体人民的力量和要求普遍选举的人走了。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控制了制宪会议。他们的政治思想逐渐明确起来，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君主立宪政体，和只有有产者才能享受权利的选举制度。

下面三项措施就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思想：禁止工人组织，排斥工人参加政治生活，反对共和派。

* * *

资产阶级是不能容忍行会组织的。制宪会议在一七九一年三月并没有经过多大讨论就取消了行会组织。“任何人有自由从事其认为合适的商业、职业、工艺或手工艺的权利。”^①只有马拉一人

^① “马拉文选”。克劳德·摩塞的序言和评注。“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

对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担心由此会引起自由竞争。

至於工人，制宪會議並沒有把他們放在眼里。工人穷苦得实在太厉害的时候，制宪會議就採取了与君主專制政体同样的政策，即建立些慈善作坊。

这样的情况工人们是不能忍受下去的。因此騷动日益扩大了。一七九〇年在聖亞田和里昂爆發了工人暴动。这就解釋了为什么恰恰在一七九〇年，里昂出版了一本工人郎琪所写的小册子：“一个法定的消極公民向法定的積極公民提出申訴和要求”。

他斥責富人的自私自利並指出商品是通过工人的手才有“价值”的。他說：

“我們是做工的人，我們才是第一个所有者，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真正的占有者。那些自称为業主的懶汉只應該得到我們生活所余剩的东西。”

这是資本主义萌芽时期關於階級关系的第一个分析。但是他所提出的藥石則並不高明，超过傳統的烏托邦想法，即希望国王摆脱小人佞臣的影响，变成工人的保护人！虽然如此，但於此仍可証明里昂工人們的憤懣情緒是在增漲着。

特別在巴黎，騷动日益扩大。

当时巴黎的工人階級是怎样分佈的呢^①？最显著的是，企業的多样性和小企業所占的重大优势。大企業占优势的地方是聖德尼鎮、植物园、和格勒納泉。聖德尼是以棉紡及建築業为主，往北則为玻璃、水晶、瓷器等企業。在阿尔区、唐布尔区、馬蘭区之間則都是漆匠、棋匠、乐器匠、帽匠、鑲金匠、鉄匠、鍍金匠、雕刻匠、制造玩

^① 下述的材料基本上借自艾德蒙·索樓的“一七八九——一七九二年的工人与农民”，第一四四——一四七頁。

具、紙花、手飾等工匠。在同一区里，还有些內衣店和雜貨鋪。由巴士提到宝座廣場一段，在聖安东尼鎮，家具業占着优势，木匠、紅木匠、雕花匠、車工为数最多。在那里，商人也是多於制造商。早在一七七二年，有一个名叫魯波的紅木匠就著了一本書叫做“木匠業”，他在書上埋怨商人們的專橫說：

“这些商人插进手来把制成的家具卖给私人，並欺騙买主，把劣貨卖給他們。这些劣貨的价錢虽然看来便宜，其实还是貴的。另一方面，他們搶走了工人的顧客，强迫工人照他們規定的价格制造木器，迫使工人破产。”

在这个市区里也有些花紙、玻璃和啤酒工場。在聖馬塞尔鎮出現了染坊、內衣工場，还有哥柏林織氈工場。許多住在这一区的工人，有的来自弗蘭德、亞尔多亞、比卡第，甚至来自荷蘭。在現在的奧迪翁区——当时的法蘭西剧院——則住着印刷工人、排字工人以及泥水匠，这些人都寄居在客店里。往天文台那边則有造紙工場，克洛瓦·魯日有一家地毯工場。植物园和聖日內維佛这两区有一家瓷器工場和若干內衣作坊。

“聖日內維佛山北坡和东北坡，陽溝水順着山坡往下流，髒水曲曲折折流过一堆堆垃圾，宛如一个又髒又臭的小村落。”

从洛歇街到貝比尼埃街之間的許多街道叫做“小波蘭”区。那里面有洗衣工人、拾破爛的、洋釘工人和銅匠鋪等。碼頭工人、搬运工人、木排運輸工人都住在小島上或河灘上。提起革命时期巴黎这些平民区，最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和小手工業者差不多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們生活都同样困难，抱的是同样的希望。

自一七八九年起，純然的工人示威运动增多了。一七八九年八月十八日，三百个成衣工人在盧佛宮草地上集会，要求提高工資到四十个苏一天。裝假髮的工人集合在香榭丽舍抗議劳动就業局

的措施。有一名国民軍軍官要驅散这些工人，反而被他的士兵解除了武裝。制鞋工人組織成一个真正的工会並建立了一种保障失業的互助制度。一七九一年，騷扰扩大。受雇修造路易十六大桥的工人要求工資由三十苏提高到三十六苏一天。

在国营工場里也發生了工人示威。一七九一年一月三日，哥伯林工場的工人向經理提出一个新規章。这个經理承認“迫於环境”不得不讓步。蒙馬尔特慈善工場的一万七千个工人也大起騷动。国民軍出面干涉，市政府把数千名工人遣回本乡。工人集会到处被武裝力量驅散，因为早在一七八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制宪會議就已通过戒严法，禁止这类集会。

从这以后，根据戒严法，市政府官員可以調遣国民軍、宪兵和正規軍。武裝力量發出警告后就可以进入行动。凡是不服从警告解散的人可以处罰三年徒刑，如果証明帶有武器則可处以死刑。資产階級經常运用鎮压法令(階級法律)来对付进行斗争的工人階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例在大革命初期就制定了，差不多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个人反对。当然，要实施这条例是要看军队的思想情况而定的，国民軍(后来是正規軍)往往是拒絕服从調遣的。

巴黎市政府是由仇視工人要求的資产階級分子組成的，它頒佈了一項決定說：

“各業工人自行規定工价，並用此彼此限制或限制別人按照別的工价接受工作者，应一律視為無效，不具任何約束力，並应視為違宪行为。”

但是市政府的禁令並沒有能够阻止工人的騷动繼續扩大。騷动並且波及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建立了木工業兄弟会。

於是制宪會議出面干涉了。真实地說来，这是一件典型的事件：制宪會議沒有进行任何討論就全体一致同意，决不能容忍工人

組織起来。以提案人的名字命名的所謂列·霞白立条例於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不經過辯論就通过了。

該条例第二条規定：同一等級和同一行業的公民：包买商、開設店舖者、任何有手藝的工人，在集会时不得推选主席、書記、代理人，並不得借口共同利益，自立冊籍、通过决定、进行討論、起草規章。

第八条規定：凡手工業工人、工人、帮工及零工，倘自行聚众，或惑众嘯聚，破坏各色人等在彼此自願的一切条件下执業和劳作的自由，或对抗警察执行任务，或阻撓有关判决的执行，或反对各种企業的拍卖或公卖，則一律作聚众作乱論。国家的武裝力量应接到合法的調遣令后加以解散。为首鼓动聚众者按照条例严惩。其使用暴力进行格斗者亦一律依法严处。

这就是說，資方或劳方的任何联盟都一律为法律所禁止，但事实上这条例只是对付工人。在此項条例頒佈前兩天，即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馬拉曾在他的報紙上發表修建聖日內維佛教堂的三百四十个工人的联名信如下^①：

“請允許我們工人向你揭露我們監工們舞弊徇私卑鄙惡劣的行為，他們把我們逼上了絕路，激起了我們的反抗。这些丑惡人物，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吞食着工人們血汗的果实，他們对国家沒有一絲一毫的供獻，七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几天中他們躲藏在地下室里。但是当他們看到貧困階級单独进行了革命，他們就从洞里鑽出来，把我們当盜匪看待。后来，看見危險过去了，他們就陰謀勾結，在地方上爭权夺利，竟然穿起了制服，戴起了肩章。今天他們自認為最有力量的人，一心一意要把我們压在最沉重的鎖枷

^① 一七九一年六月十二日第四百八十七期“人民之友”报。參閱“馬拉文选”，第一一九頁。

下，他們毫無憐恤心，毫不悔恨地壓迫我們……他們這些人已經腰纏萬貫，你真想不到他們依然是貪婪無厭，還想把公家所規定的每天四十個蘇的工資減低。他們毫不考慮到我們一年只有六個月工作^①。我們的工資實際上每天只能算二十四個蘇。這樣菲薄的工資，我們拿來要住、要吃、要穿，如果有家還得養活妻子兒女。因此我們替國家服務，使盡了我們的體力，受够了我們頭子的虐待，等到被飢餓和疲勞弄得力盡精衰時候，剩下唯一的道路只有到老人院去等死。至於我們的吸血鬼，住的是高樓大廈，喝的是最講究的美酒，睡的是毛絨被，乘的是軒車駟馬，他們享樂快活，把我們苦人兒忘得一乾二淨，他們對受了傷或死於非命的工人的家屬往往連當天的工資也拒不付給……”

有些歷史家否認這封信的真實性，說這是馬拉的手筆。但是，工人們既然經常閱讀馬拉的文章，他們模仿“人民之友”報的手筆寫這封信，也是極平常的事。總而言之，馬拉是反對列·霞白立條例的，他把這個條例的階級性揭露得非常透徹。他寫道：

“制憲會議代表們深怕人民集會太多，於是剝奪人數眾多的徒手勞動者和工人們集會合法地討論他們本身利益的權利，以資防范於未然。他們的藉口是這些集會會使已經取消的行會制度復活。他們一心只想把公民孤立起來，阻止他們共同過問公眾事務。因此這些無恥的人民代表就運用卑劣的詭辯和荒謬的言辭把人民的權利一筆勾銷了。”（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八日“人民之友”報）

這是值得讚揚的抗議，因為在當時這是稀有的事情。

列·霞白立條例是一件了解法國大革命的基本文件，也是研究法國工人運動史的基本材料。它肆無忌憚地暴露了一七八九年

^① 泥水匠遇風雨寒冬不能工作，即無工資，因此說一年只工作六個月。——譯者

各項原則的形式主义本質。泛泛的“自由”是宣布了，但是这个自由的主要表現方式之一，即結社自由，却馬上就被法律所禁止。報告員（即列·霞白立）肯定地說：

“現在只有每個人的個別利益和公共利益了。因此必須奉行以下的原則：即每個工人的工資應由個人與個人之間自由地來商定。”

在法理上，老板和工人的權利是平等的。但是事實上，工人依靠勞動為生。工人只有勞動力為唯一的資源，他不能不把勞動力出賣給占有生產資料的業主。如果工人是孤立的（這正是制憲會議所希望的），那末他就不得不接受僱主強訂的條件，否則就只好餓死。工人越是孤立，條件就越苛刻，因為這時候工人與工人之間將發生無限度的競爭。只有工人們協調一致，使僱主找不到必要的勞動力或是眼看就要找不到勞動力，這才能迫使僱主讓步。因此，制憲會議堅持只承認個別工人，以便听憑資產階級加劇對全體工人的剝削。所以馬克思在研究“資本的原始積累”時，特別提到列·霞白立條例並指出它的歷史意義說：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暴風雨初期，就敢把勞動者剛剛獲得的集會結社權取消。他們用一七九一年六月十四日的法律，宣布勞動者的一切集會，都是‘反抗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企圖’，除了剝奪公民權一年，還科以五百里華的罰金。這種法律，借國家刑法及警察權，把勞動與資本間的鬥爭，限制在有利於資本的範圍內，並且經過幾次革命，幾個朝代，照樣保存下去，甚至在恐怖政治時期^①，它也不會有所糾正。”^②

^① 列·霞白立在恐怖時期上了斷頭台，但這並不是由於他制定反工人法律而是由於政治嫌疑。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三七頁。

尽管这位报告員曾表示，希望：“一个劳动日的报酬应比現在略高一些”，尽管他提醒大家說：“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工資應該定得相当高，以便受工資的人不致因生活必需品的匱乏而陷於与奴隶相仿的絕对的附屬地位。”但是他这种說法是無补於事的。

我們不必斤斤於判別这种論調中那些是虛伪的，那些是空想。总之，列·霞白立条例剥夺了工人階級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改善生活的唯一办法：即組織起来进行斗争。

但是有組織的斗争也不是立即就能出現的，因为在一七九一年，現代工業剛在萌芽时期，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叶，它才在法国显露出来。一直到了一八六四年，罢工才不算犯罪，而到了一八八四年，組織工会才在理論上被承認。但是这並不是由於資本家的慷慨施舍，这是法国無产階級为了反对列·霞白立条例和反对資产階級国家进行斗争而获得的成果。

* * *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它的实施根本是兩回事，而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又重新証實了二者之間的矛盾。虽然說“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但是公民却被分为兩種，即所謂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要做一个積極公民，必須繳納相当於当地三天工資的直接稅。積極公民可以指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选議員、法官、各省行政人員。要做一个选举人，必須繳納相当於当地十天工資的直接稅。資产階級一上台就想以資产階級出身的金錢貴族来代替封建階級的世襲貴族。这硬是少数人的統治。但是这又是什么样的少数呢？这是有錢的人的少数。照西哀士的說法，積極公民是“巨大的社会企業的真正股东。”他在那时候就用上这样資产階級的詞彙，豈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積極公民一共只有四百万，而全国人口則为二千四百万。至於选举人則为数更少，約五万人。因此像上維也納

省一省只有三百八十二名选举人。議員和省級行政人員就是由这一小撮公民指定。这真正是一个階級政权。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認真看待的民主派人士如馬拉、罗伯斯庇尔和格萊古亞修士等都对此提出过抗議。貧穷的公民，連工人在內都被剝夺了政治权利，如同他們被剝夺結社权和罢工权一样。这确实是为了对付工人的，因为巴尔那夫公然說过：必須从政治生活中排除“那些由於一無财产而为了生存必須刻不容緩地和不断地劳动的人。”

* * *

一七九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国王潛逃。他企圖偷越国境逃到外国去利用外国軍隊来攻打法国。他在聖麦納黑被年青的德魯叶逮捕了，这个青年就是十年以后同巴貝夫一道斗争的人。国王的潛逃引起了巴黎人民群众的抗議。各兄弟会要求廢黜国王，宣佈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正是大資產階級所不願意要的，因為他們害怕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他們捏造一个法律性的遁辞，說国王並不是自己逃走的，而是被人劫走的，因此不应处罰。因为国王已变成了資產階級所有制的保證人。七月十五日又是那个巴尔那夫無耻地宣称：

“先生們(指議員們)請想一想罢，想一想今后可能發生的事罢。你們对自由，对平等已經出了力，你們已經使人人在公民法和政治法面前一律平等了。你們已經重新取得国家所失去的一切，並且已經还給了国家；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即是如果革命再前进一步就非遇到危險不可，因为在自由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繼續發生的事情就是王权的消灭，而在平等的道路上，第一件可能繼續發生的事情就是私有财产的消失。”

階級意識使大資產階級有了何等样的遠見！那时虽然还没有無产階級，但是大資產階級却已預感到工人运动的高漲，預見到

工人运动的目标了。

兩天以后，即七月十七日，巴黎的資產階級國民軍向集合在馬尔斯廣場舉行示威的共和主義者開槍射擊。五十個人當場被打死。民主主義者被迫藏匿起來，人民俱樂部都被封閉了。

馬拉抗議說：“公民有集會自由，只要他們遵照警察律，和平地不攜帶任何武器。如果說通過馬尔斯廣場的屠殺案，我們對這個自由權還不知該作何想法，那末只要想一想警察永遠可以借口聚眾作亂來禁止任何公民的集會，我們就可以知道這自由權是縮小到什麼程度了。”

戒嚴法，列·霞白立條例，剝奪大多數公民的政治權利，屠殺共和主義者，凡此種種都是一七九一年年終制憲會議解散，讓位於立法會議後，大資產階級實行階級政策的各種表現。

* * *

這只是一個休戰。人民群眾不久就要重新起來奮鬥的。另一方面許多資產階級分子也在惴惴不安，因為他們發覺貴族又在抬起頭來，知道國王和王后正在同外國談判。這時尚不能說封建制度已經完全摧毀，資產階級已經用不着人民大眾的幫助了。

全國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早在一七九一年秋天，騷動又重新開始。生活費用不斷高漲。制憲會議拒絕讓西印度群島的黑人獲得自由，從而發生了暴動。來自殖民地的食用品，如咖啡和糖越來越稀少，越來越貴。投機商人則囤積居奇，抬高物價。人民痛斥囤積居奇的商人。在农村里，農民不滿於封建制度的繼續存在，也發生了暴動。各市政府受到人民的壓力，不得不規定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混亂擴大了。厄當普的市長是一個富有的硝皮商，他拒絕限制麵包價格，激起了當地居民暴動，並在暴動中被人殺死。羅伯斯庇爾告訴我們說：這個人“當地人民普遍認為是個貪婪

無饜的投机商。”

可是大資產階級却把他認做是維護私有制的烈士。但是厄当普附近一个神甫，莫桑堂的主持皮埃尔·多利維却替暴动者出来辯护。当然我們絕不能要求他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口吻出來說話，但是他却攻击統治着肥沃的包斯平原的大塊土地封建所有制，他写道：“只有民族才是土地的真主人。”他引用盧梭的論点說：“吃不是自己賺来的面包就是偷窃。”

一七九二年春天，情况更为严重了。革命的法国和整个欧洲發生了战争，而战争一开始就对法国不利。士兵們被貴族軍官出卖，这些軍官紛紛溜到国外去了。士兵們担心后方正在醞釀着陰謀，於是边打边退。反革命分子在法国南部和西部發生扰动。国王拒絕署簽立法會議希望用来保衛祖国的法令。

一七九二年六月二十日發生了第一次群众大示威，但是失敗了。这以后，形势变得非常危急。外国軍隊帶領了亡命在普魯士科不林士的軍隊节节前进。反革命陰謀越益猖獗。拉法夷特扔下他的軍隊赶到巴黎来对付雅各宾分子。

立法會議还在犹疑不决。它虽然於一七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宣布祖国在危險中，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它好像一个巫师的学徒，既要召喚能战斗的力量，又害怕这种力量。立法會議是資產階級的議會，它害怕群众力量高漲。可是它也知道如果排斥这些力量，也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裝，它就会弄到一文不值，一事無成。它知道，沒有这些力量，它就不可能战胜那些为了保衛他們的特权和保證这些特权的政治制度而联合起来的国内外的封建力量。

* * *

人民於是又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人民群众把君主專制制度打倒了。这个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革命是

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列宁曾把这一次革命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的革命做了比較並指出其重要意义^①。七月十四日，工人會同資產階級一起反对封建階級。可是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大資產階級由於害怕人民——特别是工人——却靠攏了封建階級。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胜利是下述三种力量結合起来而得到的^②：

(一)首先是外省的义勇軍不顧国王的否决权，来到巴黎城下扎了营。他們来自华尔·爱洛、比利牛斯、吉倫特、谷特多、杜省、斐尼斯堆、下罗阿等等省份。其中最著名的是五百名馬賽义勇軍。他們唱着盧热·德·里列所作的歌曲开进巴黎，这就是后来的“馬賽进行曲”。这些义勇軍在巴黎集中后，同巴黎郊区热情奋發的人民取得了兄弟般的連系。他們在罗伯斯庇尔的鼓动和說服下，成立了一个秘密指揮部，他們不断地呈遞請願書，要求廢黜国王。就是由于他們的参加才使八月十日的革命运动具有了全国性。

(二)第二种力量是罗伯斯庇尔所領導的最先进的雅各宾分子。这些人都屬於小資產階級，他們表达了小資產階級的願望，他們反对卖国贼和外国人，主張实现全民大团結。罗伯斯庇尔善於提出正确的口号。他扼要地說：“廢除王权是好的。但是还不够。由限制性的选举所产生的立法會議是不能获得我們信任的。我們不能讓立法會議窃取人民的胜利。应该以一个由普选产生的新議會来代替立法會議，这个議會应该是国民公会。”

(三)第三个因素是巴黎的劳动人民。当时，巴黎已經划分了区。照制宪會議的想法，所划的只是选区。但是事实上，人民的主动性和巴黎市民的政治觉悟改变了原来分区的性質。許多分区不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 第九卷 第二三六頁。

^② 見阿尔倍·馬基埃斯：“八月十日”，巴黎一九三一年版。

顧法律的規定，自動讓消極公民參加，以致立法會議也不得不遷就事實，於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規定各區為常設機構。

在這些區里占統治地位的是“長褲漢”，即是工人、手工業者和小商店主人。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些自由職業者，如律師、新聞記者、藝術家等等……

“長褲漢”受了分區的組織編制，勇猛地反對背叛祖國的國王。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摩貢賽區就宣佈廢黜國王，並聲明該區不再承認路易十六為法國的國王。立法會議想推翻這個決定，但是沒有成功。摩貢賽區政治上的主動性變成了一個榜樣。一七九〇年大資產階級限制各區活動的辦法已經大大地被突破了。

這其間，普魯士、奧地利聯軍總司令不倫瑞克公爵發表了一篇檄文，威脅着要“以軍法處置巴黎並徹底地加以殲滅。”

於是巴黎市民着手組織起義。八月九日夜里，巴黎各區所選出的委員占據市政廳，成立了起義公社。民眾認為國民軍司令芒達有通敵嫌疑，立即把他撤職並執行死刑，遺職由桑特爾接替。早晨七點鐘，各區人民和各省來的義勇軍開始包圍土伊勒里宮。他們進入迦魯索廣場，企圖同守衛王宮的瑞士衛兵進行友好談判，但瑞士衛兵突然開了火。馬賽義勇軍措手不及，紛紛後退，但是援兵一到又繼續前進，並且攻下土伊勒里宮。這時候，國王正躲在議會里靜候戰局勝負。

人民群众的行動又一次擊敗了革命的敵人。王權終於取消了。立法會議不得不決定召集由普選產生的議會。這是法國工人在歷史上第一次取得選舉權，而這個選舉權是八月十日的戰士們經過艱苦奮鬥所取得的。這對封建制度是一個新的打擊，因為封建貢賦被無償地取消，除非領主能出具文契，證明他確實有權征收貢賦。幾星期後，法國在瓦爾米戰役中打了一個勝仗。

* * *

一切危机並沒有完全消除。国民公会虽然是由普选产生的，但人民群众並沒有直接代表，而且其中許多代表还是原来的議員。因此在新議會里，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依然占着統治地位。工人議員只有兩個，一个是諾埃·普恩德，一个是讓-巴底斯特·亞尔蒙維勒。諾埃·普恩德是聖亞田城^①的兵器工匠；亞尔蒙維勒^②是馬恩省选出的一个織布工人。反动派对他不知造了多少謠言，进行了許多誹謗。拉馬丁在他的“吉倫特史”中居然还拾了反动派的牙慧。事实上，亞尔蒙維勒在冷斯城是很得人心的，到了巴黎就同馬拉过从甚密。馬拉死后，他曾一度彷徨無主，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有一个时期會同罗伯斯庇尔分手。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原来面貌同巴貝夫一起参加“平等派密謀活动”。普恩德和亞尔蒙維勒在国民公会是孤立的。他們和其他雅各宾分子一起当选，虽然不能算是工人階級的代表，但是他們却以他們的“等級”自豪，而且始終忠於选举他們的劳动人民。

大资产階級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吉倫特派作为新的党羽，發表保守的言論，也就是兩年前巴尔那夫的言論。其中有一个名叫佩基翁的在一七九三年四月号召所有主張維持秩序的人联合起来，他說：

“你們的財產受到了威胁，而你們对此危机却閉目不視。有人正在煽动有产者与無产者火并，而你們却漠不关心不加以防止。几个陰謀家，一小撮乱党制服了你們，拖着你們去搞些橫暴和荒唐的勾当，你們毫無勇气起来反抗。你們不敢深入各区去對他們斗争。你們眼看有錢的安份守己的人离开巴黎，你們眼睜睜看着巴

① 讓·若列斯：“法国革命社会主义史”，第四卷，第三〇二——三〇七頁。

② 古·勞倫：“一个工人議員：亞尔蒙維勒”，冷斯，一九二四年。

黎就要遭殃而無動於衷。巴黎人啊，從你們昏迷中醒過來吧，把這些毒蟲逐回他們的巢穴去吧！”

雅各賓分子中最激烈的變成了山嶽派。他們也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但是他們認為人民大眾的干預是不可缺少的。羅伯斯庇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國內危機來自資產階級，要戰勝資產階級必須聯合人民。”

山嶽派既然是人民大眾的先鋒，他們就與代表富有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起了衝突。於是吉倫特派轉而主張同反動派妥協，始則竭力阻撓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的起義，後來又用盡一切力量想保全路易十六的首領。在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二日的革命運動中吉倫特派遭到失敗。巴黎人民在這兩天內起了很大作用，特別是迫使議會通過了控訴吉倫特派領袖們的法令。

亞爾倍·馬基埃斯寫道：

“六月二日革命的意義遠超過一個政治變革。長褲派所否定的不僅是一個政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否定了一個社會階級。少數貴族與王權同時復滅後，接着就輪到了上層資產階級。”^①

國民公會逮捕吉倫特派後第一批採取的一些措施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國民公會規定亡命者的產業分成小塊出賣，以便貧苦農民能夠獲得土地。尤其是付款期限定為十年，對於他們更有莫大便利。一切封建性的貢賦都取消了，甚至連那些根據舊契約的一切封建權利也給取消了。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四日通過了新憲法。由於當時的環境，這個憲法自然未能立即付諸實施，但是它却

^① 亞爾倍·馬基埃斯幫助我們認識法國大革命的貢獻是無可爭辯的。但是我們還得用批判的眼光來了解他的著作。不錯，大資產階級在六月二日是被打敗了，但是長褲派並沒有形成一個社會階級。即使在國民公會時期，法國大革命依然只能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不如此的。但是，當時如果沒有長褲派的支持，那末封建制度就不可能被摧毀，而外國的勢力也不可能被擊退。

成为追求民主的象征。宪法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共同的幸福。”接着指出：

“社会对贫苦公民应给予工作以维持其生活，对不能工作者亦应保证其生活。”

新宪法又肯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是人人所需。社会应以全力发展公众理性，使全体公民受到教育。”

这以后，山嶽派成为胜利者。他们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建立了一个革命政府。这是一个城乡劳动人民都支持的人民政府。普列汉诺夫有一次曾声称：

“我是反对用阴谋家方式夺取政权的，但是我却完全赞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按照国民公会的方式夺取政权。”

他认为这种说法足以表现出他是列宁的反对派。可是列宁很高兴地反驳他说：

“普列汉诺夫同志，好极了……就把你所说的载入决议中吧！你愿意多严厉就多严厉地谴责阴谋吧，但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将全体一致通过一项完整的决议，不仅允许而且嘱咐无产阶级照国民公会的榜样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国民公会正是城乡贫民中下层阶层的专政。它是资产阶级革命中赋有无限权力的机构。它不是由大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控制而是由……我们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完全地和整个地控制着的机构。”^①

正就是这个国民公会的专政，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粉碎了内外敌人的联盟。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们为了武装革命军队所作的努力是惊人的。法国在那时候已经不能依靠外国而必须自己发展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十卷，第三三九页。

軍事工業，儘管有某些“國有化”了的工場的業主實行暗害和破壞。

有一個特派員從維愛松寄出一份報告寫道：

“我把煉鐵爐托付給別的工場。群眾的意見，這些工場是可靠的。我親到現場和鐵匠們談話，他們都高呼：共和國萬歲！山嶽派萬歲！”

格勒諾布尔城的雅各賓分子要求懲罰有罪的工場主，讓他同工人一起給國家勞動。巴黎變成了軍器製造業的重要中心。許多收歸國有的修道院變成槍械製造所。科學家和工人們密切合作改進生產率，提高生產。有賴於全體人民的努力，同時也有賴於鎮壓賣國賊的恐怖政策，敵人到處都失敗了。

新的階級關係出現了：一方面是工人、手工業者、小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工商業大資產階級。後者準備同舊日地主貴族的代表妥協，他們得到了在國有產業拍賣中發了財的富農們的支持。

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用局勢造成的一切困難，特別是經濟上的困難趁火打劫。困難中最嚴重的是食物缺乏和生活昂貴，這對城市里的老百姓影響最深。固然，食物和工資都實行了限價。實際是，工資限價雖然已經嚴格實施，但是食物限價卻未實行，因此物價繼續上漲。長褲漢中間產生了不滿和悲觀情緒，公安委員會的敵人對此馬上就加以利用。公安委員會也曾設法團結農村中的平民。風月法令（一七九四年二三月）的用意就在於此：沒收嫌疑分子的財產，分給愛國的貧民。聖茹斯特宣稱：“窮人是世界的力量，他們有權以主人翁姿態向忽視他們的政府說話。”

這是土地改革的前奏，可是這些法律並沒有付諸實施，事情一直停留在調查財產和調查愛國貧民的階段上。甄別嫌疑犯的人民委員會也已經建立起來。此舉雖然不能滿足長褲漢，但卻引起了大資產階級的不安，這些人包括大資產階級、瀆職的官員和為了個

人利益利用恐怖政策的恐怖分子。他們於一七九四年夏季結成聯盟並於熱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擊敗了羅伯斯庇爾。

* * *

大革命的高潮時期至此已告結束。現在我們就法國工人運動史方面來研究一下大革命的意義。

直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為止，現代史上沒有一件事可以和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相比擬。列寧寫道：

“法國革命所以叫做大革命，是因為它不像一八四八年的很多革命那樣優柔寡斷、半途而廢、流於空談，因為它是一個推翻和徹底鎮壓了君主派的實實在在的革命。”^①

因此這一首革命史詩在我國歷史上，特別在法國工人階級歷史上打上一個深刻的烙印是毫不足奇的。正如國際歌作者，詩人艾任·波狄埃所歌頌的“一七九三年的火山”，曾在一個很長時期照耀着我國歷史的道路。

因此弄清楚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是十分重要的。法國大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近代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列寧曾指出這一次革命的偉大性和局限性，他寫道：

“它(法國大革命)被稱為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個十九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標誌下度過的。十九世紀在世界各個角落里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實現了、分別地實現了、做到了偉大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們所創始的事情，這些革命家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①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一八頁。

他們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詞句蒙蔽了……他們(偉大的法国革命家)支持了兩年……任何一个自觉地对待历史的人都会說,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了,但它畢竟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無法消灭的資产階級民主,資产階級自由的基石。”①

(一)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偉大是因为它替法国人民剷除了国王和地主貴族的政权,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創造了条件(这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也就为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階級的壯大創造了条件。当时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即資产階級民主制度的誕生。比起封建制度来,資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进步,正如过去奴隶占有制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进了一步。

“在估計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恆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見出發,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並与其相联結的那些条件出發。”②

(二)在所有資产階級革命中,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最为徹底。它徹底摧毀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並促使一部分欧洲国家也摧毀了它們的封建政体。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採取了行动。我們可以看到这一段历史上每一个轉折点都有大批人民群众出現。他們制止了国王解散制宪會議。他們通过七月十四日的革命和农民起义第一次打击了封建权力。他們迫使立法會議宣佈廢除王权,並在肃清吉倫特派以后,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摧毀,粉碎了外国干涉軍的进攻。

(三)但是由於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革命依然只是一个資产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三三四—三三五頁。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六九五頁。

階級革命。封建体制虽已摧毀，但並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終止人对人的剝削，只是資產階級剝削代替了封建剝削。

（四）法国大革命給近代無产階級遺留下来的一些傳統頗不乏積極性的因素。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法国人民表现出政治上的積極性和成熟（我們在前面特別強調了这点）。長褲汉的明智和勇敢是極可欽佩的。他們知道如何挫敗敌人的計劃，如何英勇地作战。

“法国的雅各宾派是民主革命和抵抗反革命君主联盟的最好的榜样”（列宁語）

（五）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在革命階級面前提出同样的問題来要它解决。这是馬克思时常向法国無产階級提出来的一个警告。他在巴黎公社的前夕写道：

“法国工人……不應該讓人家用一七九二年的民族傳統来迷住他們。”^①

我們在馬克思所著：“路易·波拿巴政变記”一書中一开头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話：

“黑格尔在某一次說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以喜劇出現。科西捷尔代替丹敦，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庇尔，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一年的山嶽党代替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山嶽党，侄兒代替伯父。”^②

在大革命时期，法国資產階級（初期是全体，后来是一部分）所以能同人民大众結成联盟，因为那时候它还是一个革命的階級。

① 馬克思：“法蘭西內战”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版，第四七六頁。

②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譯文引自上書第一卷，第二二三頁。

但是等到解除了封建束縛，資產階級就日益發展，而在發展過程中同時加強了無產階級的力量。於是對它說來，危險已經不是已遭摧毀的封建力量，而是日益增長的無產階級力量。

今天是輪到法國工人階級來體現革命精神了，但是長褲漢的理想已經不能同現代工人運動的目標相提並論。長褲漢是工人，但也是手工業者。那時候工人的理想是取得獨立，就是說希望自己能占有一些簡陋的生產資料。手工業者最恐懼的，就是失去他自己的生產資料而成為工人。因此把長褲漢的要求說成是社會主義，那是很錯誤的。我們不能夠要求他們擁護以生產資料社會化為內容的那種民主制度，因為當時的生產方式還剛開始帶有社會性質。但是毫無疑問，私有制在長褲漢心目中已不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了。植物園區（已成為長褲漢區）的長褲漢對國民公會說：

“你們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不再容忍保王黨分子、野心家、自私自利的人、陰謀家、吝嗇鬼、患瘋狂病的人，把我國國境放棄給專制暴君，讓他們遍地帶來破壞和死亡呢？”

他們要求國民公會：

“規定堅定不移的基本食糧的價格、工資、工商業利潤……可是，貴族、保王黨、溫和派、陰謀家却一定會對你們說：怎麼！這不是破壞理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嗎？不錯，但是那些混蛋知不知道，私有財產是必須以物質需要為出發點的？”

他們又提出他們的要求說：

“必須規定財產的最高額，一個人只能有一個最高額；必須使私有財產不越出公平合理的比例。”

所以說，長褲漢的理想仍然不出乎我們在前面已加以敘述的大革命前夕的理想，只是方式有些不同罷了。這理想就是：小業主和獨立手工業者的民主主義。這樣既無富人也無窮人的平均主義

的共和国只能是个烏托邦。

“雅各宾分子所以沒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十八世紀的法国在大陆上被过分落后的国家所包圍着，而在法国本部，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还没有銀行、資本主义辛迪加、机器工業、鐵路等。”^①

長褲汉的这种理想是不能作为現代工人运动的理想的。在一七九三年，資本主义还只在萌芽时期。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已經社会化，而生产資料却依然是私有制，因此二者之間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只有由無产階級建立了生产資料的社会所有制才能加以解决（正如在苏联已实施的那樣）。長褲汉的理想只是代表着資本主义前期的思想。如果今天再来复活这种思想把它作为現代工人运动的理想，那就变成反动行为。所以，不顧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引用雅各宾的傳統，为什么曾經对法国工人运动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我們在下面各章研究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时，將对於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些。

比較晚近也曾發生过同样的問題。一九一四年，法国工人运动的領袖們为了替自己参加“神聖同盟”，就是說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作辯护，有时也援用了一七九三——九四年的先例。这些說法对某些人說来是無意識的，但对有些人說来則是蓄意欺騙。总而言之，这都是抹杀了历史条件的基本不同点。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反动势力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解放战争^②，至於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战争，則是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長褲汉在一七九三——九四年帮助法国資產階級战胜欧洲封建势力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九一四年，已經存在着工人階級，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〇二頁。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一卷，第二六七——三〇七頁。

它有着自己的目标，而历史的演变也已使工人阶级成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工人阶级的责任则已是“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危机来煽动最下层的人民阶层，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①

列宁於一九〇五年对俄国工人说的话，今天对法国工人运动还是适用的：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一七九三年的雅各宾派，借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以及行动方式。全然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工农革命民主专政。”②

(六)但是有人要说了，这些人民群众不是上了当么？他们奋斗了一场结果只换了个主人！事情却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人民群众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发动一个自己的革命的，第一，因为总的来说，他们不能有一个共同的有关前途的纲领，第二，因为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太薄弱，还不能把城市和乡村的“老百姓”团结在他们周围。人民群众在使资产阶级获得胜利时，已经准备了自己日后的解放。而且归根到底，当他们好像只是为资产阶级斗争时，他们也已经为了他们自己而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是十分有利的。从无产阶级底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完全、愈坚决、愈彻底，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争取社会主义的

① 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六〇六——六〇七页。列宁於一九一七年重新阐明这一思想说：“二十世纪欧洲或欧亚边境的‘雅各宾主义’将是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利用现有的物质条件向社会主义迈进，不但可以作出十八世纪雅各宾分子的一切伟大、不朽、不灭的事业，而且还可以给全世界带来劳动人民持久的胜利。”(“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一〇二页。)

斗争也愈有保证。”^①

当然，列宁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俄国无产阶级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工人阶级来更为发展，更为觉悟，更有组织到不知多少倍。但是他的结论对我国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依然是适用的，一七八九年革命“以最坚决的方式扫清了过去的残余。”“保证了资本主义更广泛、更自由、更迅速的发展。”

然而，资产阶级还得要把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起来。这却是在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经过许多波动，雅各宾分子最后几次暴动被镇压下去和巴贝夫被处决之后，轮到拿破仑来完成的事業了。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九八页。

第四章

資產階級國家的誕生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巨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過去時代殘渣都掃除淨盡，為建立現代國家的大廈廓清了社會基地。這座大廈是在第一帝國時代建立起來的^①。

——馬克思

一七九四——一八一五年這一時期的意義。——熱月反革命運動。——共和國三年芽月十二日（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和牧月一日（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最後群眾行動。——巴貝夫和巴貝夫思想在法國工人運動史上的地位。——督政府和資產階級。——霧月十八日（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政變。——資產階級國家的誕生。——農村中的階級關係。——法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反工人階級的措施：工人身份證和禁止工人組織。——一八一〇年到一八一一年經濟恐慌及其後果。——資產階級放棄拿破侖。——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人民保衛祖國。——百日帝制或對人民的恐懼。——大革命和帝國的總結。

山嶽派隨着羅伯斯庇爾一起失敗後，大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但是大資產階級的勝利還不夠穩固。長褲漢雖然一時失措，但是並沒有被打垮。他們力量的源泉，手工業者、小店主和工人的團結，仍繼續存在。雅各賓派思想並沒有隨着羅伯斯庇爾之死而被扼殺。反動的國民公會在熱月事變以後，依然面臨着人民大眾的

^①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九六頁。

起义，而繼承国民公会的督政府还得鎮压巴貝夫的密謀。資產階級現在需要的是国家政权。因此，“国家”在历史上作为階級斗争的产物而出現了，它是階級統治的机构。

“通例，它就是那最强大的在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底国家，这个階級依靠国家又成为政治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①

封建階級的国家已經被大革命摧毀了，而資產階級国家却还没有成立，虽然在恐怖时期，雅各宾分子对建立一个既能保衛祖国同时又能保証手工業者、工人、貧苦农民和整个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政府曾作过一番努力。

現在輪到拿破侖来創立資產階級国家的政权了。它將“日益完善”起来，它將在它整个存在时期不擇手段地保衛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而与工人階級不断地作对。由資產階級拥立的拿破侖，在資產階級的帮助下，同时也在購得国有产业的富农階級帮助下，把这样的国家建立了起来。这就是拿破侖政权的階級基础。

然而，拿破侖畢竟完成了大革命所沒有完成的革命事業，並帮助了法国境外的封建制度的摧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例如在德国，拿破侖是大革命的代表，革命原理的宣傳者，旧式封建社会的摧毀者。”^②

但是，拿破侖的失敗也就決定於此。这个从封建社会廢墟上出現的新社会又被它本身的矛盾破坏着。拿破侖把欧洲各国人民从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但他却不敢进行到底，一遇到欧洲巨大的农民起义，他就退縮了。

在法国本国，經濟危机和軍事失敗引起了資產階級的不滿，資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六五頁。

② 但是这不等於說：拿破侖所进行的战争不是掠夺性战争。（参閱柯茹霍夫一九五一年在布尔什維克雜誌發表的論文：“庫圖左夫在一八一二年衛國战争中的作用”。）

產階級拋棄了他們的“皇帝”，準備和舊日的貴族妥協。

可是，歷史任務基本上是依然要完成的。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和它的行政官吏、民法、刑法、訴訟法、商法等也終究是要建立起來的。

* * *

代替革命政府的政權精神，即熱月反革命的精神，可以以波亞西—唐格拉斯此人說明它的特徵。波亞西—唐格拉斯出身於塞凡納的貴族，同資產階級保守派向有勾結。後來拿破侖任命他為元老院議員，而路易十八也任命他為貴族院議員。目前，他是熱月黨政策的策劃者之一。他說道：

“我們應由最優秀的人來治理。最優秀的人即是最有學問，最熱心維護法律的人。可是差不多極少例外，這樣的人只有從有產者中間才能找到。只有他們才對維繫他們財產的国家，保護他們財產的法律，保持他們財產所必需的太平世界表示關心。有了財產，他們才有時間受教育。而教育使他們學會明智地和正確地討論那些決定祖國命運的法律是否有利有弊，……一個由有產者來治理的国家是符合於社會秩序的，而一個由無產者治理的国家則是一個處於自然狀態的国家。”

在波亞西—唐格拉斯看來，所謂自然狀態就是野蠻狀態。

反動措施逐漸擴展到各个方面。限價法律被放棄了。各種規定物價的條例都陸續取消。“香狸金色青年”^①獲得了行動自由的權利。這些青年都是貴族子弟，特別是投機商人的子弟，他們可以隨便毆打雅各賓分子，而雅各賓俱樂部則早已封閉了。國民公會會議廳上的革命烈士塑像都被取走，達維德所繪的“馬拉之死”和勒

^① 這些青年愛用麝香酒在身上，故人們以此稱呼他們。

不勒基埃·德·聖發尔乔^①於投票贊成处死国王的第二天被人刺死的画也取走了。馬拉和少年英雄巴拉和維亞拉^②的遗体也搬出了偉人墓^③。一七九五年八月二日通过的新宪法甚至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上的第一条：“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也改为“平等即人人适用同一法律”。政治平等已不存在；普选亦已取消。要当一个积极公民，必須繳納直接稅。积极公民只是为了推选初选人才举行集会。初选人人數只有兩万名，只有他們才享有实际的立法权，为全国行使表决权。

* * *

可是，長褲汉並未停止騷动，因为人民群众依然十分貧困。通貨膨脹和投机倒把把把物价抬得非常高。在罗伯斯庇尔当政时期，革命法庭曾使进行公債、証券、匯兌等投机的人深感恐惧知所收敛。現在什么阻碍也沒有了。一小撮人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这些人就是所謂“金肚子”。一部分人的貧苦和另一部分人的濶綽，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照。每天因飢餓而至自杀的悲剧層出不穷，警察局的报告也不得不写上这样的話：“街头有一个妇女抹了脖子，有五个孩子的父亲跳窗自杀”等等。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王宮区的飯店侍役却說：“現在那些年青人和那些投机家的揮霍無度的情形是以往从未見过的。”

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饕餮指南”把濶客从“小牛头飯店”的松露饅魚那里帶到“沙鍋居”的老牌閩鷄那里。金融資本家烏弗拉尔买下了馬尔里、蘭西、盧維西納等宮堡，而仅仅巴黎一市，一七九七年

① 勒不勒基埃(一七六〇——一七九三年)一七九〇年当选为議會議長。——譯者

② 巴拉(一七七九——一七九三年)，为一爱国少年，被敌人逮捕。敌人逼他高呼“国王万岁！”他却回答：“共和国万岁！”因此當場被杀。維亞拉(一七八〇——一七九三年)亦为一少年英雄，曾企圖阻止保王党军队渡河，死於杜朗司河边。——譯者

③ 偉人墓造於一七五四年，建成於一七八〇年，本系教堂，后改为偉人墓。——譯者

的棄兒即達四千人。

巴黎各郊区人民的憤怒如海濤那樣地吼嘯，尤其是因為貧困之外政治又是極端反動。一七九五年三月十七日聖瑪爾索和聖雅克兩鎮的代表們說：“我們缺少麵包，我們正在後悔我們以前為大革命所做的種種犧牲。”

他們的理想仍舊是民主共和國，在他們看來，一七九三年的憲法即已體現了這個共和國。

共和國三年芽月十二日（即一七九五年四月一日），巴黎各市区群众冲进国民公会。但是由於缺乏領袖、缺乏組織、缺乏明確的口號，運動依然失敗了。但是騷動不久又死灰復燃，終於發生了共和國三年牧月一日（即一七九五年五月二十日）的人民起義運動。

巴黎東部各市區的警鐘敲響了，軍鼓也打響了。示威群眾在帽子上或短褂上別上“麵包和一七九三年憲法”的標識。聖安東尼鎮的婦女關上了舖子。運動波及到巴黎中心各市区。一個手工業工人名叫皮埃爾·里姆的刻字匠是這些武裝群眾的領袖。他們衝進了國民公會會議廳。有幾個士兵揮動皮鞭想把婦女們從講壇上趕下來，但是示威群眾像海潮一樣湧來。有一個議員費羅當場被打死。此人是巴黎小麥運輸的負責人，因此特別為群眾所痛恨！起義群眾再一次掌握了國民公會，但是這一次又是由於缺乏領袖、缺乏綱領，把寶貴的時間在吵吵嚷嚷彼此矛盾的演說中浪費掉。傍晚山嶽派幾個議員出面干預，其中一個議員名叫羅姆把共和國二年實行的平等麵包制恢復過來，規定麵包供應量平等制，禁止糕餅舖制作糕餅，下令實行搜查面粉。但是山嶽派自熱月九日事件後已是一個力量微小、內部分裂的集團。

右翼分子開頭是手足無措，但在國民公會議長吉倫特派分子浮尼埃積極幫助下又很快地鎮定下來。富人住宅區的國民軍集合

起来了，起义群众武装不足，不得不撤退。但是，第二天，起义又重新爆发。长裤汉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再一次面对面发生了冲突，这次斗争真正是个有关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斗争。有一个热月党人写道：“我们唤醒了所有安份守己的人，我们唤醒了每一个有财产需要保护的好公民。”

充满保王思想的纨绔子弟给资产阶级保卫者以莫大的帮助。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对付长裤汉：笼络人心的诺言、暗中布置的谋杀、虚伪的亲善友好，最后是使用武力狠狠打击。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军队第一次开进了巴黎。圣安东尼镇被包围起来，终于在砲火和饥饿双重压迫下不得不投降。镇压开始了。这个横暴的镇压已预告一个白色恐怖正在酝酿中。山嶽派議員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其中六个一出法庭就相继自杀。巴黎一万个共和主义者被登记在驱逐出境的名单上。在外省，土伦也好，里昂也好，圣亚田也好，马赛也好，雅各宾分子大批地遭到屠杀。有一个当时人（此人并不喜欢雅各宾分子）写道：“人们杀害爱国分子，如同在田里打画眉鸟一样，见到就杀。”

在这些决定性的时日里，工人们是始终站在前列的。不但巴黎的工人，外省也是如此，土伦兵工厂的工人即是一个例子。他们占领土伦城四天之久，而停泊在港口的舰队上的水兵也对他们表示同情。最后调来了军队才把他们打败。土伦人被解除武装，四千五百名水兵为了逃避镇压开了小差。

长裤汉的这一次失败应该怎样来解释呢？他们既不缺乏胆量，也不缺乏勇气。虽然他们几个月来已经饥饿不堪，虽然屡次被人出卖，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他们仍是很英勇地对警察和正规军队展开了斗争，但是他们所期待来领导他们的山嶽派議員却临阵退却了。这些人害怕担责任，而实际上他们心底里却也是反对

起义的，他們雖然對工人和手工業者是同情的，但終究是屬於另一個階級，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財產也好，教育也好，家庭關係也好，千絲萬縷的關係把他們同資產階級連在一起。他們只有在法國遇到危險、自己面臨封建反革命的威脅時，才會想到同人民大眾結成聯盟來尋找出路。可是現在他們經常同人民失掉接觸，他們已不了解人民。因此人民群眾就缺乏綱領、缺乏領袖、缺乏組織。

* * *

這一切正是巴貝夫在督政府初期企圖帶給人民群眾的東西。所以巴貝夫在法國工人運動史上是一個先驅者。對於這點，馬克思曾指出：

“行動的共產黨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首次出現的……最徹底的共和主義者，在英國是極端平等派分子，在法國是巴貝夫和布亞納羅梯等，他們是最早提出這些社會問題的人。巴貝夫的朋友和戰友布亞納羅梯所寫的‘平等派的密謀’指出了這些共和主義者如何從‘運動’中吸取了明確的觀念，即：人們撇開了君主政體或共和政體這一政治問題——就一點也沒有根據無產階級的立場解決任何社會問題。”^①

有一天亞爾培·戴孟^②對儒勒·蓋德^③說：“你們的淵源是巴貝夫密謀與平等共和國。”儒勒·蓋德回答說：“我們接受他的學說。”儒勒·蓋德這話是說得對的。

巴貝夫是個平民子弟，深知道窮苦的滋味。他的故鄉比卡第曾經發生過不少次農民暴動。他的父親雖然受過些教育，但是也不得不搞幾個行業。他當過兵，做過皇莊的職員、臨時工，後來在聖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二〇八頁。

② 亞爾培·戴孟（一八四一——一九一四年）法國反动政治家。——譯者

③ 儒勒·蓋德（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法國工人領袖。——譯者

奎丁要塞当建筑工人。他的母亲是一个紡織工人，生活也很艰苦。巴貝夫早在十五岁上就不得不出外謀生，最后他当了文書，給地主老爷們办理地契档案等工作。他写道：“我是在地主档案的塵埃中發現貴族階級霸占產業的丑惡秘密的。”

他有極大的求知慾，凡經過他手的东西，他都閱讀过：文学、詩歌、科学、历史和哲学。他开头和十九世紀的思想家一样，是个空想派。他相信仅仅哲学就可以产生“幸福”。可是由於他的出身、他的職業，他究竟还是脚踏在現實的土地上，熟悉人民的痛苦。他所生活的省份是一个農業的省份，但是毫無疑問，工業也已經深入該省。他觀察到正在發展中的財富集中的現像。“工人們在幫助大財富併吞小財富的过程中，自身的人数也大大地增加了。結果，不但工資大为削減，而且大批公民越来越不可能找到工作。”

后来巴貝夫之所以能逐漸自拔於烏托邦的夢想，那是因为他从一七八九年起就積極参加了革命运动。他以保护农民为己任，創辦了一个週刊，叫做“比卡第通訊”。这个週刊特別欢迎刊載請願書和訴苦書。在立法會議选举时，他拟了一个極民主的綱領，主張人人有选举权、人民享受否决权、人民監督国民議會、設立人民請願处、确定集会权、实行軍隊民主化、教育平等、保証全国人民的生活。

巴貝夫在本乡受到压迫，来到巴黎。但是他开始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在热月事件之后。开头，他並不了解热月事件的意义。他被罗伯斯庇尔的敌人所散佈籠絡人心的言論所迷惑。后来，他知道自己錯了。一七九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写道：“罗伯斯庇尔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但是他却不甘願停留在一七九四年的雅各宾主义上，他認為如果不同时进行政治斗争就無法保衛人民利益。

“如果在一個國家里，社會上少數人能夠把農業、工業的財富攬取在手中，然後用來控制社會上的多數人，並使用自己的權力，使多數人宛轉呻吟於困乏之中，那末應該承認，這樣的侵犯行為只有在不良的政府制度袒護下才能做得到。”

因此，必須打倒的就是這些不良的政府制度。

巴貝夫在他的“言論自由報”上，繼之在“人民論壇報”上發表文章，因而遭到政府追索，並於被捕後在亞拉斯獄中坐牢六個月。亞拉斯獄中生活在巴貝夫的思想發展上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他了解到他所生活的社會，其根本毛病是在於社會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占有一切的少數人，另一部分是什麼也不占有或是幾乎什麼也不占有的極大多數人。這是私有制的原則，這樣的不公平的制度就是從这里面產生的。挽救的辦法只有共產主義，即每個人為大家勞動。

“所有從事生產和製造的人都為公共商店勞動，他們之中每一個人將各自負責生產的物品送到公共商店，而負責分配的人不再為個人打算而為整個大家庭打算，從整個合伙公司的全部產品中平均地將不同品種的產品分給每個公民，以資酬報每個公民為增加產品或改善產品所付出的勞力。”

如何才能實現這樣一個社會呢？巴貝夫摒棄了烏托邦思想，說：

“如果我有一根魔棒，那末一方面我將粉碎一切妨礙我們的東西把它變成過去的塵埃，另一方面，我將使在地球上出現為建立一個平等社會所需要和包含的一切東西。可惜，我們並沒有這樣的一根魔棒。”

因此必須發動一個革命運動，對反动勢力實行人民大眾的專政。出獄後，巴貝夫就着手組織這樣一個革命鬥爭。那時正是反

动势力猖獗进攻时期。他組織的第一个人民俱乐部於一七九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被解散了，到了一七九六年三月間，“平等派密謀团”成立了。时机似乎很有利於革命。資本家拒絕增加任何工資，工人們的工資是以紙幣憑單支付的，而商人則只收受現金。督政府被迫求助於發行强制性的公債，許多工業家關閉了他們的企業作为报复手段。

共产主义者西尔文·馬萊歇尔和費里克斯·勒柏勒基埃、安东納尔·德尔特、布亞納罗梯、德朋等团结在他周圍。他們七个人組成一个秘密指导委员会。因为自一七九五年長褲汉失敗后，一切革命活动都必須採取地下活动方式，而且督政府曾於一七九六年四月頒布法令，宣布“凡企圖恢復君主政体、恢復一七九三年宪法、假借土地法进行搶劫和瓜分私人產業者”一概处以死刑。

巴貝夫被政府追索，只得躲藏起来。但是这絕不能阻止他領導革命运动。

在巴黎每一区都有一个革命組織者。他的任务首先是了解各行業的劳动者的要求，並組織工人对督政府进行斗争。还有其他革命組織者从事軍隊工作。恰恰在这些人中間鑽进了一个告密者格里塞尔。巴貝夫等人所用的宣傳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报纸、标语、小册子、傳單、歌曲、在咖啡店和排队时評論时事等等，斗争傳到了外省：里昂以及巴特加来、馬恩、諾尔及諾尔-厄斯特等各省。

当时另外有一个發源於小資產階級而具有雅各宾傳統的起义运动，这方面的領導人物是些前国民公会議員，如雅伏格、里哥尔、萊尼罗等。巴貝夫成功地實現了這兩股革命潮流之間的協調。

他們決定一旦取得胜利，就把政权交給一个由平等团选出的代表(每省一人)和前山嶽派的国民公会議員組成的議會。这个議

會將負責立即採取一系列步驟，其中最具特點的步驟是：每一個身體健康的人均須勞動，實行人民普遍武裝，禁止報刊散布謠言和虛偽消息，沒收全體亡命者和叛徒的財產，普遍實行平等教育、注重職業教育、使每個人均能合適地擔任一門職業並參加企業管理及制定法律以消滅官僚主義，壟斷對外貿易。這樣的綱領自然已是大大超過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雅各賓派的要求了，巴貝夫認為這是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步驟。

革命運動迅速地發展，但是督政府也在密切監視着。政府靠了告密者格里塞爾，對平等派密謀團的進展和領袖人物的性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七九六年五月十日，巴貝夫和他幾個戰友被捕了。政府對所有參與密謀的嫌疑分子都發出拘捕証。所有著名的共和主義者一律驅逐出巴黎和塞納省，報刊在督政府授意下對共和國四年的共產主義者盡量地造謠誣蔑。

可是，政府還是不敢放心。它對巴黎各郊区非常害怕，因此將被控的人裝在柵籠里趁黑夜押出巴黎，送往萬杜姆。這時候，在該地已經組織好最高法庭。在押解途中，德魯葉居然脫逃了。

一七九六年九月，格勒納軍營發生企圖暴動事件（有人企圖煽動士兵們暴動，這大概是警察局有意佈置的），這就使督政府找到了實行血腥鎮壓的借口：三十個被告（其中有三個是前國民公會議員）被槍決。

巴貝夫案件於一七九七年二月二十日開始審判。在萬杜姆也發生了人民示威運動。巴貝夫的態度非常勇敢^①。他不是法庭上說話而是越過法庭的圍牆直接在向人民說話。他說：“除了我們的審判官以外還有別人在傾聽我們。人民是很關心我們所說的話

^① 馬爾賽·維拉爾：“被告的控訴”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二五——三六頁。

的。我們在这里發言就像是对人民發言。我們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来証明我們是無罪的。”

審訊拖延了三个月，直到一七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才判決。巴貝夫和德尔特被處死刑。布亞納羅梯、謝爾曼和五个革命組織者被判处流放。巴貝夫和德尔特兩人为了不願落在劊子手手中，均以短劍自杀，但未當場死掉。第二天，他們才被送上断头台。巴貝夫說：

“我虽然沒有能够使負責審判我們的法庭相信我們無罪，但至少我确信后世的公論一定会宣佈我們無罪並為我們加上花冠。”

后世的公論不但宣佈巴貝夫無罪，並且把他看作工人运动先期的英雄之一，社会主义先期的理論家之一。

毫無疑問，我們不能忽視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去了解巴貝夫学說的局限性。資本主义的集中还只在萌芽时期，个体經營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無产階級剛剛开始出现。因此十分自然，在巴貝夫看来，基本問題还不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来組織生产的問題（虽然他比起他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更注意到生产問題），而是組織分配的問題。当时無产階級还不可能确信自己是个独立的階級。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产生出“一些超过了旧事物观念的思想”而巴貝夫思想已是“新事物的思想”了。

如此說來，巴貝夫学說和平等派密謀团究竟有些什么特出的地方呢？換句話說，巴貝夫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第一，巴貝夫的共产主义已經擺脫了烏托邦思想，因为巴貝夫分子虽然缺乏無产階級斗争的經驗，但从長褲汉在恐怖时期及热月九日事件之后所进行的战斗中汲取了經驗教訓。他們已經發現了一股能够發揮历史性效力的物質力量。

巴貝夫寫道：“共和主義者並不是永恆的人，他是某一個時代的人，他的天堂是在地上。他要在人間享受自由和幸福。他不願意等待，至少是愈快愈好能趁他在世的時候享受到自由和幸福。”

正是為了這個緣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要善於把空想社會主義與“在近代一切大革命中間都代表過無產階級要求的文獻（巴貝夫等人的著作）”^①區別開來。

因此，巴貝夫已經把思想理論同革命行動結合起來。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論，散見在他的文章里和布亞納羅梯所著的“平等派的密謀”一書中。這一套理論不僅是從人民群眾的經驗、痛苦和鬥爭中產生出來的，而且反過來又用來鼓動起一個“密謀”。這個“密謀”在巴貝夫說來就是激發人民群眾起來革命，並領導他們根據一個明確的綱領去取得勝利的革命運動。

第二，巴貝夫已意識到階級鬥爭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寫道：“一般地說，什麼是一個政治革命？個別地說，什麼是法國的革命？它是貴族同平民之間、富人同窮人之間的公開戰鬥。”

當時工人与“窮苦”大眾雖然還沒有明顯地區別開來，但是巴貝夫已經首先依靠工人，並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

第三，巴貝夫特別重視土地所有制，他首先想到土地公社。這是誰都不能責備他的，因為我們應該想到一七九六年的法國基本上還是個農業國。但是巴貝夫最值得讚揚的地方，是他揭示了當時尚屬新鮮的一件事實：即近代工業和作為近代工業特征的資本主義結構，特別是他已看到了工人受剝削的根源。他寫道：

“這些無數的手創造了一切，但是它們現在已經什麼都得不到，什麼都摸不到。真正的從事生產的人注定了要忍受飢寒。為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局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頁。

什么最主要的人即从事创造性的、最基本的劳动的人，他们所得的报酬反而要比商人（这些人在我眼中看来只是从事最最次要的劳动即分配工作的人）少得无可比拟呢？”

巴貝夫早在傅立叶之前，已經揭露了竞争的灾害性后果，竞争必然导致壟断，並引起經濟危机。

“竞争不但不是为了改进产品，而且是讓專門想出来迷惑买主的那些不耐用的貨色来淹沒那些規規矩矩的产品。竞争只会迫使工人粗制濫造並喪失手艺，迫使他們疲勞挨餓，看了別人不顧信义的作風而喪失道德观念，从而压低成本。竞争只是使最有錢的人获得胜利。竞争經過一切斗争后只会使胜利者取得壟断地位，而使正当的市場归於消灭。在竞争中粗制濫造出来的貨色，大有可能找不到买主，徒然毀灭大量的原料，把有用的东西变成廢物。”

巴貝夫和十八世紀大部分的空想家相反，他在工人們开始自發地破坏机器以前好几年，就已經認識到使用机器的进步性，只要机器是为集体服务。

“当我听說我那一門行業里用了机器可以节省許多人手时，是不是会叫我發生恐慌呢？不会，一万个不会，因为我知道用了机器决不会帶來任何不幸的事，对集体說来这是节省許多時間，从而減少疲勞，而用了机器所节省下来的人手可以用到別处去，誰也不会因此而挨餓。”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最高行政机关應該用机器以及能够減少人力劳动的各种方法来从事民族公社的建設工作。”

所以，無可爭論的，巴貝夫已經有了比土地法（即土地公社）和恢复手工業經濟这些理論更进一步的思想。

第四，巴貝夫預見到，一旦起义成功，为了粉碎反动势力，必須賦予人民群众以“特殊的权力”。布亞納罗梯給“特殊的权力”下了

这样一个定义：

“特殊的权力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有了这个特殊的权力才能克服过去奴役所遗留下来的墮落腐化，突破内外敌人的陷阱和他們联合一致的反抗，从而确保民族的自由。”

这就是說，人民專政的觀念在那时候已經提了出来。这个观念無疑是巴貝夫分子根据历史經驗所想出来的，因为公安委員會，馬拉和若干山嶽派分子都曾經提到过这件事。馬拉在一七九〇年就曾經主張过設立一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專政官职位”。只是这种提法過於直接受到古代和羅馬共和国的影响（羅馬共和国在危險时期曾实行專政，即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官职）。專政官的任命势必引起人心恐慌，因为專政是應該由人民自己来行使的。

可是，馬拉为了証明他的提議的正确性所提出的理由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說：“我一再說，想使那些一千年以来魚肉我們、掠奪我們、压迫我們而从未受到懲罰的富人，能够心悅誠服地变成和我們平等相处的人，这是極端荒誕的想法。他們这些人永远要暗算我們，直到他們完全被消灭为止。假如我們不下这个唯一的和必要的决心，那末我們就不可能避免內战，也不可能脫逃遭人屠杀的下場。”^①

在恐怖时期，長褲汉曾制造了某些建立人民專政的必要武器如划分市区、設立監察委員會、兄弟会、革命軍隊、特派員等等，这些都是对巴貝夫分子有啓發作用的先例。但是以往却从来沒有人那末清楚地認識到，必須牢牢地依靠“人民地方議會”，把專政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面这条道理。

“革命政府應該使革命有利於拥护革命的人而不利於反对革

^① 參閱“馬拉文选”，“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〇年版，第八一頁。

命的人，从而加强革命。”

这个政府应该剥夺人民的敌人的自由权利，而依靠武装起来的长裤汉，依靠小商铺和平民家庭。

那时当然还谈不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一个能同农村居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但是巴贝夫仍有值得我们讚扬的地方，即是他廓清了那些以为可以通过资产阶级自动放弃他们的特权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许多幻想。

第五，巴贝夫往往被人说成是个阴谋家，而且说成是个专门搞阴谋的人。事实上，首先必须记得巴贝夫时代还没有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其次，我们不能把“密谋”与“地下工作”混为一谈。由于督政府时代反动势力占着统治地位所造成的政治条件，使巴贝夫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但是巴贝夫的确是抱有群众斗争的思想。他完全估计到巴贝夫分子一旦陷于孤立时将会遭到何等的危险。他写道：

“统治者永远是为了统治别人才进行革命，而我们所以要革命是要通过真正的民主来保证人民永久的幸福。”

因此，他总是设法去了解工人们的要求，指导革命干部发动反对生活高涨的示威运动，试图取得前国民公会委员们的帮助来恢复和刷新雅各宾的传统。

第六，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带有人道色彩的。在巴贝夫看来，共产主义不仅是要消灭人类的贫困，消灭“充满成见的旧的压迫制度”，而且还要创造条件使文化艺术发扬光大。

“危险的寄生虫必然会大叫大嚷，说我们要把社会退回到野蛮状态去。他们把我们说成是肆意破坏文化的野蛮人，是科学、艺术和工业的敌人。艺术和科学是决不会萎缩的，恰恰相反，它们将受到推动，向普遍应用方面去发展，它们将在应用中起变化，从而提

高每一個人享受的數量。藝術、科學、工業將在摸索新道路的過程中，大大地發展並且變得更加純潔。它們將帶上符合於一旦無數幸福的人結合一起必然會產生的偉大感情的崇高的標誌。等到它們不用再當奴隸，不用再自貶身價去趨奉風雅的潤人的時候，它們就會提高到唯一無愧於真文明的偉大思想的境地，而正是這樣的思想才是標誌着以人類共同幸福為重的真文明。”

最後，巴貝夫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剛毅勇敢的人民英雄的范例。他從不向困難低頭。無論生活怎樣困苦，法庭怎樣威逼他，他從沒有表示屈服過。他在萬杜姆對法官所講的話，不僅是為了人民而且也為了後代子孫說的。那些審判巴貝夫分子的人，他們的名字久已為人所遺忘，而巴貝夫的名字卻還活在近代無產階級的心里。他臨死前寫給他妻子的信中說：

“你知道，我親愛的朋友，我的辯護詞是件有價值的文件。善良的人和愛國分子都會永遠加以珍視的。我身後遺留給你的唯一財產就是我的名譽。我確信你和孩子們有此名譽一定可以自慰。你們一定喜歡聽到正直仁慈的人提到你的丈夫，提到你們的父親說，‘這個人的道德是完善的’。現在惡人當道，我讓他們打敗了。

懷着像我那樣純潔的心灵去從容就義，可以說死也死得愉快。最慘、最痛心的是把我從你們的懷抱中奪走，啊，我最親密的朋友們，我最珍愛的一切！我還有一句話，請你們給我母親和我姊妹寫封信，把我的辯護詞照日後印出來^①的樣子由驛站或其他方法寄給她們。請你告訴她們我是怎樣死的，同時設法使這些善良的人了解這樣的死是光榮的，絲毫不是什麼恥辱。”^②

我們今天讀了這封信還不能不為之感動，尤其是我們一想到

① 巴貝夫希望把他在法庭的辯護詞印出來散發。

② 這封信的全文見巴貝夫的“文選”，第九五——九七頁。

那些自从一七九七年以来为了“真正的民主”而倒下的人。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对家人表示了骨肉之爱，同时也表示了对於人民必定获得胜利的信心。

当时，反动势力占得了上风。建立一个行动的共产党的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领袖们被杀死的杀死、坐牢的坐牢、分散的分散。巴贝夫起来捍卫人民是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人民能左右历史。“如果不是由人民来干，如果没有人民参加，那末任何伟大的和有利于人民的事業是永远做不成的。”可是，当时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在“人民”中间形成一个能够通过它的胜利，建立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领导阶级。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图谋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那些最初尝试，曾不免要遭到失败，这是由於当时无产阶级本身尚欠发展，並且是由於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質条件尚未具备，因为这些条件是只能由资产阶级时代产生出来的。”^①

但是，巴贝夫的斗争也不是白费的。他在遗书中写道：

“你们不要以为，我为了这个最美丽的事業牺牲自己会感到后悔，那怕我的一切努力都無助於这一事業，我还是尽了我的责任。”

巴贝夫留下了一个榜样，一套学說。布亚纳罗梯^②流亡回来后，曾发表了“巴贝夫平等派的密謀”一書，討論巴贝夫的学說，以便傳給后人。后来巴贝夫的傳統曾啓發过不少法国革命家，尤其是布朗基。

* *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七頁。

② 參閱薩·伯恩施坦：“布亚纳罗梯”，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在巴貝夫死后^①，就再沒有雅各賓式的起義運動發生了。資產階級是勝利了。除了彼利厄、奧倍爾康夫、夏柏泰爾以外，又出現了波文、利夏和勒諾亞、特爾諾等工業鉅子。一七九八年九月，佛朗梭亞·德·納夫沙朶組織了第一次全國工業博覽會，並且宣布要舉行一個競賽以獎勵革新家和發明家。人們趁此機會大大歌頌了革命的偉大性，因為這個革命摧毀了封建的束縛。佛朗梭亞·德·納夫沙朶叫道：

“不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那時候，工業受着種種束縛，幾乎不敢生產自己鑽研得來的成果。享有特權的行會實行着害人的行規，擾民的捐稅制也扼殺了珍貴的天才的萌芽。現在自由的火炬已經握在工業手里。”

可是這火炬只照耀着資產階級，因為幾個月以來，真正代表胚胎時期工人階級的巴貝夫分子只有坐牢的份。

真正的銀行集團在這時候逐漸出現並不斷發展，成為十九世紀法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勢力。金融資本家在恐怖時期曾一度惴惴不安，自羅伯斯庇爾失敗後才重新抬起頭來。一七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禁止設立不記名股份公司的法律和一七九四年四月十五日

^① 從下面所引的話裏面可以想見，反動勢力對巴貝夫和巴貝夫傳統是如何的憎恨。國家圖書館有一本不見經傳的作家於一八一八年在諾翁出版的“羅葉城記事”。在這本書裏有一個名叫小格萊哥爾·德西尼的人寫道（第四〇一頁）：

“巴貝夫在羅葉城娶了一個女傭人為妻。這個女傭人比巴貝夫的年紀要大得多，她生了幾個孩子。巴貝夫用‘愛彌兒’這本書裏面所講的方法來教育孩子們，其中有一個女孩子最受鍾愛。這個女孩子在六歲上死了。巴貝夫破開她的肚子取出心來吃了一半，說是這樣才能使他半個心愛的孩子回到本源。他又把另外半個心在胸膛上掛了很久。如果不是一个絕對可靠而又非常熟悉巴貝夫的人親自告訴我，我幾乎不敢相信天下竟會有這樣的事情。”

在這個作家看來，這一切都是解釋得通的，因為照他所說：“巴貝夫是一個聰明人，但是心地奸邪。他那種陰險的眼色就透露着他為人的奸惡”。反動分子對工人運動（尤其對工人階級已取得政權的國家）造謠污蔑，已經不用再發明什麼。他們只要把人名和日期改動一下，那末在熱月黨徒的武庫裏就可以取之不盡了。

禁止創辦銀行的法律，都在一七九五年十一月被廢止了。從此以後，金融資本家的活動再不受任何束縛。自由的火炬照耀的就是這些人。五百人院財政委員會召集人埃斯夏塞里奧宣稱：

“我們應該鼓勵開設自由銀行，因為誠實可靠的人創辦的銀行既能協助政府又有利於發展我國商業，增強公共信貸，促進商業、農業和工藝的進步，並能成為國家繁榮的源泉，一如在英國、荷蘭那樣。”

一七九六年“儲蓄銀行”成立，它代替了一七七六年設立而於一七九三年撤消的“貼現銀行”。一七九七年“商業貼現銀行”成立，它最後集合到一百零三名股東。在外省，一七九八年盧昂成立了“盧昂銀公司”。這些金融資本家並不都是法國人。但這有什麼關係呢。金融貴族在那時已經有了明顯的國際性，而且已經滲入工業圈子。比方拿克勞德·彼利厄來說，他的父親已經是一個富有的商人。老彼利厄壟斷了伏亞龍區的布匹批發業並且自己發展了織布業。克勞德本人在一七八〇年買下維齊爾宮堡，安裝機器以生產花紙和印花布。一七八八年，他把這座宮堡交給道費奈省三級會議應用，因為他是一個革命的資產階級，熱望封建制度早日消滅。他經營好幾家公司，特別對馬賽兩個企業感到興趣，一個是制糖廠（煉制聖多明格^①糖），另一個是煉油廠。他同時又是銀行家。在大革命時期，他在製造軍用品中投機倒把，他特別在教產公賣上大做投機。後來因為他有同情里昂聯邦主義派暴動^②的嫌疑，幾乎受到革命法庭的裁判。熱月九日事變後，他回到巴黎。從此他的活動範圍就再無止境了。他瘋狂地從事投機倒把，成為“儲蓄銀行”的董事並在諾爾省買下了瀕於倒閉的安辛煤礦。這個人就是

① 聖多明格在中美洲西印度群島，當時為法殖民地。——譯者

② 指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後吉倫特派暴動。

后来著名的迦西米—彼利厄王朝的祖先，關於这个王朝 我們以后还要时常提到它。

馬萊家族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家族，他們一家人有的在十八世紀就到巴黎安了家，有的仍住在日內瓦，有的到倫敦、到美洲 但彼此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八〇〇年紀奧姆·馬萊当了法蘭西銀行總裁。此后馬萊一家在差不多一百五十年中，始終保持着總裁的第三把交椅：紀奧姆之后是占美，占美之后是亞尔封斯，亞尔封斯之后是埃尔納斯特。这是一个最出色的新封建的典范。他們靠了人民的支持取得了权力，然后反过来打击無产階級。这些世襲的新封建家族所缺的只不过是一个爵位，但这也無关宏旨。紀奧姆·馬萊在拿破侖时代已經封为子爵，后来路易十八又在一八一五年追認了他的爵号。

尼姆城的基督教徒布巴尔·德·奈弗里茨家族，曾被路易十四驅逐出境逃至日內瓦。路易十六登極后又回到法国。我們还可以举出維尔納家族，他們也是从日內瓦来的。埃基埃納·德勒塞尔在大革命前曾創辦第一家火災保險公司，被革命政府判处徒刑。一八〇一年，他的兒子朋謝明在帕西開設一家棉紡厂，又經營甜菜制糖厂，后来成为法蘭西銀行總裁和帝国的子爵。他偶而也从事写作，后来發表一本書叫做“幸福南針”。他的兄弟迦勃利埃·亞勃拉汉当了基佐手下的警察厅长。

又如德馬希家族后来和温德尔家族和許奈特家族联婚結成亲家。又如讓—弗雷德里克·貝雷哥，他是公安委員會的銀行家，一七九四年因通敌被控，热月事件以后才重新露面。又如加勃利埃—徐里恩·烏弗拉尔，他原先只是南特城一个殖民地食品批發商的合伙人，后来竟成为督政府的最大的債权人之一。又如亨利·亨許於一七九八年設立亨利·亨許—隆巴尔銀行。一百年

后，他的一个后裔当了“国立贴现银行”的董事长。

我希望读者记住上面这些名字（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名词来），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以后常会提到他们的。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最坚决的阶级敌人。有些并不是法国人，但在法国立下了宗支，而且有许许多多人在拿破仑时代封了爵位。他们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是基督教徒，有的是犹太教徒。他们虽然不用同一部圣经祈祷，但却崇拜同一个上帝，即是金钱。这些大部分在热月九日反革命运动之后，雾月十八日政变之前这一时期出现的金融世家，传世之悠久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二百家”的历史根源。奥古斯丁·霍蒙说的很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政体，不管那些五日京兆的政府的政治色彩是什么，这些人（法蘭西银行的总裁）总是屹然不动，保持原位的。所以一九三五年，法蘭西银行董事会中还有些总裁是上一世纪以前的总裁们的后代。馬萊、霍丁盖尔、洛特雪、奈弗里茨等家族至今还有人在法蘭西银行董事会内占着席位。波拿巴、波旁、奥尔良等王朝都已经消亡复灭，但是这些金融世家却屹然未动。有时候换了姓名，但只是一个表面问题，因为不是他们的女婿，就是他们的姪子或姑表兄弟，仍是他们家族而原封未动。”^①

这样就再一次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和从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国家”的阶级性。

可是，这些金融资本家还不大安心。因为督政府无法实现资产阶级所向往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日益增长的贫困有引起暴动的危险，因此有些政治家为了克服财政危机，主张依照雅各宾方式向富人举债。当时全国盗匪如毛，而保王党的武装部队又在重新

^① 奥古斯丁·霍蒙：“法国的主人”，巴黎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九三页。

活動。自從出了巴貝夫，雅各賓主義已與“共產主義”無所區別，因此，資產階級什麼都可以忍受，就是不能容許雅各賓主義復活。對人民的恐懼打開了賣國的道路。督政府方面的政治人物拉馬格這樣寫道：

“有的人主張利用人民力量來打退蠻子，有人卻害怕利用這個威力無比的人民力量，就是說他們害怕共和派的群眾甚於北方蠻族。”

熱月黨和督政府的資產階級不僅包括金融資本家，而且還有工場主。他們在农村有富裕農民可以依靠，這些富農在教會沒收財產拍賣中發了大財。這些心滿意足的富農，他們的理想是：既不要土地法，也不希望舊政體復活。這個資產階級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但是恢復君主政體却已經不可能，因為保王黨表示出不想協調的姿勢，他們無論如何不肯承認封建制度已經崩潰而資本主義時代已經開始這樣事實。一直要到後來路易十八復辟，保王黨才接受妥協的想法。在目前，“保王黨的命運是完結了。企圖使歷史開倒車各種的荒謬想法使他們的一切盤算都成泡影，即連他們最精密的盤算也歸於失敗了。”^①

資產階級已經獲得了經濟自由，它決不甘心把自由讓給行會制度，而保王黨卻堅持要恢復行會制度（在第一帝制時代也有這樣的問題）。在农村中，如果在教會和貴族的支持下恢復君主專制政體，那就意味着對買得國有財產的農民進行倒算。因此，資產階級需要的是——一個能夠鞏固它靠了大革命而獲得的好處的政體。經驗證明督政府並沒有建立起這個政體。督政府由於接連不斷的政變，威望已經低落。在有產者看來，督政府是個無能無用的政府。

^① 泰爾萊：“拿破侖傳”，第二六頁。

而督政府也不可能再依靠人民群众来保卫它自己，因为热月党人已把巴黎郊区的工人杀的杀、解除武装的解除武装，同时，督政府也已把巴貝夫送上断头台，放逐了巴貝夫分子。城乡的无产者已把督政府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发财致富的政权，贫困和贪污的政权。在军队中，不满情绪也在高涨。这时候欧洲已组织成第二次联盟，法国在军事上接连遭到失败。舞弊和浪费把军需库弄得空空如也，全国都普遍地感到匮乏。

於是热月党资产阶级利用督政府威望的低落，打算把波拿巴捧上台。除了前述的金融资本家之外，直接参与这次阴谋的还有些后代子孙在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上起着头等作用的人物。我们在这里只举出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其一是洛德莱，此人在大革命前以麦茨法院的法官开始其政治生涯。后来当了三级会议议员，参加了雅各宾派并任巴黎公社的检察官。他曾支持王室。热月事件后，他重新出现，替波拿巴上台出了不少力，波拿巴为此酬以伯爵爵位，并选入元老院。路易·菲力普又把他选入贵族院。他的子孙之一就是聖哥宾公司的负责人。另一个例子是柏基埃。此人在督政府成立之初任陆军部长，在执政府和帝制时代负责意大利隆巴迪地区的行政和筹划波洛尼军营职务^①。他的子孙柏基埃子爵更为出名，后来成为汽车工业巨头之一。

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不很费事地就摧毁了督政府。从此，拿破仑就将资产阶级政权组织起来了。资产阶级在将政权交给他以前也曾想到过别的解决办法，但都一一放弃了。选择拿破仑似乎是个最好的办法，因为拿破仑远离巴黎，没有受到督政府贪污腐败的连累。同时他还有过一段雅各宾历史，并且在国民公会末期镇压

^① 波洛尼军营系拿破仑於一八〇五年專为侵犯英国而設的一个兵营。

过風月十三日的保王党暴动。

拿破侖上了台，法国大革命就告一結束，而且这样又不用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了。馬克思曾強調指出：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魔法时，立即就会看出它的中間的显著的差别。德姆連、丹敦、罗伯斯庇尔、聖茹斯特、拿破侖——所有这些旧法国大革命时的人物以及党派和人民群众——都是穿着羅馬的服裝和講着羅馬的詞句来实行了当代的任务，即摆脱旧时枷鎖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任务。有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長在封建制度基地上的封建头腦；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創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証有可能發展自由竞争，經營細塊地产和利用解脫桎梏的民族工業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則到处扫除了封建的体制，为的是要給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創造一个符合时局要求的适当环境。”^①

作为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現代国家随着执政府和帝制政府而产生了。工人运动从此必須对这个国家进行斗争，不摧毁它不能罢休。当然，在大革命期間，特别是在热月事变以后，現代国家的基础是已經打下了，但是还要等到拿破侖上台才告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执政府和帝国並沒有什么区别。当时，資產階級还留恋着共和形式，同时也还不宜於从正面去得罪那些忠实於共和国的人民群众，这就是为什么波拿巴必須慎重將事，等过了几年以后才宣佈帝制而把自己变成拿破侖皇帝。但是实际上，执政府和帝国的結構是毫無不同之处的。

拿破侖的国家机器一直保持到今天，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蔑視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机关。其次，革命的資產階級为了打倒

^①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記”。譯文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二四頁。

封建制度，曾不得不打倒教会，若干资产阶级思想家也曾达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在波拿巴看来，已到了恢复宗教的时机。资产阶级需要宗教，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教会不得利用新恢复的权力来准备恢复旧政体。拿破仑对于这个条件的实现是毫不通融地监视着的。波拿巴同教皇签订了一八〇一年的条约，为法国资产阶级同教会言归于好创造了条件。这条约打下的基础是巩固的，因为直到一九〇五年教会同国家关系基本上依然不出这个条约所规定的范围。波拿巴这样做，并不諱言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说：

“在宗教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上帝托生的灵迹，而是社会秩序的秘密……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像一只船没有指南针。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一个坚固而持久的支持……一个社会没有宗教是不能生存的。当一个人在另一个饱得打嗝的人旁边饿得快死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来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意志，世界上必须有穷人有富人，但是死后在永恒的世界里将有另外一种分配。’那末穷人是无法接受这种差别的。”

拿破仑就是这样帮助了资产阶级的發展。他在一八〇五年说：“属于以往所谓第三等级的好家庭是国民中最健康的一部分国民，他们与政府之间有着最密切最广泛的联系”，因此权力应该交给他们。

政变前拿破仑向金融资本家所作的诺言都已付诸实践。那怕在历史一切条件都很顺利的情况下，发动一次政变也得花很多钱，因为终有些游移不决的“良心”需要用金钱去收买。所以金融资本家科罗和贝雷哥曾借给未来的第一执政官二百万法郎。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波拿巴即召集巴黎的大商人和银行家，要求他们马上借给他一千二百万法郎，以免发行强迫公债。事情就这

樣決定下來，過了幾個月法蘭西銀行就成立了（一八〇〇年二月二十日）。

法蘭西銀行總裁委員會包括九個銀行家：貝雷哥、勒古德、雷加米埃、馬萊、謝爾曼、加里埃、巴斯特雷希、塞維納、巴利翁，和五個商人：巴黎的洛皮亞、格勒諾布尔的彼利厄、格朗維爾的貝雷、馬賽的佑格·拉卡德、里昂的里加爾。主席是康特路的勒古德。實際上，法蘭西銀行的領導權已經交給了二百個最大的股東。我們在前面研究過他們歷史淵源的“二百家”就這樣在“國家”里建立起來了。

為了鞏固資產階級在大革命中所得到的好處，一切方法都用上了。在农村中：繼續肅清封建制度，並且宣佈了國有產業一經出賣後不再改變的原則。這些產業雖然擺脫了舊日的封建桎梏，但是現在又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了。禁止無產者的任何破壞，正就是拿破侖民法典的根本意圖。關於這點，說的最徹底的莫如喬治·勒費佛爾：

“拿破侖民法典是為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設的，它首先關心的事是確定財產所有權。這項所有權被認為天然的，早在社會存在以前即存在的。這是絕對的個人的所有權。拿破侖民法典並保障實際占有的效力等於文契的作用。民法典所規定的契約幾乎專為這種所有權而設，而關於雇用問題只占了兩條條文。家庭問題大部分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考慮的。關於婚契的詳盡規定把婚姻變成一項銀錢買賣，而民法典之所以特別重視血統關係，無非也是為了繼承權。”^①

整個說來，農業技術很少變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戰爭及封

^① 喬治·勒費佛爾：“拿破侖傳”，巴黎一九四一年版，第一三六頁。

鎖，代替进口的种植有了發展，如馬鈴薯、染料植物(茜草、菘藍、郁金草)、菊蒿莖、特別是甜菜。但是农民中間的分化已在加劇。大农户生活很富裕。在小麦漲价(一八〇〇年每公石价格为二十一法郎，一八一二年漲至三十四法郎)和發展甜菜种植上(种植地区相当於以大农場为主的冲积地面积)，几乎只有大农户才能从中获利。拿破侖的一切考虑就是以他們为主。这一个富裕农民的阶層，在农民还占絕大多数的法国，是一个拥护現狀的因素。拿破侖曾說过：“我們需要好农民，軍隊的力量是来自他們而不是慣於在城市塵埃中打滾的籬头匠。”

这些农民一直要到兵役和稅賦压得他們过分沉重的时候才拋棄拿破侖。可是在“百日帝制”时期，他們还是拥护了他。話虽如此，大部分有地的农民，他們占有的土地还是很不够的。此外，大批农業工人的境遇自一七八九年以来一直不曾有所改善。同时，和在旧政权时代一样，許多流浪汉在貧困的逼迫下变成了乞丐或盜匪。这些劳动后备軍在工業蓬勃發展时期来到后，就大批地被工業吸取了去。这是一个热月党資产階級分子早在一七九四年底就預計到的。他說，如果以为全国多数人民都可以成为地主，这才是荒謬的設想，因为根本沒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實現这种希望。就算耕地不缺，这样的想法依然只是幻想，因为“在这样假設下，每个人都得耕种他的土地或他的葡萄园来生活，那末商業、工艺和工業就很快会消失了。”^①

換言之，必須使这批农村無产者長此陷於貧困，以便日后能供应手工工場所需的劳动力。

拿破侖利用博覽会、政府訂貨、獎勵、競賽等方法並召集工業

^① 乔治·勒費佛尔：“热月党人”，巴黎一九三七年版，第二〇三頁。

家及科學家，成立民族工業促進會，以鼓勵並刺激工業生產。機器日益增加了。

拿破侖曾以諷刺的口吻說：“說用機器比較合適，那就等於說太陽比蠟燭照得更亮。”

一八〇七年發給各省省長的通知中指出，呢絨製造業發明的機械操作方式已大大節省了勞動力。這時候賈卡爾織布機正在絲織業方面普及起來。一八一二年里昂一城即有一萬二千架新機子。賈卡爾是個織布工人的兒子，一七九三年當過義勇軍。他發明一種織布機，只要一個工人就可以織出花紋十分複雜的布，並且像織元色布一樣方便。一八一〇年，法國不得不建設自己的麻織工業來對抗英國的棉織工業，於是菲力普·德·吉拉爾就發明了一種紡麻機。這時候，由手工工場轉變為工廠的過程已在加速。

雇用女工和童工的風氣日益普遍。彼利厄兄弟在蒙泰琪附近的亞維里工場里雇用了六百個十一歲至十三歲的男女童工。有些工場主在奧斯透利支戰役^①之後，要求政府將陣亡將士的遺孤交給他們。查理·希米特曾指出：

“每次裝置更完善的、效率更高的機器，童工的需要馬上就增加。每創辦一所新工場，中央政府就接到千篇一律的申請書：‘把孤兒院的孩子們撥給我們吧！’”^②

這時候紡織工業方面出現了一些工場主的王朝：在亞爾薩斯省有杜爾富斯和葛許林，在巴黎有利夏—勒諾亞。弗朗梭亞·利夏是一個不平凡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只有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

①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五日拿破侖在奧斯透利支打敗奧俄聯軍。——譯者

② 見查理·希米特：“初期法國棉紡業（一七六〇—一八〇六年）”一文。僱用童工除煤礦業外不受任何限制。關於煤礦業，一八一三年一月三日法令禁止十歲以下的兒童下井。

本家还是一个开明阶级的时代才会出现。他出身贫寒，开头在卢昂当一名店员，后来到巴黎当咖啡馆侍役。后来在英国布疋的投机生意中发了财。在恐怖时期过后，他同一个商人，勒诺亚—杜弗雷斯纳合伙（他后来保留了勒诺亚的商号）。他们的专长就是制造利夏原先做过投机买卖的棉布。他们第一批工场设在巴黎，设备十分简陋。最初设在一家小酒店里，后来迁到一家旅馆里，最后又迁到巴黎附近沙罗纳一个废弃的修道院里。他们的企业日益发达，逐渐发展到外省。到了一八一〇年，雇佣的工人已经有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二名。利夏—勒诺亚变成了棉布业大王。由于英国军舰实行封锁，棉花不能按时运到，利夏—勒诺亚就在那不勒斯平原从事棉花种植。

在同一时期，奥倍尔康夫创办的印染花布的作坊也有所改进。凡尔赛博物馆有一幅达维德的学生伊萨倍^①的画。我们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典型的场面：拿破仑在参观奥倍尔康夫的作坊时，从自己胸前取下荣誉军团勋章别在奥倍尔康夫的胸上。这足以说明这位皇帝是如何尊重大工场主。

战争促进了冶金业的发展。焦煤炼铁逐渐代替了木柴炼铁，虽然冶炼师傅还有点保守思想。旧日的流亡者查理·德·温德尔在莫尤弗尔和哈扬日两地的地位加强了。由于英国的封锁，法国不得不发展生产以资弥补，于是化学工业也渐露头角。

同时，英国的封锁使整个欧洲大陆变成法国资产阶级的广大市场。被拿破仑征服的各国成为当时人所说的“帝国的大陆殖民地”。毫无疑问，欧洲封锁在拿破仑来说是打击英国的一个武器，但同时也为扶植拿破仑上台的法国资产阶级带来许多好处。

^① 拿破仑一世的宫廷画师。——译者

“法國工業在國內有財政上的津貼，有政府定貨的支持。獎勵發明家的制度也有一種刺激作用。在國外則有歐洲市場為它打開大門。法國工業在各方面獲得便利，隨着帝國軍隊深入各同盟國，並且跟着在前面開辟道路的捐客，侵入了被征服的國家。”^①

* * *

拿破侖一方面扶助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却採取一系列措施以維持勞動人民於羈絆之下。

每一個工人都須領有身份証（一八〇三年十二月一日條例）。身份証上載明工人的姓名，出生的年月日及地點、面貌特征、受雇日期、解雇日期。雇主可以要求把身份証留在他手中。他在工人身份証上記明一切預支的工資，工人直到把所欠的債務償清後才能收回身份証。身份証上根本不載明僱傭工人時雇主答應給工人的工資數字。如此，工人如遇到減薪就毫無辦法來保衛自己，而且，我們必須着重指出那時候風行預支工資的習慣。這辦法就把工人牢牢地鎖在工場里。因為事實上工人是無法節省一些錢的，所以只要家裏有一個人生些小病就得借錢。東家預支給那些每天賺二十個蘇的工人的錢往往高達數百法郎。工人只有用錢或用勞動把債還清後才得離開雇主，於是工人就像被一條鏈子一樣鎖在工場里了。工人身份証條例第七條規定：凡工人預支了工資或約定了工作這一個時期內，不得要求收回其身份証而隨便離職，除非已經以勞動償清債務並完成其雇主所要求的義務。這是現代化的奴隸制！但是有人一定會說：工人償付債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不錯，可是要知道在這種政治制度之下，工人要不餓死就非舉債不可，這難道也是理所當然的嗎？一個工人如果出門不隨身攜帶由

^① 奧德特·維也奈：“拿破侖和法國工業”，第四〇頁。

雇主签字，並由市政府(实际上就是由警察局)签証的本人身份証。那末他就当作游民，可以被逮捕受到惩处(六个月以下的徒刑)^①。

一八〇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追認了列·霞白立条例，对工人聚众停工規定了極严厉的处罰。值得注意的是，雇主之間的联合也在禁止之列。但是雇主的联合只有为了“强制实行不公平的或荒謬的削減工資”，才受处分。至於工人之間的联合則不問理由如何都要受处分的。不仅如此，工人如果違反条例，他受的处分比雇主要严厉得多。这条法律后来又搬进了刑法(四一四、四一五、四一六各条)，甚至还变本加厉，因为第四一六条規定，因違法联合而受处罰的工人可能“在刑滿后处於警察監視之下兩年以上五年以下。”

一八〇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規定了“工人和雇主双方的义务”。它肯定合同是自由的，說得好像工人和雇主在經濟上是处於平等地位的。劳資合同訂立自由的虛伪性已在拿破侖立法时打下了基础。这项法律后来愈来愈坏，對於資方愈来愈有利。一八〇三年四月十二日的条例只監視工人履行合同，因为这一条例是以肯定雇主总是能履行諾言的为出發点。此外，民法第一七八一条的規定还使雇主得到对工人的优越地位：“關於工資定額，關於上年已付之工資及本年內預支之工資之爭執，悉以雇主的供詞为信讞”。

这一条法律不但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牺牲了社会的平等，而且也牺牲了公民的平等。一直要到一八六八年八月二日这一条例才被廢止。

^① 所追求的目的是显然易見的。夏柏泰大臣在他所写的書“法国工業”中說：“關於工人身份証的办法是明智的。它並不增加麻煩，給人不便。它使政府得以監視人数众多的公民阶级，为的是要把警務搞得更好。”

一八〇六年勞資調處委員會成立。這個機構擁有很大的權力。一八一〇年的法令又賦予這些調處委員會以初級刑事裁判權，對於學徒嚴重不尊敬師傅的行為、對徒手工人企圖在作坊里擾亂秩序和破壞紀律的行為，這種委員會有權處以徒刑。可是在這些調處委員會中，代表工人的只是作坊工頭，因此僱主才是委員會的主宰。

此外，一八〇四年二月十日，巴黎專為“被認為有此必要的某幾類工人”設立了勞動就業局。由警察局長任命勞動就業局的管理員，這些管理員就壟斷了介紹工人就業的事務。在這些階級性的法律以外，又從督政府繼承了而且比督政府時代更為嚴密的警察監視制度。一八〇五年的一項通令寫道：“警察是一種調節的力量。雖然到處都看不見它，但是到處都有它的影響。它在一個國家中所占的地位，一如宇宙內保持一切天體和諧運行的那種力量。我們往往只看到這種有条不紊的現象而感覺詭異，而不知道原因何在。”

預防性的逮捕是愈來愈多了。工人不經法庭審判，但憑行政措施就可以予以監禁。我們從下面一八〇四年的一項警察局關於建築工人的報告摘要中可以得到一個證明：

“幾天來，首都教堂建築工程僱用的工人中間發生了一種運動。這些工人要求把每一天的工資提高到十法郎^①，現在的工資規定是四個法郎一天。三個搗亂分子：郎勃洛、勃萊特及普琪已奉警察廳長之命予以逮捕，工地立即恢復了安寧。上述勃萊特及普琪兩人在比塞特爾監獄將禁閉到風月一日（共四天）。郎勃洛是煽動作亂的主犯擬監禁至霧月二十日（共五十一天）。”

^① 工人的要求似乎太高，但是讀者必須知道，這是警察寫的報告。

預防性逮捕已經变成家常便飯。罢工剛要發动,武装部队就調来了。一八〇二年九月,塔拉斯貢地方开始採葡萄釀酒的时候,就發生了这种情况。农业工人准备罢工,要求增加每天的工資。可是罢工尙未开始,地方駐軍已經出現了。翌年在亞尙城,警察包圍面包工人集会的屋子(他們在那里决定举行罢工),橫蛮地逮捕了七个工人。

某些情况还要严重。例如在康特城^①,市政厅根据大工場主利埃文·波文的請求,决定派遣“警官前往各紡紗工場,协同工場主开具細紗粗紗工人的名單,把他們的住处、姓名、年龄以及在进入紡棉工場前詳細的社会关系一一登記下来。”

这里所指的名單实际上就是波文所說的“煽动作乱分子”的黑名單。請看这位大工場場主何等傲慢地叫警察来保护他。

“聰明的領袖們拿出自己的財富来維持一大批人民的衣食,如果他們所养活的工人竟蔑視他們自己对雇主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爱戴,並否認这种神聖的关系,那末这些領袖們就應該享有很大的权力並得到周密的保护才对。”

一八〇八年,政府害怕营造木匠到如此程度,它竟禁止私人不經申报而雇佣工匠至兩天以上。它又借口“营造木匠所用的工具如落在坏人手里可以变成很危险的兇器”,命令工匠在他們工具上刻上特別的記号。

告密是以往就有的,可是現在更加制度化了。

有一位並不仇視拿破侖的历史家写道:

“巴黎社会上上下下都有並不体面的告密者暗藏在里面:上自名媛閨秀,她們開設沙龙来窃听或叫人窃听別人的談話;下至最

^① 在比利时,当时比利时是法国的省份。

下等的酒販，他們收集酒后談吐，甚至把酒店變成陷阱。”^①

為了在工人內部偵察情況，拿破侖和他的大臣們往往利用雅各賓派的叛徒如杜柏萊（綽號木腿子）之流。杜柏萊是羅伯斯庇爾的舊房東杜柏萊木匠的姪子。此人在瓦爾米戰役中給一顆砲彈打斷了右腿，因而獲得了愛國分子的稱號。後來他叛變雅各賓派，受傅息僱用為警察廳服務。警察廳長傅息本人也是雅各賓派的叛徒。從此以後，資產階級就不斷從工人運動的叛徒中僱用特務，甚至僱用他們的政府部長。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國家的警察活動起源於督政府和拿破侖時代，資產階級在一世紀半統治中，把這個傳統改進得愈來愈趨完善了。

* * *

工人階級儘管承受着這樣階級法律的壓制，但是依然設法把自己組織起來。加強這樣的法律，正說明了資產階級對工人活動的恐懼。

一八〇七年五月三十日的警察局報告^②指出：“建築工人的聯合和集會是最容易形成的，而又是最不容易解散的。原因是在同一個工作地點經常就集合着好幾個工人甚至一大批工人。只要有一個搗亂分子出個壞主意，立刻所有的人都會爭先恐後地附和他。”

這個警察的供辭至少說明已有這樣的現象，工人集中是對鬥爭有利的。為了逃避法律，工人的團體採用了慈善組織或互助會等形式，因此互助會愈來愈多。在開始時，政府是允許設立的，尤其是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原因是當時工人們對督政府深感絕望，而由於巴貝夫分子和最後幾個山嶽派的失敗又迷失了方向，因此

^① 路易·馬德林著：“傅息傳”，第一卷，第四八四頁。

^② G·伏迪埃在“帝國的巴黎工人”一文內公布了這個報告的全文，見“拿破侖研究”，一九一三年，第二卷，第四二六—四五〇頁。

对拿破侖並不採取敌对态度。一八〇三年格勒諾布尔出現了一个手套工人的团体，一八〇四年巴黎出現了一个梳麻工人团体和一个皮鞋匠团体。兩年之后，石匠、鞣皮工人、硝皮工人也都有了組織。一八〇八年，織布工人、呢絨工人、鎖匠等等紛紛組織起来。此外在巴黎，从一八〇五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間成立了十个排字工人团体，三个制帽工人团体；里昂有了三个絲織工人团体。波尔多、魯貝以及其他城市也有了同样的組織。这一运动普遍地展开，虽然沒有精确的統計，但可以想像在帝制时代，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个各行各業的互助互济会組織。这还不过是一个开端，一个非常謹慎的嘗試，但是已經可以表現出工人們互助团結的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受着行業和地区的限制，但也已經可以看出階級意識的萌芽。这些工人組織的章程上往往可以找到这样典型的措辞：“工人們到处受到排斥，需要彼此支持。”帮工組織的兄弟会制度仍旧存在着，因此，有些地方的工人分成了彼此对立的宗派，而有些地方却使他們一致起来斗争或者在困难中彼此支援。

在开头，政府只表示漠不关心，但很快就採取了猜忌和敌視的态度，而雇主方面也組織起来了。一八〇三年，营造包工、木匠泥水包工都有了組織，一八一〇年鋪路包工也組織起来了。

那时候已經發生了一些罢工活动，有的罢工居然取得了胜利，一八〇六年建筑工人的罢工，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次罢工起因於工作条件。原来一八〇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法令規定工作時間如下，每逢夏季（即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工作日从早晨六时开始，晚上七时下工，冬季（即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早晨七时开始到晚上天黑下工，除了上午十时到十一时的吃飯時間以外，再沒有任何休息。这就是說，工人在冬季必須从上午十一时以后不停地工作到天黑，再沒有吃点心的時間。罢工由十月六日开始，十

三日結束，工人們取得了勝利。此後，不論冬夏他們可以在兩點半到三點休息吃點心，但不得離開工地。這個勝利頗具典型性。那時候的罷工主要是為了反對工作時間太長，因為直到一八一〇年左右，工資還是不斷地在上升（當然生活費也在上漲）。這是由於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了工人數字的增長，而有許多男子都被迫去服了兵役。話雖如此，勞動人民的困苦却並未因而有所減輕。工資雖然在上升（這只能根據我們所能夠找到的某些比較正確的材料），但只不過對在業工人有利。因為勞動人民失業是週期地和工業發展聯繫着的。這裡建立了一些新工場，那邊就造成手工業沒落。而且，工人身份證制度又使許多工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法國在當時總有一大批乞丐和遊民即是一個證明。執政府和帝國政府對此只知道兩種對付辦法，一種是鎮壓，另外一種就是把遊民關到類似英國習藝所的乞丐收容所里去。被捕的乞丐送到那裡從事強迫勞動，而這種勞動條件是對僱傭者十分上算的。因此就有七十七所乞丐收容所成立了起來，這些收容所與其說是救濟院不如說是監獄^①。

* * *

一八一〇年，爆發了極嚴重的經濟危機。危機的最初征象早在一八一〇年年初就出現了。倒閉、破產事件接踵而至。成千成萬的工人失業，特別在紡織業方面尤為顯著。里昂有二萬五千男女工人失業，盧昂的各工場解雇了一半工人，城區和郊區約有一萬人需要救濟。愛斯納省有一半職工被解雇。諾曼第的萊格爾地方的

^① 愛米爾·勒瓦瑞在他的“法國工人階級史”一書中說：乞丐這癩瘡與工業發達並無連帶關係，這是自然產生的癩瘡，任何社會都不能避免的。但是他卻承認那些收容所是“監獄”，是“偷竊和墮落的學校”。（“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法國工人階級和工業史”，第一卷，第五二三—五二四頁。）

利夏—勒諾亞厂解雇了一半工人。冶金業由於制造軍火，危机較輕，但也不是沒有受到影响。巴黎失業工人达二万二千人以上，他們冲进工場要求工作和面包。另一方面，由於农業歉收、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小麦价格高漲，面包随着也漲价。帝国的稅收政策又加重了已感負担沉重的人民群眾。消費稅重新恢复：其中如酒稅早在一八〇四年就已經恢复（到一八一三年增加五倍），鹽稅在一八〇六年恢复，封建时代弄得天怒人怨的鹽稅又重新出現了。

政府到了这时候不得不下令設立平民施湯厂，並且無恥地宣称，每日兩頓湯就可以讓扛活的人活得不錯了。工業区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在巴黎近郊，馬队把刀劍拔出了鞘到处巡邏。

* * *

这个經濟危机是拿破侖垮台的決定性因素。拿破侖以前所备予优遇而且越来越优待的旧貴族代表人物，都在陰謀活动，甚至进行叛乱。事实是，以前不少保王党分子知道不能馬上就复辟，所以投降了拿破侖。拿破侖曾热忱地欢迎过他們，把他們引进了国务院，任他們为省長，讓他們加入軍隊。自从經濟危机爆發，俄罗斯战役失敗之后，許多附和分子日益离心。此外，誠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英国利用現代大工業的利潤，撥出了大批活动費，也大大助長了种种陰謀。这就是人們所称的聖乔治別动队。拿破侖政权愈来愈專橫，他們採取的統治形式使資產階級本身也頗感不安，甚至害怕旧政权的一切会卷土重来。恩格斯指出：

“我應該加上一句：他（指拿破侖）越統治下去，就越使人覺得他的結局一点也不冤枉。拿破侖最大的錯誤是与旧日反革命朝代联盟，娶了奧国皇帝的女兒。他一方面要扫除旧欧洲的一切痕跡，一方面却又想同旧欧洲妥协，而且一心要作欧洲君主中最大的君主。所以他便尽其可能要使他的朝廷与欧洲君主的朝廷一模一

样。”^①

俄罗斯战役之后是德国之战，接着是法国之战。法国边境被突破：蠶蒙、爱比那、郎格尔等城相繼投降。一八一三年十二月，拿破侖派他的元老院議員和国务院委員为欽差大臣出去巡查。其中有些人已在暗中背叛他，正如塞蒙維尔伯爵所承認的：“到了一八一四年三月中旬，除了害怕复兴（此处指：恢复旧政体）的人以外，誰都不再怀疑当时的政治危机的性質了。任何正派的公民都有責任尽力之所及来促成复兴。”

波尔多市長林希是帝国的伯爵，他开城投降了英国。

人民又起来積極参加保衛祖國的斗争。农民被占領軍的暴行所激怒，同时也为反对封建階級卷土重来，在香檳省和法国东部进行战斗。爱尔克曼—沙特里安在他所著的“侵略”中歌頌孚日山区游击队的英勇事蹟时說：

“敌人的部队不敢再在村庄里駐紮，他們命人把征發来的物資送到露营地……树林、森林边缘、湖畔河岸、僻靜的小徑都成为打埋伏的地方。”

三月二十九日晚上，盟軍已到达巴黎城下。工人們要求武器，当有人告訴他們武器已發給了士兵，他們就高呼“卖国”，前往参加在罗曼維尔、拉維萊特、貝勒維尔作战的軍隊。他們沒有武器，等着一有士兵倒下就檢起他的槍支来作战。当金融資本家貝雷哥的女婿馬尔蒙元帅告訴他們說停战协定已經签字，必須立刻停火，旧軍官們都提出抗議。夏斯德尔將軍不肯服从馬尔蒙的命令，得到士兵們的欢呼：

“停战！真是莫名其妙，讓我們的砲兵缺少砲彈，把不合口徑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一〇頁。

的砲彈發給我們，這難道還不夠嗎！現在我們還能作戰，却要我們撤退。這裡的情況大概同最近其他幾個戰役的戰場一樣，到處有人在叛國！”

這個全民族性的人民抵抗運動竟沒有一個人來加以領導。工人為數太少了，既沒有領袖又缺乏綱領。拿破侖害怕人民，正如勒費佛爾所說：“他所一手提拔出來的人都迫切地要求他保全社會，要他對可惡的賤民保持戒心。”

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皇帝遜位，二十八日離開法國前往厄兒巴島。

反革命勢力是勝利了。亞爾多亞伯爵（即後來的查理第十），然後是路易十八，都坐了外國軍車回到法國來恢復波旁王朝。封建貴族什麼也沒有學會，但也什麼沒有忘掉。他們氣焰十足，萬分傲慢，一心只想恢復他們過去的特權。僧侶們流亡後回國，同聲宣稱買過國有地產的農民都將打入地獄受苦。資產階級分子，除了曾在港口迎接^①的白旗航海業大老板外，現在莫不懷念拿破侖。有人已經在談論着要恢復行會制度。工業家都害怕英國工業的競爭。工人們深受失業痛苦。軍官則成千地被驅逐出軍隊，而由曾對法國本國作過戰的貴族分子來當高級軍官。拿破侖得悉這種不滿情緒，深知他必定會受歡迎，於是就由厄兒巴島回來了。

三月一日，他在讓灣登陸，在人民歡呼聲中到達里昂。阿爾卑斯山農民告訴他說：“貴族要把我們駕在犁輓上。你是我們的救星！”里昂的絲織工人舉行示威時高呼：“皇帝萬歲！波旁上斷頭台！打倒保王黨！”派去攻打拿破侖的軍隊一批接着一批倒戈相向，皇帝就在里昂宣佈一切由貴族收回的國有地產全部作廢（那時貴族已經進行了倒算）。三月二十日他到達巴黎。在大革命初期

^① 白旗是波旁王室的旗幟——譯者。

出現的聯邦運動又出現了。五月十四日，聖安東尼和聖馬爾索兩鎮的工人在土伊勒里宮列隊遊行，高呼“民族萬歲！自由萬歲！皇帝萬歲！”又高呼“打倒富人！打倒貴族！”的口號。當聯邦派義勇軍到達巴黎時，拿破侖曾親自檢閱。檢閱完畢在回來途中，他問跟隨他的國務部長巴沙諾公爵馬雷說：“你瞧，人民的心是向著我的。聖日爾曼鎮的人說什麼來著？”。馬雷回答說：“人家說你是賤民的皇帝。”拿破侖還是和在一八一四年時那樣，既不能夠也不願意做賤民的皇帝和雅各賓國王。他依舊是個資產階級的君主。他把保王黨一律留在原位，要求他一手提拔的警察廳長並且背叛過他的傳息來壓制“亂黨”和“恐怖分子”。拿破侖是永遠害怕工人的。有一年發生經濟恐慌，拿破侖曾召見參議官夏柏泰，對他說：

“工人沒有工作，就會被陰謀家隨意擺佈。我不怕同二十萬敵人打一場大仗，却怕那些因為沒有麵包而發生的暴動。”

於是拿破侖拒絕了人民的支援，敗耗也就接踵而至。保王黨在萬第掀起一個新戰爭。自由資產階級猶疑不決。歐洲宣佈拿破侖無權再受法律保護。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拿破侖在滑鐵盧打了敗仗。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寫信向英國人道賀說：“真是一個大喜的日子。”巴黎人民舉行示威（尤其是工人們）。泰爾萊在所著的“拿破侖傳”中寫道：

“那年夏季，除了定居巴黎的工人們以外，又有來自各省的幾萬工人：建造房屋和鋪修馬路的泥水匠、粗木工、細木匠、鎖匠、油漆匠、瓦匠、裱糊匠、土工等等。他們一到夏季就由鄉村到首都來做工。他們和農村的聯繫比巴黎的工人更加密切。所以，毫無疑問，他們對波旁王朝有著工人和農民的双重的痛恨，他們把拿破侖看成是波旁王朝失敗的保證。”^①

^① 泰爾萊：“拿破侖傳”，第四三八—四三九頁。

巴黎居民以工人們为首，抱着痛恨旧政权的心情来保卫拿破仑。

拿破仑於六月二十一日回到巴黎。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工人和手工業者在当布尔、聖安东尼、聖馬塞尔各鎮集合起来。一七九三——一七九四年的傳統又在他們的身上（而且只是在他們的身上）复活了。他們組織队伍举行遊行，走到土伊勒里王宮前面要求發給武器繼續战斗，同时高呼：“皇帝万岁！”拒絕呼喊“反对遜位”口号的貴族分子都遭到群众的痛毆。“处死卖国賊”“处死保王党”，拿破仑直到最后还是害怕巴黎各郊区的人民，再次拒絕进行斗争。他先讓位給他的兒子（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然后投降英国，英国人把他流放到聖海倫島。

至於大資產階級如上年一样又来一次叛变，他們宁願同封建階級妥协，他們宁願受外国侵略，却不願革命爆發。

馬德林，在他的全部历史著作中始終替大資產階級辯护，但对此点却也不得不承認：

“法国資產階級在这几个月中写下了最悲慘的一頁，虽然他的历史中有过那么些光彩的頁篇。”^①

巴黎市議會要求巴黎宣佈为不設防城市，也無非是为了階級的利益，巴黎資產階級对此甚至並不諱言。

交易所里公債市場的波动就足以标明資產階級的爱国精神。六月十八日，拿破仑兩天前在里尼打了胜仗的消息傳來时，公債利息跌了四法郎，滑鉄盧失敗后，上漲兩法郎，拿破仑遜位后又上漲兩法郎。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敌人离巴黎不到四十公里，又由五十七法郎一躍而至六十三法郎。等到普魯士軍隊攻打拉維萊特，又

^① 路易·馬德林：“大帝國的崩潰”，巴黎一九五〇年版，第三四一頁。

漲到六十四法郎。很明显，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金融資本家）是在投失敗的机。保王黨把敵人叫做“我們的敵人好朋友”每逢敵人打一次勝仗，公債就上漲一次。

如果說反革命勢力又取得了勝利，那是因為他們靠了外國的救援。一八一八年四月，約在滑鐵盧戰役後三年，沙皇的大使在給沙皇信中還寫着：“那些最熱烈的保王黨分子匍匐於惠靈頓公爵腳下，懇求他延長占領時期。”

* * *

從法國工人運動發展條件的角度來看，我們怎麼來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做一個總結呢？大革命把資本家，跟工人和農民一樣地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大革命和帝國給資本主義創造了發展的條件，尤其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〇年，資本主義發展得特別迅速。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之間，資本主義工業雖然確實有所發展（機器的使用亦是如此），但速度還很緩慢。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相當清楚地分為三個階段：從一七八九年到一八〇〇年，除了軍火工業以外，一般生產發展得很慢。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一二年，生產的發展比較顯著，超過一七八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五十，但一八一二年經濟危機發生後重又下降。由於戰爭和封鎖，商業資產階級失去許多重要市場，但是他們在另一方面取得商業交易的自由，這項自由一俟戰爭結束，他們即可加以運用的。同樣地，工業資產階級也取得了工業自由。作為一個階級來說，資產階級已取得了政權，這對它今后的發展說來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第五章

資產階級与貴族的妥協 和初期的工人斗争

(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

拿破侖政权的矛盾。——复辟：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对农村的統治和农村經濟。——生产力發展的速度。——机器和集中。——选举資格的限制。——工人生活：工資的下降和工作時間的延長。——一八一七年的經濟危机。——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空想社会主义：聖西門和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总結。——工人的斗争。——搗毀机器。——兄弟会組織的最高峰。——救济会和斗争組織。——罢工。——工人运动的性質。——貴族与大資產階級妥協的破裂。——一八二七年的經濟危机。——工人对經濟危机的后果进行斗争。——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銀行家掌握政权。

拿破侖政权由於不能克服本身的矛盾而告崩潰。对国内來說，拿破侖是由資產階級捧上台的，而資產階級一遇到困难就拋棄了他。对国外來說，他开始了封建制度的摧毀从而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到处出現了各式工業資本主义，而拿破侖則又企圖使这些工業資本主义服从於法国資本主义的利益^①。拿破侖的軍隊摧毀了封建割据，並於無意中喚醒了处在拿破侖專制制度压迫下的各国民族意識。

例如在德意志，拿破侖摧毀了日尔曼羅馬神聖帝国，取消了諸侯列国，並(至少在萊茵区)消除了封建剝削。俄罗斯人民却起来

^① 欧仁·泰尔莱在“欧陆封鎖和意大利王国”一書，及“拿破侖一世和法国經濟利益”一文中，曾經指出了在意大利發生的这种情况。

反對拿破侖的侵略，並進行了解放戰爭^①。

* * *

拿破侖失敗後，波旁王朝隨着路易十八回到法國，他們的政權在舊時貴族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兩者之間建立了一個協妥關係。毫無疑問，主要的是為了保持大革命和帝國所形成的經濟制度、社會和政治制度原封不動。他們知道，恢復封建制度和大地主的特權已經不復可能，也不可能再使君主專制政體復活，君主專制政體是以維持那些保證封建特權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為自己的生存條件的。

但是，貴族和大資產階級對下面兩個基本問題的看法卻是一致而可以彼此妥協的：其一，排斥人民群眾使其不得參加政治生活；其二，通過關稅政策，實施一種既能滿足大地主又能滿足一部分工場主的經濟政策。

就是在那種階級關係的基礎上，法國建立了所謂君主立憲政體，這種君主立憲政體一直維持到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這種妥協之所以能夠實現，那是因為復辟時期的法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這就說明了當時不僅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而且資產階級的力量也是很薄弱的。另一方面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法國的生產力雖然由於大地主的阻撓而發展得相當緩慢，它畢竟還是壯大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樣，上述妥協不免帶有脆弱性，因此一遇到一八二七年的經濟危機和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這種妥協即告破裂。然而，如果說那時候的無產階級還太軟弱，不足以作為推動歷史的力量，那末資本主義卻已經發展到使一

^① 蘇聯歷史家曾指出：一八一二年的民族戰爭是俄國民族史和世界史上一件突出的大事。這是俄羅斯人民為反對拿破侖軍隊侵略俄國並爭取民族解放的正義的戰爭……（科茹霍夫，同上文，第八七頁）。

方面出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这样的程度。

这也就说明了下文所提及的初期工人斗争的局限性和伟大性。这一时期的工人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马克思说：

“经济的诸关系首先把居民底群众改变成工人。资本底统治替这批群众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诸利害关系。所以这批群众已经是一个阶级在资本对面，不过还没有向自己本身。在……斗争里面，这批群众发现自己齐集在一起，把自己构成向自己本身的阶级。他们所拥护的诸利益成为阶级利益。而阶级对阶级底斗争是一个政治斗争。”^①

这也说明了复辟时期盛行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伟大性和局限性。

* * *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作用。不论根据那一种统计材料，当时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大是十分显著的事实。我们根据一八二六年的法国人口调查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三千一百八十五万居民中，倒有三分之二，即二千二百二十五万人是依靠种地为生的。

大土地所有制在当时起着极大的作用，它是大地主的力量基础，尽管在大革命时期，教会的产业已经收归国有，并且没收了一部分贵族的产业。但是在这一时期，有些政治亡命者的产业已经发还给原主，而且，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五日的法律又决定将旧时亡命者未曾公卖的一部分土地发还给他们。此外，在一八二五年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四九页。

極端保王黨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期，又頒布了一項“賠償流亡者十億法郎”的條例。因此，這些人在五年內領到了利息率三厘的年金三千萬法郎。這項賠償大大便利了舊貴族產權的恢復。在舍爾、梅恩—羅亞爾、萬第、下羅亞爾等省，舊貴族的產業依然占着統治地位，而在諾曼第等省資產階級的大地產則正在積極發展。

由於國有地產的拍賣，中等地主也有所加強了。這些富裕農民雖然在农村代表着社會中的保守力量，但是他們也害怕恢復舊政體，因為恢復舊政體就會恢復貴族和僧侶的特權和產業。

這些人之外有小土地所有者（因為，大地主和小農經濟往往是同時存在的）、自耕農、佃農和雇農。大革命使農民解除了土地上的封建義務，但是大革命也加速了農民階級的分化。事實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之間，農業技術進步極少。因為封建大地主所關心的並不是如何增加產量，而是希望從為他們利益服務的政府方面獲得一個有利於他們的關稅政策。

直到一八二二年才出現第一架打麥機器。這架打麥機是由蘇格蘭輸入的，打麥機在法國被採用得很慢。土地輪休制還繼續存在^①。人工牧場也沒有什麼發展。鄉間道路很壞而且很不够發達。地主所感興趣的是，保持小麥的最高價格。這個希望到了一八一九年和一八二一年由於實施所謂機動調整法而獲得了實現。根據這個辦法，不但對輸入小麥規定了關稅率，而且在國內小麥跌價時，還禁止輸入小麥。這樣，我們的鄉紳先生，不管是貴族或是資產階級分子，都保證可以高價出賣小麥。既然如此，何必還要辛辛苦苦去改進農業技術呢？這正是專為少數地主的利益服務的階級政策。總的說來，小農的境況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是每

^① 有一個時期，土地不上肥料，每隔兩年或三年，讓土地“休息”一年再行播種。

况愈下。

这种关税保护政策也是某些工场主所拥护的，这也就是复辟时期妥协政策的基础之一。地主阶级所得到的是关于小麦的法律，工场主所得到的则是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二年的法律。后面两项法律对外国输入的钢铁规定了很高的关税，同时禁止由印度输入绸纱、毛绒和丝。生活程度的高涨对大地主和这些工场主说来是無所谓的，有一个和“康特铅笔公司”有关系的工业家，亨勃洛—康特，曾寡廉鲜耻地说过：

“小麦价格高，可迫使工人更好、更快地工作。这能激发工人的技巧和热情，可以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从而便利于销售。”

在复辟时期，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是有着这样的默契的，这是当时政权的基础，这种情况明显到连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都坦然承认的。例如沙尔莱梯曾写道：

“右翼分子大部分是地主，他们最关心的事是增加土地的收入；左翼分子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扩大他们的营业数字。商人、工业家和地主一俟他们取得政权，即以全权授予他们代理人去夺取国内市场的垄断，保证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因此，两股敌对的政治势力就在抵制外国竞争的关税制度中找到了一个平等获利的保证，它们联合一致维护这种关税制度并加以发展，至于其他一切有关经济生活的問題，在他们看来都成为不相干的事了。”^①

誰也不能比他說得更透徹了。

* * *

正因为大资产阶级倾向于关税保护政策（至少起初几年是如

^① 沙尔莱梯：“复辟时期”，第二七二頁。

此)，所以一般地說，工業生產進步得很慢。當然，統計數字也曾指出若干工業部門曾有过比較顯著的發展。例如一八二五年開採的煤有一百五十萬噸，而一八一四年則只有一百萬噸。一八二八年，鐵的產量是二十二萬噸，而一八一八年則只有十一萬四千噸。原棉的消耗在一八二八年為三千萬公斤，比一八一二年的一千零五十萬公斤，增加了兩倍。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個特點即是進度的不平衡性。如果把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法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和同一時期英國工業發展的速度或者和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國工業發展來做一番比較，那末這一時期法國工業的發展顯然是很慢的。工業上採用機器是三心二意的。人們並不是不知道機器的好處。一八一九年博覽會評議委員會即曾指出：“採用機器已經如此普遍，沒有機器的工廠不久即無法與人競爭。”

可是，蒸汽機還是很稀少的。牟羅茲城的杜爾富斯—米埃格工廠早在一八一二年即有一架十四馬力的蒸汽機，但一八一九年，才換上一架馬力較大的、三十四馬力的蒸汽機。這架機器也是和原來的一架蒸汽機一樣從英國買來的。阿貝維爾城的望羅倍廠用了一架二十四馬力的蒸汽發動機，而盧昂城則到了一八一七年才出現四匹到八匹馬力的蒸汽機。聖奎丁城的二十九家紗廠中，有半數是用蒸汽為動力的。棉布工業中也不乏這類例子，特別在紡紗業方面無疑是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間最機械化的工業部門。然而，棉紡工業雖說是技術進步的前哨，但是舊式的操作法却依然存在著。人們還往往可以看到用牛力或馬力來轉動有齒輪的機器。用手紡車紡紗的方法也沒有完全消失。在達爾納塔城，三分之一的棉紗是手紡的。主要工具還是水力推動機，利用流水推動裝有葉子板的輪子。不用說，其他工業部門的機械化當然來得更慢了。一八二二年亞爾薩斯省才第一次試驗用機器織布。

上萊因省到了一八三〇年才有了二千架机器織布机而手力織布机則还有二万架之多。下塞納省的織布業到了一八二五年还是全靠人力。毛紡業中虽然已經出現了蒸汽机(特別在艾尔勃夫),但是毛織業却基本上还停留在农村副業状态,如在十八世紀一样專为批發商生产。艾尔勃夫城的大商家都向呢絨小生产者买进然后在全法国推銷。

在冶金業,总的說来,技术仍然相当原始。加泰隆煉鉄法^①还甚風行,因此仍处在一种手工業式的家庭工業状态。鉄是用低爐燒木炭来煉的。加强火力只用一个手拉風箱或者用水力轉动机。这样煉成的鉄塊在放大鏡下可以看出有許多沙眼渣子,还須用大錘子錘打。当时,煉鉄並不經過鑄生鉄的阶段。有时也用高爐来煉鉄,但是也不过用水力来推动風箱和錘子而已。这样煉出来的就是直接用来翻沙的鉄或者用来煉鋼的精鉄。用高爐煉鉄的工厂比加泰隆煉鉄場的規模要大些,成本也比較高,因为木柴的价格很貴。估計煉生鉄一吨需用木柴八十至一百二十法郎,如果用焦煤則只需三十至六十法郎。但是煉鉄工場的老板却並不关心这些,因为他們同时又是树林的主人,而且又有关稅保护政策在排除一切外国来的竞争。其实,这时候用焦煤煉鉄法早已出現了。起初只有克劳索厂(在罗亞尔省的特尔諾亞鎮)和福尔香博厂(在尼埃夫尔省)才例外地应用这种方法,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种方法需要的資本比較大得多,因为高爐爐身較大,風动力較强,最好是用蒸汽机来送風。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鋼的年产量还是有所进展,估計为五千五百吨,但是对法国的需要來說是很不够的。

阻碍工業發展的另一因素是交通不便^②。鉄路剛出現不久。

① 由矿砂直接熔成鉄,不經過鑄生鉄这一阶段的原始方式。——譯者

第一條從聖亞田到安德列濟安的鐵路是在一八二三年造成的。但是這些鐵路上使用的牽引力還是獸力，當時人們認為鐵路只能用於短距離的煤炭運輸。

採用機器的不平衡性造成了集中的不平衡性。因為集中是要以機械化為前提的。當時只要化上幾個法郎就可以置辦一個紡車，而一架人力織布機就需要百把法郎，一架機器織布機則需要千把法郎。更不用說，等到蒸汽機一出現，費用當然更大了。當然大企業當時也已經出現。但是像擁有二千四百個工人的福爾香博鋼鐵廠，亞爾台納省的各大呢絨廠和牟羅茲的大棉紡廠那樣規模的工廠卻還是罕見的。農村工業在日趨沒落中。諾曼第的一個極平常的小鎮如波爾培克變成了極為活躍的製造業中心。但是事實上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擁有幾名工人的手工作坊。因此，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工人總數是增加了，但仍未出現一個單一的工人階級。當時只有由於工業發展而從農村里吸引來的工廠無產者，另外就是作坊的幫工、手工業者，和人數比較少得多的農村工人。工業和商業的集中還很有限，小資產階級（小店主、商人、中等手工業者）的數量依然很大。

* * *

在這種情況下，政權自然屬於舊貴族和最富有的資產階級了。國王是他們的國王；第一個國王路易十八是最不願得罪大資產階級的一個國王；第二個國王查理第十從一八二四年起已成為極端保王黨的領袖，他傾向於舊貴族。憲法就是一八一四年的憲

② 機器雖然由英國輸入，但却是秘密輸入的。英國一心想保持它的先進地位。馬克思曾指出：“從一八二五年以後”“說到歐洲其他諸國則因英國在歐洲各國國內市場上以及在世界市場上進行了競爭鬥爭來對付歐洲其他各國，因此它們歐洲其他各國也採用了機器。”（馬克思給安涅可夫的一封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見“哲學的貧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九三頁。

章,根据这一宪章,国王攫取了全部行政权,而立法权则由他自己和他所任命的贵族院以及通过选举产生的众议院共同掌握。但是选举法则重新采用了极严格的根据纳税多寡而规定资格的选举制度。要当一个选举人必须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要当一个被选举人则需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那时候,牟罗兹城一个缫丝女工要赚三百法郎就得工作四百天。因此有选举资格的只是全国极少数的一部分居民。在一八二〇年,一千万纳税人和二千九百万居民中有选举权者只有九万六千人,而有被选资格者只有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在若干省份,有选举权者为数特别低微,如兰德省只有六百七十四人,下比利牛斯省只有三百二十一人,科西嘉岛只有三十人。不但工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而且全部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也不能参加政治生活。一八二〇年的“双重投票法”变本加厉地允许最富有的选举人可以投两次票,在区选举时投票一次,在省选举时又投票一次。每逢举行选举,内政部还施行种种压力和种种舞弊手法。候选人名单是伪造的,公务员在立即解除职务的威胁下必须选举“政府所介绍的优秀候选人”并须设法叫别人也投同样的票。新闻界受到严密的监视。若干极端保王党分子甚至咒骂印刷术的发明。例如有一个名叫沙拉培里的议员于一八二六年在众议院叫嚣道:

“报刊是放射火把和毒箭的强弩,报刊是新教和离经叛道的人民主权最最爱用的武器。先生们,慎防印刷术的灾祸吧,这是摩西唯一忘了用来遗祸于埃及的毒瘤。”

不管怎样,报纸售价是很贵的。在外省,报纸只卖给长期订户,而且价钱是如此昂贵,以致往往要好几个人才能合起来订一份。大学被压制到只能唯命是从。高级僧侣是有产阶级的忠僕,较诸拿破仑时代更进一步地成为精神上的宪兵。把皇冠和神坛在

理論上和實踐上如此粗暴地結合起來，這還是過去所未有的。沙多布利安在“論憲章下的君主政體”中說：“法國如果沒有保王黨，製造也得製造一個出來。”怎麼製造法呢？

“一個主教、一個軍隊司令官、一個省長、一個皇家檢察官、一個特別法庭的庭長、一個憲兵司令，再加上一個國民軍司令，只要這七個人都屬於上帝和國王，那末其餘的我都可以對付。”

* * *

所謂“其餘”，極大部分是指工人階級。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工人的生活越來越惡化，工資下降而勞動時間延長，生活費用則不斷上升。

一些老行業（如農業工人和建築工人）的工資^①雖然達到某一程度，但在正向機械化發展的工業如紡織工業和冶金工業中，工資反在下降。我們姑且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種情況。在已經很工業化的諾爾省，居民總數九十六萬二千人中，工人有二十二萬四千人，工資原來六法郎的跌為三法郎，原來三法郎的跌為一法郎半，女工工資原來一法郎二十五生丁的跌為六十生丁，原來兩法郎的跌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總而言之，工資降低一半。下塞納省約有十萬綿紡業工人，他們的工資一落千丈，他們的週薪（製造手帕工人）由原來二十法郎跌為六法郎，而原來掙六十法郎的則跌至九法郎。一八三〇年，里昂一個工人掙不到他在一八一〇年所掙工資的三分之一，也掙不到一八二四年工資的二分之一。紡織業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後果是男工的工資的下降。結果，工人們由於工資降低，不得不把妻兒送進工廠。這就是真正的惡性的循環，以至

^① 我們在这一章研究這個問題時利用了A·沙倍爾：“論一七八九——一八二〇年法國國民收入和經濟動態”巴黎一九四九年版（在上一章我們也利用了這一著作）。

亞尔薩斯省有一个工業家竟敢說，这是“工人对他們子女們丑惡的投机行为”。

工資虽然菲薄得吃不飽穿不暖，然而劳动時間却不断延長。这情况恰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所指出的一样。如所週知，馬克思区别了必要劳动時間和剩余劳动時間(或名之無酬劳动時間)。在必要劳动時間內，工人只收回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質的价值。在剩余劳动時間內，工人創造了剩余价值，讓資本家占为己有。这就是資本家对增加剩余劳动時間所以感到兴趣的原因。

“它侵夺了身体得以生長、發育和健全維持的時間。它偷去了消費新鮮空气和陽光所必要的時間。它侵蝕了飲食的時間，只要可能，便把这种時間，併入生产过程中，以致劳动者只是当作單純的生产資料。以食物給与他們，就像以炭添入蒸汽爐，以油脂注入机器一样。积聚、恢复和更新生命力所必要的酣睡，被还原为若干小时的無感觉状态。这几小时是已經完全消耗的身体組織的恢复所不可少的。”^①

技术上若干进步使資本家得以增加剩余劳动時間。开始普及的煤气灯使延長工作時間成为可能，尤其是冬季。水力推动机不能保証工作持續不断，逢到枯水时期它就要停頓，而沿河又佈滿了各种企業(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因为各种工業都在覓寻水力)，因此需要調整水力的利用。而有了蒸汽机，这一切就不成問題了。蒸汽机供給动力是無休無止的。因此可以無休無止地把工人拖在厂內。同时，蒸汽机的主人也就变为更加貪婪不足，因为劳动日愈延長，机器的折旧費就愈能迅速收回。相反地，一旦机器停止轉动，則陷於不生产的資本較諸利用水动力时自然要更大。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六頁。

“如果機器是增進勞動生產率，從而，縮短一種商品生產上必要的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它當作資本的擔負物，在直接為機器所征服的各種產業上，就還是超過一切自然限制，將勞動日延長的最有力的手段。”^①

失業情況雖然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但是這時候的資本家已在設法通過週期性失業，把脫離農村的農業勞動人民和在資本集中初期降為無產階級的手工業者組織成一支勞動後備軍。

在這同一時期，除衣着外，一般生活費用都在上漲，特別是食物方面的支出。據估計，一個工人家庭的伙食費用占總支出的最大部分，約為一家開支的百分之七十，而其中又以麵包所占的比重為最大。一個有三個孩子的家庭，麵包占一家開支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可是麵包價格却還在不斷上漲。一八一五年在巴黎，兩公斤麵包賣六十生丁，一八二〇年就漲到八十生丁。一個普通工人一天所掙的工資買兩公斤麵包都很勉強。

有一個諾爾省卡托城的居民寫信給當時宗教事務大臣弗雷西努主教說：

“法國現在有一項弊政，諒閣下尙未知悉，但必須予以補救。工場主的貪婪是沒有止境的，他們為了發財不惜犧牲工人。他們使工人在空氣惡濁的作坊里，春夏秋三季從早晨五點工作到晚上八點，有時到晚上十點，冬季則從早晨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他們把工人變成奴隸而還不滿足。那些可憐的人在星期天還不得不用一部分時間去做工。因此，他們離了床就進作坊，離了作坊就上床。許多工人到工作場所去要走上兩里到四里路。夏季，他們最遲早晨四點鐘就得起身。他們辛苦了一整天，最早要到晚上九點鐘才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四八七頁。

回得家。冬天的情况更坏，他們冒着严寒的天气，往往被雨雪打得浑身湿透，第二天衣服还没有干燥又得穿上身去。人們不能想像比这样还要困苦的奴隶生活。他們从来没有一点时间来料理私事，他們永远呼吸骯髒的空气，永远見不到太陽。在这些作坊里做工的兒童变得羸弱不堪，男子們缺少新鮮空气，身体也日漸衰弱下去……”

这封信最后轉到当时救济总署署長西里埃斯·德·馬林亞克那里，他的决定是“应毋庸議”。

在經濟恐慌时期，工人的生活情况更为严重。資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由於資本主义生产的無政府状态带来了經濟恐慌的。水災旱災等天災沉重地打击了农業生产，而交通運輸不良又阻碍食粮由这一地区运到那一地区。大地主則坚持关税保护政策使小麦价格抬得很高。这一切使經濟恐慌为禍更烈。在上述时期內，曾發生兩次經濟危机，一次是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一次是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每一次經濟恐慌都增加了失業人数，从而引起工資急剧下降。食物价格的飞漲更加剧了工人的困苦。

后面將要談到，从一八二八年到一八三二年的經濟恐慌，对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形成是起了什么样决定性作用。但自从第一次經濟恐慌，即一八一七年的經濟恐慌起，無产阶级的生活已經急剧恶化。失業的增加剛剛和工資下降及面包价格上涨，同时出現。一八一七年一月，里昂一万七千架織布机中只有六千到七千架开工，而且每週还要停工三四天。該省省長承認在五万工人中有一万七千人在慈善委员会登了記。一八一七年一月十日，埃佛安城警察局曾在报告中写道：“商業和工厂日益蕭条，工場主解雇工人，对留下的工人則削減工資三分之一。”

巴黎的工人把最后几件破爛衣服送进當舖。每天夜里，孤兒

院門口都扔着不少嬰孩。有一位行政長官無恥地對這樣的慘況竟然幸災樂禍，說貧困會使工人離開小酒店：

“窮苦的生活有利於消滅不良習慣。人類雖然受些苦，但是道德將受到良好的後果。”

慈善跳舞會，王室公主訪問“窮人”，舉辦平民施湯廠，這些就是資產階級能想出來為補救工人貧困的唯一辦法。一八一七年冬季，有一位高級官員宣稱經濟危機將於春天來到前結束。他說：“春天來到，希望也來了。春天是窮人們真正的食糧，如果它不能使窮人強壯起來，至少能支持他們活下去。”

創辦學校來教育工人子弟是一點也沒有做到過。這種需要只是到了很久以後，當工業發展到需要有文化的工人時，才感覺得到。這時候還沒有這種必要。保爾·拉法格曾說：

“富戈侯爵在一七九〇年制憲會議講壇上曾說過，做一個農夫，不需要會讀書寫字。”

拉法格又說：

“到了工業生產有此必要時，這才使資產階級換了另外一種的說法，但這並不是他們對人類有所熱愛，也不是對科學有所愛好，而是為了經濟利益，資產階級才鼓勵和發展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①

但是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還是富戈侯爵的思想。一八二一年，巴斯基葉大臣^②為微不足道的初等教育經費提案辯護時說：

① 保爾·拉法格：“社會主義與知識分子”，巴黎吉亞爾與布里埃一九〇〇年版 第一三頁。

② 勒伐塞：“一七八九——一八七〇年工人階級史”，巴黎一九〇三年版，第一卷，第六四九——六五八頁；參閱喬治·谷尼歐：“一八四八年的教育問題和佛魯法”，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一九四八年版，第三七頁。

“决不会有一个公营作坊的管事，一个聪明的农庄主人宁愿要一个目不識丁的工人而不要一个会写会念書的工人。”

巴斯基叶是比他的时代走得太快了一些，那时的資產階級还不需要有文化的工人。在目前还是把工人的子弟丢給教会学校的神父来管教罢。

有一个議員在那次辯論中說道：

“神父不但教孩子們讀書寫算，而且还教孩子們懂得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有些什么义务，他們給穷人的教育是很有用处的，因為他們使穷人知道今世受了苦，下世会得好报。”

事实上，一八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會規定每个乡都应该推行兒童教育。但是那时候的免費学校还是赶不上需要。在巴黎，只有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三名学生进了免費学校，即占五岁至十二岁的兒童五分之一。所以后来在一百名新兵中有五十八个文盲，就毫不足奇了。



在資產階級理論家看来，一切是好得無可再好了。至於政治上的彼此傾向稍有出入，哪有什么关系呢？效忠於波旁王朝的右翼資產階級和策划奧尔良王室登位的左翼資產階級，实际上都是一致的。翻閱一下德斯土·德·特拉西於一八二三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論”吧。在他看来，不平等是天造地設的。平等公約的唯一后果只是使人人一样的穷。当然 誰也不能否認世界上有的是穷人，而且穷人愈来愈穷，但是这是由於人口的增加。起初本来有足够的土地可以滿足大家的需要，但是人类在繁殖 因此在許多人說來，要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只有替拥有財富的人去效力。可是想掙工資的人也太多了，工資自必降低，而这点並不能阻止工人們“不識羞恥地生子育女”。“因此他們之間免不了有許多人衰弱多

病，甚至死亡。”十五年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正確地指出，資本主義是摧毀家庭的一種政制。

讓-巴地斯特·賽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教程”中（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所下的結論也是如此。他企圖在理論上證明總的經濟危機是不可能有的，因為人類的需要是沒有止境的。至於有時有經濟危機發生（賽本人也無法否認），那不過是局部的危機，是暫時發生的偶然事件。

其他的一些經濟學家，如西斯蒙第之流則陷入了絕望悲觀的境地。他看到了一八一七年和一八一八年的恐慌以及恐慌使“工場工人們遭受的慘痛生活”后，心中充滿了悲憤。他承認：

“我們幾乎可以說，現代社會是靠剝削無產階級、靠從無產階級身上剝奪一部分勞動而生存的。”

至於基本的補救辦法，西斯蒙第卻覺得茫無頭緒。他說：

“我承認，我雖然指出了，在我心目中，原則在哪里，公道在哪里，但是我絲毫不覺得我有力量找到實行的手段……對我說來，要設想出同我們經驗中已經認識的所有制完全不同的一種所有制，那幾乎是超乎人力之外的一件事。”

無產者已經注定要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而所得的工資正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賽所說的“不超過最低限度的活命所必需”。無產階級的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初期的理論家看來，不是一個自然法則便是天生命薄。人們只能以慈善事業來補救某些太說不過去的事情。話雖如此，但過分強調救濟也還是不甚合適的。賽厚着臉寫道：

“想像一個社會可以減輕一切不應有的苦難，固然是——一種溫暖的想法。不幸的是很難相信這樣的想法真正能夠成為事實。”



可是，經濟危机、生产的無政府状态、工人的貧困等情况已經激发起一种新的思潮，即大家所說的空想社会主义^①。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帝制时期和复辟时期产生的，但是还要等到后来才發生明显的影响，不过，为了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为了了解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我們却必須从它誕生的时候起就加以研究。这样，我們才能够在下文順利地說明法国工人运动曾受到它什么样的影响。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創造人是聖西門（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年）和傅立叶（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克勞德—昂利·德·聖西門^②伯爵和巴貝夫是同年生的，他同巴貝夫一样都是比卡第省人。但是他和巴貝夫有一点不同，即他出身於豪門大族。路易十四宮廷外史的著名作者就是他的族人。聖西門的一生是非常曲折的。他是百科全書派哲学家达蘭貝尔的学生（但是这点在可信可疑之間）。他十六岁当軍官，跟随拉法夷特將軍以志願軍身份前赴美国作战。法国大革命爆發的时候，他已經当了一年上校。实际上，他主要是負責出卖国有产业。后来他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捕，直至热月九日政变發生后才获得釋放。他的家产很快地被他揮霍干淨。后来只得靠朋友的接济和在当鋪里做抄写員維持生活，所以境况很苦。他的著作很多，最早的是一八〇三年的“一个日内瓦居民致同时代人的書信集”。最晚的是一八二五年的“新基督教义”。我們只从他的著作中总结出几个基本观点来談一談。这些基本观点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是屢次要出現的。首先是他的

^① 参閱罗歇·加洛第：“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法国源流”，巴黎昨天和今天出版社修訂第二版。我們在此只需，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中所占的地位就够了。

^② 茲向讀者推荐讓·多特里研究聖西門的著作，特别是讓·多特里：給“聖西門文选”所写的序言，“人民古典文选”，巴黎社会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

歷史觀。這是一個內容很豐富的觀念，因為根據這一觀念，各種不同的所有制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政治結構。他說：“歷史是一種社會物理學。”他強調生產問題，從而解決了十八世紀空想派特別關心的財富分配問題。在聖西門看來，社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財富的生產。因此，工業界變成了國家最重要的社會階層。當然，聖西門並沒有看到這個“工業界”是分成兩個對立階級的。他所指的工業界是：製造商、技術人員、農莊主、手工業者、工人、銀行家、商人的總體。工業界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因此，聖西門為他的一本小冊子題了這樣一個名字：“民族派或工業派與反民族派之比較”。他所指的反民族派就是游手好閒的人、貴族、宮廷寵臣之類。

許多人都知道聖西門著名的“寓言”。他說：

“假定法國突然失去五十個最優秀的物理學家、五十個最優秀的化學家、五十個最優秀的生理學家……五十個最優秀的機器工人……五十個最優秀的硝皮匠、五十個最優秀的染布工人、五十個最優秀的礦工等等……。這些人是法國最主要的生產者，他們所生產的是最重要的產品。他們所領導的是全國最有用工作。他們使科學、藝術和工藝為國家發生生產作用。他們是法國社會真正的花朵。他們是法國最有用的人。他們給予國家以最大的光榮，並且促進法國的文明和繁榮。如果沒有他們，整個民族就會變成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

讓我們再作一個比喻。假如法國保存了全國的科學、藝術和工藝方面的人才，而不幸在同一天內失去了國王的御弟、昂古里姆公爵、波旁公爵夫人等等，同時它又失去了皇家高級軍官，所有的國務大臣（不論掌管不掌管部務）國務參議官、所有的大法官、所有的大元帥等等，再加上一萬個最富有的、生活最貴族化的財主。

“这样不幸的事件一定会叫法国人伤心，因为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但是这些被誉为国家最重要的三万个人物，他们的损失之所以使法国人伤心，那不过纯然是感情上的事情，因为对国家说来并不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坏处。”^①

問題並不在消灭資本主义而是如何把資本主义組織起来，为此，必須：

一、进行反对以年金为生的寄生虫（貴族，地主）的斗争。

二、給予工業家以政权，由工業家以事务性的管理来代替对人的政治統治。

三、發展資本主义的集中，特别是工業和金融的集中。

因此在聖西門看来，最主要的是对貴族地主进行斗争。在他著書的时候，資產階級和貴族之間的决斗还没有結束。無产階級在数量上和政治上都很薄弱，还不足以被聖西門看成历史的槓桿。資本家和無产者之間的矛盾在他看来是次要的事情。归根到底，聖西門對於雇主和工人关系的看法，比家長制思想並不高明多少。

可是他也有他的功劳，因为他指出了社会真正的目的是創造社会的幸福，就是說劳动者命运的改善。恩格斯曾指出：

“聖西門所特別着重的乃是这点：他無論何时何处首先关心於‘人数最多並最貧穷的階級的命运’。”^②

聖西門是个空想家。虽然他已經概括地批判了資本主义，但是他並沒有揭露資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他沒有揭露后来馬克思所發現的，劳动方式已經社会化和生产資料仍是私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他也沒有揭露，新生的無产階級是具有克服資本主义的矛盾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当然是不能作为無

① “寓言”全文，見“聖西門文选”，第一〇八——一一四頁。

②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〇頁。

產階級利益的代表。

馬克思指出 聖西門除以“新基督教義”確實為工人階級做過辯護外，聖西門“以前的著作不外乎歌頌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社會或是歌頌工業家和銀行家來反對拿破侖的元帥和立法者”。

因此，聖西門不得不退步到指望一個統治階級的領袖人物：如拿破侖、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路易十八或神聖同盟的倡議人來贊成他的學說。聖西門的影響是在後來才顯著起來的。我們還要到一八三〇年以後才重新看到他的影響。

傅立叶^①也是背叛了他原來的階級的一個人。以他的家庭出身而言，他屬於富裕商人的家庭，他本人雖然極力想逃避他的周圍環境，但仍不得不靠商業為生，可是他只是一個領工資的商業推銷員。所以在傅立叶身上有着兩重人格：一方面是為平凡的工作而奔走的勤懇的高等職員，另一方面則是確信自己掌握了人類幸福之鑰的空想主義者。他死於一八三七年，後於聖西門十二年。他曾目擊一八二七年的經濟恐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暴露無遺。他也曾眼見初期的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衝突。傅立叶和聖西門一樣，在他看來，社會是不斷地在運動中的。

“任何社會在它本身內即具有孕育下一個社會的能力。當這個社會達到它本身主要特徵的高峰時，它也就達到了分娩的陣痛時期。”

傅立叶思想的可取之處首先在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會造成一個本末顛倒的社會，他稱之為“工業的無政府狀態”。他寫道：

“誰曾見過比文明社會^② 更適合於‘顛倒世界’這一稱號的社

① 阿爾曼和牟伯郎：“傅立叶”（兩卷集），巴黎國際社會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

② 文明社會是傅立叶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制度。

会制度，不管这个社会是朝着什么方向組織成的。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它已更变行政制度二十次之多，但是这个柏洛泰神^① 尽管变了二十个身形，結果依然代表着正义和理性的反面。一小撮遊手好閒之徒嘲笑着被迫从事报酬菲薄的劳动的大多数人。这些大多数人与幸福是無緣的。七个不幸的家庭为一个享受幸福的家庭而劳动。那种压迫政策历来就不得不武装一小批雇用的奴隶来压制一大批沒有武装的奴隶。各国政府老是联合起来阻碍光明的来临。”

傅立叶也並沒有比聖西門走得更远一步，他也沒有找到这种無政府状态的根源。他認為無政府状态的根源在於产业分裂过細，因而阻碍了生产的發展，其次是社会的寄生虫風气。正因为这样，一切都不对头了：生产方面不对头是由於产业分裂过細而造成的浪費；消費方面不对头是由於真正的生产者即劳动者消費少而寄生虫消費过多；分配方面不对头是由於貧富分別聚集於社会的兩極；流通之所以不对头是由於中間人越来越多。

既然如此，那末这样的制度又怎样能維持下去的呢？一方面，这是靠了掌握在唯利是圖的金融貴族手中的国家权力，另一面是依靠叫穷人“自我牺牲”的虛伪的道德观念。

但是如同聖西門一样，傅立叶仍是一个空想家。他的幻想是在资本主义無政府状态中，像沙漠里的綠洲似的建立一种“合作社”。这种綠洲即是“法郎克”（共同生活的合作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把几十戶人家聚集在一起。每一个人根据他个人的兴趣，选择一項工作。傅立叶深信，这种办法將在初次試驗后不久，就会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信徒。於是“法郎克”將日益增多，密佈

^① 柏洛泰是海神，他有先知之明，但是不肯解答問題。他善於变化身形。——譯者

於全世界。因此問題只在於創辦第一批“法郎克”，只在於籌集第一批“法郎克”的資金。傅立叶同聖西門一樣，他也和在朝大臣們打過許多交道。他前後向拿破侖、路易十八、路易一菲力普的大臣們呼吁。但在屢次失望後，他就只能希望有一位豪富的義士拿出錢來供給第一批必要的資金一千万法郎。他宣布每天中午在家等候慷慨之士送錢來讓他來幫助人類走向“合作制”階段。他每天中午趕回家去，可是徒然望穿秋水，始終沒有人來敲門。至於原因，那还用說！

從這件空洞渺茫而轟動一時的事業中，我們也可以得出一些積極的意義來。這里面雖然充滿了怪誕的幻想，但也非常現實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

第一、傅立叶明確了十八世紀遺傳下來的進步思想。這種進步，其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由科學和技術上的發明，以及隨之在生活資料生產中所發生的變化來決定的。恩格斯寫道：

“傅立叶的偉大最顯著地表現在他的社會歷史觀上面。他把社會歷史全部發展已往的歷程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蒙昧、野蠻、宗法和文明——後者在他那裏和現在所謂市民社會相吻合的，〔也就是和從十六世紀以來發展着的社會秩序相吻合的；〕他指明：‘文明階段怎樣使野蠻階段的每一個以簡單形式來實行的罪惡，採取了複雜的曖昧的兩面的虛偽的生存形式。’他指出：文明是運行於不能克服的經常復生的矛盾之‘罪惡的循環’中，文明所達到的結果永遠是和它原來所誠意期望或假意期望的相反的；例如，在‘文明階段，貧困就是富裕本身所產生的’。”^①

第二、傅立叶指出，社會的混亂不是由於人，而是由於社會制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二七二頁。

度本身所產生的。他寫道：“文明的工業只能創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創造幸福本身。”

第三、傅立葉宣佈男女平等。

“在每一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這個思想第一個是屬於他的。”^①

第四、傅立葉建立了一個新的勞動觀點。他最先揭露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特點的強迫勞動。

“道德叫我們愛好勞動。而實際上，這是一個既含有嘲諷又是很可笑的勸告。讓道德來把工作給予要求工作的人吧，讓道德來把勞動變成愉快的事吧。因為工資的菲薄、失業的憂慮、老板們的不公道、作坊里的淒涼氣氛、勞動時間的過長以及工作的單調都是文明社會的恥辱。”

相反的，在“法郎克”里面，勞動不再是苦事而成為一種樂趣，每個人意識到他的勞動將給大家帶來幸福，每一個人都是為了大家而勞動。

聖西門和傅立葉兩人都是法國的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在這里並不想為他們的思想畫出一個輪廓來，我們只想說明他們的出現的原因，他們的偉大性和局限性。如果想獲得一個完整的結論，如果想從工人運動發展的觀點上來判斷空想社會主義的價值，讀者可以參考恩格斯的經典著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我們在前面已引用了最主要的幾段。空想家出現在那樣一個時期，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還不很發達，從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還不很尖銳的時期。

“無產階級……表現出只是一種受苦的被壓迫的等級，由於

^① 恩格斯：“反社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一頁。

它無力幫助自己，所以對於它的幫助只能來自外面——來自上面。”^①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雖然已經相當發展，發展到生產的“不正常性”已經相當明顯，而工人的窮苦已經無法掩蓋，但是它還沒有發展到使無產階級可以作為一個能夠改變歷史的階級的地步。

這正是早在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他駁斥蒲魯東的名著“哲學的貧困”一書中所指出的：

“當無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把自己建立成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進行的鬥爭還不帶任何政治的性格，當諸生產力在資產階級本身底胎中還沒有充分發展起來讓人家看見那些對無產階級底解放並對一個新社會底建設所必需的物質的諸條件，在這些時限內那些理論家們（指無產階級的理論家——引用者）只是空想家們而已，他們想應付被壓迫的諸階級底種種需要而臨時想出一些體系並追求一個革新的科學。”^②

從此以後，空想社會主義就以不顧已有的諸階級的存在而企圖創造一個未來社會制度的姿態出現了。聖西門和傅立葉都相信，有可能把資產階級分子從他們所屬的階級中分離出來，有可能僅憑理性的力量來說服他們，使他們信仰他們自己的優良制度。

簡言之，恩格斯已下過這樣的結論：

“烏托主義者之所以為烏托主義者，正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尚是如此薄弱的時代，他們不能成別個樣子。他們不得不從他們頭腦中編造出新社會的因素來，因為這些因素，在舊社會本身中還沒有顯露到能為大家所看清的地步，他們在擬制了自己新建築計劃後之所以不得不限於向理性求助，正因為他們那時還不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第二六八頁。

②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一七八頁。

能求助於他們同時代的历史。”^①

但是一百五十年已經过去了，这样的时代已一去而不复返。恩格斯早在一八七八年即已指出这点，他所說的話是值得記住的，因为从一八七八年到今天，社会就是照着恩格斯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恩格斯写道：

“可是自此以来，大工業已把那些蟄伏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發展成这样强烈的对抗，使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潰，可說是可以用手去觸覺到了。只有採用新的同生产力的現在發展現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才能保存和往前發展；这种对立，發展到了如此的程度，使得現存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並且由它（即生产方式。——譯者）在日益尖銳的对立中經常再生产出来的那兩個階級之間的斗争，普遍於所有文明国度，並日益劇烈起来。所以現在已能理解到这些历史的相互联系，理解到由於这种互相联系而成为必然的那种社会改革的条件，並且也已理解到这种改革的基本特征。”^②

恩格斯这个分析不用說到了今日更显得十分正确，不惟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迫近的毀灭，已“用手可以觸到”，而且这种生产方式实际上已在世界大部分土地上毀灭了。

因此，复活空想主义的企圖在今天說来已是具有十分反动的性質，而且是直接和工人运动的利益背道而馳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那些企圖制造一种二十世紀的聖西門主义的人所处的境况。例如急进党人布格萊曾於一九二五年把聖西門称为“国际联盟之父”，說是由於国际联盟的存在，帝国主义之間的竞争就会消失。一切新合作主义者發揮“劳資联合”的論調，（由米勒蘭到貝当直至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二七八頁。

^② 同上書，第二七八——二七九頁。

戴高樂)都是借用了聖西門的學說,但是聖西門的學說僅是在他那時代才是進步的。只有把他的學說放到他的時代里去,而且也只有這樣做才能了解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意義。正如列寧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來源的著作中所指出,空想社會主義是不能給人指出一條真正道路的:

“它既不會闡明資本主義僱傭奴隸制度底本質,也不會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底發展規律,也不會找到能夠成為新社會創造者的社會力量。”^①

然而,空想社會主義終究是勞動人民受壓迫的“反映”,反對壓迫勞動人民的抗議。今天,空想主義(在本書中可以看到,可以成為空想主義者的方式是很多的)只會使本應引導工人階級走向解放的工人運動迷失路途。

總之,空想主義者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看到新生的工人階級一定會壯大起來。因此,他們不能投身於工人階級的鬥爭中。他們對無產階級的苦痛是敏感的,但是他們卻不相信無產階級能夠組織起來,能夠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正是這個原因使他們對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和政治鬥爭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 * *

可是,儘管有那些我們在前面所講的阻礙而正因為有這些阻礙,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却無可爭辯地發生了工人階級起來鬥爭^②,他們力圖組織起來。工人們不甘心接受強加諸於他們身上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學說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兩者不能結合一起,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徵。這些理論家和工人階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七三頁。

^② 參閱 G 和 H·布爾金:“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法國工業制度”;于爾根·庫爾斯基:“一七〇〇年至目前法國工人狀況史”(德文版),柏林一九四九年版。

級的斗争既然沒有接触，所以就只能做个空想家和想入非非的人。而工人阶级缺乏理論，也就不能把他們所英勇地进行的战斗引向胜利。但是工人阶级还是进行了战斗。这是他們开步走的第一步。

工人阶级繼續迁怒於机器，他們認為机器的应用是失業和貧困的根源。

“他們施行的打击不仅是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而且是反对生产工具本身，他們破坏那些竞争的舶来品，搗毀机器，放火焚燒工厂，他們企圖用强力来恢复那已經失去了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①

这就是所謂魯德主义，其名称来源是因为有一个英国工人名叫納德·魯德。他在十八世紀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搗毀了織布机，后来成千上万工人就照他的榜样行动起来。同样事件也發生在法国。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工人們抗議採用机器，而且有时候还采取了实际行动。一八一九年，工人們听说依塞尔省維也納城有兩家工場要採用一架剪絨毛的机器，大为不安。剪毛师傅發表宣言說，这机器

“是件邪惡的工具，它能在十二小时內，剪、整、刷一千尺（按：法国老尺合現在的一公尺一八八）呢絨，而且只要四个人就可以管理。这样势必使一大批工人失業。”

虽然有这样的抗議，机器还是在宪兵护送下从里昂运到当地。工人們襲击押运人員企圖打毀机器。武装力量进行干涉。工人們被逮捕，但給格勒諾布尔法院釋放了。搗毀机器的事件到处都在發生：洛台佛、亞蘭桑、格萊蒙—萊洛等地都發生同样的事件。

工人們的反应是暴烈的，但是很可理解，對他們說來机器是他

^① “共产党宣言”。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第一六一—一七頁。

們的敵人，因為在他們看來，他們自己是不可能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人，即機器的主人的。

“工人要能分別機器與機器之資本主義的使用，從而，不以物質生產資料自身而以物質生產資料之社會的剝削形態為攻擊目標，是還要有相當的時日和經驗的。”^①

* * *

幫工組織的兄弟會又有了新的發展。無疑的，門戶之見仍繼續存在。宗派不同的幫工重又發生了械鬥：例如一八一六年在呂納爾，一八一九年在里昂，一八二五年在南特和波爾多，一八二七年在勃洛亞等地。然而有若干事實終究說明了工人階級起了變化。首先是对門戶之見本身的反應，這種反應來自受到兄弟會嚴密等級的壓制的青年工人。因此波爾多的“候補”木匠和鎖匠分裂出來自行組織了新團體。此外，即在兄弟會組織內部也出現一種趨向，即加強或創造全國性的聯繫，這是工人階級全國性的團結的初步象徵。一八二〇年十一月波多爾舉行各兄弟會代表大會，大會集合了許多大城市的代表。我們從巴黎的確皮匠和皮帶匠寄給大會的意見書中，已可以看到工人階級中間已萌芽了團結統一的意志：

“我們熱烈地表示願意和你們一起來當面解決這個主要問題（指終止各幫工組織之間的糾紛——引用者），而且對這個企待已久的偉大事業竭盡綿力。我們這種內心要求迫使我們決定向你們提出本意見書以表示我們的願望並且說明我們如何殷切希望各行業之間普遍地能獲得和解，恢復社會的協調並使我們之間充滿着協調氣氛，這是使我們在对付我們共同敵人的時候，被人尊重和發生力量的唯一辦法。”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二一頁。

事实上，波多尔大会並沒有达成任何協議，特別在各主要的行業內部如制帽匠、石匠、木匠、硝皮匠等。不論如何，工人运动史还是應該記住这个第一次爭取統一所作出的努力，即使这些努力並沒有立即获得效果。政府当局对此倒並不胡塗，警察当局已經害怕起来。他們感觉到有許多工人的秘密活动沒有弄清楚。有一份一八二五年九月十五日的警察局报告曾这样辛酸地說：

“号称为負責帮工的一些工人們彼此傳遞消息非常迅速，而这些团体对个别的工人有着絕对的权威，可以使他們一听到号召立即放棄工作，不顧他們的利益和关系，跋涉數百里，花許多盤纏，去支持別的負責帮工，对地方当局严禁集会的命令毫不在乎……这种情况依我看来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帮工团体可能在表面上並不違背政府禁止集会的禁令情况下，获致危险的協議，从而損害到社会秩序和公私利益……”

同时，受到政府支持的資本家則用尽一切計謀要使工人們彼此对立起来。工人中間往往發生械斗。这也是必然的，但这些械斗大部分是資本家所挑起的。例如一八二四年，巴黎的营造工人同新来巴黎的工人發生了械斗，这是因为包工头从外省招来了肯於接受較低工資的工人。一八二五年九月，土尔奈斯發生的混乱也是如此，石匠要求增加工資，資方就招来一批屬於另一系統的兄弟会的工人来对付他們，因此發生毆打和械斗。各省当局对帮工組織的兄弟会採用的态度是兩面手法，当兄弟会能起分裂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容忍，当它能起团結工人的作用时就加以鎮压。

虽然如此，这終究是兄弟会組織的最后一个掙扎，它不久即迅速衰落了，因为它已不能适应經濟生活的新条件，不能适应这些新的条件在工人中間所引起的願望。

可是，当时又出現了另外一些組織，首先是救济会，而这些組

織往往是變成了鬥爭組織。它們是從當時工人極端貧困的生活中產生的。這種貧困現象不能不使資產階級擔心，怕出亂子。有人想恢復慈善作坊並設立勞動習藝所來收容乞丐。救濟金庫也創辦了起來，一八一七年為里維德基愛區礦工所設立的救濟金庫即是一個例子^①。金庫救濟金的來源，一方面是樂意認捐，另一方面則由採礦公司按每百公升煤繳納零點零一法郎、而礦場的業主則在所收地租中按每百公升煤繳納零點零二法郎。但是金庫的管理人總以為工人們應該“永遠停留在某種程度的附屬地位上”，“他們與金庫的管理機構的關係應該和家庭中的兒子對父親一樣”。這是何等值得驚嘆的家長思想！可是，當慈父的還不是有什麼約束性的。路礦局局長提到里維德基愛區救濟金庫時寫道：“對於採礦商和礦產業主而言，強迫他們放棄一部分生產所得，無疑是損害他們的所有權。”

換言之，資本家是想用這種辦法來獲得廉價的保險，以防止工人們由於貧窮而起來反抗。為了同樣理由，資本家也鼓勵發展工人自己創辦的互助會。讓工人們互相幫助去吧，讓他們把菲薄的收入放在一起使用吧，讓他們生病時自己幫助自己吧。這樣一來，我們資本家就可以不必害怕暴動，可以繼續支付低微的工資而獵取巨額的剩餘價值！巴黎慈善協會里的那些“慈善家”就是如此盤算的。他們說：“必須強迫工場主、包工頭、工廠主幫助他們所雇用的職工成立救濟會，並且由東家來控制這些救濟會，主持會議，不時向救濟會送些小額的款子。”

人們就是用“不時”送些“小款子”給救濟會作基金（主要來源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工人們分担的），這樣的辦法來摧毀“那些

^① 礦工參加里維德基愛救濟金庫的“管理”是沒有表決權的。——譯者

手工業者耽有害於他們身心的各種可惡的習慣”。

那些慈善家又說：“大家害怕工人聯合，但是參加救濟會的工人究竟不像獨立生活、無規律、無原則的個人那樣可怕。”

所以互助性質的團體是允許存在的，列·霞白立條例也不適用於互助會，然而准許與否則要看官方高興，手續方面則還是遵循着拿破侖政府所定的手續。警察局首先調查創辦人的身份和他們的目的（包括他們本人所公開宣布的以及別人猜想的），同時明確規定，基金只能用於幫助病、老、殘、弱的人。每次召開大會須獲得許可，並須由警官或市長主持，這些人物並且可以參事會會議。由於害怕屬於同一行業的工人結成同一個團體，警察當局往往規定各行業須混雜組織。

凡涉及政治和普遍性利益的討論概予禁止。

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警察局的報告這樣寫着：

“每個星期，一般情況是在星期日，那些旨在救濟貧困會員的工人團體的理事會和委員會，在指定地點舉行會議，由本街坊的警察局長到場監視。他們討論他們本身的利益以及如何運用他們的基金等問題。這些會議的秩序和所表現的情緒 據報告都是令人滿意的。送來審查的章程，以及警官們嚴格督促他們履行章程內有關紀律的條款，使他們不得不僅限於處理該會本身的事務和以慈善為宗旨的事業。這些會議如果領導得好，監督得好，可以做出許多好事，並在平民階級中恢復良好的風氣。”

這是家長式的互助會的開端，資產階級往往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實行這樣的互助政策，以便維持低工資並削弱工人的反抗（在這部工人運動史中，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這種例子）。

的確，工人們大批地創辦了互助團體救濟團體。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十八世紀末葉創辦起來的，但大部分則創辦在大革命時

期和帝制時期。最初是由工資較高的熟練工人創辦的，後來在徒手工人中間也出現了這些組織。例如一七九一年成立了巴黎碼頭卸鐵工人的救濟會，一七九五年成立了盧維埃島工地工人的救濟會，一七九六年成立了菜市搬運工人的慈善金庫等。

一八一五年和一八三〇年之間，這個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大部分行業都有了互助組織：如首飾匠、鞋匠、鋪焊鐵皮鉛管工人、木工、石匠等等。一八二一年，巴黎計有一百三十八個組織，會員達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三人，一八二六年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個組織，會員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二人。外省也有很多這類的組織：例如諾爾省有一百十三個，會員七千六百六十七人。這些團體每個團體的會員數字都是極為有限的，在巴黎，只有五個團體的會員總數達到二百人，而二千六百二十一個參加互助會的印刷工人卻分屬於三十個組織。

這些組織的活動雖然只限於互助工作，但是對於工人接受組織觀念還是很有幫助的。只說定期繳納會費，開會，選舉收款人等活動也有助於他們接受組織觀念。

但是，主要的還是，儘管資本家和警察當局採取種種預防措施，工人互助組織還是很快地擔負起戰鬥性任務。到了這時候，資產階級慈善家的本相就暴露出來了。工人們如果利用這些組織來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事實上工人們確是這樣做的），那就活該遭殃，例如一八二六年巴黎鋪路工人就是如此。他們本來只想創辦一個慈善團體，但其中有些工人卻曾企圖“引導他們伙伴拒絕替他們老板工作，如果老板不同意增加他們的工資”。

於是警察當局就下令禁止集會。

巴黎慈善協會報告員說：“如果有人竟敢在已成立的團體內提出違反公共秩序的建議，警察當局應立即解散這個團體。”

馬賽的面包工人又給了我們另外一個例子。由於他們舉行過好幾次罷工，當一八二五年他們請求准許成立一個救濟會以幫助患病工人時，警察局長就加以拒絕。內政大臣得報後表揚警察局長說：“對那些互助互濟的意圖應多加小心。我們的經驗日益證明其危險性。”

事實上，這些手段並不能阻止工人們為改善生活而進行鬥爭。一八一七年，里昂制帽工人的工價受到了減削，他們利用救濟會里的“公共金庫”舉行罷工，結果提高了工價。雖然如此，罷工工人還是受着殘酷的鎮壓。一八二一年，巴黎有六十個硝皮匠因為犯了結社罪而被判處徒刑，領導人被判兩年徒刑，其餘的人則關了一個月監牢。一八二二年，有許多泥水匠和木匠也被判處徒刑。

我們這裡只提到司法上的鎮壓，此外還得加上來自資本家的形形式式的壓迫，例如彼利厄家族所經營的安辛煤礦就是如此，真所謂：

“……維齊爾的彼利厄一家，
把賬櫃一直設到安辛的地獄里。”^①

工人們如要脫離煤礦，必須在三個月前就通知公司，而在這三個月裡面，工人們不許到別處去工作，而公司則可以對他們不負任何責任。三個月的奴役或是三個月的飢寒隨你選擇。

若列斯為了這件事情曾寫道：

“他們就這樣為了防止奴隸逃跑，造成一種三個月的沙漠地帶，在這期間，他們或則餓死，或則回去重當奴隸永遠受飢寒和絕望的熬煎。”^②

^① 詩人巴爾戴萊米（一七九六——一八六七年）的詩句。他辦過一份專載諷刺詩的報紙，名叫“內美齊斯”。內美齊斯是希臘復仇之神。——譯者

^② 法國政治家若列斯（一八五九——一九一四年）為謝洛—里查爾所寫的辯護辭（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五日）。謝洛—里查爾被控侮辱法國總統卡西米爾—彼利厄而受審判。

最典型的一次罢工是下塞纳省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厂主勒伐伐塞是个出名貪婪橫暴的人。一八二四年八月六日他决定把原来工人吃饭时间减少半小时，因此引起罢工。八百名工人参加罢工並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厂主在宪兵保护下逃到盧昂。这次罢工似乎不是完全自發的，工人不但有組織，而且也許拥有一笔款項来支援失去工作的工人。宪兵出头干涉，又获得国王近衛軍一营兵力的帮助，工人们英勇地以石块、木棍和鉄叉进行战斗。据宪兵的报告說，有一个宪兵被打死，另有若干人受了伤。这份报告沒有提到工人方面的伤亡，但报告肯定說“这些暴徒也沒有占到便宜”。这已經足够說明一切。政府逮捕了大批工人，罢工工人盧斯特被判处死刑，三个工人判处苦役，十四个工人坐牢。盧斯特的上訴被駁斥，因为下塞纳省的省長宣称：

“依我看来，为了維持工業的利益和公共治安起見，严刑处罰，杀一儆百是必要的。”

死刑在一八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执行，但事前並未宣布日期，因为据省長自己供認“害怕工人们如他們已經表示过的要到盧昂去”。

虽然統計和資料不够全面，但是我們还是能够看得出，在一八一八—一八二四年經濟恐慌时期結社虽然已經風行，但自从一八二四年起，結社是更趋熾盛了。有一份警察局的报告竟称之为“結社狂”。一八二四年十二月有南特的絨布織工举行罢工。在同一时期有利米尔蒙花布織工反对減低每疋布的工价在各作坊举行示威，苏昂泰尔白的造紙工人举行罢工。一八二五年有亞尔台納省利馬尼的採石工人举行罢工，巴黎鉄皮鉛管工人罢工，馬賽的面包工人罢工，胡尔姆的棉纺工人罢工，基埃尔的造紙工人罢工，土尔奈斯的石匠罢工，聖奎丁的棉纺工人罢工，谷夢特里的煤矿工人和玻璃厂工人罢

工。一八二六年有巴黎馬車夫罢工,巴黎泥水匠罢工,土倫的泥水匠罢工,馬賽的面包工人罢工,聖德尼鎮的鉄釘工人罢工。一八二七年有巴黎的鋪路工人罢工,路尔的木場工人罢工,谷夢特里的玻璃工人罢工。

这以后,經濟恐慌更加深刻化而騷动也更加扩大。这是一八三〇年革命的主要起因之一。

簡言之,那时候的工人虽然为数还甚少,但是他們已經不顧鎮压而起来战斗。每一次工人联盟,每一次試圖联盟,都遭到司法上追索,那怕沒有真正停止工作,“煽动者”也会遭到逮捕。可是,不管怎样殘暴的鎮压都沒有奏效。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日,馬賽警察局長以絕望的口吻向內政部大臣报告說,工人們“微笑着走进監牢”。罢工的起因,不是为了爭取增加工資就是为了反对減低工資,反对延長劳动時間,抗議市政厅和警察局控制劳工介紹所等等。但是有时也是为了表現工人之間的团结友爱而起的。例如一八二六年在基埃尔,有一个造紙工人巴托遭到他的老板的驅逐,他的老板也已經把工人身份証交还給他。所以按当时的法律來說,巴托在手續上是合格的,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他到另外一个老板那里工作了三天,又被辞退了,新老板对他說:“我很滿意你的工作,可是你冒犯了我的同行,我不能留你。”資本家互通声气是显而易見的,他們無可爭辯地有着一張“黑名單”。为了表示抗議,本城的造紙工人就停止工作。当然这样的声援活动並沒有超越本行業的範圍,这不过是紙業工人兄弟会組織还相当活躍的表現。但是这种情况却也使官方深感不安。

可是,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罢工的地方性。除了少数組織較好的行業如制帽業、造紙業、印刷業外,罢工往往只限於本城,甚至只限於一个企業,虽然当时工人的組織不論是公开的或秘密的,已

比一般的當時人想像的為多。那時的法國工人運動還沒有超越自發性階段，沒有領導機構、沒有理論，也就沒有遠景。但是在這個階段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鬥爭意志已鼓舞着勞動人民，工人階級的尊嚴感已使他們起來反對侮辱和卑視。政治要求是模糊的，只是偶然同工人的切身要求有連系。在工人階級身上還殘留着雅各賓派的傳統，這往往是由帝制時期當過兵，退伍下來當工人的那些人保存下來的。但是更普遍的是，由於資本主義還不很發展，工人們還追隨着資產階級，特別是標榜自由主義的那部分資產階級，這只因為這部分資產階級還是意圖完成摧毀封建制度和阻止封建階級復辟的事業。

* * *

以上已經說明了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基本特征。

所謂復辟，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基本上就是舊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妥協。任何妥協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穩定的平衡。從一八二五年開始，這種平衡是破壞了。資產階級已經壯大，它的利益愈來愈和封建地主的利益發生衝突。資產階級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封建地主的政黨——極端保王黨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一八二三年他們組織了遠征軍支持西班牙的反革命運動，他們賠償了舊日亡命者被大革命所沒收的財產的損失，他們並企圖恢復長子繼承權^①。資產階級害怕以前的封建專制制度死而復生。極端保王黨不是已在叫囂恢復行會制度嗎？這是會給取消大資產階級所珍視的工業自由打開一條道路的。

經濟危機促使資產階級更進一步反對復辟政體，而且把工人階級投到鬥爭中去，從而使其再一次發生決定性作用。

^① 指長子可取得比其他子女更大的一部分遺產的權利。這種權利前已被制憲會議取消。

一八二五年在英国开始的經濟危机很快就波及法国。自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〇年，工資急剧下降，巴黎营造業下跌百分之三十，外省紡織業下跌百分之四十，鋼鐵業下跌三分之一以上。失業在一八二六年即已开始。一八二六年春，里昂織布机停工者有一万一千台。許多工人設法回到不久以前才离开的农村去。里昂的房东們因为他們的房客，那些失業工人付不出房租不声不响地搬走而抱怨。三千个建筑工人准备回到为来巴黎謀生而离开的利穆辛省。到了一八二七年，国立印刷厂工人們也自动要求簽發工人身份証以便离开巴黎。不景气由一个工業部門波及到另一工業部門，棉布業受到不景气的襲击，繼之是鋼鐵業。巴黎的夏乐煉鉄厂在繁荣时期曾雇用四百名工人，現在只留下一百名工人。薩伏尼利地毯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失業。工人成千上万地向慈善机关登記：南特有一万四千人，几占全市居民百分之十八，里尔二万二千人占全市居民三分之一。

工人的反应極为猛烈，尽管並不是互相呼应的。搗毀机器、結社联盟、騷动，这些純粹是工人进行的示威行动愈来愈頻繁。警察当局頗感不安，以为背后另有陰謀，所以指斥那个“被煽动起来扰乱治安的工人階級”。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引起了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二九年之間的騷动，尤其是由於馬鈴薯收成不佳，群众在路上，在碼头上攔截小麦；群众起来反对囤积小麦的大地主。在巴黎，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兩天，發生了真正的暴动。大学生和工人們在聖德尼街和聖馬丁街筑起了街壘进行战斗。軍隊出动开槍，造成了死伤。青年法科学生布朗基^①和起义群众一

^① 布朗基是法国有名的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八八一年。他坐过許多年牢，参加过巴黎公社。在这一次受槍伤以前已經被軍警砍过兩刀。一次是一八二七年四月在聖奧諾雷街，一次是同年五月在聖米歇尔桥。——譯者

起在聖德尼街和大熊街轉角上所築的街壘上作戰時，頸子上中了一顆槍彈。小資產階級受到影響，破產者日益增多。一部分工場主也受到波及。財政預算自一八二七年起年年都有赤字。

經濟恐慌加深了地主貴族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為儘管自一八二五年起，工人階級的鬥爭愈來愈壯大並且無可爭辯地愈來愈擴大，但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還沒有占到首要地位。

在一八二七年的選舉中，大資產階級結成了聯盟，把極端保王黨打敗。於是政治危機表面化了。這一次政治危機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普遍尖銳化，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尖銳化的反映罷了。極端保王黨的首相德·維萊爾辭職讓位給溫和派的馬丁雅克，後來，貴族階級在國王支持下決定以武力把坡林雅克捧上台作首相。坡林雅克內閣是各沒落階級叛國的象徵。這個內閣的領袖坡林雅克伯爵是舊日的亡命者。他的內務大臣拉·勃勒特希·拉·布尔杜納伯爵曾在科不林士軍中^①服務，後來並且參加過萬第叛亂。陸軍大臣布尔蒙元帥則在滑鐵盧戰役的前夕背叛過拿破侖。這個反动政府解散了倔強的議會，重新舉行選舉，但是這一次選舉仍然讓資產階級反對派取得了勝利。國王於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勅令解散新議會並宣布延至九月再舉行新選舉。他又以勅令禁止未得准許而發刊報紙（准許証每三個月須更換一次）；從獲取選舉資格的納稅單中除去了工業家、商人、律師、醫生所繳付的營業稅，從而剝奪了一部分資產階級的選舉權。目的是很明顯的：要把全部政權歸回大地主。

這種盤算是沒有把巴黎工人的行動計算在內。七月二十七、

^① 法國亡命貴族於一七九二年在德國科不林士城依仗外援，組織軍隊，準備跟着國際反革命軍隊打回法國。——譯者

二十八、二十九日这光荣的三天，巴黎人民推翻了外国人於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在法国重新建立的波旁君主政权。

巴黎工人再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大詩人維宜在他的“日記”上指出：“今晨已發生战斗，工人們表现出万第軍队的英勇气概。”詩人巴尔皮厄頌揚巴黎無产階級的英雄气概，唱道：

这个寬闊肩膀的巨人多么雄偉！
这个衣衫襤褸的力士，
这个身穿粗布衫的小工多么豪迈，
身上染滿了整营官兵的鮮血！
这个泥水匠一揮手就掀翻了王座，
在悶热的暑天，
在寬闊的石路上拋滾着王冠，
好像一个小孩子滾鉄环。

資产階級很乐意工人階級起来反对封建貴族。为了鼓励工人採取行动，資本家有时甚至关闭了工場。但是他們却利用工人階級的人数少、缺乏組織、缺乏綱領的弱点，篡夺了工人的胜利果实。

革命后却並沒有成立共和国，而是建立了以代表奥尔良王族的路易-菲力普为首的新君主政体。

拉菲特和迦西米·彼利厄这两个人进入政府。这是一件象征性的事情。拉菲特是著名的“銀行家之王，王之銀行家”。迦西米·彼利厄則是法蘭西銀行創辦人之二的兒子，而且他本人也是巴黎一家大銀行的經理。

同他們一起在朝的有基佐，他是資产階級的历史学和理論

家。昨天他還在鼓動資產階級反對貴族的革命鬥爭，而從今以後他却來保衛資產階級反對上升的工人階級了。另外一個是梯亥爾，他雖然年紀還輕，但已決心不惜用任何手段來保證資產階級的勝利。

班子已經湊齊了。大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現在已經掌握了政權。馬克思指出：

“七月革命之後，自由派的銀行家拉菲特送他的‘教父’奧爾良公爵向市政廳凱旋行進時，失口說出了一句話：‘從今以後，銀行家要統治國家了’。拉菲特道出了這次革命的祕密。”^①

這也是當時人斯當達爾的看法。他寫道：

“銀行是國家的首腦。資產階級代替了聖日爾曼鎮^②，而銀行就是資產階級中的貴族。”

一幕爭權奪利的丑劇又將開始了，詩人巴爾皮厄用諷刺詩刻畫這幕丑劇中的角色道：

說到那些身佩三色帶的俊俏兒郎，
穿着美麗的襯衫，時式的禮服，
那些細腰的男子，嬌嬈的女人，
都是康特大街的英雄啊^③！
當槍彈滿天飛，
可怕的刀光閃耀時，
當勇敢的平民，神聖的賤民們，
奔向不朽的事業時，他們在幹些什麼？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一六頁。

^② 聖日爾曼鎮是當時巴黎的貴族住宅區。——譯者

^③ 百日政變時，路易十八的追隨者均躲避在比利時的康特城，所以巴黎人把瀾人來往的意大利大街叫做康特大街。

当巴黎全城湧現出丰功偉績，
这些老爷們臉色慘白，混身發抖，
冷汗直流，双手掩着耳朵，
蜷縮在窗帘背后……

銀行家拉菲特对他自己的功績得意非凡，他叫道：“如果你們信我的話，那末你們可以把幕布拉下来了，趣剧已告結束。”不！幕布还不能拉下，戏还要演下去。

不錯，戏还要演下去，因为工人階級不能甘心忍受这样一个局面。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四年这四年中，工人們又起来进行了战斗，而这一次战斗却是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了。

第六章

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及其影响

(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

正义的賤民已在成長壯大，
你还要他們呆在破屋里变得下愚無知；
他們却成長壯大：从草薦上站起来，
从臭水溝中走了出來。

——聖西門派詩人迈尔西爱

七月革命和工人的关系——一八三〇年七月至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工人斗争的第一次浪潮——里昂絲織工人的困苦——标准工价問題——里昂絲織工人三天的光荣斗争——胜利者内部的混乱：帮工和师傅的关系——“社会秩序”的恢复——工人运动的威力及弱点——资产阶级的恐惧：野蛮人就在我们的院子里——“結社狂”——工人和共和主义者——镇压罢工的政府——仇视工人团体的新法令——一八三四年四月里昂和巴黎的起义。

前章已經說到，大資產階級已經攬得了政权。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这种情况是不能忍受的，虽然他們还没有自己的綱領。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結果所引起的失望，使法国工人产生了初步的階級意識。

首先，法国工人意識到只有他們自己才是三天光荣斗争的真正胜利者。一年后，維克多·雨果所称頌的“为祖国捐軀的人”指的就是工人。在他們的行列中也杂有手工業者、小店主和学生。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工人在七月革命后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連溫

和派的“国民报”也在七月三十日承認道：

“任何事情向来都是人民做的，人民的力量巨大而雄厚，取得胜利的既是人民，斗争的一切成果自应归功于人民。”

一八三〇年八月十日，有一位大臣名叫杜平的說道：

“任何王朝，就像当今的王朝一样，如果它是借助于工人的英勇斗争而建立的，那它就应当为英勇的工人创造一些幸福生活的条件。”

其次通过战斗，工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那时，经济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工人仍找不到工作，面包依然昂贵。一八三一年克劳索市的玻璃工厂相继倒闭，奥尔纳省的各手工工场和纺纱工场以及上维也纳省的磁器工场，都被迫停工。

如果说当初工人可能有过幻想，那末现在所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把他们幻想廓清了。正如几个月以后，天主教作家查理·德·古在“未来报”上所说：“对于这些人，当人们需要加以利用时就称之为人民，利用过后就改呼为贱民。”从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五日起，塞纳省省长就告诉工人，不必再指望新政府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

“任何要我们去干和解决雇主同工人间有关工资多寡、工作日长短或选择工人等问题的请求，一概不予受理，因为这种请求于法不合，法律已经规定企业自由的原则。”

当街垒尚未被摧毁时，曾经称赞过工人的“国民报”编辑们，现在却对工人提出了下面那种虚伪的忠告：

“工人们还没有具备足够的才识来鉴别那些既符合工人的利益又符合大众利益的东西，工人阶级由于缺乏教育而抱有偏见，这不仅贻害甚大并且常常妨碍社会的比较经常的改良。”

过了几个月，一八三一年四月十九日的选举法依然保持了財

產資格選舉制，只不過把原來必須繳納三百法郎直接稅才能享有選舉權的規定改為二百法郎，必須繳納一千法郎直接稅才能享有被選舉權改為五百法郎。全國三千三百五十萬人口中，只有二十萬人能享受選舉權。

* * *

於是，工人就繼續展開了鬥爭^①。

在最初幾個星期，資產階級政權還自顧不暇，還談不到禁止集會，追索罷工工人。警察都還不敢露面。從資產階級，尤其從小資產階級內部招募來的國民軍是動搖不定的，因為小資產階級也深受經濟危機的痛苦，而小店主則對銀行家懷有疑忌。為工人廣開大門並使工人在其中獲得政治教育的那些俱樂部卻不停地舉行集會。最前進的共和主義者都轉向工人方面。一八三〇年七月三十日成立的“人民之友社”，於九月里揭發了工人身受的痛苦和“資產階級貴族”的自私自利的真相。

奧古斯特·布朗基曾在街壘上打過仗。七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被彈壳和火藥燻黑了嘴臉和雙手”的布朗基興高彩烈地高喊着走進大廳：“浪漫派叫我們打垮了。”現在，布朗基以學校委員會的名義把學生們組織了起來。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對奧爾良派篡奪政權的行為提出了如下的抗議：

“我們不能讓七月革命變成一個騙局，帝制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必須全部加以摧毀。如今這個建築物既然連一磚一瓦都沒有

^① 參閱奧克泰華·費斯蒂：“七月王朝初期(1830—1834年)工人運動史”。現代歷史圖書館。第二卷，第三分冊，巴黎一九〇八年版。關於工人聯合會，可參閱：勞動局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四年發表的“行業聯合會”，計統計表及文字說明共四冊。關於思想運動問題，可看B.伏爾金的“法國秘密會社的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一八三〇至一八三四年)”，載蘇聯“歷史問題”雜誌，一九四七年第六期。

打落下来，他們(學生們)應該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它上面轟开一条缺口来並把它徹底摧毀掉。”

布朗基参加了起义运动，並且在起义之后仍繼續进行斗争，因此，他开始从無产阶级的生活中，它的痛苦和英勇不屈的精神中，发现了历史前进的秘密。在“人民之友社”里，布朗基重新找到了巴貝夫主义的傳統，亦即一八二八年布亞納罗梯在布魯塞尔發表的“巴貝夫平等派的密謀”一書中所重新指出的傳統。

不幸的是，作为一个阶级，当时的無产阶级还仅仅是一个剛剛形成的阶级；它沒有自己的領袖，沒有自己的組織，也沒有自己的学說。在当时，只有资产阶级已經組織起自己的政党。至於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論家，他們是脱离群众的，他們仍滿足於幻想一个奇蹟：社会会自动变得又公正又美好。然而，毫無疑問，聖西門派仍旧是站在工人方面的。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聖西門派的报纸“組織者”报导說：

“不到一个月以前，人民还曾經替自由主义者及资产阶级分子打了一个胜仗，而現在，他們却被迫忍受种种忘恩負义的报答。这是我們早就料到了的。人民埋怨竞争过份，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却用自由的幌子，拒絕为人民解决問題。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对人民的英勇推崇备至，但仅仅这样一个美名不能令挨餓的人感到滿足时，統治者便不許人民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来，不然就叫国民軍和正規軍来請人民尝一尝刑法或戒严法的滋味。”

聖西門分子組織了真正傳播社会主义的队伍。他們的演講会越来越頻繁。他們第一次同工人群众获得了接触。后来聖西門派的影响曾發展到里昂和馬賽等地。然而，聖西門派自己對於工人斗争並未提供任何領導人物，也沒有提出任何口号和組織形式。

因此，紧跟着七月革命之后，法国工人的斗争，虽然已有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这些斗争都还是在无秩序、无远景的情况下进行的。

工人仍旧从机器身上来洩愤。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从战场归来的巴黎印刷工人就曾捣毁了印刷机。在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日，“一个受了欺凌的”排字老工人发表了一本小册子，表示出：“工人阶级对于机器的正当恐惧”。他写道：

“机器比被赫尔居斯战败的妖魔还要贪得无厌，机器是违反人道的，是违反自然法则和工业的权利的，同时也是违反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的。”

印刷工人向议会提出一项请愿书，要求政府根据宪章第九条取缔印刷机器。宪章第九条规定：“国家得以保护合法的公共利益为理由，没收私有财产。”当时，政府不但驳回印刷工人的请求，而且指令印发一道拨款修理被捣毁的印刷机的命令。可是“立法公报”印刷所的工人拒绝承印这项命令。九月三日，全巴黎市的印刷工人举行总罢工。印刷工人拒绝承印他们认为违反自己利益的文件，这类事件在工人运动史上还是第一次。当时，许多报纸都未能出版。“时代报”仅仅出了一个单张，不过勉强地湊成了三分之一的版面，还是用手摇机印的。

针对工人提出生存权利的要求，资产阶级答以企业自由的论调。有一个议员说：

“工人在难忘的七月革命时，曾经那么英勇、那么忠诚地进行了战斗，现在他们竟然要求你们去妨害发展我国工业所迫切需要的自由，这真令人感到惊奇。”

罢工工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十三个委员被捕，后又被释放。九月十四日，他们被提付初级刑事法庭审讯，结果在群众的

掌声中被宣佈無罪。

一八三一年九月，巴黎有一千五百名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反对工場主从里昂运来一架剪裁妇女肩巾的机器。九月七日，这些女工集合在一起，高呼：“不要机器！”当局出动馬队把她们冲散，五天之后秩序才逐渐恢复。九个女工被判一个月徒刑。縫衣工人也同样为反对使用縫衣机而提出抗議。

这个运动發展到外省。一八三〇年十月，南特的工人搗毀了一架用来在罗亞尔河挖掘泥沙的机器。一八三一年三月三日，聖亞田有二千工人冲进里維工厂去搗毀机器；四个工人因此被判五年强迫劳役。一八三一年五月，波尔多有五百至六百鋸木工人举行示威，反对使用鋸木机。他们手持鋼斧，冲进作場，搗毀了全部机器。一八三一年六月，哈佛尔的木匠砸毀了用机器制成的木板、地板和門窗。

机器給工人带来了失業，所以工人搗毀机器，这在阶级斗争中並不是什么新鮮的斗争形式。在前一个阶段，我們已經看到，这类事件是屢見不鮮的。但是其中产生了新的东西，那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对輿論进行了解釋工作，用解釋工作来讓人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一点是值得着重指出的，因为在这部工人运动史中，我們所要特別叙述的正是工人运动的进展，而这样的进展則应归功于“人民之友社”，因为“人民之友社”曾經出版了一批二十来頁的小册子，对工人曾起了極為广泛的教育作用。这些小册子的内容往往还没有摆脱空想主义，或則沒有摆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在今天讀起来，尽管在内容上必須採取种种保留，这些小册子仍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激动，仍是不失为一种典型的宣傳品。如果我們联想到奥古斯特·布朗基曾是“人民之友社”的一个积极活动

家，那末對於這一點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了。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人民之友社”出版了一本有关巴黎女工在加德朗街举行示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作者都非常注意时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究竟有何作用。我们应当在这里引述几段，因为这是当时先进工人在思想上已有肯定提高的证据。

“别扯谎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改良工具并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如果生产工具有了改进，这只能对它们的占有者有利，如果机器的力量变得更大，如果机器变得比人的双手更灵巧，那末只长着双手的人便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既不如机器工作得好，更不如机器工作得快。资本家便不必再雇佣工人的劳动。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侍候那些占有千奇古怪、壟断一切生产、一切贸易的机器的幸运的人了，而这些人也就可以左右工人的命运。讓我們再說一遍，每逢一种新机器問世时，工人们所常说的一句老話，一句非常入情入理的話，就是咱們再也沒有办法啦，咱们的膀子算是断啦……”

“……任何一种改进只能有利於一小撮占有工業生产資料，占有資本、土地及机器的人們；別人就只好等着去撿他們所任意丟棄的殘余，只好听从他們支使！社会上就此产生了爭夺利害的斗争……”

“为了平息这种使宮廷和商店深感头痛的騷动，他們採取了些什麼对策呢？一年来他們的对策就是集合馬队下令出动：用槍托，用快馬奔馳，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塊廣場又一塊廣場上去冲、去赶、去抓人、捉人、網人。这是他們的祖傳秘方，这是旧制度的殘余。这种旧制度早就不合时宜了，而我們却沒有把它剷除淨尽。他們命令他們的警官高声喊叫：‘請守法的公民回到自己家

里去!’似乎是說,既然你是守法的公民,那你就該有一个家。这些由我們,由我們自己来养活的、到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安安逸逸回到自己家里去的家伙应当知道:有些守法的公民連晚飯都沒得吃,因为他們根本一無所有;他們只能睡在大街上,因为除了大街之外,他們是無家可归的。”

工人所担心的另一件事便是失業。为了不再失業,至少为了減少失業,他們往往只懂得一种办法,一种帮工組織的兄弟会原有的只起消極作用的傳統办法,那就是攆走外地来的工人。一八三〇年九月間,巴黎的馬車制造业工人要求資方不要再雇佣外来工人。里昂的泥水匠和土工則要求解雇来自薩伏依的工人。

搗毀机器和排斥外来工人还是一些原始的斗争形式。当时,工人还不懂得直接对社会制度(資本主义)和階級敌人(資本家),即工人階級所受痛苦的根源,进行斗争。

但是,工人也展开了一些水平比較高的斗争,即争取減少劳动日和增加工資的斗争。

在这一方面,盧昂市發生的事件最具有典型性。一八三〇年八月二十七日,盧昂的棉紡工人,在附近各城鎮工人的支持之下,举行了罢工。他們首先要求把工作時間減为每天十二小时,而当时的工作時間往往是十四,十六,甚至十七小时(中間休息一小时半)。其次,他們要求取消工場的罰款規則。根据这些規則,缺勤工人得課以相当於缺勤時間的工資兩倍的罰金,如果預定工作未能按时完成,也要扣除一部分工資。后来棉紡業的老板虽然不得不另訂新的工場規則,但是,这种新規則,不是修正得不够,便是沒認真实行,所以工人的要求仍然是沒有得到滿足。一八三〇年九月六日,达尔納塔的工人举行示威,包圍市政厅,要求躲在市政厅里的皇家檢查官下令釋放被捕的工人。当局調动了軍隊来进行鎮压,

有的工人受了傷。有些人被捕。一個參加示威的工人被判兩年徒刑和兩年管制。直到十二月八日，監獄里還有尚未經過審訊的工人。

也是在一八三〇年九月六日，巴黎的機器匠和鎖匠提出了每天工作不得超過十個小時的要求。

針對工人們的這些鬥爭，資本家的代表們卻提出“勞動自由”來作擋箭牌，好像工人是自由的，可以隨心所欲，願意什麼時候勞動就什麼時候勞動；願意勞動多長時間就勞動多長時間似的。攬得政權的大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國家的高級代理人，竟然宣稱，工人們在七月革命時進行戰鬥，正是為了爭取這種奇怪的“勞動自由”，塞納省的省長在向泥水工人們講話時說道：

“有的時候，工人們竟然忘掉了他們當初參加鬥爭所要爭取的究竟是些什麼原則，他們之中還有人為此曾流過血呢……他們忘記了勞動自由的神聖性是並不亞於其他任何自由。”

此外，工人還展開了鬥爭來反對強迫他們接受吃不飽、穿不暖的工資。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日夜間，魯貝城內發生了騷動，工人要求資方出具“增加工資的書面保證”。全城因此布滿了憲兵和國民軍。在安辛，礦工們要求每天增加工資四個蘇，而當局則決定向安辛及瓦林西納的國民軍分發子彈。在巴涅萊和蒙特婁，石灰礦上的工人要求每天增加工資五個蘇並減少工作一小時……

資產階級想盡辦法來對付工人；他們不但使用武力來鎮壓工人示威，而且還企圖在社會輿論面前，尤其是在小資產階級面前破壞工人的名譽。正當罷工運動到處展開的時候，“集錦劇院”於一八三〇年十月里上演了一個小型的歌劇，劇名“通力合作”。這個歌劇把工人刻畫得十分可笑。劇中的“好工人”一打完仗，立刻重新回去做工。工余之暇，他並不看一看報紙上說些什麼，而卻唱道：

“我打过仗，为祖国效过力，
我呀，我很满意，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我很满意，再也没有别的要求。”

这个工人不仅歌颂国民军，而且庆幸国民军出头来镇压罢工工人：

“布尔乔亚的好汉，莫离开你们的武器，
社会秩序和自由就赖你们而得救！”

至於领导罢工的人那是出卖基督的犹太，是什么受外国雇用的鬼鬼祟祟的煽动分子，他的本领就是请人喝酒和制造暴乱。他是这样一类的人：

“他们在街头巷尾
张贴下贱和血腥的标语！”

这个剧本可说已经包罗了后来一百多年中宣传仇视工人的一切论调。这些论调的主要用意就是诽谤工人，离间小资产阶级，使工人陷于孤立。在这个剧本里什么都有：有尊重资本家的“好工人”；有善良的、爱护自己工人的资本家；有酗酒、懒惰、非常容易受煽惑的帮工；甚至还有恶性循环的说法。这真是一点也不假！请大家来听听那个“好工人”是怎样劝说他的同伴们不要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的他說：

“请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活要少做，工钱倒要多拿，那末老板怎样能够收支相抵呢？这样一来，他们势必只好多生产！可是，市面上已经这样萧条，多生产能有什么好处呢？”

这是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绝好证明。当时的“辩论报”报导說：这是一个好剧本，

“它的功劳就在于把这些有关公共秩序和自由的原则加以推广和普及，因为现在有许多许多群众取宠的暴徒在反对这些原

則。”

工人运动虽說还只在萌芽阶段,但是资产阶级却已經慌了手脚。他們因为害怕保不住自己的特权而战慄。为了保衛他們的特权,资产阶级非但用武力对付工人运动,而且还到处扯謊造謠,污蔑工人。

一八三〇年九月,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現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报纸:“工人报”,“手工業者报”,工人自己編的“人民报”。不錯,这些报纸的編輯已經开始意識到,工人阶级代表着什么。“手工業者报”說:

“人民不是什么别的,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开发資本为資本創造价值的是工人阶级,国家的商業和工業所依賴的也是工人阶级。”

但是,总的說来,这些寿命不長的工人报纸並沒有如何越出手工業者的理想,因为它們所主張的不过是組織生产合作社。这些报纸不是不注意工人們爭取实现切身要求的运动;但是對於这些运动,他們既不設法提供意見,也不設法加以領導,而相反地,却警告工人不要从事任何引导他們走上違法途徑的活动。总之,这些报纸所代表的,只不过是手工業者或是希望成为手工業者的工人所关心的东西。在当时,这还是些最有文化的劳动者,唯一能写文章和經營一个报纸的劳动者。

工人活动在全国沸騰的情况下展开了。到处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騷动,但是我們並不能在此一一指出其中哪些是純粹的工人活动。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巴黎居民举行示威,要求处决查理第十的一些大臣,因为这些大臣是使人民在七月革命中流血的罪犯。第二年年初,查理第十的党羽居然在教堂里为貝利公爵^①被刺的遇

^① 法王查理第十之子,於一八二〇年二月十三日被人刺死。

年紀念举行公祭，於是成群的人冲进了聖日尔曼—洛賽魯阿教堂和大主教府邸。

一八三〇年八月，里摩日城的居民被失業和高漲的物价逼得無路可走，举行了起义。农村中也是接連不断地發生騷动。在奧克薩尔，穷人搶占了麦倉並放火焚燒稅卡。农民拒絕納稅，他們在好些城市里搶占了間接稅稅务局，並在公共廣場上焚毀稅务局的賬冊。

* * *

然而，在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打开一个新的阶段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却是一八三一年十一月間發生的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①。

这是成千上万工人为反对他們的直接剝削者並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举行的第一次的起义。單單这一点就足够說明这一事件的基本重要意义了。欧仁納·泰尔萊写道：

“一八三一年的里昂起义不仅是法国工人階級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有人曾經这样講过：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②以后的俄罗斯工人和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以前的俄罗斯工人是截然不同的兩种的人。對於里昂起义以后的法国工人和里昂起义以前的法国工人，我們也完全可以这样說。里昂起义之后，工人對於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法国大

① 我們利用了以下的史料：在上面已引用过的奧克泰华·費斯蒂的著作：費尔南·呂德：“一八二七——一八三二年里昂工人运动”，巴黎一九四四年版；欧仁納·泰尔萊：“机器生产初期的法国工人階級。从帝制末期至里昂工人起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專門叙述里昂工人起义的，已譯成法文，發表在“馬克思主义評論”一九二九年三、四、五月第一、三、四期。最后必須指出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出版的Ф.波將金的極重要的著作：“里昂起义”，这本书研究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絲織工人起义。

② 指“血腥的星期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即俄历一月九日）。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指使下，軍隊向示威工人开槍，这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起点。

革命時期以來已經熄滅了的、一八三〇年七月間曾經甦醒但還甦醒得不够的革命傳統，在里昂起義之後，完全復活了。”

十六世紀以後，里昂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絲織工業占據首要地位。然而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里昂絲織工業的勞動組織却幾乎完全沒有變動^①，依舊分製造商、作坊主和幫工等三種人。

不論是製造商、批發商，或是製造商兼批發商，誰都知道他們並不是直接生產者。他們沒有作坊。但是他們有資本。他們購進原料，委託作坊代為紡織，然後再拿去出售。在理論上這些作坊是獨立的。作坊主或師傅在自己家裡做工，或多或少地自己備有一些織布機，平均為兩架到八架。他們可以隨意組織自己的勞動。可是他們既然不甘心餓死，自不得不接受製造商隨意訂定的工價。這種工價，和僱傭工人的工資一樣，是按件計算的。作坊主和普通工人的唯一區別就是他們自己有生產工具。如果作坊主自己家裡人手不够，不能轉動全部紡織機時，他們便招僱幫工到家裡來做工，在這種情形下，作坊主便得從製造商那裡得來的酬勞中分一部分給幫工。在作坊里做工的，除了幫工外，還有婦女、學徒和童工。童工被稱為“拋梭手”，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把繞着絲綫的梭子投進正在轉動着的織布機里去。

幫工、學徒、女工和拋梭手等形成了一個緊密的階級，他們的利益和作坊主的利益一樣，都是和一小撮製造商的利益相衝突的。製造商是市場的主人，他們把持着全行業的領導機構如商會、商事裁判所和勞資調處委員會。製造商是有錢的人，所以他們享有選

^① 茹斯丁·哥達爾：“絲織業工人”。關於里昂絲織工人的專門著作，研究歷史、經濟、社會方面情況。第一部：“勞動法規（一四六六——一七九一年）”，里昂和巴黎一八九九年版。

举权^①並实际操縱着地方上的一切政权机关。

絲織工人有的住在富尔維埃爾山坡上,有的住在古尔基翁一帶,有的住在聖乔治区,有的住在克洛瓦—魯斯山坡上,有的就住在克洛瓦—魯斯山頂上。

里昂人蒙法尔貢,在一八三四年就写了一部“一八三一年及一八三四年里昂暴动史”。作者是个为制造商階級热心服务的人,所以他否定了絲織工人的起义。但是對於絲織工人的痛苦,他却也不能完全一字不提。他写道:

“聖乔治区是一条狹長的地帶,一面是索恩河,一面是聖茹斯特山。許多住戶都是手工業工人。全区的特色是簡陋的房屋重重疊疊地堆积着,空气非常惡濁,住戶非常拥挤。在那里一間房間要住上許多人。小小的一間还不到一丈見方的閣樓,往往要住一大家人,也就是說一对夫妻外,还有兩三个孩子,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睡覺的时候,每人頭頂上只有二尺來高的一小塊地方的空隙。在那些狹窄的街道上,在那些又黑又深永远見不到陽光的天井里,得不到流通的空气,而且經常散發着一种酸味。堆积在每幢房屋里面的大量垃圾,男女老少挤在一間屋子里的呼吸,經常散播着傳染病菌。”

蒙法尔貢的書中還有一兩段詳細的描写,可供我們了解絲織工人的生活情况:

“有些青年人从附近的农村来到了里昂,學習紡織綢緞的手艺。他們过不了多时就变得憔悴瘦削……臉色蒼白。四肢不是骨瘦如柴,便是由於淋巴液充斥而浮腫。肌肉松弛無力,身体一般都長得矮小;这就是里昂工人通常的健康情况……”

^① 一八四八年,由於实行了財產資格选举制,罗尼省全部人口五四五六三五人中只有五、三五三人有选举权。

蒙法尔貢尽管出身於資產階級，但是也不得不承認拋梭手和学徒所受到的殘酷剝削：

“有的孩子年紀還很小，就派到紡車上去繞紗圈；這些孩子必須整天彎着腰，不能隨便動彈，又不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結果弄得腰酸背痛，慢慢變成癱瘓病。

他們虛弱的四肢漸漸變了形，背脊骨也長得歪歪斜斜，身體一天天瘦弱下去，不消幾年就變成終身虛弱的病夫。另外有一些孩子專門僱用來搖大輪子，轉動一連串紡紗的長軸。因此，他們脖子上的肌肉特別發達，而兩腿却瘦弱下去。這些不幸的孩子往往長着畸形的下肢。”

織布機雖然在一八三一年以前的幾年，已經有了一些重要的改進，但是蒙法尔貢不得不承認：

“發明家所關心的是增加效率，而不是為工人設想一些比較方便的操作方法。”

這就是在一八三一年光景的里昂三萬多幫工和八千左右的作坊主所過的生活。工資是按件計算的，但是工資不僅要看季節而定，而且隨着產品性質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很難得出一個平均數來，但是當時的記載都一致指出：一個作坊主一天工作十五至十八小時，往往只掙得到三個法郎^①。而這三個法郎還是整個作坊的收入。作坊主要付三十個蘇給幫工，十個蘇給女工，七個蘇給拋梭手。自己還能剩下多少錢呢？一共不過十三個蘇。而一斤麵包（這是最便宜的東西）倒要四個蘇。房租更是昂貴：在克洛瓦—魯斯區，六層樓上的屋子，每年的房租要一百法郎，二樓的房租要三百八十法郎。住在這些黑黝黝的小胡同里，在白天大部分時間

^① 讓·阿拉札爾：“一八三一年里昂工人起义的原因”，“歷史評論”，一九一二年。

也得点灯。为了不使光鲜夺目的絲織品染上灯灰，織工們还得用价钱最貴的橄欖油来点灯。肉和酒都是很貴重的东西。从一八〇三年到一八三一年，里昂的人口由九万三千人增加到十四万六千人，可是酒和牲畜的輸入却並沒有增加。一八一四年，全城有四千七百七十八个棄嬰，一八二八年增加到九千零三十二个，即增加一倍。总的說来，劳动条件虽然有了些微的改善，但是生活条件則反而越来越惡化^①。

当时制造業的發展是迂迴曲折的，蕭条和繁荣不断地循环相替。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了一段蕭条时期，到了一八三一年，制造業又重新活躍起来。但是制造商为了減低产品的价格，他們只知道一种办法，就是压低工价，換句話說，就是加强对作坊主和帮工的剝削^②。

* * *

然而，絲織工人的战斗意志是越来越昂揚了。一八二七年，有一个名叫皮埃尔·沙尔尼埃的作坊主創立了一个“互助会”。毫無疑問，沙尔尼埃对帮工是怀着戒心的，他認為这些人是“越来越不听话了”。可是，他也不讓拥有六台織布机和两个学徒以上的作坊主参加互助会。至於制造商，則是互助会的最主要的敌人。

各作坊里漸漸出現了一个主导思想：如果要反对降低工資，必

① 爱德华·道萊昂为费尔南·吕德的書所写的序言中，曾引用乔治·布尔琴的話說：“里昂的工人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那么困苦和屈辱。”可是，根据我們所搜集的材料（其中有些材料所引用的仍是吕德本人的著作），这話並不实在。固然，里昂的絲織工人的确有着一股自尊心，不肯讓別人侮辱他們，所以說来他們並不能算得当时法国工人中最不幸的工人。但是他們究竟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已經不甘心再忍受貧困。

② 这是里昂制造商們早已关心的事情。茹斯丁·哥达尔在他所著的“絲織業工人”一書中，曾引用普魯士皇家工場總監、手工工場法庭陪審官梅鐸的話說：“里昂的制造商必須記着，廉价劳动力不但本身就對他們有利而且更有利的是能使工人做起工來更加勤快，生活更加循規蹈矩，對制造商更加听话”。

須規定一個不讓制造商任意壓低的标准工價。早在一七八九、一七九三、一八〇七、一八一—和一八一七年，工價已經有所規定。但是，規定标准工價的想法，現在又汲取了新的力量。對絲織工人說來，規定标准工價是他們的生死問題。一八三〇年七月絲織工人之所以拿起武器來^①，一部分理由是為了爭取标准工價。他們在获悉巴黎革命勝利之前，已和里昂其他工人占領了市政廳、兵工廠和電報局。推翻波旁王朝的結果，在他們看來，毫無疑問地意味着标准工價的制定。而且，新市長普魯納爾博士還是個自由分子，他就是靠了絲織工人的擁護才上台的。他應該記得這一點，尤其是大家都說他心腸好，為人慷慨。在第一次出的布告上，他不是作過很漂亮的諾言嗎？

“受到我們制度培育的工業從此不會再在生產上受到阻礙了”。

幾個星期過去了，絲織工人的處境却愈來愈壞，工價還是不斷地下降。

現在誰還不熟悉絲織工人所唱過的怨歌嗎？這是勞動人民不甘心再受剝削的歌聲：

讚美在天之父，
就得穿上金線的祭衣。
教士啊！我們給你織出這件祭衣，
可是我們啊！窮得穿不上一件襯衣。
就是我們這些絲織工人，
一個個窮得赤身露體。

^① 哥隆勃：“里昂起義及其起因的札記”中曾寫道：“正如巴黎一樣，法國第二個大城在一八三〇年起義的日子里，首先拿起武器來的也是工人。他們和巴黎的工人一樣，也是急於要推翻專制政府，雄壯地宣佈他們熱愛自由和民族的旗幟。”

做大官的人，
要穿上外套，佩上織錦的胸綬。
大人先生們，我們給你織出了这些，
可是我們啊，可憐死了也沒有一塊布來裝殮。
就是我們这些絲織工人，
一个个穷得赤身露体。
但是，我們的天下快要來到，
你們的天下就要拉倒。
那时啊，我們將織出
旧世界的葬服，
因为起义的雷声已經响徹云霄，
我們，絲織工人，
再也不赤身露体了。

騷动不断地發生，特别是从一八三一年五月到九月尤为頻繁，其中不但有絲織工人，而且还有其他行業的工人。聖西門派的演說家到处举行演講，听众非常踊躍，以致这些演講会不得不換地到可以容三千听众的勃洛托馬戏場去举行。有一个演說家大声疾呼說：

“为什么！創造財富的人反而永世受苦？为什么！华貴的綾罗老由赤貧無告的人紡織出来作为生来就是特权階級的人增添穷奢極慾的資料？”

然而，甚至在里昂城中，聖西門分子虽然亲眼看見几乎每天發生的工人斗争，他們却依旧摆脱不了空想家的故态，同时也認識不到这些斗争的重要意义①。

克洛瓦一魯斯区不断举行集会，这些集会都是由几个作坊主發起的。十月十六日通过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工价草案。但是省長

布維埃—杜摩拉不敢承擔任何責任。他是個對製造商的利益維護惟恐不力的人^②。他既怕影響他的宦途，又怕引起暴動。實際上，這個優柔寡斷的人物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在絲織工人反對製造商的偉大鬥爭中，他除了頻頻召集會議調處外，根本不曾起過任何作用。十月二十五日，作坊主代表和製造商代表舉行了一次決定性的會議，為了支援作坊主，六千名工人由郊區來到省長公署門前，雅各賓廣場和貝勒古爾廣場附近。他們態度安詳，紀律嚴明，沒有攜帶任何武器也沒有拿棍棒。凡是目睹的人無不獲得一個強大力量的印象。總之，這一次示威運動立刻取得了效果：標準工價被通過了。

於是人們在克洛瓦—魯斯區張燈結彩。在工人區，滿街是人載歌載舞。可是某些製造商卻根本無意實行他們的代表所答應的標準工價。他們向巴黎遞送一件冗長的控訴書，控告省長，特別是反對規定工價的制度。他們埋怨工人們之所以要求太高的工資，只是因為他們巧立名目，編造了許多“虛偽的需要”。內閣總理迦西米·彼利尼（斯當達爾曾稱之為無恥的大混蛋）在沒有接到控訴書以前，就已指示商業大臣达尔古（此人也是金融資本家，後來成為法蘭西銀行的總裁）駁斥標準工價。絲織工人在他們剛創辦的報紙“工場回聲報”上，揭露了所有違犯標準工價的事實。

民情愈來愈激昂。十一月十七日，出現了手寫的招貼，號召工人集合開會。十一月二十日，絲織工人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從第二

① 事實上，聖西門派卻曾企圖阻止暴動。警察局報告中指責他們是暴動的發起人，這是不符事實的。當然他們是同情絲織工人的，但是他們說：“只有上層階級伸出手來，下層階級才會想到提高自己。”（見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環球報”）。“在里昂所舉起的旗子是個偉大的象徵。但是里昂事件本身永遠算不得光榮事件。啊！光榮絕對不會與同屬一個家庭內勞動人民之間所流的血結合在一起。”（奧林德·羅德里格語）

② 他本人就是莫塞爾探礦的業主。

天起全体停止工作。

三天中(里昂無产阶级的三天光荣日中),絲織工人在各行各業的工人协助下,控制了整个城市①。

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晨七时,工人们离开了作坊,四个人一排,手挽手向中心区进發,嘴里高唱着一八三一年的“巴黎进行曲”:

前进,前进!
冲向敌人的炮口,
冲过枪林彈雨,
 奔赴
胜利!

他們手持長矛、腰刀、棍棒和步槍,冲退了所有用来对付他們的武裝力量。工人队伍中有些人被国民軍第一团的士兵(主要由制造商所組成)打死。示威工人就折向格郎谷特进發,动員克洛瓦-魯斯区起来参加起义。“武裝起来,我們的弟兄被打死了!”工人们筑起街壘,挖掘战壕。由於缺乏軍火,他們便把賈卡尔織布机上的鉛質零件拆下来,熔在針筒里当子彈。他們夺到了兩門砲,但是不会使用,沒关系,就用来加强街壘吧。就是在那个时候,絲織工人的黑旗上出現了这一句名言“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
.....
省長想对工人们进行劝說,但是工人答复他說:“不是工作就是死!与其餓死,不如給一顆子彈打死。”国民軍首先退却,正規軍也繼之被击退,省長和奧多諾將軍都当了俘虏。

入夜,中將罗盖伯爵曾試圖重整队伍。第二天早晨,国民軍已

① 据不完全的統計,軍民死伤者計三百五十七人,其中有絲業工人六十二名(包括各种工匠,女工和少年工等)。但是能够表现出这一次起义的广泛性的是,其他行業的工人:如成衣匠、鞋匠、瓦匠、木匠、园丁、制鎖匠、車夫、短工等等,都参加了战斗,並且出現了許多烈士。

經不再响应集合的鼓声。兵器庫被搶一空，国民軍營房也被占領了。篷巴斯特兵營被工人攻克。工人們對於打仗並不是外行，因為其中有些人原在拿破侖手下當過兵。一八三〇年為了支援薩伏依的爱国分子而組織起來的“羅尼义勇軍”，曾在邊境受到截阻，他們不時給起义的工人提供了軍事幹部。正規部隊和工兵都和起义的工人彼此親善。甚至孩子們也參加了戰鬥，他們穿插在馬隊里，往往給騎兵以致命的打擊。上午十時，起义隊伍攻占了勃洛托、紀約基埃和聖茹斯特。第十三營的兩個連和第四十營的三十九名士兵，在加爾美里特高崗上被包圍作了俘虜。

戰爭至此告一結束。

里昂有兩個聖西門分子投書“寰球報”(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說：

“工人們終於勝利了。昨天，他們以無比的英勇打了一仗，他們的仗打得那樣狠，遠非言語可以形容。以前我們錯誤地以為這些人缺少毅力，這是因為我們過去還沒有見過，人們為了爭取麵包是如何能夠戰鬥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兩點鐘，羅蓋伯爵率領殘軍敗將撤離里昂。這是後來在巴黎公社時期，梯亥爾將記住的——一個事例。這次戰鬥是激烈的，傷亡共計六百名左右。

* * *

羅蓋撤走后，工人們即占領了市政廳。可是勝利却給他們帶來了困難。他們恢復了社會秩序，並採取了一些措施制止搶劫(槍斃了幾個搶劫犯)。他們佈置哨崗，派隊伍巡邏街道。造幣廠和稅務局門前，都有衣衫襤褸的人站崗。

但是已經勝利的工人們在政治上還顯成熟。從二十二日起，他們就釋放了他們的人質——省長和奧多諾將軍。地方當局確是

受到了斥責和約束，但是沒有被消滅。起義工人建立了一個“臨時參謀部”，由“羅尼義勇軍”分子拉貢勃領導。他們發表了一個告市民書：

“里昂市民們，狡詐的官吏們事實上已經喪失了人民的信任。里昂將成立普選的初級代表大會，听取本省人民的要求，同時並將組織一個新的公民保安團。今後內閣大臣們再也不能強迫我們听从他們的鬼把戲了。”

這篇告市民書不久就被參加市政廳工作的某些人否決了，因為他們仍舊信任着地方當局。

不要忘記一直要等到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無產階級才知道必須把資產階級國家摧毀。現時，還談不到這樣一個問題。只有一些最前進的人，主張解除國民軍第一團（由台羅區的大商人組成）的武裝，他們說：“這次戰爭確實是一無所有的人反對有產者的戰爭。”但是這些最前進的人並不能帶動整個隊伍。省長既然恢復了自由，他就到處奔走，發佈告示。起義方面的領袖却忙於爭論，而這些爭論竟讓警察總局局長來參加。里昂一面和羅蓋將軍繼續談判，一面派代表前往巴黎。

* * *

起義方面舉棋不定的態度，便利了政府方面進行嚴厲的干涉。這事做來也不太困難，因為里昂方面任何抵抗都沒有組織起來。而羅蓋伯爵却在距離里昂四公里的里利歐兵營調兵遣將。幾天之內，他就集中了六個作戰聯隊，另外還有第十二騎兵隊和從格勒諾布開來的一隊砲兵。政府軍並在各農村中發出征兵令。鄰近各省的國民軍也已經全付武裝作好戰鬥準備。總的說來，這一支軍隊至少有兩萬人和五十門砲。

這是件十分嚴重的大事，因此十一月二十九日，國王的一個兒

子，奥尔良公爵也亲自到了里利欧。

到了十二月一日，里昂郊区和附近的乡村已经被政府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三日中午，奥尔良公爵由陆军大臣苏尔特元帅陪同下，经怀兹镇进入市区，当时他还觉得不够安全，所以先派两个作战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在他前面开路，才敢进入城区。

城里的秩序恢复了。里昂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国民军也被解散。省长布维埃—杜摩拉被撤职^①，换了一个果断的人当省长。标准工价宣布完全无效。新任省长施展了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他收罗了一些工人编入市警察队，并决定逮捕“带头人”，同时企图污蔑起义运动，把它说成是由拥护查理第十的分子煽动起来的。

然而激昂的民气使政府不敢在里昂本城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审判。他们决定“为了顾全公共治安”，把被告们送到里欧姆刑事法庭去受审。这些被告是事前经过一番选择的。政府特别选择出一批“政治犯”，尤其注意挑选一些不是丝织工人的人，其目的在於抹煞起义运动的阶级性。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做法，里欧姆的居民对被告们还是表示了同情。一八三二年六月十八日被告们都被宣布无罪释放。

可是，当局就在里昂本城积极兴建炮台，以便於必要时可以向城中开炮^②。工人身份证都要重新更换，而且要附缴警察局出具

^① 实际上布维埃—杜摩拉曾以谄媚的言辞欢迎过奥尔良公爵，他在佈告上说：“里昂市民们，脱去丧服，穿上节日的衣服罢。奥尔良公爵已经来到了。这是预示暴风雨已告结束的虹霓。”可是就在这时候，克洛瓦—鲁斯区的作坊里，孤儿在痛哭失去的父亲，母亲俯视着受伤的儿子。

^② 蒙法尔瓦写道：“我应该坦白地说，是的，政府在里昂週圍建筑了一道强大的防御工事。在政府的心目中，内部的敌人和萨丁岛人或奥地利人是同等重要的。是的，政府的工事是受到十一月事件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是为了预防工人再度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在此再加上一句，过去亨利四世曾对里昂人民宣称：“我宣布，我绝对不怀疑你们，我只想在你們心坎里，把你们善意变成金城汤池。”

的品行优良的証書。这样一来，一万名左右工人被認為“不良工人”遭到了斥逐。

表面上，里昂的劳动人民是失敗了。但事实上，这一次經歷却有其深远的后果。前面提到的那位蒙法尔貢，倒是一个有远見的資产階級分子，他非但不敢为資产階級的胜利而自豪，反而不得不承認：

“国民軍和里昂的駐軍給手無寸鐵的工人打得落花流水，这件事恐怕要成为今后一百年中，作坊里飯后酒余的佳語。这个故事將一代一代傳下去。多少年后，子孙們還將以驕傲的口吻說：‘我的祖先就是当年里昂的胜利者。’”

絲織工人的起义运动显示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但同时也显示出工人階級的弱點。工人的人数日益增多，他們已經为爭取本身的要求而起来斗争。从今以后，必須估計到工人階級的存在及其战斗精神了。

苏联历史学家伏尔金写道：

“尽管里昂工人表现出还缺乏組織性，在思想意識上还有弱點，但是里昂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第一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階級已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出現了。这一次起义运动已在世界的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对資产階級說来，它的掘墓人是已經站起来了。”

然而，里昂的工人还未形成一个單一的階級（大部分其他工業中心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們中間，有作为手工業者的作坊主，也有無产階級的帮工。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反对制造商的斗争。惟其如此，所以运动的倡議来自作坊主，因為他們遭受制造商的压迫更是直接，而要求規定标准工价的也是他們。但是，帮工們也参加了斗争，而他們的行动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就在

起義期間，幫工和作坊主之間往往發生衝突。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幫工方面，可以說是“他們只會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條鎖鍊”。而作坊主則不同，他們擁有紡織機，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減輕對製造商的從屬地位。幫工和作坊主之間的這種矛盾，就是起義運動終告失敗的原因之一。而這種矛盾本身又是由於當時的經濟不夠發展，而工業還具有手工業性質所致。

由於同一原因，起義者除了要求規定標準工價外就不能提出任何其他明確的綱領來。他們是勝利了，但不知如何利用勝利。當然，他們中間也有共和主義者。如果說這一次起義不帶任何政治色彩，那也是不正確的。但是起義運動的領袖們確實沒有任何明確的社會觀點。他們中間，最有學問的不過是些信仰互助主義的人。他們考慮解決問題的办法，極少能跳出空想主義窠臼，他們只希望把作坊主組織在生產合作社內，以此逃避製造商的控制。他們是在手工業中生長的，他們的視野極少能超越作坊。

絲織工人既然看不清自己希望達到的是什麼樣的目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戰略。他們是出色的戰士，他們很勇敢，對製造商懷有強烈的仇恨。他們善於打仗，因為他們曾經當過兵。他們在行動中所表現的膽量甚至令人感到驚訝。他們不但沒有停留在自己住的市區內，而是主動活躍，紀律井然，向資產階級市區展開了真正的襲擊。但是他們的行動卻很少能越出里昂本城。他們控制了全城後，又不知如何利用他們的勝利。然而，里昂的起義差不多依然獲得了全國工人的響應。

奧古斯特·布朗基在一八三二年一月“十五人控訴案”審訊法庭上的發言，充分表達了這種感情^①。當時，政府決定對“人民之

^① 馬爾賽·維拉爾：“被告的控訴”，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第三七頁。

友社”的各主持人提起控訴。

法庭主审官問道：“你的職業是什么？”

布朗基岸然答道：“無产者。”

法官駁他道：“这不是一个職業。”

布朗基反駁說：“怎么？这不是職業？这是三千万法国人的職業，他們靠劳动为生，但却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接着，布朗基追述里昂起义經過道：

“無产者难道是想改換那些难得見到的錢幣上的人头像才發动七月革命的嗎？难道我們竟那样稀罕新人头像，所以才推翻一些王朝来过过瘾的嗎？一位官方的政論家一口咬定說，七月革命时，我們曾坚持要一个君主立宪政权，由換湯不換藥的路易—菲力普来代理查理第十。照他的說法，人民只是作为中等階級的工具来参加斗争的，換句話說，無产階級不过是羅馬角斗場中的武士，为了供特权階級消遣消遣，为了特权階級的利益，專去杀人或被人杀死，好讓特权階級等斗争的危險过去后，然后到窗口来喝兩声彩的。但是，里昂事件所表現的是何等样的慘狀！那些餓得半死的幽灵，冲进槍林彈雨，圖个死的痛快。全国人民目睹这种景象，哪一个心中能不心痛不悲伤？……是的，这次战争是穷富之間的战争。但是这是富人逼出来的，因为侵略別人的正是他們。不过，他們很不滿意穷人硬要抵抗，所以他們一提到人民，就忿恨地說：‘这些畜牲真够兇惡，打了他們，他們竟敢抵抗。’”^①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警察局長^②憂心忡忡地写道：

“我們發現人心越来越动盪，工人階級方面尤其来得厉害。我們已經發現，煽动分子正对这部分居民进行工作，他們不断地給工

^① “路易—奧古斯特·布朗基在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辯護詞”，一八三二年出版，第五和第一三頁。

人們指出里昂工人先例。”

在巴黎，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目擊者曾寫道：

“據說，工人們已在各郊区竊竊私語，城里牆上已貼出了煽動性的標語，警察和便衣偵探正忙於撕毀這些標語，警察和偵探的人數越來越多，熱情越來越高。”

在塞納省諾西勒塞克，砲台工程處增加了工人的工資，因為工人們威脅着“要效法里昂工人”。里昂隣近各省如羅亞爾省（里維·德·基愛、聖亞田、洛亞納各城）、依塞爾省，都普遍地發生了騷動。奧爾良公爵和蘇爾特元帥路過馬貢城時，歡迎他們是一片充滿敵意的叫喊：“打倒各大臣！”“打倒蒸汽機！”“里昂人萬歲！”

儘管聖西門派的解決辦法仍是空想主義的，儘管他們目前只滿足於提出減輕捐稅的口號，但是他們對起義的重要意義卻作過一番正確的評價：

“里昂事件改變了‘政治’這個字的含義，並且擴大了它的含義。勞動者的利益已確定地進入政治圈子，並且還會越來越擴大其地位。”^②

共和主義者到處張貼標語發表文章來配合這些形形色色而日趨普遍化的行動。“人民之友社”於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出版一本

^② 警察局長季斯蓋與金融資本家有着直接的連系。早在一八一八年，他已創辦了哈佛爾貿易公司，並與彼利厄公司合股。一八二五年，他在巴黎得取迦西米·彼利厄的借款創辦了一家銀行貿易公司。一八三〇年十月，他受陸軍大臣委託前赴英國購買軍火（洛特雪任中間介紹人）。詳見“警察局長季斯蓋回憶錄”，他本人撰寫，巴黎一八四〇年出版。

^③ 米歇爾·希瓦立：“聖西門教。里昂事變。”傅立叶在死前兩年（一八三五年）也曾論述過里昂事件。他寫道：

“過去任何世紀都不能像我們這個世紀一樣的有充分理由來對哲學表示懷疑？經歷了十五年來無數次的變遷，理性主義、實驗主義和工業主義方面的進步，迅速地向越來越完善的境地發展，人民也屢次地進行革新和復興，但是時至今日竟然還要為了工資菲薄，衣食無着而不得不起來暴動，不得不在他們旗幟上大書：‘工作不能生活，毋寧鬥爭而死’。”（“虛偽的工業……”第一卷，第五六頁）

小冊子，譴責內戰的罪魁。“里昂已恢復秩序，蘇爾特和國王最寵愛的兒子終於進了城。”“人民之友社”並且譴責人剝削人的制度說：

“勞動的果實應該回到勞動者手中。許多人給一個人當奴隸的制度應當永歸消失。”

但是，那怕作為起義的發祥地的里昂也沒有提出任何一個口號。

然而，甚至在農村中，里昂絲織工人的起義就算不說它引起了農民的響應，至少可以說已引起了農民的了解和同情。當政府在鄉村征召國民軍用來向里昂增援時，許多農民寧願冒着被處罰的危險而拒不應召。

* * *

不論如何，里昂絲織工人並沒有白白的犧牲。他們那怕無意中犯了些錯誤，但是對於本階級的徹底解放，依然是大有功勞的。

資產階級，它倒毫不糊塗，因為在那時候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自然要比無產階級更加明確。里昂的消息一傳到巴黎，巴黎交易所的證券立即狂跌。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發出了警報。例如聖馬克·吉拉廷於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八日在“辯論報”上寫道：

“里昂的叛亂揭露了一個重大的秘密，這是在同一個社會內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發生了鬥爭……我們的工商業社會和所有其他形態的社會一樣，有它本身的隱患，這個隱患就是工人。既然任何手工工場都需要工人，工人的人數自然越來越多起來，而他們的生活自也越來越困難，社會自也就永遠不會安寧。取消商業吧，我們的社會就要枯萎、停頓、死亡；繁榮、發展，加強商業吧，你就同時在增加着無產階級。他們掙一天活一天，一個小小的波折就會叫他們無法活下去……只要看一看每個工業城市中的工商業階級

和工人階級的比例，你就一定會對這樣相差懸殊的比例大吃一驚。每個工場主在他的工場里就像殖民地種植園主在一群奴隸中一樣：一對一百。里昂叛亂就是一種聖多明格式的暴動^①。威脅社會的野蠻人並不在高加索，也不在韃靼草原，他們就在我們工業城市的郊外……我們使用‘野蠻人’，‘侵略’等字眼，似乎是夸大其辭，其實我們是有意如此使用的。不錯，對於現在的情況來說，這些字眼固然用得過份一些，但是對於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況，卻又形容得並不過份。中等階級^②必須認識實際情況，必須認識他們所處的地位。他們下面有一批無產者在騷動、在呻吟、在叫苦，這些人不知道要些什麼，不知道何去何從；可是他們並不在乎這些，他們有苦惱，他們要改變，這就是現代社會的危機。毀滅現代社會的野蠻人就是會從這些地方跑出來……”

這個聖馬克·吉拉廷又以緊急呼喚的口吻號召資產階級停止他們之間一些次要的政治鬥爭而趕快起來對付那些野蠻人的襲擊^③，他寫道：

“問題已不在什麼共和政體或君主政體，現在已是一個社會的生死問題了。人們可以喜歡有個民選的總統來代替國王，但是誰也不能讓社會顛倒綱常，讓尾巴代替腦袋……無產階級民主制度

① 指大革命時期聖多明格（即中美洲西印度群島海地島）爆發的奴隸大暴動，暴動結果是黑人獲得了勝利。

② 此處顯然是指資產階級。

③ 這也是“時報”的意見。照儒勒·蓋德的說法，那時候的“時報”已經是地道的資產階級“報紙”了。我們以後還時常要提到這張報紙。該報於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道：

“一旦私有制遭到了威脅，那末就談不到什麼政治見解，什麼內閣制的不同傾向，什麼在朝在野了。那時大家必須先來救燃眉之急。我們必須停止彼此責難，號召一切力量去幫助那個維護我們利益的政府。任何叛上作亂的行為都會帶來大混亂，沒有一個公民會在混亂中倖免人身和財產的損害。因此趕快幫助政府吧！我們應當自動地採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必須阻止叛亂思想蔓延開去。工人運動是有傳染性的。里昂就是一個中心。”換句話說，他的意思就是號召人們起來組織一個反對工人的統一戰線。

和共和体制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中等階級的共和派和君主派，不管你們對什麼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有着如何分歧的意見，但是維持現存社會，却只能有一個意見。”^①

在同一時期，沙多布利安也叫喊道：

“難道需要在每個工業城市駐紮二萬六千名警備隊，在每尺絲帶，每尺呢絨旁邊站上一名哨兵嗎？”^②

的確，沙多布利安後來在“墓外回憶錄”中還說：

“除了駐紮警備隊外，還可以加上至高無上的宗教力量，……一個政治國家，有的人收入可達千百萬而其他的人則幾乎要餓死，如果沒有宗教以另一個世界的希望來解釋這種犧牲精神，那末，這個國家豈能存在下去？”^③

我們所以要提出這些佐證來，因為這些佐證可以證實恩格斯所說的話^④：

這是“歷史觀上的決定的變革。一八三一年在里昂發生第一次工人的起義。在一八三八——一八四二年間，第一個全國性的工人運動，英國的憲章運動，達到了它的頂點。一方面隨着大工業

① 在國立圖書館中，現在還可以找到一個工人很自豪地給聖馬克·吉拉廷的一個答復。這是一本只有八頁篇幅的小冊子，書名為“一個無產者送給辯論報編輯倍爾丁先生的禮物”，書上署名“無產者，印刷工人巴洛”，茲摘錄一段如下：

“我們無產者是祖國的敵人？！啊！先生，如果說祖國不幸在哺育着一批忘恩負義的兒女和賣國賊，那末這批人決不是無產者，而是那些社會上的大人先生們。那些人絕少有像我們被人稱為真正的愛國人士的那種品德和勇氣。”

② 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他的信中的話。可以肯定，沙多布利安是個保王黨分子（他是個正統王朝派，所以並不擁護路易一菲力普），但是他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工人們的英勇氣概，他寫道：

“這些工人驅逐了當地駐軍，迫使國民軍脫下軍服；廢除稅捐，迫使政府不得不在冬季動用巨款，調遣二萬大軍前去對付他們。這些工人把省長當作秘書使用，命令製造商接受他們的條件。這些工人進行談判，派遣使節，以平等地位和路易一菲力普王朝辦交涉。”

③ 百年出版社，第四卷，第五八一頁，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④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一四頁。

之發展程度，他方面隨着資產階級不久以前所獲得的政治統治權之發展程度，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開始在歐洲最先進國度的歷史上進居於前列了。”^①

* * *

事實是，從一八三二年到一八三四年，高潮是已經出現了，工人的騷動此伏彼起而且日益普遍。我們無法在此一一舉出這三年中所發生的“結社聯盟活動”（那時已開始用“罷工”這個字眼）。一八三三年里昂的控訴制鞋工人案中，檢察官已談到“各行各業的工人中間出現了結社狂。”

經濟恐慌自一八三二年起開始好轉，但是工作恢復得很緩慢，工資也未曾增加。當一八三二年巴黎發生了霍亂時症，受害最深的還是各平民區^②。

沒有一個行業，沒有一個城市不發生罷工風潮。我們只須提出幾次最重要的罷工就成，而更其重要的是指出其特徵來。

一八三二年曾發生貝達利歐城絲業工人的罷工，富梅城的聖安娜石板公司工人的罷工，里維德基愛城的玻璃工人的罷工，巴黎的木匠、縫工、鎖匠等的罷工，格萊蒙—斐龍城縫工的罷工，盧昂城的綿紡工人的罷工。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蒙貝利埃區蒙巴辛

^① 里昂起義運動即便在外國也引起了極大的反應。奧地利首相、歐洲極端反動派領袖梅特涅克也不掩飾他的不安情緒。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日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論用什麼方式快快結束吧，這對我們德國自由分子真是一個很不好的榜樣。在德國，中等階級（指資產階級）反對王朝和高等階級（指貴族）的激烈鬥爭還在進行中。而在法國，現時王朝和貴族幾乎已經消滅殆盡，賤民（指無產階級）却站起來反對中等階級（指資產階級）了。雖然這樣發展是合乎邏輯的，但是竟必要帶來一系列難於預料的後果。”

^② 當時，巴黎不合乎衛生條件的住屋約有二萬所。有一個醫生談到霍亂時症時寫道：

“聖日爾曼—洛賽魯阿街二十號，住有一個硝皮匠。他的作坊就設在樓下院子里。作坊用來浸牛皮的潑水就倒在院子的小溝里，水然後流到井里。同院住有一個麵包師傅，他就是用這種井水來做麵包。”（伏季埃著：“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第二十五卷，第二三六頁。）

的农业工人提出有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新章程并要求付诸实行。起初地主让了步，但是不久就廉价招来一批邻区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引起农业工人之间的械斗和法律上的惩处。

五月间，有巴黎炼铁工人的“结社”运动，安辛煤矿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一如一八二四年和一八三〇年，他们要求恢复原先的工资，因为原先的工资曾被减去四个苏。因此，他们的罢工就以“四个苏骚动”出名。这一次罢工坚持了十天，不但秩序井然，而且全体都参加。十九个矿工在瓦林西纳的初级刑事法庭被控，但是法庭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天中，五千名工人对方圆三十公里之内的矿坑毫无破坏行为。”

法庭上的辩论，证明了有一千八百名矿工已在市政府登记为在家受救济的赤贫户。许多矿工穷得欠下面包账达四万法郎之多，如以每天工资三十苏计算，此数相当於五万个工作日的工资。矿工的情况悲惨到这步田地，以致在法庭上被控诉的简直不是罢工工人而倒是安辛公司了。

当时有一个报纸报导说：

“这件案子在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就显出一个怪现象。好像不是受审的十九个工人在当被告，而是安辛公司坐在被告席上受审。有些证人指责它，另外一些证人为它辩护。公司的管理处、经理人员和公司制度，对全体工人的苦难显然是责无旁贷。这些工人所受的苦痛已经超乎常情，因此才不得不抛弃原有的安静和逆来顺受的习慣。他们只觉得，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能够保护他们，以致使他们长期受着垄断资本兇横的鱼肉压迫。这种垄断是中世纪种种虐政和特权当中，唯一能够莫名其妙地经过两次革命，而居然还原封未动地遗留下来的东西。一般人都觉得，这将是这件案子的真正内容，因此，不论是检察官和法官，都将就这一方面来提

出問題。”^①

法庭對於礦工的反應頗具戒心，所以不得不比往常做得溫和一些：十三個被告被宣告無罪，兩個被判处一個月徒刑，兩個各處刑十五天，另外兩個各處刑八天。

一八三三年夏季的罷工並不僅此一次。六月間，蠶蒙的手套工人聯合反對克利伏總廠雇用新工人，因為這樣一來，不但使得舊工人失業，而且會招致工資的普遍降低。七月間，哈佛爾港的工人，包括泥水匠、細木匠、馬蹄匠，要求增加工資。繼之，聖瑪利奧米尼的織布工人對資方的壓迫（對繞綫工作的工資決定減少二十生丁）忍可無忍，用鋪路的石塊和棍棒砸碎了製造商的門窗。九月，巴黎的兩個木匠團體取得協議，採取共同行動，五千個木工離開工地，結果每天的工資提高了十個蘇。

九月，里摩日的瓷器工人發動罷工。當時，瓷器業受到了經濟危機深刻的影響，因此工人們遭到失業，工資減低百分之二十，而且欠薪達數月之久。到了一八三二年年底，蕭條已告結束，於是二百名工人於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二日發動罷工，要求恢復經濟危機發生前所規定的工價。製造商初起拒不接受，後來在工人的堅決鬥爭下陸續讓步。

一八三三年十月，巴黎首飾工人要求每日的工作由原來的十一小時半減為十小時半。十月二十日，一千二百（一說一千五百）名首飾工人在亞夢田稅卡檢驗場舉行集會，決定成立一個包括首飾工人、鑲嵌工人、琢磨工人、雕刻工人的互助會。罷工是在兩個作坊里爆發的，一八三四年一月十日，十三名首飾工人以結社罪被控。

十月及十一月，巴黎麵包工人兩次在梅恩稅卡檢驗場舉行集

^① 安辛公司的老板彼利厄，取消了以前所同意的如孺救濟金。一八二五年，他又將患病的工人每週的救濟金，從六法郎減至五法郎。

会，提出每天的工資增加十个苏，每家面包房应雇用与烤面包爐数相等的面包工人等要求。在第二次示威时（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面包工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其中包括正规作战部队、国民軍、長矛騎兵队和龙驃騎兵队等。被捕的工人达二百二十五人之多，仅这个数字已經可以看到示威运动的規模。

在同一时期，巴黎的縫衣工人又發動了好几次罢工，三百个工人被投入牢獄。外省如翁热、奧頓、貝約納、达克斯、里摩日、勒曼、麦茨、奥尔良、盧昂、都尔等地的成衣業普遍地發生騷动。在巴黎被捕縫衣工人的家屬均由里昂和都尔兩地的同伴設法接济。制鞋工人的結社运动也有此情况：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巴黎制鞋工人在洛歇苏亞稅卡檢驗場集会，这次运动逐漸發展到外省，如里昂、第戎、夏龙、包恩、馬賽、蒙貝利埃等城市。

一八三四年二月間，爱克斯附近的矿工罢工兩天。爱克斯城的总檢察官不得不指出矿工确受到殘酷的剝削。他写給司法大臣的报告中說：

“工人們久已在埋怨他們的工資太低，而資方强迫他們向当地矿局管理处購買灯油，而灯油的定价又非常昂貴。在控告他們結社罪的过程中，我很高兴見到这些工人所埋怨的事情能在公开的辯論中揭露出来。这些情况已經調查屬实，法庭認為矿工們犯罪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加斯特拉納伯爵發給这些矿工的工資实在菲薄，而伯爵手下的經理人員所供应的灯油，价格則由於貪污作弊又确实定得太高。”

在工人运动史上，这样連續不断的罢工是以前所沒有过的情況。这是工人战斗精神已經提高的鐵証。当时經濟恐慌虽然可以認為已經結束，而罢工运动却还是不断發生，而且大多数帶有明显的进攻性，都是以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劳动時間为目标。因此更

証明了工人战斗精神确是提高了。

* * *

不仅如此,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更加积极地参加一般的政治斗争。一八三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拉波尼拉依在刑事法庭上講的話,就是代表着工人们說的。他被控的罪名是为工人公开講授法国史课程,因为他在講座上說过:在一七八九年,人民只是“換了一批暴君”,結果依然受到“更陰險的、更可惡的、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暴君”的奴役,他对法官宣称:

“真正的共和国,我們所热烈追求,夢寐以求的共和国,是个沒有伊洛达^①、沒有奴隶、沒有賤民的共和国,是个不分资产阶级和平民,不分特权阶级和無产者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自由和平等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的东西,而不是某一阶层独占的特权。”^②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拉馬格將軍^③出殯那天,各行各業的工人都高举旗帜和标語牌参加送殯,其中有染坊工人、印刷工人、啤酒工人、制帽工人。在他們所持的旗帜中,有一面黑旗迎風飄展,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第二天即六月六日,在聖麦利修道院內發生战斗,工人们筑起街壘。这次逮捕人数之多弄得政府方面不得不征用公共車輛来載运犯人。警察局長通令医生和外科医生,告發就診的受伤工人。

共和主义者在反对路易一菲力普王朝的斗争中已經不能再忽視工人了。

要了解当时共和派的态度,我們不能忘記,以路易一菲力普的名义在統治国家的,只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即大资产阶级,

① 即古代被斯巴达人征服而淪为奴隶的人。

② “公民拉波尼拉依在塞納省刑事法庭上所作的辯护詞”(一八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③ 拉馬格自一七九一年起曾历次参加革命及帝国各战役,由於他反对波旁王朝和路易一菲力普而受到人民的愛戴。

特别是金融资本家。因此，不但工人阶级倾向于共和制度，而且还有小资产阶级，因为财产资格选举制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其中尤以自由职业者对此更为不满。其次凡是反对银行家专政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憧憬着共和制度。共和主义者虽然团结一致反对七月王朝，但还远不能组织成一个阶级成分一致的政党。他们彼此在利益上有着不少的矛盾，抱有不少分歧的希望。不过可以肯定地说：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人士看来，工人只是个辅助力量，他们虽然需要这个力量，但是早就在准备过河拆桥了。但在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方面，他们心坎里却还保持着雅各宾式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目前说来，主要的是大家如何同心协力来对付七月王朝。

这时候，“人民之友社”内已经建立起缝衣工人、营造工人的支部^①。一八三三年十月，“人民之友社”改组为“共和人权协会”，并在会内设立一个宣传委员会。这个宣传委员会似曾在工人中间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不管怎样，这个组织内除了知识分子外还有一定数目的工人，如排字工人拉蒙尼爱、巴斯基叶—布吕耶尔、鞋匠厄弗拉汉、红木家具木匠洛耶爱、木匠亚拉个、手套工人贝拉尔等等。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同时还在本行业中积极参加发动联盟结社的工作。

许多共和派报纸不断发表工人的请愿书，抗议逮捕罢工工人，组织对罢工工人家属的援助工作。在联盟结社罪的审判案中为工人出庭辩护的也往往是共和派的律师。例如里昂的米歇—安日·柏利埃，他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已和工人站在一起并在起义中受过伤。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他为被控告的各制鞋工人出庭辩护。他在辩护中强调指出，工人“只是一架生产的机器”，“计算工资，不是根据工人的劳动为原料所创造的价值，而是根据使工人不致於

^① 参阅上面引用过的伏尔金论文；车尔诺夫：“七月帝政时的共和党”，一九〇一年。

餓死的最低需要。”

大資產階級知道它必定能得到政府、警察、法官和軍隊的支持，所以拒絕作任何讓步。當安辛市市長向安辛公司總經理指出礦工們極度貧困的情況時，這位總經理竟然答道：

“本公司寧願讓礦井停工十個月，決不向工人作任何讓步。”

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在縫衣工人審判案中，資本家方面的律師說道：

“這不僅是對一切形式的合法政府宣戰，而且是對一切社會秩序的永恆的基礎（人身安全、所有制和自由權）宣戰。”

他感謝警察和檢察官給予資本家的“忠誠協助”。可是，為了對抗僱主而創辦自己的生產合作社，因而於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被捕的一百五十名縫衣工人，對於他們說來，“人身安全”又到那里去了呢？十一月六日，警察沖進縫衣工人慈善社，逮捕了二十個縫衣工人，對於這些縫衣工人說來，“自由權”又到那里去了呢？所以，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人，才能享受“人身安全”和“自由權”。抗議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辯論報”說：“永遠是有富人和窮人之分的，這有什麼辦法呢？”再說，工人們子女太多。家庭是和工人不相稱的一種奢侈品。這一點至少是索姆省省長、倫理學院院士杜諾叶的意見，他於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通令本省各市市長說：

“窮苦家庭沒有第二個辦法可以解決問題；這些家庭只有刻苦耐勞，謹慎小心，才能上升。尤其是在夫婦關係上必須小心，必須特別注意到不使他們的夫婦生活比他們的手藝生產出更多的果實來。”

一八三三年九月，政府接受了巴黎木匠包工頭的建議，決定利

用军队来代替罢工工人，从而创立了一个先例。包工头请求陆军大臣派给他们一百至二百名工兵营的木匠，让他们使用十天以上。每人每天的工资为三法郎半（这就是原来的木工工资，而木工们则要求增至四法郎）。这样做法是“为了叫误入歧途的工人恢复理性，想一想他们的义务。”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包工头最后还是不得不让步，不得不答应增加工人们所要求的半个法郎。但是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当时的商业大臣写信给陆军大臣说：

“如果工人们再要结社聚众，我们也许还要请求你阁下，允许用卫戍部队内的工兵来暂时代替他们。”

一八三三年九月十九日的“辩论报”叫嚣道：

“好极了！只要包工头确实能够按照他们所惯常付给的工资找到人手，那末不久就可以看到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人也会来重新要求工作了。”

请看这些人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如果一个工人的工作让士兵占去，为了活命和养活家口而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那末对这个工人说来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一八三三年十月，面包工人罢工，政府宣布将巴黎驻军中所有会烤制面包的士兵，交给面包房主人调遣。一八三三年十二月，马赛也发生同样事件，这次是为了对付罢工的石匠。马赛卫戍司令调集军队中所有的石匠给包工头。这些军匠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一月三日当真代替了罢工工人。工人们终于失败了，不得不恢复工作。陆军大臣在庆贺胜利之余，通知该司令官说：“今后如逢发生类似的结社聚众行为，应即以同样手段对付之。”

的确，政府是想从此消灭工人们所进行的那种游击战。“普通”的镇压手段已经不足以应付，可是仅在一八三三年一年中，仍有五百二十二个工人以结社罪被控。

* * *

政府企圖予以决定性打击的对象是各种社团,它希望一举打垮共和派团体和工人团体。当然,政府想打击的还是共和派团体,政府所以要打击它們,正是因为如同掌璽大臣巴尔特所說的,“那些团体的活动已面向工人階級。”他又說,最严重的倒不是那些“工人們自發”的結社运动,而是“工人为了反对东主而組織起来的大团体”所發动的那种結社运动。

工人在共和派的支持下,反对大資产階級利益的保护人、路易一菲力普政府的斗争,已經达到了最高峰。

一八三三年十月,政府計劃加强反結社的法令,为此就必须給各团体以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刑法第二九一条的規定並不包括人数不到二十人的团体在內,因此共和派团体和工人团体为了避免触犯法律,建立了許多不到二十个人的小組。一八三四年二月二十日,政府提出一个新的法律草案,如果議會予以通过,那末,事实上就意味着一切社团的消灭。因为根据这一法案,那怕是不到二十人的支社都在禁止之列。按照法律,不但对领导人可以判罪,便是全体成員也都有罪。同时,这类案件又規定不再提付刑事法庭陪审团审問,而將提交更順从政府压迫政策的初級刑事法庭法官来处理。

鑒於当时的选举制度,当然不可能希望議會真的会反对这个法律草案,因此这个法案果然在一八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通过了。

* * *

於是,一心要保护他們組織的共和主义者,尤其是坚决保衛自己的組織的工人,都紛紛起来騷动。

这一次信号又是从里昂^①發出来的。自上次絲織工人起义以来,工人們的物質条件毫無改善,但是他們的思想却起了变化,他

們比过去更能接受共和主义的宣傳。“互助主义者”也紛紛活动起来,与他們並肩作战的有法蘭絨帮工們,他們組織了法蘭絨織工会,要求限制劳动時間。絕大多数的行業中的工人,如薄紗綢工人、縫衣工人、头紗工人等也都組織起来。一八三三年五月十二日的“工場回声报”写道:

“劳动者只有組織起兄弟般的团体来,才能改善他們的命运。他們之間的利益是一致的。他們不但不应互相仇視,而且應該彼此帮助。各国人民的‘神聖同盟’將从同样神聖的劳动者同盟中产生出来。”

這張報紙又於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八日揭穿了承認工人享有自由权的虛伪性,它写道:

“凡人均有生存的权利,因此就有劳动的权利。如果对劳动者說,他們不必联盟結社也可以进行工价的談判,那是对那些吃了今天沒有明天,因此不得不忍受弱肉强食的規律,即資本主义規律的人們的一种侮辱性的嘲諷。”

一八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互助主义派决定举行总罢工,抗議降低制造帽子上絲帶的职工的工資。工人們一致採納了罢工口号,使三万架紡織机停工十天(二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这一次,虽然絲織工人的要求沒有获得滿足而不得不恢复工作。但是他們都意識到,这不过是暫時遭到失敗,並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們的紀律性和彼此支援的精神已經在他們身上产生了極深刻的印象,而为日后进行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創造了条件。甚至工价並未削減的織布工人也参加了这一次罢工。恰恰在这时候,人們得悉禁止結社的法律草案已被通过。里昂共和派報紙“拾穗者”宣称:“进行抵抗

① 參閱茹斯丁·哥达尔:“一八三四年里昂四月起义”,載“一八四八年革命”,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五頁。

已經不僅是一項神聖的義務，而且是變成了一項需要了。”法案通過後，二千五百五十七個互助主義者提出了一項嚴正的抗議書說：

“決不在這樣無理的桎梏下低頭，集會決不停止。根據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即勞動謀生的權利，他們知道如何以一個自由人應有的一切力量來反對任何橫暴的企圖，他們決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衛任何強權所不能奪取的這項權利。”

人權協會里昂支會決定，“他們的組織將不顧一切像過去一樣繼續存在。”因此，在罷工期間雖然沒有一個人被逮捕，但等到復工後，反而有六個互助主義者在煽動二月間結社運動的罪名下被捕。

共和主義者（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者）初次和工人組成了統一戰綫，這對兩方面說來都標誌着一個深刻的變化。人權協會和各紡織業工人協會成立了一個“統一委員會”，決定在被捕的互助主義者受審那天，即四月九日舉行示威。

政府當局極想從此把絲織工人壓服下去，他們看到幾天以來士兵與工人彼此親善的情況，更加惴惴不安。

四月五日步兵第七團的兩個連已經與絲織工人有了親善友愛的表示。

當時有一個新聞記者曾作過這樣的報導：

“士兵們用極為友好的態度來回答那些過來和他們握手言歡的工人。不一會兒，插在槍頭上的刺刀都放進了刀鞘，軍官們也收起了指揮刀，市民和軍隊之間建立了友善的團結。在酒舖子門前支起了桌子，士兵們槍托朝天，很高興地接受同胞們的邀請。後到的一連士兵也以同樣的熱忱參加了這樣的和平舉動。彼此之間都表現出無限的信任。”

因此要幹就得趕快，而且必須立即整頓士氣。從四月五日至九日，政府在軍隊中有計劃有系統地進行了污蔑絲織工人的宣

傳，把絲織工人說成“法国国内的强盜”，“活該槍斃的下流胚”。這些誹謗和造謠的手段，正好供日后梯亥尔“勁員”凡尔賽軍隊进攻巴黎公社时的借鏡。

四月八日夜間，政府調動一萬軍隊，占領了各十字路口和主要建築物。九日早晨有一家報紙报导說：

“市政厅今天收到了拒馬柵、火箭、子彈和各种攻守武器，市政厅好像已經兵临城下。全城崗位都派了双崗。一直到这时候还認為不需要設防的隣近各高地都安了砲位，从而把分散的砲台連成一气，成为完整的居高临下雄視全城的战斗系統。”

四月九日，里昂發生了总罢工。在法庭进行审讯时，有一个人在法院的院子里被人杀死。第一批街壘出現了，但很快被砲火轟毀。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四天中，战争十分劇烈。士兵們接到“街上見人即格杀不論”的命令。高地上的砲台向城中轟击。十二日，軍隊採取攻勢，占領了紀約基埃和怀茲鎮。随之而来的無非是屠杀和放火。最后剩下的一些起义者被壓縮到城中心，然后驅进科尔德利教堂全部被槍決了。

保守派議員阿米洛曾写道：

“里昂遭到了可怕的破坏，一切战争手段都尽情地用上了，居民的住宅在砲声雷鳴中紛紛倒塌或被熊熊大火所燒毀。無辜的人民，妇女和兒童都遭慘死。他們都是鎮压叛乱所用的手段下的犧牲者。”

在这个階級战争的戰場上，省長卡斯貝林获得了荣誉軍团^①的宝星，亞瑪尔中將則获得了荣誉軍团的一級勳位。卡斯貝林的父亲是国民公会的議員，曾投票贊成路易十六的死刑。亞瑪尔中將

^① 荣誉軍团是拿破侖於一八〇二年設立的勳位，旨在酬报“有功”的軍人和民政人員。
——譯者

則曾在埃洛^①一役中升為上校，他的岳父也曾在國民公會投票贊成路易十六的死刑。於此可見，這是一個如何充滿了悲劇性的演變（我們已在前面指出了這個演變的各個階段）。卡斯貝林省長和亞瑪爾中將，既然做了大資產階級的爪牙，從今以後自然要千方百計來打擊工人階級了！

這一役，總計死者三百四十二人，傷者六百人。各行各業都有殉難的烈士。“這真是保衛結社權的總起義。”

政府之所以痛恨結社權，並不是單為阻止共和主義者結社，而是，特別是要把工人們孤立起來毫無抵抗地听憑僱主們壓迫。羅尼省議員富希龍無恥地在起義一個月後在議院裡宣稱：

“在里昂，工資越低，工人們越勤勞。因為如果工資太高，工人們一個星期幹三天，掙夠了，其餘的日子就不想幹活了。”

這一次起義比十一月起義所引起的震動更為廣大。四月十一日，三四千工人在聖亞田舉行示威，一部分煤礦停工。工人企圖奪下兵工廠沒有成功。在亞爾波亞城，起義群眾佔領了市政廳。在格勒諾布尔、馬賽、夏龍許索恩、維也納、格萊蒙—斐龍等城市也都發生示威運動。呂納維爾城的一個鋼盔騎兵團密謀譁變。

巴黎的人權協會中央委員會曾決定支持里昂的起義群眾，但是遲遲沒有擬定計劃。里昂來的消息又是彼此矛盾的。當政府決定封閉“論壇報”，該報總編輯亞芒·馬拉斯特倉皇出走後，資產階級的共和派就覺得迷失了方向。可是工人們却在馬蘭區，波蒲爾街、奧白里勒波雪街、特朗斯諾南街築起了工事。軍隊出來干涉，造成了所謂特朗斯諾南街的大屠殺。在那條街上，僅僅在一所房子里就有十四個人被殺死，四個人受傷。這是內閣總理梯亥爾第一次

^① 普魯士的一個城市，拿破侖曾於一八〇七年二月在其地打敗俄普聯軍。——譯者

对巴黎工人所下的毒手。他和教育大臣基佐以及指揮巴黎軍隊的布乔，是主要的負責人。梯亥尔說：“不該留活口。”基佐說：“命令是毫不留情的。”布乔对士兵們說：“見一个杀一个。朋友們，不要留活口，不要心軟……我們得堆成一个三千名乱党的死屍堆。”

政府提交議會通过了一項禁止携帶武器的法令，並把征兵額提高到三十六万人。兩千名嫌疑犯被捕。但是他們的案子一直等到第二年五月才在貴族院举行审判。这一次审判的風波特多，因为政府拒絕被告選擇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亞納罗梯、布朗基、拉梅納、儒勒·法佛尔等人当他們的辯护人。有些被告拒絕法官的审訊。一大批一大批的被告被判处流刑和徒刑，首先是里昂的工人，其次是其他省份的城市如呂納維尔、亞尔波亞、格勒諾布尔、馬賽、聖亞田的工人，最后輪到巴黎的工人。

这一批案子一直到一八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才审判完畢。中間还發生了謀刺路易-菲力普的案子(費爱斯希謀刺案)。政府於是找到了借口，要求議會通过一系列的鎮压条例：这就是一八三五年九月頒佈的条例。刑事法庭增加許多分庭，以便發生叛乱时可以更迅速地审判大批罪犯。报館監理人繳付的保証金提高數額以阻止人民的报纸，首先是工人报纸的發展(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里昂和巴黎早已有工人报纸出現)。对木刻、石印、圖片則規定了出版前須受檢查的办法。著名的漫画家杜米埃曾以充滿了仇恨的現實主义笔法，繪画一幅特朗斯諾南街大屠杀的石印画，竟也遭到資產階級的迫害。

法国工人階級从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四年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就这样在表面上的失敗下結束了。事实上，他們不过剛剛經歷了初步的斗争考驗。对此，總結下經驗是十分重要的。

第七章 总 结

祖国的希望和人类的将来正寄托在这个优秀的无产阶级身上。

人权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维纳尔特(一八三三年八月)

工人阶级的进步：阶级意识的觉醒、工人组织的增多、初期的工人积极分子的出现。——政治上不够成熟。——乌托邦思想的继续存在。

从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法国工人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已起着显著的作用。而这个时期的斗争，首先是它已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工人们参加了斗争。由于资产阶级在七月革命中欺骗了他们，工人们便起来斗争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和维护自由结社的权利。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重大的进步。他们的阶级意识觉醒了。

有一家工人的报纸^①写道：

“自从人民的事業真正胜利以后，工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力量，因为没有他们七月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也许连发动也发动不了；同时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资产阶级就要和他们分道扬镳了，因为资产阶级不再需要他们来反对那些特权阶级。这样，工人阶级养成了自尊心，不再信任高贵的阶级，而要求种种保证，要求提高工资，进行骚动和彼此联合。”

许多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家，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

^① 摘自一八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十七日“播种者”（见一九三六年巴黎版维纳尔特：“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的调查”所引）。

实际上,这种思想当时是很模糊的,很近似烏托邦思想。有些人不願一切定要找出一批馬克思以前的先驅者,結果是反而忽視日后科学的社会主义帶來的完全新的东西。这些人看不清当时工人的思想直接受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影响这一事实。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所有發展起来的東西,那就是法国工人直接反对剝削者的斗争以及在這些斗争过程中並且为了这个斗争,工人們接二連三地所建立的許多組織。

工人組織日益增多起来。有些工人甚至已达到这样的結論,即工人組織要强大,就應該終止分散的状态。必須

“把这些孤立的团体組織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总的协会;而且必須在这个工人大团体內設立一个各个个别团体都有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①

有些工人也体会到,工人的斗争除以經濟要求为目标外,还应加上政治活动。

縫衣工人格里农写道:^②

“我們不要忘記,現在只有富人在制訂法律,如果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样行使我們的公民权,那末我們是永远不会摆脱貧困的桎梏……”

格里农又說:

“我們並且必須向富人斗争,反抗妨碍大家获得有利的職業的壟断組織,成立一个人民的政府来强迫富人救济穷人。我們必須模仿里昂的工人强制压迫我們的僱主遵守法律。”

这些說法还是很模糊不清。組織一个政府来强迫富人救济穷

① “論国家一切团体的工人协会”,一八三三年巴黎出版,(署名者为厄弗拉汉)。

② “一个縫衣工人的回想”,其内容为:工人的一般貧困情况,劳动日的長度,工資的标准,工人和作坊主之間目前已經建立的关系,工人組織协会作为改善待遇的手段之必要性。署名者:格里农,縫工,巴黎人权社社員,一八三三年。

人，这种想法本身还是种空想主义。但是工人的幸福和政府的方針二者之間有联系，这一点总算是明确了。这是前进道路上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工人积极分子是出现了。其中大多数人的姓名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们常常在起义中或集会时涌现出来。在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往往在法官面前勇敢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辩护。他们的辩护词常常被印成小册子，这对教育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动人的例子便是缝衣工人普罗斯贝尔。他是在一八三二年为圣麦利修道院事件被逮捕的。他在法庭上丝毫不替自己作任何辩护，却攻击了统治阶级，他说：

“我从孩提时起就在不幸中长大起来的，我养成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习惯。我现在被你们控告，站在你们面前，但不管控诉的结局怎样，它却绝对吓不倒我。”

他带着调侃口吻——这种调侃的口吻已经成为巴黎工人的特点——对自己的不善词令表示歉意说：

“我因为得到慈善机关的帮助，曾经受过几个月的教育，除此以外没有受过别的教育。我自己承认本来不应该在此发言，因为我是国王的臣民，国家的公民，贫困的人，无产的人，粗鄙的人，不知还有些什么称呼的人。在这样的地方来发言对我来说是极不相称的。像我们这些老百姓竟敢和执法诸公对立起来，岂不是大逆不道的行径吗？似乎有人要我们养成一种习惯，给打击我们的人去祝福；而且我们如果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反对政府的活动，那当然活该受你们的怒骂了。”

他被判罪后毫不屈服，并且在孔西日里监狱里写道：

“因为我说了无产阶级者应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他们就把我判了罪，但这决不能使我的对方因此变成有理。判我罪并不能阻止我再三告诉他们，穷人的子女应该受更多的教育，这是应该给他们

的权利；贫穷的老年人和残废的人应该有可靠的安身之地；富人出钱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是什么行善施舍。世界上的任何惩罚都不能阻止我重复这些话。我这些话可以写在通衢大道上，正如同我现在写在孔西日里臭气薰人的监牢里一样。”

格里农和前述的制鞋工人厄弗拉汉不仅是通俗小册子的作者，而且是积极分子。他们为了把他们的同伴组织起来，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八三三年，格里农曾担任缝衣工人罢工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十二月二日，他经缺席裁判，被处五年徒刑和五年管制。判决后六天他才被捕，结果减为三年徒刑。他在法庭上陈述了缝衣工人的苦况以后，接着就提出大胆的警告说：

“不久以后，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首都的工人就会重复里昂工人的呼声，你们难道不怕吗？”

厄弗拉汉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领导过制鞋工人的斗争。一八三三年十一月八日，他在洛歇苏亚税卡检验场参加制鞋工人的集会而被逮捕。格里农和厄弗拉汉两人都以人权社社员资格参加过共和运动。

工人和共和主义者也在监狱里相遇并交流经验。对许多工人来说，圣贝拉基监狱变成了他们的大学。一个政治犯给我们留下一篇关于工人们在圣贝拉基狱做晚禱的动人描写：

“七月革命以后不久，圣贝拉基狱就开始有了晚禱的风气。在日落时候，无产者恭恭敬敬地把三色旗取下来，然后拿到院子里，大家围着旗站成一个圆圈。所有的共和主义者都来到，他们都崇奉平等思想，怀着愉快的心情集拢一起向三色旗致敬。大家随便站着，往时的回忆鼓舞着他们，大家反复地合唱着我们革命诗人的诗句。

一位参加者领头唱起‘出征歌’，立刻所有的人都齐声重复着

歌曲，然后大家另外唱一支讚美自由的歌。这些歌曲显得多么尊贵、高尚、卓绝！爱国主义思想沸腾起来，大家的心鼓舞起来，情绪激动起来，心灵昂扬起来，任何外物也不能打乱这样的热情！所有这些有力的、雄壮的声音，这种静寂，这种场合，这个被颂扬讚美的自由，这面三色旗的出现，所有这些满怀忠诚、满怀使他们的歌声更响亮、使他们的意志更坚定更强烈的信念的人们——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动人的盛典，一种充满希望的节日气氛，一种人人都准备捐躯成仁的祭礼！这是多么美丽！多么伟大！接着又唱‘巴黎曲’（其中有些词句被删去了）。然后又唱‘马赛曲’。这些歌唱得都很庄严，发自心灵的深处，大家都跪着。当歌曲唱完后，执大旗的人绕个圆圈，每个人都吻一下三色旗，然后大家站起来，郑重地目送别人把旗取走。接着大家就听到每座房屋的下面，一个粗大的声音用力地叫喊：‘锁门啦！’接着牢门隆隆地关上，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牢里。”^①

然而，这还是，而且只能是工人阶级在它解放道路上前进的第一步。

一、虽然工人们受到警察的镇压，骑兵队的冲击，自己的街壘被砲彈打穿，並且被效忠於资产阶级的法官无情地判罪，可是他们还識不透国家的阶级本质。就这一点来说，如我们前面已看到的，里昂絲織工人的第一次暴动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些絲織工人相信省长，他们甚至在警察局长面前开会议事。总之，他们是尊重现有的政府形式的。后来，在共和主义者的影响之下，他们才要求改革，特别是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但是对于这个明明是反对他们的国

^① 这是共和派记者阿芒·马拉斯特的记载。当时著名画家杜米埃也是聖貝拉基獄囚犯中的一个，因为他曾把路易-菲力普画成一个卡崗都亞型的巨人（拉柏雷小說中主人翁，有譯作高岡大的——譯者），坐在破椅子上，饑涎欲滴地吞噬农民和工人繳納給他的稅款。

家的阶级本质，他们却还是看不清楚。

二、自此以后，工人们是有了一个纲领了，至少是有些最积极的工人已提出了一个纲领。但这个纲领仍跳不出乌托邦的范围。对于压在他們身上的贫困，工人们只看到一种补救方法：就是结社。结社不但是为了斗争，而且还为了组织生产合作社。这就是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之间占统治地位的工人思想。瞧呀！如果工人们大家齐心协力，如果把他們微薄的积蓄放在一起，如果把这样聚集起来的钱购买生产工具，如果大家共同使用这些工具，那末他們就会胜利！只要通过竞争方法，他們就能把雇主們的顧客争夺过来，而把自己变成市场的主人。这是鞋匠厄弗拉汉的主张。必须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从消费者手里接受工作，然后分給社員去做”。这是行李箱工人和皮鞋工人的意見。他們在罢工中组织了合作作坊，直接为顾客做工。这种结合不久就垮了，而在组织那些合作作坊的人的思想中，这种结合应该在罢工结束后仍然能繼續存在下去的。当巴黎制鞋工人加入罢工时，他們准备

“筹集一笔社会資本，用来成立一个机构，保证本行的每一个会员都有工作，所得的利潤归行会所有。”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日，有几个細木工匠想成立一个生产协会，他們深信“总有一天会把巴黎全市的細木工匠都集合在一起”。

在这些方案中，要算儒勒·雷盧^①所制訂的方案最为突出。只要四千个或五千个巴黎印刷工人，每人每星期拿出一个法郎存在公庫里，就可以設立一个“大印刷厂”，可以把所有雇主的印刷厂都打垮。

同时共和主义者也在鼓励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人权社”就是

^① 他是社会主义者皮埃尔·雷盧的兄弟。他的小册子在一八三三年出版，書名：“肯印刷工人書。論設立协会俾使工人成为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之必要性。”

劝告工人不要罢工。他們說：

“經驗向工人們証明，这种反抗(指停止工作)不能給工人們帶來任何好处。这种藥比病本身还坏。”^①

因此必須增多协会。

“这种协会不能再被認为爭取高工价的联盟，而是一种合作团体，即为社会劳动的人們的协会。”

所以說，这种种想法完全是烏托邦思想。这是毫不足奇的，因为那时法国的資本主义还在發展的初期。大工業虽已出現，但仍占少数。占优势的还是中小工業而工人中的積極分子都是来自手工業。如上所述，他們不外是縫衣工人、制鞋工人、印刷工人。即使在工人众多的里昂，起重大作用的还是当师傅的工人，而他們是手工業者。这些積極分子为他們自己和整个工人階級只能設想手工業者的团体，而不能設想其他的經濟組織。生产工具虽然有了进步，但仍是很簡陋的。因此誰也不能禁止工人“夢想”着：經過共同的努力，依靠他們的积蓄或是依靠政府的帮助就可以取得这些工具(这种想法，共和主义者早已提出来过)。要使这种幻想烟消云散，还得要經過許多次失敗，尤其是要等到强大的生产工具發展到这种程度，使大家都認識到，只有集体剝夺靠剝夺为生的資本家，工人階級和整个人类才能有出路。

这就是以后几年中將發生的情形。

然而，里昂絲織工人的斗爭並不是徒勞無功的。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里昂工人的報紙“工場回声报”追怀他們說：

“安息吧，十一月起义的烈士！願压在你們身上的泥土不致於使你們感到沉重！……你們的鮮血滋潤了这片土壤，从那里一定会生長出無产者解放之树！”

^① 我們在本書第二卷中將要看到，后来普魯东也採取了这种見解。

大事年表

(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九四年)①

(一) 革命前的騷动

一七八八年	七月二十七日	維齐尔會議。
	八月八日	决定於一七八九年五月召集三級會議。
一七八九年	四月二十七日	雷万宏花紙工場焚毀。

(二) 制宪會議(一七八九年五月至一七九一年九月三十日)

一七八九年	五月五日	三級會議开会。
	七月九日	三級會議自行宣佈为制宪會議。
	七月十四日	攻占巴士提大獄。
	七月——八月	被称为“大恐怖”的农民起义。
	八月四日夜	封建制度开始摧毀。
	八月二十六日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十月五日六日	人民群众举行示威,路易十六被迫回返巴黎。
	十月二十二日	頒佈戒严法。
	十一月二日	教会财产沒收为国有。
	十二月十四日	發行国有产业代价券。
一七九〇年	七月十四日	联邦节。
一七九一年	三月二日至十七日	取消行会制度。
	六月十四日	通过“列·霞自立条例”。
	六月二十日	路易十六逃往發梭鎮。
	七月十七日	馬尔斯广场的屠杀。
	九月	一七九一年宪法完成。

① 我們在这里並不打算編制一个生产力和工人运动發展史的年表,我們在本書中已就此点指出其各个主要阶段。我們只想在此簡略地举出几个日期来帮助讀者把法国工人运动史同法国政治史結合起来研究。

(三) 立法會議(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至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七九二年	四月二十日	法國對奧宣戰。
	六月二十日	人民群眾在土伊勒里宮示威。
	七月十一日	宣佈“祖國在危險中”。
	八月十日	人民起義，王權顛覆。
	九月二十日	瓦爾米戰役的勝利。

(四) 國民公會(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甲) 吉倫特派控制下的國民公會(至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止)**

一七九二年	九月二十二日	共和國宣佈成立。
一七九三年	一月二十一日	路易十六上斷頭台。
	三月	萬第暴動開始。
	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	人民群眾示威。吉倫特派失敗。

(乙) 山嶽派控制下的國民公會(至熱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止)

一七九三年	六月二日	山嶽派取得政權，革命政府逐漸形成。
	六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	討論及通過一七九三年憲法。
	九月二十九日	頒佈全面限價法律。
	十二月四日(即共和國二年霜月十四日)	頒佈革命政府調整法令。
一七九四年	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三日	頒佈風月法令。
	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審判和處決阿貝爾分子。
	四月五日	丹敦分子被捕殺。
	四月十一日	取消奴隸制。
	六月二十五日	弗勒魯斯戰役的勝利。
	七月二十七日	羅伯斯庇爾失敗(共和國二年熱月九日政變)。

(丙) 熱月黨人控制下的國民公會(至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止)

一七九四年	九月十八日	實行政教分離。
	十一月十九日	雅各賓派俱樂部遭到封閉。
	十二月二十四日	取消限價法律。
一七九五年	三月	證券市場恢復活動。
	四月一日	巴黎人民騷動(共和國三年芽月十二日事件)。
	四月五日	法普締結和約(巴塞爾條約)。
	五月十六日	法荷締結和約(海牙條約)。
	五月二十日	巴黎人民騷動(共和國三年牧月一日事件)。
	七月二十二日	亡命分子軍隊在吉勃隆被擊潰。

七月二十二日	法西(班牙)締結和約(巴塞爾條約)。
八月二十二日	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三年憲法”。
十月五日	保王黨暴動(共和國四年葡月十三日事件)。
十月二十六日	國民公會解散。

(五) 督政府(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一七九六年	五月十日	巴貝夫被捕。
一七九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	巴貝夫被處死刑。
	十月十七日	法奧締結和約(坎波福米奧條約)。
一七九八年	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次反法聯盟。
	九月	兩個第三等級的破產。工業博覽會。
	十月九日	波拿巴自埃及回法。
一七九九年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即霧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拿破侖·波拿巴發動政變。

(六) 執政府(一七九九年十一月至一八〇四年五月)

一七九九年	十二月	通過共和國八年憲法,從此為個人權力开辟了道路。
一八〇〇年		法蘭西銀行創立。
一八〇一年	二月	法奧媾和(呂納維爾條約)。
	七月	拿破侖與教庭締結條約。
一八〇二年	三月二十五日	法英簽訂亞眠和約。
一八〇三年		實施工人身份証制度—“列·霞白定條例”的復活。—讓—巴地斯特·賽發表“政治經濟學論”。—聖西門發表“一個日內瓦居民致同時代人的書信集。”—亞眠和約破裂。
一八〇四年	三月二十四日	頒佈民法典。
	五月十八日	拿破侖建立帝制。

(七) 帝制(一八〇四年五月至一八一四年四月)

一八〇四年	八月四日	共和國十二年憲法:個人權力加強。傅立葉發表“萬國協調論”。
一八〇五年	十二月二日	奧斯特維利茲戰役的勝利。
一八〇六年		頒佈民事訴訟法典。—英國開始封鎖歐洲大陸。

一八〇七年	商法頒佈。
一八〇八年	大學組織法公佈。刑事審訊法公佈。傅立叶發表“四次運動論”。
一八一〇年	刑法典公佈。拿破侖帝國全盛時期，其權力遍及一百三十個省份。
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三年	經濟危機。
一八一二年	俄羅斯戰役。
一八一三年	德國戰役。
一八一四年	法國戰役。
四月六日	拿破侖遜位。

(八) 第一次復辟(一八一四年五月至一八一五年三月)

君主專制政體復活。通過憲章。

(九) 百日政變(一八一五年三月至六月)

三月一日	拿破侖由厄爾巴島潛回法國。
三月二十日	拿破侖到達巴黎。
六月十八日	滑鐵盧戰役，拿破侖失敗。
六月二十二日	拿破侖第二次遜位。

(十) 第二次復辟：路易十八(一八一五——一八二四年)和查理第十(一八二四——一八三〇年)

一八一五年	維也納會議發表反對拿破侖宣言。
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	白色恐怖。
一八一六——一八二〇年	立憲派取得政權。
一八二〇——一八二八年	極端保王黨政府成立。
一八二〇年	雙重投票法。報刊出版條例(出版許可証及檢查制)。
一八二二年	監督報紙條例。拉洛瑟爾兵變，四名中士被處死刑。
一八二三年	法軍對西班牙發動有利於反動派的戰爭。
一八二五年	頒佈宗教治罪條例。頒佈賠償政治亡命者十億法郎條例。
一八二六年	鉗制報刊及恢復長子繼承權條例均歸於失敗。
一八二七年	反對派紛紛舉行示威。資產階級反對派取得過

	举胜利。
一八二八——二九年	馬丁雅克組閣。
一八二九年	坡林雅克組閣。反对派的进展。
一八三〇年 七月五日	發动对阿尔及利亞的侵略(攻占阿尔及尔)。
七月二十五日	查理第十頒佈非常敕令。
七月二十七、八、九日	“光荣的三天”(七月革命)。

(十一) 七月王朝的初期(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四年)

一八三〇年 八月	路易·菲力普宣佈为法国国王。一修改宪章以保証资产阶级的优越地位。
十一月	銀行家拉菲特組閣。
十二月	查理第十各大臣受审,人民举行示威。
一八三一年 二月	聖日尔曼—洛賽魯阿騷动。
三月	銀行家迦西米·彼利厄繼銀行家拉菲特組閣。
十一月	里昂絲織工人起义。
一八三二年 六月	聖麦利修道院的暴动。
一八三四年 四月	里昂和巴黎起义。

人名对照表

A

Abraham, Gabriel 迦勃利埃·亞勃
拉汉
Adeikhanov 阿德里汉諾夫
Aillard 亞拉尔
Amilhau 阿米洛
Angoulême 昂古里姆
Antonelle 安东納尔
Argenson 阿尔尚松
Argout(d') 达尔古
Aristote 亞里士多德
Arkwright 阿克萊特
Armonville, Jean-Baptiste 讓-巴
底斯特·亞尔蒙維勒
Artois 亞尔多亞
Aymard 亞瑪尔

B

Babeuf, Gracchus 巴貝夫
Bara 巴拉
Barbier 巴尔皮厄
Barillon 巴利翁
Barnave 巴尔那夫
Barrat 巴拉特
Barraud 巴洛
Barthe 巴尔特
Basterrêche 巴斯特雷希
Barthélemy 巴尔戴萊米
Bauwens 波文
Belin 白蘭

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貝爾納
丹·德·聖皮埃爾
Berry 貝利
Berthier 倍基埃
Bidegaray 皮德加萊
Blanc, Louis 路易·勃朗
Blanqui, Auguste 奧古斯特·布朗
基
Bloch, Joseph 布洛克
Boissy d'Anglas 波亞西—唐格拉斯
Bonnet 彭奈
Bouglé 布格萊
Bourbon 波旁
Bourmont 布尔蒙
Bouvier-Dumolard 布維埃—杜摩拉
Bret 勃萊
Bretèche(La) La Bourdonnais
拉·勃勒特希·拉·布尔杜納
Brunswick 不倫瑞克
Bugeaud 布喬
Buonarroti 布亞納羅梯

C

Cahen 加恩
Calvin 喀尔文
Campanella, Thomas 托馬斯·康帕
內拉
Carié 加里埃
Carle, Guillaume 吉奧·喀尔
Cartwright 卡特萊特
Castellane 加斯特拉納

Caussidière 科西捷尔
 Chaptal 夏柏泰
 Charles X 查理第十
 Charlèty 沙尔莱梯
 Charnier, Pierre 皮埃尔·沙尔尼埃
 Chastel 夏斯德尔
 Chateaubriand 沙多布利安
 Chrétien de Troyes 克莱第安·德·
 特尔瓦
 Colbert 科尔伯
 Collot 科罗
 Coux(de), Charles 查理·德·古
 Croy 克盧沃

D

D'Alembert 达兰贝尔
 Danton 丹敦
 Darthé 德尔特
 Daumier 杜米埃
 David 达微德
 Debon 德朋
 Delessert, Benjamin 朋谢明·
 德勒塞尔
 Delessert, Etienne 埃基埃纳·
 德勒塞尔
 Demachy 德马希
 Desmoulins, Camille 德姆连
 Destut de Tracy 德斯士·德·特拉西
 Diderot 狄德罗
 Dietrich 第特利希
 Dolivier, Pierre 皮埃尔·多利维
 Dolléans, Edouard 爱德华·道莱昂
 Dollfus 杜尔富斯
 Dollfus-Mieg 杜尔富斯-米埃格
 Drouet 德鲁叶
 Dumoulin 杜穆林
 Dunoyer 杜诺叶

Dupin 杜平
 Duplay 杜柏莱
 Duplay, Simon 西蒙·杜柏莱

E

Efrahem 厄弗拉汉
 Erckmann-Chatrian 爱尔克曼-沙特
 里安
 Eschassériaux 埃斯夏塞里奥
 Esopet 艾索贝
 Etienne-Marcel 艾顿·马赛

F

Favre, Jules 儒勒·法佛尔
 Féraud 费罗
 Fieschi 费爱斯希
 Forcel 佛尔塞
 Foucault 富戈
 Fouché 傅息
 Foulon 富龙
 Fourier, Charles 傅立叶
 Frachon, Benoît 贝诺瓦·弗拉尚
 François Ier 弗朗索瓦一世
 Frayssinous 弗雷西努
 Fulchiron 富希龙

G

Gasparin 卡斯贝林
 Gerault-Richard 谢洛-里查尔
 Germain 谢尔曼
 Girard, (de) Philippe 普力普·德·
 吉拉尔
 Gisset 季斯盖
 Gournay 古纳
 Grégoire 格莱古里
 Grignon 格里农
 Grisel 格里塞尔

Guasquet, (de) R. P. Hyacinthe 亞
森特·德·加斯盖神甫
Guesde, Jules 儒勒·盖德
Guibert de Nogent 吉倍·德·諾尙
Guizot 基佐

X

Hamon, Augustin 奧古斯丁·霍蒙
Henri IV 亨利第四
Hentsch, Henri 亨利·亨許
Hottinguer 雷丁盖尔
Humblot-Conte 亨勃洛—康特

I

Isabey 伊薩倍

J

Jacquard 賈卡尔
Jaurès, Jean 讓·若列斯
Javogues 雅伏格
Jouhaux, Léon 雷昂·若奧

K

Kay, John 約翰·凱伊
Koechlin 葛許林

L

La Bruyère 拉·布呂耶尔
Lacombe 拉貢勃
Lafargue, Paul 保尔·拉法格
La Fayette 拉法夷特
Laffitte 拉菲特
Lagarde, Huges 佑格·拉卡德
Laignelot 萊尼罗
Lamarque 拉馬格
Lamarche 拉馬墩
Lamartine 拉馬丁

Lambiot 郎勃洛
Lamennais 拉梅納
Lange 朗琪
Laponneraye 拉波尼拉依
Laurent 勞倫
Leblanc 勒勃郎
Le Chapelier 列·霞白立
Le Couteux 勒古德
Lefebvre, Georges 乔治·勒費佛尔
Le Leap, Alain 阿蘭·勒里普
Lemonnier 勒蒙尼爱
Lenoir-Dufresne 勒諾亞—杜費雷斯
納
Lepelletier, Félix 費里克斯·勃柏勃
基埃
Lepelletier de Saint-Fargeau 勒不
勒基埃·德·聖發尔乔
Leroux, Jules 儒勒·雷盧
Levasseur 勒伐伐塞
Liebkn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Lime, Pierre 皮埃尔·里姆
Lombard 隆巴尔
Louis-Philippe 路易·菲力普
Ludham, Nel 納德·魯德
Luxembourg, Rosa 罗莎·盧森堡
Lynch 林希

M

Madelin, M. 馬德林
Mallet 馬萊
Mandat 芒达
Marat 馬拉
Marcal, Etienne 艾丁納·馬賽
Maréchal, Sylvain 西尔文·馬萊歌尔
Maret 馬雷
Marmont 馬尔蒙
Marrast, Armand 亞芒·馬拉斯特

Martignac 馬丁雅克
 Mary, Pierre-Jean-Baptiste 皮埃
 尔—讓—巴底士达·馬利
 Mathiez, Albert 阿尔培·馬基埃斯
 Mayet 梅露
 Mercier 迈尔西爱
 Metternich 梅特涅克
 Michelet 密歇莱
 Millerand 米勒蘭
 Mirabeau 米拉波
 Monfalcon 蒙法尔貢
 Monmousseau, Gaston 加斯东·蒙
 慕索
 Morely 摩勒里
 Morus, Thomas 摩尔
 Mun(de), Albert 亞尔培·戴孟

N

Neufchateau(de), Francois 佛朗梭
 亞·德·納夫沙朵

O

Oberkampf 奥伯尔康夫
 Ordonneau 奥多諾
 Orléans 奥尔良(公爵)
 Ouvrard, Gabriel-Julien 迦勃利埃—
 徐里恩·烏弗拉尔

P

Papin, Denis 德尼·巴宾
 Pasquier 巴斯基叶
 Pasquier-Labruyère 巴斯基叶—拉布
 吕耶尔
 Pataud 巴托
 Pérard 貝拉尔
 Perier 彼利厄
 Périer, Michel-Ange 米歇—安日·

柏利埃

Perrée 貝雷
 Perrégaux, Jean-Frédéric 讓·弗
 雷德里克·貝雷哥
 Petiet 柏基埃
 Petion 佩基翁
 Peuchet 潘雪
 Plékhanov 普列汉諾夫
 Pointe, Noël 諾埃·普恩德
 Polignac, Jules 坡林雅克
 Pottier, Eugène 艾任·鮑狄埃
 Pougy 普琪
 Poupert de Neuflyze 布尔巴尔·德·
 奈弗里茨
 Prospert 普罗斯貝尔
 Proudhon 蒲魯东
 Prunelle 普魯納尔

Q

Quentin 肯亭
 Quesnay 奎納

R

Raoul 拉烏尔
 Récamier 雷加米埃
 Reclus, Maurice 莫里斯·勒克魯
 Réveillon 雷万宏
 Ricard 里加尔
 Richard 利夏
 Richard-Lenoir, Francois-Richard
 利夏—利諾亞, 弗郎索亞—利夏
 Richelieu 黎塞留
 Robais(van) 望罗倍
 Robespierre 罗伯斯庇尔
 Robillard 洛皮亞
 Rodrigues, Olinde 奥林德·罗德里
 格

Ricord 里哥尔
 Roederer 洛德莱
 Roguet 罗盖
 Roland de la Platière 罗兰·德·
 拉·伯拉第埃尔
 Romme 罗姆
 Rothschild 洛特雪
 Roubo 鲁波
 Rouget de L'Isle 卢热·德·里列
 Roure(de), Antoine 安东尼·德·陆
 尔
 Roustel 卢斯特
 Royer 洛耶爱

S

Saint-Just 圣茹斯特
 Saint Louis 圣路易
 Saint-Marc Girardin 圣马克·吉拉
 廷
 Saint-Morc(de), Benoît 柏奴瓦·
 德·圣摩尔
 Saint-Simon(de) Claude-Henri 圣
 西门
 Salaberry 沙拉培里
 Santerre 桑特尔
 Say, Jean-Baptiste 让-巴地斯特·
 赛
 Schatzel 沙撒尔
 Schmidt, Charles 查里·希米特
 Schneider 许奈特
 Sémonville 塞蒙维尔
 Sévène 塞维纳
 Sévigné 塞维尼
 Sieves 西哀士

Sismondi 西斯蒙第
 Solages 索拉热
 Soult 苏尔特
 Spartacus 斯巴达克
 Stendhal 斯丹达尔
 Syriens de Marinhac 西里埃斯·
 德·马林亚克

T

Tarlé, Eugène 欧仁纳·泰尔莱
 Taupin 托宾
 Ternaux 特尔诺
 Thiers 梯亥尔
 Toynbee, Arnold J. 亚诺尔德·
 约·托因比
 Tubeuf 屠包夫
 Turgot 杜尔果

V

Vernes 维尔纳
 Vernier 浮尼埃
 Viala 维亚拉
 Vignerte 维纳尔特
 Vigny(de), Alfred 维宜
 Villèle(de) 德·维莱尔
 Volguine(Волгин) 伏尔金
 Voltaire 伏尔泰

W

Wage, Robert 罗伯·瓦斯
 Watt, James 詹姆斯·瓦特
 Wellington 惠灵顿
 Wells 威尔斯
 Wendel(de), Charles 温德尔

地名对照表

A

Abbeville 阿貝維爾
Agen 亞尚
Aisne 愛斯納
Aix 愛克斯
Alençon 亞蘭松
A'ès 阿來斯
Alpes 阿爾卑斯山
Alsace 亞爾薩斯
Amiens 亞眠
Andrézieux 安德列濟安
Angers 翁熱
Aniche 阿尼希
Antilles(les) 西印度群島
Anzin 安辛
Arbois 亞爾波亞
Ardèche 阿爾德什
Ardennes 亞爾台納
Argonne 阿爾貢納
Arles 阿里
Arras 亞拉斯
Arsenal 亞森納
Artois 亞爾多亞
Aubry-le-Boucher 奧白里勒波榭
Aubusson 奧勃松
Autun 奧頓
Auxerre 奧克薩爾
Avisy 亞維里

B

Bagnolet 巴涅萊
Bastille 巴士提
Bayonne 貝約納
Beaubourg 波滿爾
Beauce 包斯
Beaune 包恩
Beauvais 波維
Bauvaisis 波維西
Bedaricux 貝達利歐
Bellecour 貝勒古爾
Beileville 貝勒維爾
Béziers 貝西爾
Blois 布洛亞
Bolbec 波爾培克
Bon Pasteur 蓬巴斯特
Bordeaux 波爾多
Boulogne 波羅尼
Brest 布勒斯特
Bretagne 不列塔尼
Brotteaux 勃洛托
Bruges 布魯熱

C

Cadran 加德朗
Caen 加恩
Canteleu 康特路
Carhaix 卡爾萊
Carmaux 卡爾蘇
Carmélites 加爾美里特

Carrousel 迦魯索
 Cateau(Le) 卡托
 Chailand 夏蘭
 Chaillet 夏乐
 Champs-Élysées 香榭丽舍
 Camp-de-Mars 馬尔斯广场
 Chalon-sur-Saone 夏龙許索恩
 Champagne 香檳省
 Charonne 沙罗納
 Chaumont 崑蒙
 Cher 舍尔
 Clairvaux 克利伏
 Clermont-en-Beauvaisis 克勒蒙—
 昂—波維西
 Clément-Ferrand 格萊蒙—斐龙
 Clément-L' Hérault 格萊蒙—萊洛
 Coblence 科不林士
 Commeny 谷夢特里
 Compiègne 貢比泉
 Concarneau 貢卡尔諾
 Conciergerie(la) 孔西日里
 Cordeliers 科尔德利
 Corse 科西嘉
 Cote-d'Or 谷特多
 Crau 克魯
 Creusot 克勞索
 Croix-Rouge 克洛瓦—魯日
 Croix-Rousse 克洛瓦—魯斯

D

Darnetal 达尔納塔
 Dauphiné 道費奈
 Dax 达克斯
 Dijon 第戎
 Douai 杜亞
 Douarnenez 杜阿尔内奈
 Doubs 杜省

E

Elbe 厄兒巴
 Elbeuf 艾尔勃夫
 Epinal 爱比那
 Etampes 厄当普
 Evreux 埃佛安
 Eylau 埃洛

F

Finistère 斐尼斯堆
 Flandres 弗蘭德
 Fourchambault 福香博
 Fourvières 富尔维尔
 Fumay 富梅

G

Gand 康特
 Gironde 吉倫特
 Gobelins 哥柏林
 Gourguillon 古尔基翁
 Gournay-sur-Marne 古尔奈許馬恩
 Grand'-Cote 格朗谷特
 Granville 格朗维尔
 Grenelle (camp de) 格勒納營
 Grenelle(Fontaine de) 格勒納泉
 Grenoble 格勒諾布尔
 Guillotière 紀約基埃

H

Halles(les) 阿尔区
 Haut-Rhin 上萊因省
 Haute-Normandie 上諾曼第省
 Haute-Vienne 上維也納省
 Hayange 哈揚日
 Hérault 愛洛
 Hondschoote 翁特舒

Houlme 胡尔姆

I

Indret 印德雷

Isère 依塞尔

J

Jaegerthal 賈热达尔

Jouy-en-Josas 茹伊昂约萨

Jardin-des-Plantes 植物园

Juan(Goife) 讓港

Jura 汝拉

L

Laigle 萊格尔

Landes 蘭德省

Langres 郎格尔

Languedoc 郎格多克

Laonnais 拉翁

La Plata 拉布拉达

La Rochelle 拉罗舍尔

La Villette 拉維萊特

Le Havre 哈佛尔

Le Mans 勒曼

Levi(Tour) 勒維塔

Ligny 里尼

Lille 里尔

Limoges 里摩日

Limousin 利穆辛

Litry 利特雷

Lodève 洛台佛

Loire 罗亚尔

Loire-Inférieure 下罗亚尔省

Lombardie 隆巴迪

Lorraine 洛林

Louisiane 路易西那

Louveciennes 盧維西納

Louviers 盧維埃

Louvre 盧佛宮

Lunel 呂納尔

Lunéville 呂納維尔

M

Mâcon 馬貢

Maine 梅恩

Maine-et-Loire 梅恩-罗亚尔

Marais(le) 馬蘭

Mareil 馬雷

Marly 馬尔里

Marne 馬恩

Mauchamp 莫桑

Mauconseil 摩貢賽

Meaux 摩城

Metz 麦茨

Montargis 蒙泰琪

Montbazin 蒙巴辛

Montpellier 蒙貝利埃

Montreuil 蒙特婁

Moselle 莫塞尔

Moyeuve 莫龙弗尔

Mulhouse 牟罗兹

N

Nantes 南特

Naples 拿不勒斯

Nevers 內維尔

Niederbronn 尼得布倫

Nièvre 尼埃夫

Nimes 尼姆

Nivernais 尼維內

Noisy-le-Sec 諾齊勒塞克

Nord 諾尔

Nord-Est 諾尔-厄斯特

Normandie 諾曼第

Noyon 諾翁

O

Océon 奧迪翁

Oise 瓦斯河

Orléans 奥尔良

Orne 奥尔纳

Ours(Re aux) 大熊街

P

Pas-de-Calais 巴特加莱

Passy 帕西

Pépinère 貝比尼埃

Picardie 比卡第

Provins 普罗文

Q

Quercy 釐尔西

R

Raincy 蘭西

Reichschoffen 賴喜索芬

Reims 冷斯

Remiremont 利米利蒙

Rhénanie 莱因区

Rive-de-Gier 里維德基爰

Rillieux 里利欧

Rimogne 利馬尼

Riom 里欧姆

Rives 里維

Roanne 罗亞納

Rochechouart 洛歇苏亞

Rochefort 罗什福尔

Rocher 洛歇

Romainville 罗曼维尔

Roubaix 魯貝

Rouen 盧昂

Roule 路尔

Roze 罗叶

S

Saint-Antoine 聖安东尼

Saint-Cloud 聖克魯

Saint-Denis 聖德尼

Saint-Etienne 聖田亞

Sainte-Geneviève 聖日內維佛

Saint-Georges 聖乔治

Saint-Germain 聖日尔曼

Saint-Germain-l'Auxerrois 聖日
尔曼-洛賽魯阿

Saint-Gobain 聖哥賓

Sainte-Hélène 聖海倫

Saint-Honoré 聖奧諾雷

Saint-Jacques 聖雅克

Saint-Laud 聖婁

Saint-Marceau 聖馬尔索

Saint-Marcel 聖馬塞爾

Saint-Martin 聖馬丁

Saint-Menehould 聖麥納黑

Saint-Merry 聖麥利

Saint-Michel 聖米歇爾

Sainte-Pélagie 聖貝拉基

Saint-Quentin 聖奎丁

Saion 沙龙

Saône 索恩

Sedan 色当

Seine 塞納

Seine-Inférieure 下塞納省

Sèvres 塞維爾

Somme 索姆

Soues-en-Tarbes 苏昂尔白

T

Tarascon 塔拉斯貢
 Temple 唐布尔
 Terreaux 台罗
 Terrenoire 特勒諾頭
 Thiers 基埃爾
 Tiflis 梯弗里斯
 Touion 土倫
 Toulouse 土魯斯
 Tournaville 都拉維爾
 Tournai 土爾內
 Tournus 土爾奈斯
 Tours 都爾
 Transnonain 特朗斯諾南
 Trompette 脫龍貝特
 Trône(place de) 寶座廣場
 Troyes 特洛瓦
 Tuileries 土伊勒里宮

V

Vaise 懷茲

Valencinnes 瓦林西納
 Valmy 瓦爾米
 Var 華爾
 Vendée 萬第
 Vendôme 萬杜姆
 Versailles 凡爾賽
 Vienne 維也納
 Vierzon 維愛松
 Vivarais 維瓦萊
 Vizille 維齊爾
 Voiron 伏亞龍
 Vosges 孚日山

W

Waterloo 滑鐵盧

Y

Ypres(Belgique) 依普爾(比利時)

